

允晨叢刊 50

林瑞明 著

# 台灣文學

與

# 時代精神



賴和研究論集

H E T



### 本書簡介

■ 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是台灣日本統治時期最重要的文化人。出生第二年，日本即佔領台灣，一生有「我生不幸為俘囚」的強烈感嘆。出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長年於彰化地區懸壺濟世，仁心仁術，夙有仁醫之美譽，民間甚至以「彰化媽祖」稱之。終其一生以文化抵抗的方式，堅決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表現在文學上，使他成為台灣文學抗議精神的代表性作家；表現在政治上，則是社會運動的中堅人物之一。

■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著重探討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運動兩個領域中的貢獻，廣泛從文化、政治，社會運動關係，考察其在台灣近現代史上所處的位置。

ISBN 957-9027-94-3 (820)



789579 027946

00380



#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  
賴和  
研究  
論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 / 林瑞明

作.--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

臺北縣三重市：黎銘總經銷，民 82

面； 公分.--(允晨叢刊； 50)

ISBN 957-9027-94-3 (平裝)

1. 賴和 - 傳記 2. 臺灣文學 - - 歷史

820.908

82004866

允晨叢刊 50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賴和研究論集

作者：林瑞明

發行人：丁元春

主編：呂美女

執行編輯：鄭竹旻、楊家興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服務電話：(02)507-2606(代表號)

傳真：(0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

一版二刷：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製：欣佑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總經銷：黎銘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大智街139號

電話：(02)981-8089(代表號)

傳真：(02)981-3049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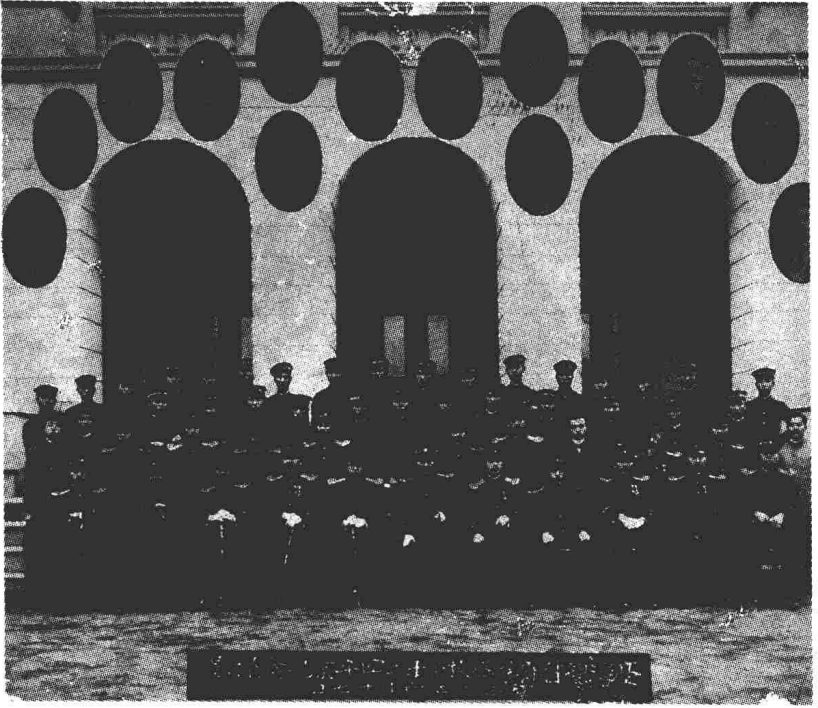
定價：新台幣380元

ISBN 957-9027-94-3

生活剪影



就讀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入  
學初期仍綁辮子。(1909年)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照。(1914年)



賴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證書。(19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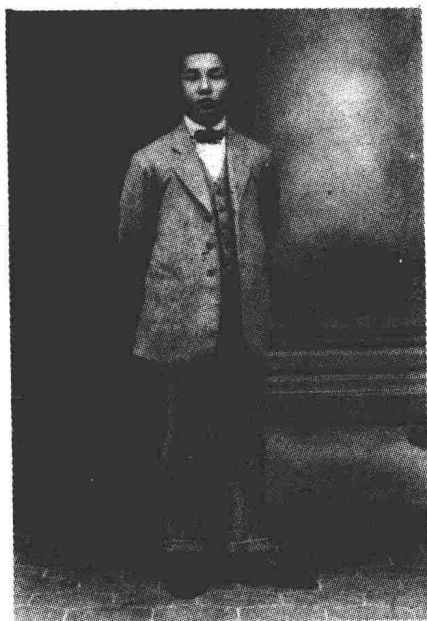
青年時代的賴和，可能攝於廈門。



廈門博愛醫院時期，中排右起  
第五人是賴和。(1919 年左右)



1920年代的賴和。



家族合影。後排左起第二人是賴和。





穿「本島衫」的賴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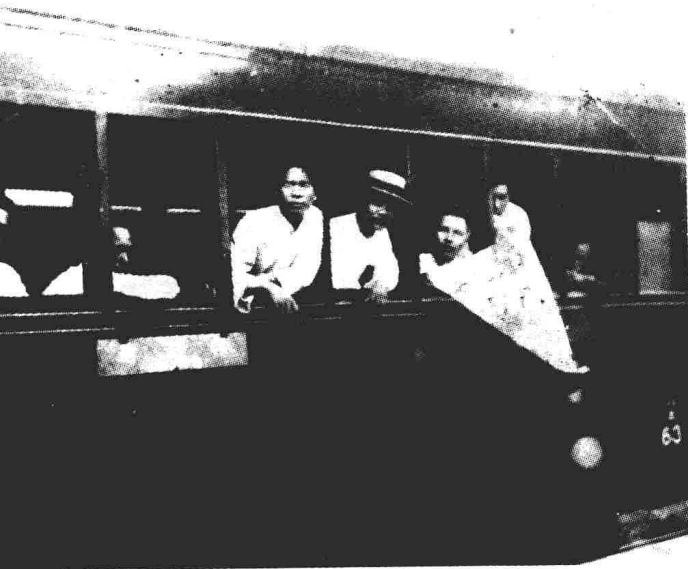
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  
賴和被捕入獄；1924年1月  
7日午後7時出獄，與歡迎者  
合影，歡迎者戴帽，出獄者脫  
帽。前排中理光頭者是賴和。

(1924年)





台灣文化啓蒙者群像，後排右四施至善，右五賴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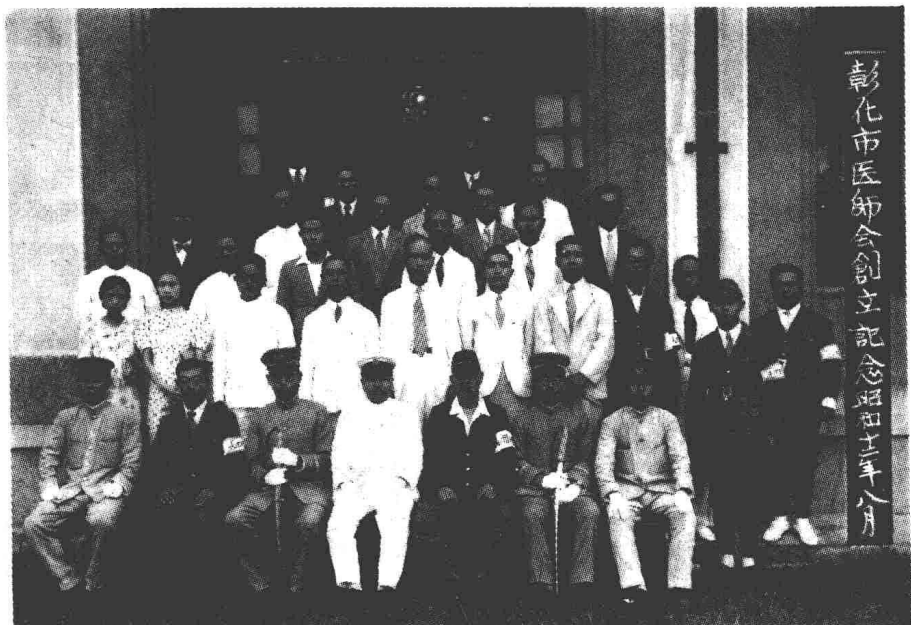
文化協會會員搭車出發演講，中間戴草帽者是賴和。



新文協於彰化座演講的場面。



賴和與友人合影。左起李中慶、詹樞柏、施至善、王敏川、吳石麟、賴和。其中施、王、賴，人稱「彰化三枝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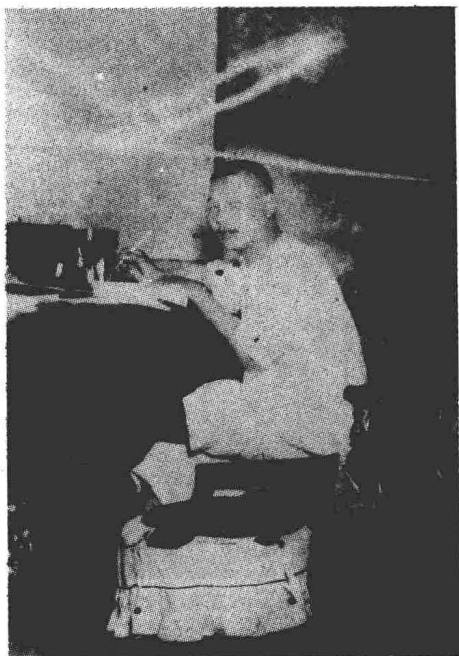


賴和穿「本島衫」出席彰化市醫師會創立紀念式。(1937年)

賴和 1939年日本之旅，左起賴和、李中慶。



賴和於醫院行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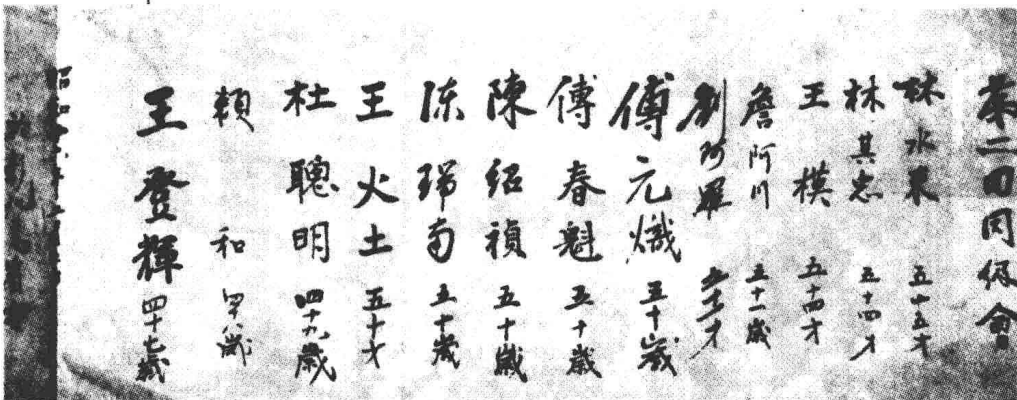


與友人合攝於寓所。後排左起賴和、陳虛谷、楊木；前排左起葉榮鐘、陳紹馨、莊垂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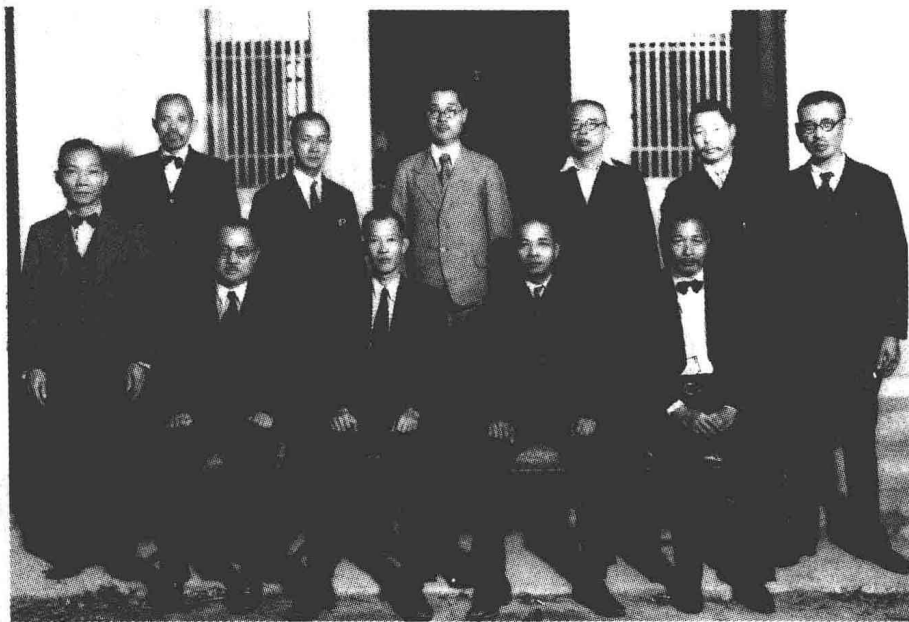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14 年班  
第二回同級會。前排左四杜聰明，  
後排左二賴和。(1941 年)



簽名單



應社詩友合影。前排左起渭雄、笑儂、懶雲、虛谷、雪峰；後排左起守愚、雲鵬、錫勳、衡秋、石華。(1942年)



賴和幼年時學習漢文的小逸堂同窗會，後排右起第二人是賴和。(1942年)

賴和晚年留影。



賴和先生追悼會。左一賴和之弟賴通堯，左三次子賴波。長子賴榮留學日本未及趕回。

(1943年)





## 自序

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動所導致。起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外在因素無疑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

二〇年代以來的台灣新興知識分子強調文學功能論，負起文化啓蒙的重責大任。這種以啓蒙、教養進而爭取民衆爲主的價值取向，貫串於二、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儘管各自有著不同的構造，但此三大論爭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聯繫與顛覆之關係，最終的走向，則是企圖在文學與大眾之間搭上橋樑，作爲文化上解放台灣民衆的預備，並且透過影響從而希望在政治上改變弱小民族的命運。這樣的結論，在台灣話文派健將郭秋生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南音》第一卷九·十合刊號的〈再聽阮一回呼聲〉，表達得最爲清楚，郭秋生批評中國話文派的人是「望洋失海的事大主義者」，

是「引底里先生」(インテリゲンチア intelligentsia)，已充分表達其台灣左翼運動者的立場，在該文中郭秋生痛切呼籲：

四百外萬的兄弟姊妹！過再細詳聽阮一回呼聲！「建設台灣話文的確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無解開掩滯目矔的手中，什麼光明都是黑暗，同樣無基礎滯台灣話文的一切解放運動，都盡是無根的花樣。」

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爭所帶動的台灣話文學的出現，雖然因漢字無法充分表達台灣口語，必需借字、借音或造新字，在書寫／閱讀兩方，一時之間各有其既存的困難存在。但努力以台灣語文創作，實際上代表著受左翼運動影響的作家以台灣大眾為對象並爭取大眾的共鳴同感，這是大眾化取向文學論最純粹的例証，細究其深層意義，則是確立了以土地與人民為中心的台灣文學主體性論述。

從一九二〇年七月陳炳於《台灣青年》創刊號發表〈文學與職務〉以來，台灣文學革命論者在「文言一致」的理念下，首先否定了傳統舊文學的言文殊途，白話文學提倡者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等人都有這樣的共識，但是到底普及中

國白話文，還是台灣白話文？黃呈聰一九二三年一月於《台灣》四年一號，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文中，主要還是強調：「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國的白話文，漸漸接近他，將來就會變做一樣」。同一文中後段，因應台灣現實與因抗拒日本的同化而自然存在的「祖國憧憬」，黃呈聰提出這樣的看法：

我要勸告初學的人，當初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言語，做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總是這個方法是一時的方便，後來漸漸研究，讀過了中國的白話書，就會變做完全的中國白話文，才能達到我們最後的理想，就可以永久連絡大陸的文化了。

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階段，關於語言操作最具代表性的意見，顯現二〇年代日本殖民地台灣，漢民族意識仍然相當強固，然而政治上受日本的支配，要靠一般社會大眾自我學習，好使中國白話文在台灣生根，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已成日本籍的台灣人，從小在學校受教育學的是日文，日常語言是台灣口語，普遍不具中國白話文說寫的能力。如是台灣作家創作時需努力將思考的語言先寫成漢文，再翻寫

爲中國白話文，而讀者閱讀作品時則需要在腦海中再次自動翻讀成台灣話文。作者與讀者在書寫／閱讀之間，一來一往，煞是費勁，更何況白話文的理想是「我手寫我口」，當作品不能以口語順讀時，還是無法趨向言文一致。

一九二五年則是新舊文學論爭的年代，儘管論戰所涉萬端，大抵上可歸結到新文學所表現的新精神與言文一致兩點。台灣的中國留學生張我軍主張屈話就文，並有改造台灣語言（以接近中國白話文）的企圖，就文學發展的實際成果而言，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同，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爲主，但同時亦摻雜台灣的日常用語。事實上賴和的表現方式，才是二〇年代台灣文學創作的主流，如張我軍一樣操作中國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反倒是少數。這當中不僅說明在新文學的陣營中存在著歧異的狀況，也預示了三〇年代屈文就話的台灣話文派之出現，同時也顯示出新興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寫實」特徵。賴和與張我軍的差異，一方面是受到環境制約（一在台灣，一在北京），但可能也涉及到對「言文一致」概念理解差異所致。就賴和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爲主，有其操作上的方便（可避過一些無法以漢字充分書寫的台灣白話音），摻雜台灣語詞，則是強調了「寫實」精神取向，這就涉及了個人對文學現實理解的選擇與判斷，台灣主體性顯然亦是思

索的方向之一。以新舊文學論爭而言，爲了向上台灣文化，屈話就文的主張因較方便於操作，二〇年代的文學創造，大抵便依循中國白話文爲模仿的對象，然而亦因應台灣的現實環境，賴和的台灣式中國白話文的表現方式起了主導性的作用。

隨著社會運動的日漸激進化，階級運動的色彩也愈形強烈，台灣主體性意識越加顯明。黃呈聰主張的折衷的白話文在文學的表現上，還是無法契合台灣有別於中國的實際需要，終於在三〇年代受到郭秋生等台灣話文派的挑戰，甚至加以顛覆，這除了是語言／文字的操作問題之外，還跟左翼政治運動尋求台灣獨立解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文化戰線上首先突出鄉土文學論爭的黃石輝，其社會運動的角色是隸屬於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分裂之後的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他在一九三〇年八月於《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其論旨主要強調：鄉土文學就是描寫台灣事物的文學，規範了以台灣爲對象，而文學爲了能夠與廣大的勞苦大眾產生共鳴，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古文，亦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興知識分子提倡的脫離台灣現實之中國白話文，而非使用勞苦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不可，黃石輝提倡鄉土文學，是從文學大眾化的立場著

眼。從語言的觀點，也進一步強化了寫實主義的精神。不難明白，強調鄉土文學，就不能不提倡在現實上多數台灣人所使用的共通語，台灣話文即是最好的選擇，這當中實含有爭取大眾的思考：一九三一年七月即有郭秋生於《台灣新聞》發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而掀起了台灣話文論爭，強調要消除文盲，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寧可屈文就話，而不要走向屈話就文這樣一條路。郭秋生年輕時代曾就讀於廈門集美中學，以後回到台灣，他操作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在當時是屬於最成熟的人之一，然而寧可捨棄慣常使用的中國白話文，而大力提倡台灣話文，這反映出台灣文學的走向面臨關鍵性的轉折期，其背後的重大的意義，則是立足於台灣解放運動。無疑的黃石輝、郭秋生兩人都是三〇年代台灣左翼文化戰線的戰將，從他們的言論、主張，可以看出在抵抗日本的過程中，台灣意識已具體成型，台灣人發現了自己的新身份——弱小民族必要追求獨立解放。

經過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之後，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概念更加確立，顯示出一九三〇年代殖民地台灣表現出來的新文學，既非日本文學的支流，也非中國文學的亞流。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已經成立了獨樹一幟的台灣文學。一九三二年二月周定山（一吼）即在《南音》一卷六號，發表了一篇短文〈拍賣民衆〉，其中一

段如是云：

「向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奴隸根性的徒抱殘闕！恐怕才是永不超生呵？這種依賴民族劣心理，不是：「已經不顧大眾而走入反動的路上」去跪磕他人嗎？呸！蠢也廣告！〈按：「跪磕」兩字，原文誤印為「跑磕」。〉

這是三〇年代在台灣文學概念成立之後，反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看法中最激情而具主見的言論。九〇年代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反省。正視台灣文學的特性與發展，必要先確立台灣文學演變過程所呈現的主軸，而這一切仍需回到歷史文獻去找尋！

在殖民地台灣最能具體反映時代精神 (Zeitgeist) 的代表性作家即是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他歷經台灣文學的三大論爭，以其文學創作忠實地描繪了二、三〇年代他所看到的一切事務，沒有恐懼也沒有偏愛，成為時代的一面明鏡。本書主要的兩篇論文，一篇是〈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撰寫時曾得哈佛大學燕京社資助，原發表於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號。本文由已刊詩文及賴和未刊遺稿，追溯在

文學革命的風潮中，賴和得風氣之先，以新文學創作，首先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基礎，並深遠影響同時代及後代的台灣作家，形成蓬蓬勃勃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爲了深入研究，探索賴和的家世背景，求學過程以及渡海前往廈門任職博愛醫院，又回歸台灣的心路歷程；作品則分成三個階段，觀察賴和從一九二五年至三五年，十年間的新文學創作過程及其轉折；文學內涵則著重於探討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強調賴和經由創作，一則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一則譴責日本統治者不義之法，從而論證賴和的新文學作品，深刻的紮根於現實，追尋理想的世界；另外一篇〈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三一）〉，分爲上、下兩期刊於《台灣風物》三十八卷四期及三十九卷一期。本文試圖透過賴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全程活動，從文協成立、分裂、再分裂以迄結束的脈絡，探討當時多方面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原致力於提昇文化，進而爭取殖民地民眾的政治權利，歷經一九二七年「左右傾辯」的對峙，賴和處身於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兩條政治路線中，以堅強的抗日決心，以不具領袖性的性格及其包容力，支援日據下台灣左右兩翼的社會運動，從而呈現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掙扎的痕跡。

其餘諸篇，則環繞著相關問題，並經由整理賴和未刊遺稿，做進一步的探索。



本書撰寫前前後後歷時十年左右，其間幸得賴和家屬提供未刊遺稿，對於研究助益甚多，衷心感謝；相互切磋的眾多學友，亦一一銘感在心，尤其感謝日本一橋大學松永正義教授費心檢閱相關文獻，撰寫評論論文〈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原文發表於東京《台灣新現代史研究》第六號，收為本書附錄，以供研究者參考。松永教授的批評、質疑，正是促使深化賴和研究的動力之一；在多年研究的過程之中，個人獲得心智的成長，賴和與台灣文學所表現的精神也深深感動了我。

希望賴和研究，能做為台灣文學研究學術化的墊腳石。

一九九三年五月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 目 錄

生活剪影

自序

III

## 輯一

一、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三

二、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1921~1931)

一四三

三、賴和〈獄中日記〉及其晚年情境

二六五

四、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

二九九

## 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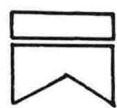
五、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

三二一

- 六、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 三六一
- 七、〈富戶人的歷史〉導言 三七九
- 富戶人的歷史 三九二
- 富戶人的歷史原稿清校 四〇七
- 八、民間的兒女——〈相思〉引言 四三一
- 九、關於賴和研究的幾點說明 四三五

附錄

- 松永正義 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四四一
- 初出一覽表 四五九



輯

一





一、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 一、前言——文學與時代

台灣的文學，在日本統治時代，比任何藝術部門，總受著更大的壓迫，和歪曲事實的鉗制，在五卅運動以後，台灣就有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此間已有不少傑出的作家。（註一）

這是台灣掙脫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之後，王白淵在第一篇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論著中，開頭的第一段話。

第一個把白話文的真正價值具體地提示到大眾之前的，便是懶雲（賴和）的白話文學作品。在一個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為淺薄粗鄙的白話文為文學表現的工具；寫大人先生輩以為鄙野不文而唾棄的小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冒險性的嚐試。而由於他的創作天才和文學上的素養，幸而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嚐試，並且多少給予白話文陣營以自信，並煽起無數青年對於「小說」的熱烈的愛好。（註二）

這是日據時代，楊守愚在「賴和先生悼念特輯」，給予賴和的評價。

賴和是仁醫，也是日據下著名的社會運動者，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一直以文化抵抗的方式，堅決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

在台灣新文化啓蒙時期，他是將「現代以前之學藝文化」轉變為「現代性學藝文化」（註三）的重要推動者之一。賴和以他的新文學創作，首先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基礎，並深遠影響同時代及後一輩的台灣作家，形成蓬蓬勃勃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他生前，即以文學成就被文學界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註四）。

賴和的文學，當然一部分由於他的天分，一部分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得風氣之先，而更重要的則是透過社會運動實踐而來，所以他的文學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此外，尚須追索他的出身背景，以及年輕時代的活動，我們才能進一步瞭解賴和的思想和他的文學。

然而由於賴和堅決抵抗日本的態度，在他一生中曾兩度被捕下獄，後一次是日本憲兵隊與警察局聯合審問他，欲究明抗日戰爭末期，在香港奉命籌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對台進行工作的翁俊明和他的關係。被拘留五十多天，始於一九四二年元月因病重出獄，隔年一月三十一日病逝，未能目睹台灣的光復。賴和一生的活



動，有些至今仍是歷史之謎。這是我們要探討賴和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是否涉及同盟會在台的外圍組織復元會的主要動機。

賴和的思想主要是透過文學表現出來，他並且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主要推動者，研究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必須先通過賴和，方能掌握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內涵與精神。

#### 附註

註一：《台灣年鑑》（台北，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六月），第十七章：「文化」，頁一。

註二：《台灣文學》三卷二號，譯文收於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以下簡稱全集，頁四二五。

註三：陳紹馨“Diffusion and Acceptance of Modern Western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Expression in Taiwan”, *Studia Taiwanica*, No. 2, 1956, pp 1-6

註四：王錦江〈詩琅〉〈賴懶雲論〉，原刊《台灣時報》二〇一號，收於全集，頁四〇〇，另見朱石峰〈回

憶懶雲先生》，原刊《台灣文學》三卷二號，收於全集，頁四二三。

## 二、民族意識與復元會

賴和，原名賴河，清光緒廿年（一八九四）四月廿五日生於彰化街市仔尾，其父賴天送，母戴氏允之長子。賴和出生這年七月一日因朝鮮問題引發甲午戰爭，在新興帝國主義日本的強大戰力下，滿清海陸兩戰皆敗。翌年四月十七日簽定馬關條約，其中之一款即割讓台灣。隨後台灣民衆雖經頑強抵抗，但終遭日本以武力佔領。賴和和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一樣，從此被迫轉籍日本。

生存在這樣劇烈變化的世代，賴和從小仍留著辮子在傳統環境中成長。直到上公學校，「意識裏，仍覺得沒有一條辮子拖在背後，就不像是人」（註五），這是當時台灣社會普遍留存的現象，顯示台灣不是外來的日本文化所能輕易同化。甚至賴和後來接受當時所能受的最高等教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五年醫學教育——成爲醫生之後，仍有「我生不幸爲俘囚」（註六）之嘆。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成爲他思想的底流，不論在社會運動或新文學運動中皆貫流其中。

賴和民族意識的由來，除了源於中原文化的遺澤，我們考察他受教育的背景，

更可進一步了解。賴和十歲時先被家人送入書房學習漢文，然後在日政府政策下始入公學校「讀日本書」（註七），每天早晨上公學校之前先上書房早讀，下課後再到書房上課（註八）。起先雖是被動的學習，日久也打下了漢文的基礎。十四歲入小逸堂拜黃倬其（黃漢）為師，「因夫子教導有方，我等學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無形之統」（註九）。經由書房教育，賴和與中原文化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更進一步接近。賴和原先的家庭背景，是比較屬於民間生活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註一〇），這只要從他祖父賴知以弄鉞（弄鏡）為生，其父天送以道士為業（註一一）即可看得出來。由於書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這一階段，使得賴和具備了寬廣的文化視野，對於未來的路線，有極深刻的影響。

賴和公學校畢業後，起先家人不允其再進上級學校，有人勸他去做補大人〔巡查補——助理警察〕，賴和不願為之（註一二）。一九〇九年五月，賴和十六歲，以最低的年齡，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十三期，這是當時台灣人最好的出路。由這一試即中的經歷來看，賴和「看來不過庸夫相，那得聰明爾許多」（註一三）的贊譽，其實在少年時代即充分表現了。醫學校教育使得賴和超越了他原先的家庭背景，爾後以醫生的身分行醫濟世，被低他一期的蔣渭水（註一四）邀請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為理事，

更使得賴和與台灣文化抵抗的運動，緊密的結合起來。

在醫學校前後五年（一九〇九—一四），現有資料仍不易充分探究他青年期的心路歷程。青年階段是一個人型塑思想、養成人格，趨近成熟、完成的最重要時期。現在我們（包括他的家屬），對於這一階段，除了知道賴和是一位醫學生之外，有關他的思想、活動，所知仍然極為有限。

值得重視而一直未被提及的是賴和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曾經涉及了復元會，導致與晚清同盟會有所淵源。

復元會取義於恢復健康，是醫生行醫濟世的理想所在。復元會原係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社團，「復元」兩字除了上述意義之外，其實含有「光復台灣」的宗旨。

其中關鍵人物是賴和的同期同學翁俊明與王兆培（註一五）。

王兆培，福建漳州人，係中國革命同盟會福建分會會員，曾就讀於廈門救世醫院，因革命活動被滿清政府發覺，一九一〇年春逃往台灣，轉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註一六）。秘密吸收同學為革命伙伴，建立同盟會在台組織。翁俊明於當年五月一日宣誓加入為會員，由設在漳州的中國同盟會機關委任為交通委員，化名翁樵，負責發展會務；九月三日且奉孫中山先生委派為台灣通訊員，中國革命同盟會台灣通訊

處隨即成立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註一七）。至一九一二年已得同志三十餘人（註一八），另外，一九一一年於醫學校成立的復元會，活動漸及於國語（日語）學校，推廣至農事試驗場，組織同盟會的外圍團體，仍以復元會為名，至一九一四年已得會員七十六人（註一九）。他們集會處在太平町之江山樓，促起啓蒙運動，聘人教習祖國正音國語，練習用中國語說話，每提到中國，均稱祖國，所有紀年均用祖國年號，絕不襲用日本人所稱之「支那」；另外亦常在艋舺（萬華）之二仙樓、平樂遊酒家、和尙洲（蘆洲）柑園，秘密集會，展開工作，密籌款項（註二〇）。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之際，翁俊明和杜聰明尚有潛往北京，計畫以細菌毒殺袁世凱的未遂舉動（註二一）。現有資料，未全數載明參加復元會及同盟會的會員名單。賴和是否加入，是本節的重點所在，我們首先試由賴和留下的詩文，來加以思考：

第一：賴和的西式筆記簿原稿本，其中一首〈登樓〉（附圖一）提供了較為具體的例證，所登樓的樓，即是復元會會員時常聚會的江山樓。全詩如下：

一樓柳色晚晴天，放眼閑憑夕照邊。  
滿路泥濘沒車馬，遠山雨後生雲烟。

半江水漲春潮急，萬頃風平麥浪鮮。

如此江山竟淪沒，未知此責要誰肩。（註二二）

全詩內含江山樓三字，而且到那裏並非飲酒作樂，在春光明媚的景色之中，賴和的結語是「如此江山竟淪沒，未知此責要誰肩」，那麼復元會「光復台灣」的宗旨，已明顯的呈現出來了。如今尚未發現賴和以復元會或同盟會入詩文，這首〈登樓〉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第二：賴和是當時台灣最高學府，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是日本教育栽培出來的最傑出人材，一生創作全部都是漢文，居然連一篇日文作品也沒有，這絕非偶然。

第三：賴和一九二三年底因治警事件繫獄，在獄中申請看書，甚至亦使用日式漢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書寫。（附圖二）。

第四：賴和作品向以傳統干支或西元繫年，絕未署日本年號（註二三）。提到中國時就稱中國不稱支那（註二四），這與復元會或同盟會的主張完全符合；而且乙未割台之役賴和以世變稱之（註二五），稱台人爲「漢族的遺民」（註二六），自稱「有遺老的氣

質」(註二七)。

第五：賴和寄情言志的傳統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單看一九三九年秋天，應社成立時，賴和手書的招集趣意書，即可略窺一二：

……請看，現在我們的彰化。文風不振，詩道萎靡，致使人心敗壞，世風日下。那些人們，不是身軀聲色，即便心迷利慾，把趨附認作識時務，把賣節當作達權變。是好久的了。當這時代，能獨標勁節，超然自在。不問季世沈淪的，惟有真正詩人拉(啦)。(註二八)

這種精神是和台中的樂社(一九〇二年)、台南的南社(一九〇六年)、台北的瀛社(一九〇九年)……，氣脈相通的，都是以傳統詩來維繫民族精神。尤其當一九三七年六月報章雜誌的漢文欄被強迫取消之後，特別具有文化抵抗的深意在內。

第六：一九二一年底賴和開始練習新文學寫作，一九二五年正式發表新文學作品，語言的應用即是中國白話文，寫出任何中國人都可以讀得懂的作品，避過了台灣話某些有音無字裏使用上的困難(註二九)。這當不僅是由閱讀中國白話文作品而來，極有可能年輕時渡海前往廈門博愛醫院行醫，曾學習過中文會話，甚至可遠推



至醫學校時代，短期學過國語正音。

第七：孫中山先生逝世，一九二五年三月廿八日印刷的《台灣民報》即以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一文（註三〇）來表達台灣同胞的哀悼之意，並曾於台北文化講座舉行追悼會（註三一）；賴和獲悉孫中山先生逝世，也曾分別寫下輓聯輓詞（附圖三），其中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輓詞中的最後一句：

使這天宇崩 地軸折 海橫流 山爆裂 永劫重歸 萬有毀絕 我先生的  
精神 亦共此世間 永遠永遠的不滅（註三二）

賴和在最後不是使用一般的通稱「先生」，而是進一步的強調「我先生」，哀慟之情極為強烈。如果由賴和曾參與復元會甚或同盟會活動的角度來思索，我們可以得知結論，「先生」和「我先生」的一字之差，當不僅具有修辭作用而已，在日本統治時代，這樣的用法是深具春秋筆意的。

以上由詩文探求所得，合而觀之推論賴和與復元會甚或同盟會的活動有所淵源。如果認為單從賴和的詩文來觀察，猶不能辨明，底下的事跡，可提供我們進一

步思考：

第一：賴和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曾與翁俊明等人一起到相館合攝一張紀念照（附圖四）。以一九一一年左右的時代而言，當時拍攝一張相片，誠非易事，一定是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才一起到相館攝影留念。原照公諸於世，因距離當日已有七十二、三年之久，賴和家屬僅能從相片中辨明站立的人（右起第二人）是年輕時代的賴和。經仔細比對翁俊明、杜聰明……等人青年時期的相片（附圖五），可以肯定右起第一人坐著的即是翁俊明，第三人現仍不詳，左側坐著的人推論是王兆培。理由：一九一〇年王兆培十九幾時來到臺灣，與相片中的人年齡相當，他是中國籍的留學生，髮式與本地學生的平頭有所不同，翁、王兩人乃是醫學校裏復元會、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賴和身廝共間，必然亦有關係。在現有文字資料仍未載的會員名單之前，這張相片提供了參考的一項旁證。

第二：賴和與杜聰明交情至為深厚，兩人在學時，曾一起在年假中從台北徒步到彰化，沿途拜訪醫學校畢業正在行醫的前輩，這一次的徒步旅行（日語謂無錢旅行）傳為醫學界的美談（註三三）。在賴和的遺稿中，我們亦可見到他當時所寫下的詩，其中一首〈旅伴〉，即是寫他與杜聰明徒步旅行的動機，並附有前言：

年假由台北徒步歸家，途中計費五日，初由三角湧〔三峽〕沿近山村落至頭份，乃折向中港，遵海而行，山嵐海氣，殊可追念。

思向風塵試筋力，故鄉遙遠自徒行。

吃苦本來愚者少，追隨難得是聰明。（註三四）

其中最後一句是雙關用語，聰明另外指的就是杜聰明。「追隨難得是聰明」，杜聰明是確定加入復元會、同盟會的人，那麼賴和亦極可能就是會員。而且這次拜訪的對象都是醫學學校畢業的前輩，除了請教醫術經驗之外，也可能向這些比較有經濟基礎的醫生募款，充做復元會的經費。

第三：賴和於一九一九年七月間（註三五）前往廈門，服務於設在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博愛醫院隸屬於台灣總督府資助設立的財團法人廈門博愛會，醫生名義上是總督府技手，給予高等文官待遇，除了研究華南各種傳染病的防疫，提供台灣本島的參考之外，還負有日華親善的任務，當然亦醫療廈門的台灣籍居民及當地民衆（註三六）。是什麼動機促使賴和離開台灣前往該機構行醫？

其中因素之一，長男志煌於一九一八年元月出生，旋於同年去逝，賴和初爲人父，受此打擊，心情鬱悶，遂欲轉換環境（註三七），但單單此一動機尚不能完全解釋。因醫官的身分和賴和一生堅持的民族意識有相衝突的地方，何況當時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已發動起來了，中國大陸反日的氣氛益見濃厚，而賴和是以總督府醫官的身分前往，是否有他隱藏的動機呢？我們試從當時曾任廈門台灣居留民會會長林木土（可能亦是復元會會員，參見附圖五之相片）的一則話來加以檢視。林氏言道：

五四運動以後高昂的反日民族主義，引出日本當局對岸政策的調整。台灣總督府在對岸辦學校，建醫院，以接受中國籍的人，以緩和當地人的反日情緒，力圖安撫。但效果不彰，犯了那麼大的罪，施點小惠是不能補償的。有些台灣人醫生由於反日而離開台灣，欲施仁術以救濟同胞中國人的病苦爲人生的意義，但是漸漸地對中國的政情失望……。（註三八）

林木土是台北州海山郡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一九一二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任教板橋公學校，一九一四年參與新高銀行創業，一九一八年任該行支店長，直到一九二八年才轉回台北，後再往廈門自創公司（註三九）。他在廈門的期間，賴和

正好在博愛醫院行醫。由林氏的回憶，再比照賴和一生的行為事跡，賴和由於反日而離開台灣，並以總督府醫官的身分為掩護，這種矛盾性的存在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如此，才方便觀察中國的政情。此外，翁俊明於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後，學家遷往廈門，直到一九一九年於廈門開設俊明診所（註四〇）。賴和是否也有因醫學校復元會的淵源而前往廈門的可能？或因通訊聯絡不便，賴和到廈門之後，顯然並未和翁俊明碰面，因翁氏正好在這一時間，前往上海發展事業，並開設俊明醫院，直到一九二一年赴浙江任樟腦總局局長（註四一）。是否也因為這樣，賴和才有「擾擾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騎共馳逐」（註四二）之嘆？這些仍值得吾人再進一步探索。因與翁俊明的關係，賴和前往廈門，此一因素我們必須加以考慮。

第四：賴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第二次遭日警逮捕五十餘日。命令拘捕的單位，牽涉警務局和憲兵單位（註四三），可見賴和被日本當局視為嚴重的「不逞份子」，而警方所欲偵察的目標，乃是審問賴和與翁俊明之間的關係，當係針對翁氏的對台工作，並且值得重視的是賴和被捕的這一天，正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當天，美國正式和日本宣戰了，中國大陸的戰況，也因美國的參戰，起了重大的轉機。

賴和生前未發表的〈獄中日記〉，第二十九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留有一則

相關記載：

州高等課……問我和翁俊明的關係，這一層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靈魂相示，這使我啞口無可應。要我說向來抱的平不滿，我也一句說不出。他很不相信，說我膽量小，我求其早釋放，他說像我這樣，尚未能再反省，看有什麼心境，可對高等主任說，又被送到留置場〔拘留所〕來。

啊，我真絕望了，我的頭腦怎樣愚蠢，我這口舌怎不靈，這是我的無用，還要說什麼，只有等待吧，家任他破滅，還有別法？（註四四）

爲了查明賴和與翁俊明的關係而遭逮捕，而且出動的單位是憲兵和警務局，日本當局之重視可想而知。翁俊明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已奉國民政府命令，在香港積極籌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與港澳總支部諮辦對台事務及進行各項布置（註四五）。極有可能日本有關當局掌握了賴和與翁俊明聯絡的線索，因而逮捕他。賴和當然可以強調和翁俊明僅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同班同學的關係來搪塞，所以在日記裏，賴和說「這一層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靈魂相示，這使我啞口無可應」。被關獄中，

賴和還能說些什麼呢？難道不打自招？以日本軍警的調查能力，諒非無風起浪，否則當時何以爲查明翁俊明對台工作情形，單單逮捕賴和呢？我們也有理由懷疑賴和此一階段與翁俊明有聯絡。

第三十九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賴和心悸亢進發作。這一天的日記是他最後一天的記錄，此後即體衰未再記日記。賴和在最後一段提到：

……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註四六）

拘留五十餘日後，終因病重出獄；隔年（一九四三）一月三十一日逝世，果真未能看到大時代的完成。翁俊明亦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於漳州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任內（註四七）。賴和這段因與翁俊明的關係繫獄，在獄中引發心臟病，以至後來病逝，遂成一段歷史之謎。

退一步而言，即使賴和戰時果真未和翁俊明有所聯絡，但他遭軍警逮捕，依然是由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的關係，翁俊明的同學中賴和特別受到注意，那麼年輕時賴和曾涉及復元會或同盟會的活動，更是提供了一則例證。

以上綜合賴和的詩文及事蹟，賴和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學校時代，與同盟會及其外圍的復元會有所關連，雖然在歷史的斷層中被埋沒了，戰後台灣無人挺身爲其證實，但也不是毫無線索可尋。

#### 附註

註五：〈無聊的回憶〉，全集，頁二二一。

註六：〈飲酒〉，全集，頁三八一。

註七：同註五，前揭文。賴和有好些地方提到讀日本書。像「讀日本書做什麼，我們不要做日本仔，也沒福氣做大人（日據下台灣人稱警察爲大人），我們用不著讀日本書」；「在當時，人們視漢文猶較重要，對於讀日本書不大關心，甚至有些厭惡，以爲阻碍漢文的教育。」

註八：賴恒顏〈我的祖父懶雲先生〉，收於全集，頁四四七。

註九：〈小逸堂記〉，全集，頁三二〇。

註一〇：借用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6. | 書中



的觀念。賴菲爾特認為在每一文化傳統中，有屬於「深思的少數人」之大傳統，以及「不思的多數人」之小傳統，雙雙並存於社會。

註一：訪問賴和哲嗣賴棻所得。

註二：同註五，前揭文，頁二三〇。

註三：虛谷〈贈懶雲〉，《陳虛谷選集》，（台北，鴻蒙，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一七〇。

註四：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北，自印，一九七六年九月），〈蔣渭水先生大事略記〉，載明蔣渭水，一九二〇年（時年廿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頁二八五。

註五：參見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一九八三），頁二四八；黃敦涵：《翁俊明烈士編年傳記》（台北，正中，一九七七年十月），頁二四—六。王兆培未畢業，參見《景福校友通訊錄》（台大，景福會，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二五—七。

註一六：若林正文前揭書，載明王兆培經歷及來台時間。頁二四八。

註一七：同註十五，黃敦涵，前揭書，頁二四。

註一八：〈杜聰明博士筆述翁烈士學生時代生活〉，收於黃敦涵前揭書，頁一三二。杜氏等三十餘人中，僅載明蔣渭水、翁俊明、蘇樵山、黃調清、林錦生、曾慶福、杜聰明等七人；一九七六年杜聰明筆述時，賴和早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因有「台共匪幹」嫌疑被撤出忠烈祠，故杜氏極有可能故

意不提賴和。

註一九：參見黃敦涵前揭書，復元會七十六人中，只多列了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王傳薪、劉兼善。頁

二五—六。

註二〇：黃敦涵前揭書，頁二六。

註二一：詳見〈杜聰明博士筆述翁烈士學生時代生活〉及〈杜氏一夕談〉，收於黃敦涵前揭書，頁一三

一—四。

註二二：此一原稿本，以鋼筆書寫於西式筆記簿中，開頭部分特別以阿拉伯數字註明一九〇八—一九一

四。賴和十五歲以後的作品，大部分寫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登樓〉在此一稿本，頁一

四。另見以毛筆寫於「懶雲書室」稿本中（殘本），後兩句由「如此江山竟淪沒，未知此責要

誰肩」改寫為「寂寞擬窮千里目，目窮轉覺意悽然」。不知何故。

註二三：不僅發表時以西元繫年，筆者查閱所有留存的原稿，亦是載明西元或者干支。

註二四：見〈高木友枝先生〉一文，這篇文章張冬芳曾翻譯成日文，刊於《台灣文學》三卷二號「賴和

先生悼念特輯」，有關中國辛亥革命這段省略。中文全文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政經

報》，頁一六—七。另見〈謹復某老先生〉，全集，頁二二。

註二五：〈小逸堂記〉，全集，三二〇。

註二六：〈棋盤邊〉，全集，頁四六。

註二七：〈彫古董〉，全集，頁三九。

註二八：手稿〈應社招集趣意書〉。單張。有關賴和的傳統詩部分，整理遺稿之後，當再另文探討。

註二九：此一觀點，王詩琅首先提出，見他所寫的〈賴懶雲論〉，全集，頁四〇四。

註三〇：《台灣民報》三卷十號，社說不具名，但註明寫於三月十四日，亦即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三天。

此文強調孫先生是熱血的男兒，自由、正義的化身。

註三一：參見黃季陸〈國父逝世前後〉一文，《傳記文學》六卷三期。此文亦引述張我軍當時被禁讀的

〈孫中山先生弔詞〉。

註三二：原稿至今猶存。全集，製版刊出。原稿註明寫於四月三日，可能台中、彰化地區亦曾舉行一場

追悼會。

註三三：參見黃得時〈台灣新文學播種者——賴和〉，一文，《聯合副刊》一九八四年四月五—六日。另

亦從楊雲萍處採訪得知賴和、杜聰明的這次徒步旅行，曾到後龍拜訪醫學校第六期畢業的前輩

楊敦謨（楊氏父親）。在賴和原稿中途經後龍，留有〈雨中涉溪〉一首。

註三四：從一九〇八—一四原稿中，得知詩文皆是歸後追記。〈旅伴〉第二句原稿是「火車不坐自徒行」。

第四句「追隨」。原稿是「相隨」，在準備出版的毛筆謄本中修正。未出版。

註三五：賴和一九〇八—一四年稿本中，扉頁中簡單寫著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在開」(在家開業)，接著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五月，當係前往廈門的簡記。又接著是一九二〇—六月……「在開」(在家開業)。這裏推論賴和一九一九年七月入閩，是由一九二〇年四月次男志烜出生，逆推可能的在家時間。此關係到賴和是五四運動前入閩或是之後。

註三六：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刊行的《台灣と南支那との關係及現在の施設並將來の方針》(台北，一九一七)，頁一九—二三。博愛醫院正式設置的時間，仍未詳，但一九一七年八月總督府才去視察，決定設在鼓浪嶼，十一月總督府訂立章程。另見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台灣》(台北，省文獻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頁六三〇—一。

註三七：訪問賴和哲嗣賴榮所言。

註三八：戴國輝〈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台灣籍民〉，《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一九八一年元月。頁一二三—四。林木土的談話是戴氏採訪所得。

註三九：林木土的經歷載於《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一九三七年九月)，頁四六九。

註四〇：黃敦涵：《翁明烈士編年傳記》，頁三五。

註四一：同上註，前揭書，頁三八—四三。另參見謝文玖：《耿耿此心在——翁俊明傳》(台北，近代中國，一九七七年十月)，「翁俊明先生簡譜」，頁二。

註四二：賴和〈歸去來〉，全集，頁三七一。

註四三：見遺稿〈獄中日記〉，戰後刊於《政經報》。第二十六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賴和記載「晚飯後，高等主任來，我又求其同情，他說這不僅是州，怕也有警務局和憲兵的指揮。所以不易知其究竟，這月中大約會有著落，再忍耐些時。這使我益覺悽悲，幾於墜淚，這一個月——今日才二日，要怎樣渡得過」。全集，頁二九三。另據賴和哲嗣賴榮所言，確是警務局和憲兵的

聯合調查。

註四四：〈獄中日記〉，全集，頁二九五。

註四五：黃敦涵，前揭書，頁九五。

註四六：〈獄中日記〉，全集，頁三〇二。

註四七：黃敦涵，前揭書，頁一〇一。

### 三、出身民間回到民間

賴和在新文化運動中，不但是一位能展現台灣社會面貌的傑出作家，而且是行醫濟世的仁醫，兩者可說是合而為一的，他以醫術救治人的肉體，以文學解剖社會，安慰人的靈魂。關於他人格的養成，有必要先加以探索。

影響賴和最大的是他的祖父以及出身背景。賴和不僅遺傳了他祖父賴知的體形「身量不甚高，但是很結實」（註四八），心理隱密的層面，亦和其祖父有所關連：

經「戴萬生之亂」，家遂零落，祖父兄弟六人，祖父最少，因家業喪失，遂各謀生。祖父聞好博奕，成家後，猶不能改。吾父五歲時貧甚，歲晚無錢，祖母把衣裙使入質，以其錢度歲，但恐其得錢復賭，教吾父隨之去，至半途，乃用頭布縛吾父於人家籬柱，不教同往，自去典衣，又把錢盡輸於賭，其嗜好有如此者。（註四九）

家業未喪失之前，是什麼境況呢？我們經由賴和的遺稿，可以追查出線索：

余家資產淡薄，爲戴案橫受波累，一遭查封，重以死喪相尋，生計遂陷艱難。（註五〇）

原來在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的戴萬生〔潮春〕事件中，賴家是站在受到太平天國影響而起義的八卦會這邊。這一事件，北波及至淡水，南至嘉義，歷時前後將近三年，可謂全島騷動。隨著戴萬生的失敗，賴家家產亦被查封。賴和記載其祖父事跡，只簡單提及：

青年時遇「萬生反」，腰中流彈，煩在腹內，幸未死，但後來常發痛，以鴉片止之，遂成癮。（註五一）

單從「戴萬生之亂」、「萬生反」，不易察覺賴知兄弟的立場，甚至會誤爲是滿清統治下的順民，但比對前引另一篇遺稿，我們即可揭開謎底，賴知兄弟是戴萬生事件中的參與者，失敗後家產被查封，遂流落爲市井游民。賴知的嗜賭緣由起義失敗，心情鬱悶有關，而更直接的原因，則係事件時腰中流彈，需用鴉片止痛，花費甚鉅所

致。前述除夕夜賭博盡輸的行爲，當是賴知後來用以訓誡子孫，不能熱衷於賭而一再提及，然而亦足以呈現其個性狂熱的一面。賴和參與社會運動，全力以赴，亦是這種性格的表現。賴和在文中接著描寫其祖父奮力自拔的情形：

及到歲時，翻然一改，祖父本有學拳法，遂學弄鉞，技成，遂聞名，近遠各處爭聘請，遂以成家，吾們後人得其餘蔭幸無凍餒。（註五二）

一個嗜賭如命的人，能夠翻然一改，絕不是容易的事，必須性格十分強韌，賴和的個性亦遺傳了這樣的強韌性。賴和戒賭之後學弄鉞，尤其值得注意。弄鉞即是台語所說的「弄樓」（弄鏡），乃是民間習俗中，人死後家人〔通常是出嫁的女兒〕爲其做功德時，特別請道士或者具有功夫的人，耍弄鏡鉢、碗盤之類的東西，以慰死者之靈的迷信行爲。弄鉞類似江湖藝人的特技表演，在傳統觀念裏，是屬於術士的職業。賴知以其技藝，得以改善其家庭經濟，購置田產，栽培後代。其子天送等還沒能多受教育，成長後以道士爲業。賴家兩代屢添購土地，從一無所有，逐漸成爲地主（註五三）。以後也才有餘力送賴和入書房念書，又培育賴和成爲一名醫生。賴和亦



深知「今日閭里榮，出自先人賜」（註五四）。

賴和的祖父起家是由於弄鉞，父親又是道士，都是和民間習俗有密切的關聯，這種小傳統中的生活，深刻影響賴和幼年的階段，也使得他從小與民間有一體感。爾後賴和同情弱者，站在弱者的立場，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不必然全屬於意識形態的層面。賴和的祖父成名之後，尙有謙虛的美德：

祖父當技藝時行〔風行〕時，若有同（誤印問）藝者的地，多辭不往，有鬪藝時，也多不使對手有難堪處，有特長之技，多略不演，後年老，到遠多坐轎，但是往返在街外落手，罕有坐在宅門前者。（註五五）

賴和在爾後的新文化運動中，牽涉層面頗廣，但皆不強出頭，默默做事，或以行動支援，或以經濟支援，絕少主動躍身領導階層，而自然令眾人傾服。遠溯原因，和其祖父的言教身教，頗有關連。

第二位影響賴和較深的長輩，就是小逸堂書房的漢文老師黃倬其，如前節所述，他使賴和與中國的大傳統接頭，民族意識更爲熾烈。即使黃倬其在一九二〇年逝世

之後，賴和在詩文中亦屢次提及，並有「豈天果欲斯父喪也，胡不愁遺一老以保我後生耶」（註五六）的強烈感嘆。

第三位影響賴和的就是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的校長，日人高木友枝（人稱衛生總督）。他是位實實在在的教育家，最重視人格養成。賴和行醫後回憶道：

……每週總有一點鐘來教我們修身。但是先生的講義卻不由書籍上的文字講解，只是講些世間的事情，但聽的我們每恨一點鐘的容易過。（註五七）

高木「是不存有內台人的成見」（註五八），盡力栽培醫學校的學生，對他們強調「將來的台灣會成爲醫學校卒業（畢業）生的台灣」（註五九），緣由重視人格的養成，每年畢業典禮總一再訓示：

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任。（註六〇）

醫生賴和終其一生無負其師的教誨。但做爲一個台灣人醫生，在日本統治下仍然受

到歧視，並不是每個日本人，都能像醫學校的校長高木友枝那樣做到內〔日本〕台灣〔台灣〕人無分別。

賴和一九一四年四月醫學校畢業，仍留在台北實習（註六一）。一九一五年始由學校的推薦，前往嘉義醫院就任醫職。薪水不及同時任職的日本人一半，且沒有配給宿舍，得自己去租房子（註六二）。同年十一月回鄉，與西勢仔王浦四女王氏草結婚，時年廿二歲（註六三）。婚後仍回嘉義醫院，但任職將近一年，所擔任的仍然是筆生（筆錄病歷的實習醫生）和翻譯的事務，不被承認是完全的醫生。賴和無法忍受這樣的歧視待遇，提出陳述，結果非僅不能見容，並且衝突對立的更厲害，「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註六四），終於辭去醫院的職務。於一九一七年六月返鄉，在彰化市仔尾故居自行開設賴和醫院（註六五）。一九一九年七月左右渡海前往廈門，服務於設在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

由於博愛醫院和背後的台灣總督府有密切的關係，賴和的思想和他所處的位置，是矛盾性的存在，不能輕易調和。五四運動以來的高昂的反日思潮，再加上廈門的一些被當地人稱爲「台灣呆狗」的台灣籍民仗日本勢力欺壓中國人（註六六），賴和對此類人的行徑曾有詩加以譴責：

門牌國籍註分明，犯禁公然不少驚。

背後有人憑假借，眼中無物任縱橫。（註六七）

儘管賴和絕不類同於所謂的「台灣呆狗」，熱心為大陸同胞服務，他的總督府醫官身分，負有日華親善的責任，亦不免使他身處尷尬的地位。這時候他給友人的詩，可看出內心的強烈痛苦：

故國相思三下淚，天涯淪落一庸醫。

此行祇為虛名誤，失脚誰能早日知。

流水萍踪遊子恨，秋風萼膾楚囚悲。

近來生活無須問，贏得傷離幾首詩。（註六八）

賴和使用「天涯淪落」、「失脚」等強烈字眼，顯現出所處地位的矛盾，此外對於當時軍閥割據下的中國政情亦極為失望：

(一) 亂世奸雄起並時，中原殘局尚難知。

茫茫故國罹烽火，颯颯西風墮舊枝。(註六九)

(二) 莽莽神州看陸沈，縱無關繫亦傷心。

迴天有志憐才小，填海無功抱怨深。(註七〇)

(三) 數聲野哭雲沈黑，滿眼田荒草不清。

匪患初安兵又到，一村雞犬永無寧。(註七一)

故國神州這樣的亂局，加上於同安見到有人於市中公然爲人注射嗎啡，而趨之者絡繹不絕，賴和深深感嘆「人病猶可醫，國病不可醫」(註七二)，再停留於博愛醫院，亦無可爲。既然對這一階段的經歷深感痛苦，一九二〇年四月次男志煜於故鄉出生，更牽動了他思鄉的情懷，於是在五月間掛冠歸來。這時賴和所寫的傳統詩〈歸去來〉，最能反應他內心痛苦的糾結：

十年願望一朝償，塞翁所得原非福。(註七三)

一九二〇年上推十年，正好是賴和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第二年，顯然在那時與翁俊明等人密切相處，即有回到大陸的念頭。既然「此行未是平生志」，只有歸鄉。賴和感嘆道：

酬世自知才幹拙，思鄉長爲別情牽。

一身淪落歸來日，松菊荒蕪世亦遷。（註七四）

詩中的「別情」，毋寧是大我的民族感情，是賴和民族意識的表現。而在博愛醫院的行醫，賴和再次使用「淪落」的強烈字眼，可見確與向來所持的民族意識有所衝突。回到彰化之後，除了不得志之外，亦擔心故舊有所誤會，賴和用以下的詩句，給在博愛醫院的這一段經歷，做了總結：

鏡前自顧形影慚，出門總覺羞知己。

飽來抱膝發狂吟，篋底殘篇閒自理。（註七五）

自一九二〇年六月之後，賴和一直在彰化行醫，每天病患超過百人以上（註七六），賴和出身民間回到民間，以他的醫術醫德，贏得當地民衆出自內心的愛戴。

附註

註四八：〈我的祖父〉，全集，二六一。見過賴和的人都留下這樣的印象。

註四九：同上註。

註五〇：原稿〈伯母莊氏柔娘苦節事略〉，收於《一九二三年稿本》（《台灣》雜誌原稿用紙自釘），頁十九。另三篇是〈僧寮閒話〉、〈小逸堂記〉、〈不幸之賣油炸槍的〉（註明小說）。〈僧寮閒話〉註明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完稿，可推斷係賴和第一篇小說。

註五一：同註四八。

註五二：〈我的祖父〉，全集，頁二六二。

註五三：李篤恭在給侯立朝的信中提及，收於《賴和先生平反紀念集》（彰化，紀念賴和先生九十冥誕

籌備會，一九八四年四月），頁一五。

另據賴和哲嗣賴榮言，他們家的土地都在今市區市仔尾一帶，約六甲，年收租三百石，戰後放領。

註五四：〈大人五十一生日奉詩稱慶〉，全集，頁三九〇。一九二三年，賴和三十歲，這首詩亦提到賴和祖父五十一歲不作壽的原因：

吾年當九歲，祖父五十一。諸父與諸姑，歡欣爲擇日。欲獻介壽觴，祖父語不必。

積儉初起家，未容事奢侈。門弟吾未修，學問爾皆鄙。或恐失禮人，騰笑於鄉里。

註五五：〈我的祖父〉，全集，頁二六二。

註五六：〈小逸堂記〉，全集，頁三二一。

註五七：〈高木友枝先生〉，全集，頁二六三。

註五八：同上註，頁二六七。

註五九：賴和自傳體小說〈阿四〉，全集，頁三三六。

註六〇：同註五七，頁二六七。

註六一：賴和《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稿本》中，扉頁中簡單記著「一九〇九入台醫一九一五」，台北醫學

校就業期間五年，一九一五當是仍在實習，至於那家醫院則不詳。



註六二：自傳體小說〈阿四〉，全集，三三二。

註六三：賴恒顏李南衡合編〈賴和先生年表簡編〉，收於全集，頁四八九。

註六四：同註六二，頁三三三。

註六五：同註六一，載於稿本扉頁。

註六六：參見戴國輝〈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台灣籍民〉一文，頁一〇六一—八。

註六七：賴和《一九一八—二二年稿本》，〔懶雲書室稿紙裝釘〕，〈廈門雜詠〉，頁六一。

註六八：同註六七，〈得敏川先生書及詩以此上復〉，頁五七—八。

註六九：同註六七，〈中秋寄在台諸舊識〉，下記古月吟社諸公，頁六一。

註七〇：同上註，下記肖白先生，頁六二。

註七一：同註六七，下記鄉村，頁五九。

註七二：〈於同安見有結帳帳于市上爲打嗎啡者而趨之若鶩者更不斷〉，收於全集，頁三七〇。

註七三：〈歸去來〉，收於全集，頁三七一。

註七四：同上註。

註七五：同註七三。

註七六：見楊雲萍〈追憶賴和〉，原刊《民俗台灣》三卷四號，譯文收於全集，頁四一一；另楊遠〈憶

賴和先生》，原刊《台灣文學》三卷二號「賴和先生悼念特輯」，譯文收於全集，頁四一八。

#### 四、由舊文學進入新文學

賴和的廈門之行（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二〇年五月），正當五四新文化的高潮，也是反日運動最激烈的時期。賴和身為博愛醫院的醫官，這一段經歷，具有強烈的矛盾，也造成內心強烈的激盪，最後只好掛冠歸來。但是在廈門約略一年的時間，賴和也有意外的收穫，那就是直接感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

我們尚不能肯定這段期間賴和閱讀的範圍，以及是否有新文學作品的寫作？但檢視賴和的遺稿，我們發現賴和在傳統詩稿本中，一九二一年年底已有為慶祝南社十五週年，他練習用白話寫的祝賀詞（註七七）；一九二三年傳統詩的稿本中，已夾雜三首白話詩；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已寫了介於散文與小說體的〈僧寮閒話〉（註七八），這些是賴和新文學的最早記錄。

回溯賴和文學修持的過程，早年小逸堂等書房的漢文教育，乃是他能寫傳統詩的重要根源。就讀醫學校時期，繁重的課業之外，賴和已偷看小說（註七九）。行醫初期，起先看《玉梨魂》、《雪鴻淚史》、《定夷筆記》等當消遣（註八〇）。等到新文學運

動來臨時，換看《灰色馬》、《工人綏惠洛夫》、《噫！無情》〔雨果《悲慘世界》〕、《處女地》以及《克拉格比》等類的翻譯小說（註八一）。甚至一九二三年底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賴和在獄中亦申請看《噫！無情》、《紅淚影記》等小說（註八二）。這時賴和的重點仍在傳統詩，但透過翻譯的西方文學，新文學的種子，已在等待著適當時機發芽生長。

一九二二年六月賴和以傳統詩〈劉銘傳〉兩首應《台灣》雜誌徵詩，始見作品發表。當時詞宗是林獻堂，詩題劉銘傳，七律，限一東韻，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刊出徵詩啓事（註八三）。賴和的詩以懶雲署名，分別獲選第二名、第十三名（註八四）。爾後懶雲成爲賴和衆多筆名中，最常使用的一個，也正式成爲他的別號，死後也刻在墓碑上。傳統詩的寫作，是賴和行醫之餘的心靈寄託。一九二五年左右與彰化地區的友人組成流連思索俱樂部（註八五），不採用傳統詩社的名稱，一方面源於張我軍已開始攻擊墮落的傳統詩社，一方面也因爲成員都是新知識分子（註八六），以示有別於傳統文人的結社。

賴和等十六個詩友，有一次曾於晚上聚會，寫詩諷刺當時的御用紳士，計得絕句廿四首。茲引用其中二首，以見流連思索俱樂部的傳統詩之風格：

(一) 位置居然負衆望，有爲身爲送迎忙。

太平作犬光榮甚，放棄人權不主張。

(二) 應酬慣善跑官場，品格何須論短長。

若得太平啣塊肉，胸前鎖鍊亦榮光。(註八七)

這些詩，主要是針對辜顯榮等公益會的紳士、有力者。因辜顯榮曾經親到台灣文化協會演說，公開主張「吾人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民」(註八八)。這句充分表現順民心態的「名言」，流傳甚廣，爲御用紳士的言行做了極佳的註腳。賴和也曾有一首表現出色的白話新詩〈飼狗領下的銅牌〉(註八九)，未曾繫年，極有可能也是寫於這一階段。

賴和熱衷於傳統詩的時候，早在一九二二年底，已同時在練習白話文的寫作。從現有資料裏，發現最早的一篇，是寫給南社十五週年的祝賀詞。由於是夾在賴和的稿本中，未曾發表，爲了探討的方便，依照原文格式先行引用：

## 祝南社十五週年

世間話說的好

詩是無用的東西寒不會禦寒飢不會療

飢

那仙的李白聖的杜甫究竟何補些兒

是是 飢要覓食寒要覓衣的

實在用他不著也就可以付之不知

咳我且問汝誰叫汝們會寒會飢？

汝們可曾偷懶過呢

我們做詩的亦還不衣會寒不食會飢

就是做苦來過日子也廢不了做詩

爲甚麼呢？有的、愁嘆的聲傷悲的淚歡喜

的情感憤的氣

一條鞭寄在裏頭去

況又是通聲氣同環境的人自然會聚攏  
在一塊兒

貴社創立過十五年了

社況的盛大社運的發展久爲我們所共  
知 南都文化的精血盡傾注在這裡  
詞精神的發露就在——詩——

我希望大家們實地裡做詩人生活去

使這無用的有用教他不知者共知

爲我們做詩的張些兒氣

那始不負我們

用盡心力來做詩

(註九〇)

這是賴和的第一篇白話文作品，文白夾雜。他的文言文、傳統詩都寫得極好，但要換寫白話文，可不是容易的事。賴和用了一些語助詞如「兒」、「呢」、「了」來增加

白話的氣氛，但因文白夾雜，讀起來十分拗口，有些地方語義不甚清楚。這一篇白話文作品，可印證台灣新文學的出現是多麼不容易。

夾在一九二二年稿本，存有譯〈蕃歌二曲〉亦文白夾雜，這裏只引用其中一首：

香煙成堆好酒如淮

我頭社的兄弟啊

搖蕩輕槳——款款來

水草碍行舟

勿惜少迂迴

(註九一)

從民間歌謠來吸收新經驗，這也是一種新的嚐試。賴和第一次寫白話詩則見於一九二三年稿本，題目爲〈歡迎蔡陳王三先生的筵間〉。亦未曾發表，引用全詩如下

兄弟們

這二十世紀



是解放運動全盛之時。

世界新潮流

久已高高漲起。

（批者——尙不知是誰——「在二十世紀」下加一「？」，將「全盛之時」，改爲「全盛的時期」。眉批：世界有此新潮流原來不錯）

無奈何我可愛台灣、

尚閉置在真空裡！

沒有傳波的空氣、

終只寂沈沈反動不起。

（批者將「無奈何」，改爲「怎奈何」。眉批：文明是漸漸來的不必性急然亦可見是有心人）

唉太陽高起來了

氣壓變動了、物質膨脹了。

真空的瓶兒微微的破裂了。

新鮮的氣流透進來了。

快醒罷、不可耽眠了。

（批者將「快」改爲「快快」；「耽」改爲「貪」。眉批：寫天氣變晴甚有機勢卻不脫清晨景象故佳）

這幾位早起來的弟兄。

說破了唇兒、喊破了喉嚨。

是因爲甚麼事呢。

快哆開眼兒罷、快翻轉身子罷。

大家合攏起來罷。

（批者在「弟兄」底下加「們」；在喉嚨底下加「兒」；「是因為甚麼事呢。」改爲「是爲著甚事呢？」；「哆」字改爲「展」字。）

『生不自由寧勿死』

我原是熱血男兒。

奮起、奮起、須奮起。

傍有人笑、走肉行屍。

（「寧勿死」，筆誤，批者未改正爲「勿寧死」；「我原是熱血男兒」，改爲「那一個不是熱血男兒」；「傍有人笑、走肉行屍」，改爲「傍有人笑我哩」。四、五兩段合併眉批：是爲著我同胞文化促進故不憚舌敝唇焦諸君不要誤會了）（註九二）。

由這首詩，我們可看到賴和寫白話詩十分認真，還請師友批改。稍後稿本第二十九頁，有一首〈三十生日〉詩，可知引前詩寫於三十歲生日之前，大約是在三、四月

間。以現存資料來看，台灣最早發表的新詩是追風（謝春木）在日本以日文寫的〈詩的模仿〉四首，稿末記明寫於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後發表於《台灣》第五年第一號（註九三）。如果單於寫作時間而論，賴和是最早起步的一人，可惜，過於謙虛未發表。直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才發表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距離初寫作白話詩，已經過了二年又七八個月了。反過來說，第一次發表即有那樣高的水準，證明賴和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

第二首白話詩是〈送虛谷君之大陸〉，以「虛谷少哥」一句開頭；如果比較收於《賴和先生全集》的傳統詩〈送虛谷之大陸〉，當然新詩仍比不上傳統詩的水準，但可以體會出賴和具有開闢新天地的精神。

第三首白話詩〈草兒〉，詩後載明「十二月十五夜作」。過了一夜，十二月十六日早晨正好發生治警事件，在總督府警務局指揮下，對台灣議會運動關係人一網打盡，賴和是當天被搜查並扣押的四十一人當中的一人。這首前一晚上所寫白話詩〈草兒〉也就更具有意義了。全詩引述如下：

春要來了、草地上——

被牛羊踐踏過的——

草兒——再要發生了！

（批者將「要」畫掉）

含蓄著無限生機的、

草兒——依依地、蓬蓬地——

覺悟似的發出芽來！

似對著人們——說、

「不相干——發芽仍舊要發芽、

甜美的露培著、和煦的風吹、

時候到了不容生生地閃著

踐踏只得由他罷！

我們亦自各有天職。」

（「熙」字筆誤，批者未將「熙」改正為「煦」，只在「吹」字底下，加一「著」字；「閃」字改為「埋沒」兩字。）（註九四）

這首詩是賴和的心聲，也是日據下台灣民衆的心聲。「踐踏只得由他罷」，但絕不是屈服，是「覺悟」產生力量。全詩藝術技巧上仍待琢磨，但賴和在〈草兒〉詩中表現的精神，絕對是可貴的抵抗精神。他以後能在文學上有傑出的表現，其中一部分亦源於這種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

一九二四年賴和傳統詩稿本，大量出現白話詩，計有〈感詩〉、〈代諸同志贈林呈祿先生〉、〈破壞〉、〈生活〉、〈生命〉、〈奉獻〉、〈有力者〉、〈種田人〉、〈壓迫反逆〉、〈瘋人的叫聲〉、〈日本藝者〉、〈可憐的乞婦〉、〈希望〉、〈山仔腳〉、〈黃昏的海濱〉、〈日傘〉、〈祝吳海水君結婚〉、〈晚了〉、〈忙〉、〈人心〉、〈生的痛苦〉、〈多數者〉等共計廿二首（註九五），篇幅佔了一九二四年稿本一半以上，而且題材相當廣泛。這已充分顯現出在張我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以前，賴和已經直接從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源流裏吸收養分，並勤加練習。

這裏僅先引用賴和給他醫學校的後期同學（二十期畢業），也是文化協會同志吳海水的結婚祝詩：

自由結婚神聖戀愛

是吾們——所主張提唱〔倡〕  
要達到實現的時代

（批者將「所」字畫掉）

汝們倆

得有美滿今日

雖說是愛情的媒介

亦因為不避——

俗世議論愚頑指摘

有那奮鬥的精神

堅決的毅力

始獲從舊慣的範圍裏

解脫出來

在充滿了喜氣的寺堂中

一束束的鮮花

特地裏美綠嬌紅

至愛之神監臨著

互相握手的刹那

已足償了人生苦痛

更希望造成理想家庭

來光大新人名聲

把叛逆憐憫等——德性

遺傳給子孫

好擴張我族的繁榮

（批者將「叛逆憐憫等——」改爲「悲天憫人鋤強扶弱的」等字；眉批：雖有必然的至理但須以含蓄出之爲是）（註九六）。



在日本統治下，賴和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將「叛逆」認為是德性，這自然是出於抵抗精神；憐憫則是出於同情弱者，兩者皆是賴和個性的基調，也是以後他從事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在這首詩裏，我們還看到文協會員，甚至推而廣之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人，結婚也是對統治者的鬭爭，因為可以擴張我族的繁榮。

這樣的白話詩，放到一九二四年的大陸文壇，一點也不遜色。賴和在習作白話詩時所使用的語調，基本上是中國白話文語調，他可能無法講流利的北京話，但多少有一些基礎。遠可追溯到台灣總督府醫學學校時代學過國語正音，此外就是廈門博愛醫院行醫的那段時間，亦可能學習過。賴和對白話文的運用，亦透過閱讀新文學作品而來，即使一九二〇年回到彰化行醫之後，仍然繼續不斷的閱讀中國新文學雜誌。一九二二年賴和鼓勵其五弟賴賢穎到廈門集美中學念書，而後於一九三〇年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就讀。賴賢穎肯定他自己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且在訪問中，他曾回答訪問者說：

當時祖國方面的雜誌如《語絲》、《東方》、《小說月報》等，我都買來看，看完就寄回家給賴和，賴和就擺在客廳，供文友們閱讀。（註九七）

《小說月報》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新文學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元月再經改版，成爲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之役後才停刊，前後長達十一年之久；《語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於一九三一年停刊，出版了七年，也是帶動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重要刊物。我們從賴和長期閱讀的記錄（註九八），可以了解即使隔著台灣海峽，在日本統治下的賴和，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動向是不會陌生的，透過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稿本的白話詩作品，我們知道賴和的新文學創作，起步的相當早。

等到一九二五年張我軍在台灣掀起新文學運動的高潮，賴和以他幾年默默苦練的成績，陸續發表新文學作品，水到渠成，以堅實的作品實踐了啓蒙期的文學理論，一開始即得到文學界充分的肯定。

賴和第一次展示他對新文學的關心，見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在答覆〈台灣民報特設五問〉中，他反對「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學」，強調「有台灣色彩的文學」，他先前未發表的新詩，同樣也具有這種特色。

在《台灣民報》的同一期裏，賴和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學創作，是隨筆〈無題〉，

前半闕是散文，後半闕以一首詩結尾。在中國白話文的行文裏，也的確顯現出具有台灣色彩。這篇作品被同時起步創作新文學的楊雲萍稱贊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優婉」（註九九）。這時距離陳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發表於《台灣青年》，第一篇有關文學的論文〈文學與職務〉，整整五年；距離黃呈聰一九二三年元月在《台灣》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兩年八個月；距離張我軍一九二四年八月於《台灣民報》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約略一年；距離楊雲萍、江夢筆一九二五年三月創辦台灣第一本白話文學雜誌《人人》，約略半年。這也足以看出台灣新文學理論的出現與作品實踐間的困難。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張我軍《亂都之戀》結集出版。這時賴和方才發表第一首白話新詩——〈覺悟下的犧牲〉，不僅不歌功頌德，不粉飾太平，而且站在殖民地被統治者的立場，以詩為劍強烈地批判「支配者」——日本當局是虎狼鷹犬。單從這首詩的副標題：「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已鮮明地標示賴和全面肯定奮起力爭權益的農民。全詩賴和如此結束：「唉，／覺悟下的犧牲！／覺悟地提供了犧牲，／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這是多麼光榮！」（註一〇〇）。僅以這首詩，賴和所呈現的道德勇氣與文學藝術，就足以在台灣新詩史上，占有不朽的一頁。

隨後賴和於一九二六年元月發表〈鬪鬧熱〉，開始小說的寫作，也同時展開十年間多彩多姿的新文學生涯。

從賴和的步入新文學的園地，吾人可歸納出他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傳統詩↓新詩↓散文↓小說。這樣的發展過程，大體也符合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賴和的創作，從一開始就與新文學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 附註

註七七：懶雲書室稿紙裝釘，計五十二頁。第一頁書丙辰丁巳間（一九一六—七），第四十七頁有〈申酉歲晚書懷〉，申酉係一九二〇—一年，〈祝南社十五週年〉寫在這首詩之前，經查南社創立於丙午年（一九〇六）冬天，此文最早不會早於一九二一年年底。

註七八：收於全集的〈僧寮閒話〉，缺了原稿本の後兩頁。其中和尚有句話，反映了賴和的想法：「現大千世界裡，有何法律，但有維持特別階級之工具而已，亦不過一種力的表現罷」。這個主題是賴和以後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一再重現。

註七九：參見〈惹事〉一文，全集，頁九二。

註八〇：參見〈彫古董〉一期，一文，全集，頁三九。

註八一：《克拉格比》一書係法國作家安那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一九〇一年的作

品《恐怖事件》(L'Affaire Crainquebille)，見於「一桿『稱仔』」的後記，全集，頁一九；其餘諸書，同上註。

註八二：賴和以日式漢文寫於在監人請願用紙。原圖發表於《賴和先生平反紀念集》。相片部分，頁二。

註八三：《台灣》，三年一號，漢文欄扉頁。

註八四：《台灣》，三年三號，頁四三—四。

註八五：流連思索俱樂部當是一九三九年成立的應社前身。

註八六：楊樹德(笑儂)、楊木(雪峯)、楊松茂(守愚)、楊添財(雲鵬)、吳銜秋(銜秋)、黃周(醒民)、王金海(金海)、陳滿盈(虛谷)、石錫勳(逸南)、賴和(懶雲)、李添才(華如)、陳英方(盈芳)、楊子庚(石華)、若虛(可能是陳炎)、鴻祥、定夫等十六人。參見《陳虛谷選集》，頁四三六。

註八七：刊於《台灣民報》三卷五號。頁一六。

註八八：參見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演說紀錄，刊於《台灣民報》五號，頁一〇。

註八九：收於全集，頁三四二—四。可明顯看出是流連思索俱樂部諷刺御用紳士的白話詩之表現。

註九〇：同註七七，頁四三—六。

註九一：《一九二二年稿本》，頁十八—九。

註九二：《一九二三年稿本》，頁二〇—三。

註九三：謝春木（追風）也以日文小說〈彼女は何處へ〉，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月發表於《台灣》三

年四—七號，是台灣最早的一篇小說。但他的日文創作皆曇花一現。

註九四：《一九二三年稿本》，頁五一—三。

註九五：為免行文蕪雜，此一部分及〈送盧谷君之大陸〉等白話詩當另文處理。

註九六：《一九二四年稿本》，頁八九—九二。

註九七：參見黃武忠《台灣作家印象記》（台北，衆文，七十三年五月）〈溫文儒雅的賴賢穎〉一文，頁

六六。

註九八：楊遠是賴和晚年相當接近的文友，他在〈憶賴和先生〉文中曾提及：「先生的客廳裏，擺著一個長方形的大桌子。在桌子上，經常，擺著幾種報紙和雜誌。」全集，頁四一三。因這段記錄，

筆者在楊遠生前採訪他，問及其中可有中文雜誌？楊遠答稱有。

註九九：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創刊號。

註一〇〇：原刊《台灣民報》六十四號，收於全集，頁一三九—四二。

## 五、初期作品白話文的運用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啓蒙期，受到中國大陸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影響，有明顯線索可查，甚至東京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創刊《台灣青年》，單從取名都可看到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之影象（註一〇一）。在《台灣青年》的創刊號上還邀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題字：「溫故知新」；慶應大學畢業的陳炳寫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篇理論文章〈文學與職務〉，結論云：

蓋文學者，不可僅以使人生有自然之興趣，純潔之情操，為責任已完。又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始可謂有自覺之文學也。……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無非有感於此耳。（註一〇二）

顯示陳炳受到中國大陸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學革命的影響。此後，不管是《台灣》、《台灣民報》有關文學理論，都不脫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範疇。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



日發行的《台灣民報》創刊號，陳逢源的一首詩，直接道出此一流源。陳詩云：

詰屈贅牙事可傷，革新旗鼓到文章。

適之獨秀馳名盛，報紙傳來貴洛陽。（註一〇三）

這一期並轉載胡適的戲劇作品〈婚姻大事〉，爾後屢次轉載陳獨秀、魯迅、郭沫若、徐志摩、劉大杰……等人文學的作品，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

台灣的青年人對於白話文發生興趣，我們也可從《台灣民報》創刊號上，黃朝琴（超今）答覆台北林佛樹的一則記載，看到這個趨勢。黃氏云：

接到你的信，即知你極熱心共鳴我們的宗旨，要同我們一齊提倡白話文，實在感服得很。承問研究的方法，最快捷的就是先向上海亞東圖書局（「館」字誤寫為「局」）購本語法講義，及知道了用法，即再買幾本白話的文範練習練習，數月之後包管成功。（註一〇四）

亞東圖書館是一九二〇年代，胡適推動白話文的主要陣營之一，像《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等古典白話文學都由亞東以新式標點重行出版，《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推動新文化的重要書籍，也是由亞東出版（註一〇五）。黃朝琴建議有心研究白話文的青年，向亞東買白話書本練習，亦可看出他一九二三年一、二月相繼發表〈漢文改革論〉上、下篇（註一〇六），也是有所淵源。同時代發表文學理論的人，自然亦有所本，脫離不了五四這個源頭。

《台灣民報》創刊同時倡設白話文研究會，以啓發台灣文化，做為創刊的紀念事業，強調「現在中國公學校裏都改用白話文」，「提倡白話文要做社會教育的中心」，擬定會所設於台南市東門町，印出台灣白話文研究會的暫定簡章，邀集關心白話文的人入會（註一〇七）。這樣具體的推動白話文，也和中國大陸的潮流有關。

台灣新文學是由白話文出發，賴和得風氣之先，早在一九二一—二四年在他傳統詩的稿本，練習寫白話詩文，奠定了寫作基礎。而身為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賴和的重要意義在於通過他的文學創作，將台灣一九二〇年以後的文學理論，具體化地呈現出來，由他「打下第一鋤，撒下第一粒種子」（註一〇八）。我們從他早期發表的作品，再一次檢討白話文使用的問題，可以肯定的說，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

國白話文基調，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形成他文字的特殊風格，以作品更進一步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

整體而言，賴和使用白話文的能力，是隨著寫作的年代，越來越進步、越口語化。誠如研究者梁景峯所言：

賴和的小說文字除了稍嫌生澀外，很少出現用字和句法的錯誤，他使用的字大都是常見的簡單字，很少難字和抽象用語。他不用長句，只用短句，就是用逗點（、）等於今日（，）的用法，把主句和各種副句和副詞片語間隔，使句子的意義明朗化，不易使人誤解。所以唸起來相當順口，並無嚙嗑的感覺。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也力求真實，符合當時狀況，所以大都用台語口氣，常用一些幽默的古成語。（註一〇九）

爲了探討賴和早期白話文的來源，我們以他最早公開發表的散文、白話詩、小說各一篇來追索台灣新文學初起步時的語言使用問題。賴和的〈無題〉，是這樣開頭的：

明天是她結婚的慶典、可沒有一點點東西、表些些祝意麼？我心理想了又想、默默地

想。(註一一〇)

這純粹是中國白話文，用中文來讀極爲通順，如果完全換用台語來讀，是讀不通的。「她」字的用法，是開風氣之先，以後才有楊雲萍在《人人》雜誌裏使用。

——一陣喧天的鑼鼓、從前街過來、一雙脚不由自主地把我的軀體、搬運到街上去。

「看熱鬧去啊！媽媽。」街上的孩子們走著在喊。(註一一一)

在台灣新文學作品裏，使用「不由自主地」，這樣的副詞，以及「媽媽」這一詞，都是開風氣之先。「看熱鬧去啊！」如果換用台語語調，得改爲「去看熱鬧啊！」可見賴和是以中國白話文語調行文。

——金鐲子、嵌寶石的指環、翡翠的頸飾、最時式的衣衫、這些物件、當能使她滿足、快樂、真的她已經滿足快樂了！我喃喃地獨語著。(註一一二)

時式即國語裏的流行，物件即國語裏的東西，賴和就是這樣加入了一些台灣語調以加重台灣色彩。再以賴和的第一首發表的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第一段為例：

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唉，這是多麼難能

他們誠實的接受

使這不用酬報的犧牲

轉得有多大的光榮！（註一一三）

這也是中國的白話文，加入像「轉得」〔反而〕這樣的台灣語調。第七小節：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註一一四）

這樣的白話新詩，無論內容與技巧的表現，放在二〇年代大多數主題薄弱語言依然生澀的大陸文壇，絕對可以其傑出的表現被選為代表作。再看賴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鬪鬧熱〉的開頭一段寫景的場面：

——拭過似的、萬里澄碧的天空、抹著一縷兩縷白雲、覺得分外悠遠、一顆銀亮亮的月球、由深藍色的山頭、不聲不響地、滾到了天半、把她清冷的光輝、包圍住這人世間、市街上罩著薄薄的寒煙、店舖簷前的天燈、如電柱上路燈、通溶化在月光裏、寒星似的一點點閃爍著。(註一一五)

這完全是中國白話文的語調，由遠景拉到近景，然後帶入即將呈現的事件。賴和白話小說的描寫能力，已經相當成熟了。在前述場景裏，也僅有「電柱」「電線桿」一辭是台灣方言。賴和也一再應用方言、俗語、諧音使得全篇小說具有台灣的地方特色。例如：

1. 囡仔事惹起大人代。意即因孩子的事，惹成大人的糾紛。

2. 狗屎埔變成狀元地。意即地價高漲。

3. 儉腸捏肚也要壓倒四福戶。意即省吃儉用也要壓倒城裏的人。

4. 所以這一回、就鬧得非同小〔俗謂發狂——原註〕狗〔以可字同讀亦俗語——原註〕。這是利用台語的諧音，造成的雙關語趣味。

這些方言的使用，使得賴和的小說更具有親和性。如以最簡單的方法來檢驗他使用中國白話文，還可以從對白裏罵人的話，得到清楚的印證。如：

——「汝算不到、」老人說、「抵當賓客的使費〔花費〕、在貧家、也就不容易、一塊錢、現在不是糶不到半斗米？」

「牠媽的、老不死的混蛋！」甲總不平地罵。

牠〔他〕媽的，混蛋，這樣罵人的粗話，在台語裏不是這樣使用的，何況這些粗話在對白裏還一再出現了。

以上提出這些彷彿不成問題的問題，其實對於檢討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是相當重要的，足以證明一開始台灣新文學的出現，即受到中國白話文的影響。如果是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所走的方向會是另外的面貌。而且一九二五、二六年階段尚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到台灣話文的寫作，一直要到一九三一、三二年郭秋生才引發這個

問題。也就是在臺灣文學的啓蒙期，不可避免地無論就理論或創作而言，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衝擊之後的反應。由於語言運用的問題，賴和寫作的過程，極爲辛苦。王詩琅在「賴懶雲論」裏，留下了一則記載：

他是一個極爲認真的作家。每寫一篇作品，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爲白話文，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據說也有時反其道而行的。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顯得十分工整。（註一一七）

這些話透露了賴和那時代的人，應用白話文寫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賴和以此許國語正音的能力，透過了閱讀五四新文學作品，培育了中國白話文的寫作能力，才能在台灣新文學的領域裏首先開拓，並得到廣泛而肯定的評價。

爾後賴和擔任《台灣民報》的編輯，以編輯者的身分介入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學發展的方向，更具影響力。賴和的朋友楊守愚曾提到有關經過：

民報原沒有設文藝欄。但經過了言文論爭，又發表了賴懶雲的小說之後，當時民報的編



輯醒民（黃周）思有以促進台灣新文學之報導，就主張設文藝欄，為文學同好者提供發表、討論的園地。……這樣經過數次討論之後，才知道了要一起解決人才和經濟難題的上策，將文藝欄創設的重責整個囑託於懶雲氏之外，別無他法。（註一一八）

可見在新文學運動開展期，賴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角色，與賴和同時起步創作白話文學的楊雲萍這時候正當留學日本大學後轉入文化學院，張我軍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環顧台灣除了賴和再也找不到具有創作經驗的編輯人選。賴和的編輯工作，十分吃重，就如同在一片荒蕪的園地裏開墾，以便培養出各種的奇花異草。楊守愚極為了解個中甘苦，在他的回憶裏，留下了相當重要的一段記錄：

通常，一個編輯者任務，無非只是擔當作品之閱讀從而加以選擇的工作。遇到「不合格」的作品，就把它往紙字簍一丟了事。但是，懶雲當時的文學界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爲了補白報紙空下來的版面，就無法去選擇原稿。他當時幾乎是拚著老命去做這份工作的。他毫不珍惜體力地去一一刪修寄來的稿子，有時甚至要爲人改寫原稿的大半部份。常常有些文章，他簡直是只留下別人的情節而從頭改寫過。（註一一九）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充分明瞭，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郭秋生、廖漢臣、黃得時、朱點人、林克夫、蔡德音……等人在台北成立台灣文藝協會，於隔年元月發行機關雜誌《第一線》之前，台灣本土文壇是以賴和為中心建立起來的。（陳）虛谷、（楊）守愚都受到賴和的提携，而現在生平不詳的人，如鄭登山、太平洋、鐵濤、劍濤、慕、孤峯、SM生、瘦鶴……等人的作品（註一二〇），如果沒有賴和的修改或甚至從頭改寫過，恐怕亦不能達到那樣的水準。

日據下的台灣，是與中國隔絕的，黃呈聰、張我軍、蔡孝乾、黃朝琴、賴和……等人，彷彿是一條臍帶，輸送了文化的新因子。賴和從一九二五年出發，以迄成為文壇的重鎮，除了他個人的創作天份之外，中國白話文的能力，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 附註

- 註一〇一：在《台灣民報》六十七號，紀念創立五週年發行一萬部的紀念號裏，靜園陳寄生曾提到從《台灣青年》以來所推動的潮流，「也恰像那民國的新青年嗎」，頁三六。
- 註一〇二：《台灣青年》創刊號，頁四二。
- 註一〇三：〈祝台灣民報發刊〉，《台灣民報》創刊號，頁二五。
- 註一〇四：〈研究白話文的討論〉，《台灣民報》創刊號，頁二六。
- 註一〇五：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即可看到介紹亞東圖書館發行的《水滸傳》、《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中國語法講義》等書的廣告。頁二七。
- 註一〇六：〈漢文改革論〉刊於《台灣》四年一號，頁二五—三一；〈續漢文改革論〉刊於《台灣》四年二號，頁二一—八。
- 註一〇七：《台灣民報》創刊號，頁二九。
- 註一〇八：守愚〈報顏聞話十年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頁六二。
- 註一〇九：梁景峯（梁德民）〈賴和是誰？〉原刊《夏潮》一卷六期，收於全集，頁四四〇。
- 註一一〇：賴和發表作品的刊物、時間，見下一節的附表。爲了查閱方便，以下悉引自《賴和先生全集》，

少許脫落字，已依據原刊改正。全集，頁二〇一。

註一一：同上註。

註一二：同註一一〇，頁二〇二。

註一一三：全集，頁一三九—四〇。

註一一四：同上註，頁一四一。

註一一五：全集，頁三。

註一一六：同上註，頁八。

註一一七：原刊《台灣時報》二〇一號，收於全集，頁四〇五。

註一一八：《小說與懶雲》，原刊《台灣文學》二卷二號，收於全集，頁四二六。

註一一九：同上註，全集四二六—七。

註一二〇：所發表的作品，收錄於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以

及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六十八年七月）。

## 六、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

賴和的新文學活動，始自一九二五年八月發表第一篇隨筆〈無題〉，當時他三十二歲；終於一九三六年元月發表小說〈赴了春宴回來〉（註一一二），當時四十二歲，前後約略僅有十年的時間。從一九三六年初之後，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前後整整七年之久，不曾發表任何一篇新文學作品（註一二三），也不會參加任何一次的文學論戰，甚至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之際，李獻璋編選日據時代唯一的漢文《台灣小說選》（註一二三），選錄了賴和五篇作品（註一二四），他也未寫序言，而由選錄三篇作品的楊雲萍執筆；三九年秋天賴和與彰化地區友人成立應社（註一二五），又恢復以傳統詩為創作的中心。換言之，在新文學運動的高潮時期，中日文新作家人才輩出，而賴和已退出他心血灌溉出來的園地了。當然，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台灣總督府強制僅存的《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文學》相繼廢除漢文欄（註一二六），賴和又堅持用漢文創作，已英雄無用武之地，停止新文學的創作，以文化遺民的精神寫傳統詩，正是一種文化抵抗的姿態。由這個角度來理解賴和的新文學活動，更突顯

出他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但多年磨鍊出來的新文學寫作技巧就這樣放棄了，亦是台灣新文學的重大損失。賴和的停止新文學創作，是否尚有另外的因素，亦值得進一步探究。

賴和十年間的新文學活動，所發表的作品計有小說十六篇、新詩十二篇、隨筆散文十二篇、通訊、序文各一篇，總共四十二篇。作品生前雖未能結集出版，但幾乎每一篇發表時都引起廣泛注意，影響深遠，方能取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聲譽。

以下爲了研究的需要，不依發表的先後而按照寫作的先後時序，先行列表如下：

表前說明：①●小說，○新詩，◎隨筆散文。

②以西元繫年。( )表示推定時間。年月日均記明的是賴和注明的是完稿時間。

③〈城〉在《南音》發表時題目爲〈我們地方的故事〉。

④〈賴和先生年表簡編〉中，一九三六年，記載〈春雷譜〉於《台灣新民報》連載，延續王詩琅之誤記。〈春雷譜〉是楊雲萍創作的日文作品，陳敬輝

畫插圖。

⑤未公開發表的作品暫不列入。

| 寫作時間          | 題名              | 署名 | 發刊物        | 發表日期             |
|---------------|-----------------|----|------------|------------------|
| 1 25. 7. 20   | ◎無題             | 懶雲 | 台灣民報六七號    | 25. 8. 26        |
| 2 (25. 8 )    | ◎答覆台灣民報特設五問     | 賴和 | 台灣民報八六號    | 25. 8. 26        |
| 3 25. 10. 23  | ○覺悟下的犧牲         | 懶雲 | 台灣民報八四號    | 25. 12. 20       |
| 4 (25. 11 )   | ●鬪鬧熱            | 懶雲 | 台灣民報八六號    | 26. 1. 1         |
| 5 (25. 12 )   | ◎答覆台灣民報設問       | 賴和 | 台灣民報八六號    | 26. 1. 1         |
| 6 25. 12. 4 夜 | ●一桿「稱仔」         | 懶雲 | 台灣民報九二—九三號 | 26. 2. 4—2. 21   |
| 7 26. 1. 9    | ◎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 | 懶雲 | 台灣民報八九號    | 26. 1. 24        |
| 8 26. 3. 7    | ◎謹復某老先生         | 懶雲 | 台灣民報九七號    | 26. 3. 21        |
| 9 (26. 12 )   | ◎忘不了的過年         | 懶雲 | 台灣民報一三八號   | 27. 1. 2         |
| 10 (27. 7 )   | ◎對台中一中龍學問題的批判   | 賴和 | 台灣民報一六五號   | 27. 7. 10        |
| 11 (27 )      | ●補大人            | 懶雲 | 新生第一集      | 27               |
| 12 27. 12. 14 | ●不如意的過年         | 懶雲 | 台灣民報一八九號   | 28. 1. 1         |
| 13 28. 5. 1   | ◎前進             | 賴和 | 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  | (東京)<br>28. 5. 7 |

|                  |                  |           |               |           |            |                  |           |            |             |                  |                     |                   |                  |                   |
|------------------|------------------|-----------|---------------|-----------|------------|------------------|-----------|------------|-------------|------------------|---------------------|-------------------|------------------|-------------------|
| 28               | 27               | 26        | 25            | 24        | 23         | 22               | 21        | 20         | 19          | 18               | 17                  | 16                | 15               | 14                |
| (31. 4)          | (31. 2)          | 31. 1. 7  | (30. 12. 16後) | (30. 12)  | (30. 12)   | 30. 11. 18       | 30. 10. 5 | (30. 10)   | (30. 9)     | (30. 8)          | (30. 7)             | 30. 4. 30         | (29. 12)         | (28. 7)           |
| ○南國哀歌            | ●浪漫外紀            | ○滅亡       | ◎隨筆           | ○農民謠      | ○新樂府       | ○生與死             | ●辱!?      | ●棋盤邊       | ◎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 | ○流離曲             | ◎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 | ●彭古董              | ●蛇先生             | ◎無聊的回憶            |
| 安都生              | 甫三               | x         | 懶雲            | 甫三        | 懶雲         | 甫三               | 甫三        | 懶雲         |             | 甫三               | 懶雲                  | 甫三                | 懶雲               | 懶雲                |
| 台灣新民報三六一—三六二號    | 台灣新民報三五四—三五六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七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三號  | 台灣新民報三二九—三三二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 現代生活創刊號    | 現代生活創刊號     | 台灣新民報三二九—三三二號    |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 台灣新民報三一—三一四號      | 台灣民報二九四—二九六      | 台灣民報二一八—二二二號      |
| 31. 4. 25   5. 2 | 31. 3. 7   3. 21 | 31. 1. 17 | 31. 1. 1      | 31. 1. 1  | 30. 12. 13 | 30. 9. 6   9. 27 | 31. 1. 1  | 30. 10. 15 | 30. 10. 15  | 30. 9. 6   9. 27 | 31. 1. 1            | 30. 5. 10   5. 24 | 30. 1. 1   1. 18 | 28. 7. 22   8. 19 |



|                |                |                |               |                |               |               |                        |                      |                |                |                |                |               |                      |
|----------------|----------------|----------------|---------------|----------------|---------------|---------------|------------------------|----------------------|----------------|----------------|----------------|----------------|---------------|----------------------|
| 43             | 42             | 41             | 40            | 39             | 38            | 37            | 36                     | 35                   | 34             | 33             | 32             | 31             | 30            | 29                   |
| 35<br>12<br>13 | 35<br>12<br>10 | 35<br>10<br>10 | (35<br>1<br>) | (34<br>11<br>) | 32<br>1<br>27 | (32<br>1<br>) | (32<br>1<br>)          | (31<br>12<br>)       | (31<br>12<br>) | (31<br>12<br>) | 31<br>11<br>13 | 31<br>10<br>20 | (31<br>6<br>) | (31<br>4<br>)        |
| ●一個同志的批信       | ●赴了春宴回來        | ◎台灣民間文學集序      | ○呆囡仔          | ●善訟的人的故事       | ◎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 ◎城(我們地方的故事)   | ●惹事                    | ●豐作                  | ●歸家            | ○相思歌           | ○祝曉鐘的發刊        | ○低氣壓的山頂        | ○思兒           | ●可憐她死了               |
| 灰              | 懶雲             | 懶雲             | 甫三            | 懶雲             | 賴和            | 玄             | 懶雲                     | 甫三                   | 懶雲             | 懶雲             | 曉鐘             | 甫三             | 安都生           | 安都生                  |
| 台灣新文學創刊號       | 東亞新報新年號        | 台灣民間文學集        | 台灣文藝二卷二號      | 台灣文藝二卷一號       | 南音一卷三號        | 南音一卷三號        | 南音一卷二號、六號、九號、十合刊號      | 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七號        | 南音創刊號          | 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      | 曉鐘創刊號          | 台灣新民報三八八號      | 台灣新民報三七〇號     | 台灣新民報三六三—三六六號        |
| 35<br>12<br>28 | 36<br>1        | 36<br>5        | 35<br>2<br>1  | 34<br>12<br>18 | 32<br>2<br>1  | 32<br>2<br>1  | 32<br>1<br>17—7.<br>25 | 32<br>1<br>1—1.<br>9 | 32<br>1<br>1   | 32<br>1<br>1   | 31<br>12<br>8  | 31<br>10<br>31 | 31<br>6<br>27 | 31<br>5<br>9—6.<br>6 |

從上表的歸納，我們可以發現賴和新生文學運動十年間概略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從〈無題〉到〈無聊的回憶〉。

一九二八年七月之後，停止一年半。

第二期：從〈蛇先生〉到〈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一九三二年元月之後，停止一年十個月。

第三期：從〈善訟的人的故事〉到〈一個同志的批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之後，未發表新文學作品。

其中尤其以一九三〇、三一兩年創作最為熱烈，在全部發表作品四十二篇中，總共佔了二十篇，幾乎達到半數。

賴和的第一期，相當於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啓蒙期。這一階段文學理論不少，但作家也僅有謝春木、賴和、張我軍、楊雲萍、施文杞……等少數幾個人。賴和的重要意義即在同時以新詩、散文、小說，實踐了台灣文學革命的要求。

賴和的第二期，相當於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開展期。第一階段(陳)虛谷、(楊)守愚、(朱)點人、(蔡)愁洞、周定山(一吼)、(郭)秋生、楊華、王白淵、(鄭)夢華……加入創作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諸人，除了朱點人、郭秋生是台北市人、

蔡愁洞是雲林北港地區人，楊華是屏東人，其他大都是彰化地區的人，即使台北的朱點人等人亦曾受到賴和的指導。（註一二七）這一階段賴和除了創作之外，還負起了新文學保姆的任務。

賴和的第三期，正當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由成熟期進入高潮期的階段。賴和在創作方面僅有小說三篇、詩一篇，而且明顯地〈赴了春宴回來〉、〈一個同志的批信〉氣勢上也弱了。他的困擾其中之一，來自一九三〇年八月黃石輝展開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引發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底，由郭秋生燃起的「台灣話文」問題。在黃石輝的階段，賴和絕對有台灣本土意識；郭秋生的階段台灣話文的使用，賴和理智上認可，但台語中有些有音無字的問題，顯然不是那麼容易解決，而且通篇以台灣白話文來寫，也非常困難。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七日給郭秋生的信上，賴和寫道：

新字的創造，我也是認定一定程度有必要，不過總要在既成文字裡尋不出「音」、「意」兩  
可以通用的時，不得已才創來用，若既成字裡有意通而音不諧的時候，我想還是用既成字，

附以旁註較易普遍。（註一二八）

賴和在寫完這封〈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的通訊後，中斷了他第二期的寫作，可見這問題深深困擾了他。

賴和從一開始寫作，是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加上一些台灣語氣；如全用台灣白話文創作，等於要重新開始。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他終於以台灣白話文寫成他最後的一篇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發表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得來的反響却是這樣：

在〈一個同志的批信〉的灰氏（賴和）的計劃諒是以漢字寫台灣白話，以謀大眾化。他的立想確實可敬，可是用了許多新造的台灣白話漢字反見得為諸篇中最難讀的一篇。（註二九）

就在日本當局尚未全面禁止報刊雜誌的禁用漢文一年半前，賴和終止了新文學的寫作，之後即使再寫已經沒有園地發表了。

由於賴和的漢文基礎與民族意識，他對中國白話文是有深厚的感情，也由於善

用中國白話文，因此在台灣新文學史上首先崛起。一九三一年以後本土意識更強，嘗試台灣話文的寫作，但結果顯然是失敗，賴和沈默了下來。

### 附註

註一二一：在賴恆顏李南衡合編〈賴和先生年表簡編〉一九三六年尚有「小說：〈春雷譜〉」，在《台灣新民報》連載」一則，全集；頁四九九。這是延續王詩琅〈賴懶雲論〉一文的誤記，事實上〈春雷譜〉是楊雲萍寫的日文小說。

註一二二：一九三六年賴和還曾在《台灣新文學》發表〈寒夜〉、〈苦雨〉、〈田園雜詩〉、〈新竹枝詞〉，已是傳統詩的形式，故不列入新文學的創作。

註一二三：這本《台灣小說選》在日據時代未能出版。據王詩琅的說法：「這本選集大約是日昭和九或十年出版已經排好了版，提出日當局審查，將行問世，就遭禁止發行，版也馬上毀掉，永遠不能問世。據他們說禁止理由是全書的內容欠妥，換句話說就是說這選集充滿了濃厚的反日民族色彩。」《台北文物》，三卷二期，頁三七。

註一二四：五篇作品依序是〈前進〉、〈棋盤邊〉、〈辱〉、〈惹事〉、〈赴了春宴回來〉。《台灣小說選》，頁一—四八。

註一二五：主要成員是賴和（懶雲）、陳滿盈（虛谷）、楊樹德（笑儂）、楊木（雪峰）、陳英方（渭雄）、石錫勳（逸南）、楊添財（雲鵬）、吳衡秋（衡秋）、楊松茂（守愚）、楊子庚（石華）。

註一二六：一九三七年九月，簡荷生又主編中文禁止使用後的唯一中文雜誌《風月報》，文言白話並載。

註一二七：見朱石峰〈回憶懶雲先生〉，收於全集，頁四二〇。

註一二八：《南音》一卷三號，頁九。

註一二九：《新文學月報》第二號，頁一二。依筆者看法將台灣白話文提昇到文學、社會科學用語，最有成就的是曾到北京研究的早稻田大學講師郭明昆（郭一舟），他在一九三五、六兩年於《台灣文藝》發表〈北京話〉（二卷五號）、〈福佬話〉（二卷六號、十號、三卷四、五合併號），代表了日據時代科學地研究北京話、台語的水平。

## 七、路線的轉折——〈前進〉的探討

賴和的散文〈前進〉，是反映他一九二七年路線轉折的重要文章。李獻璋日據時代編《台灣小說選》時，將〈前進〉當成小說，列於全書第一篇，當時即未載明發表的雜誌（註一三〇）；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列於隨筆雜文，歸納正確，但文末註明「本文可能作於一九二八年前後，原載刊物及日期不詳」（註一三一）；塚本照和及下村作次郎尋得被禁止刊行的《台灣小說選》校本（註一三二），〈前進〉一文，賴和註明作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從另外記載得悉原發表刊物是《台灣大眾時報》（註一三三）。《台灣大眾時報》，是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元月文協左右分裂之後，新文協籌辦發行的刊物（註一三四）。

賴和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理事，爾後新文協階段擔任評議員（註一三五）一九二六年以降主持《台灣民報》文藝欄（註一三六），一九三一年元月擔任《台灣新民報》「相談役」，並兼學藝部「客員」（註一三七）。當一九二七年文協左右分裂時，賴和是分裂後代表，但台灣民眾黨成立後也擔任幹事（註一三八）。

在這思想衝激強烈的「左右傾辯」的時刻，顯然賴和比較傾向激進路線的新文協。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大眾時報社於台中成立。林碧梧任社長，王敏川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賴和則擔任監查役兼囑託（特約）記者（註一三九）。大眾時報社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申請，結果不准發刊，遂移往東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由蘇新擔任發行人及總編輯（註一四〇）。

《台灣大眾時報》，記事全部採用白話文，而《台灣民報》於一九二七年島內發行許可時，讓步增添了日文，且比例越來越重。就這相異性而言，《台灣大眾時報》，亦展現出文化抵抗的姿態（註一四一）。

賴和此一階段傾向新文協，是有脈絡可尋的。在他的遺稿〈赴會〉（註一四二），即已顯現徵兆。這篇散文是遠在文協分裂之前，賴和有一次赴霧峯林家開理事會的心靈記錄。〈赴會〉由出發搭車起筆，在車站等車的時候，賴和看到一隊進香客，從而引發出一些感想：

這些燒金客，在我的觀察是勞動者和種做的人占絕對多數，他們被風日所鍛煉成的鉛褐色的皮膚，雖缺少脂肪分的光澤，却見得異常強韌而富有抵抗性，這是爲人類服務的忠誠的



奴隸，支持社會的強固基礎。他們嘗盡實生活的苦痛，乃不得（不）向無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虛的慰安，社會只有加重他們生活苦的擔負，使他們失望於現實，這樣想來使我對社會生了極度厭惡痛恨咒詛的心情，同時加強了我這次赴會的勇氣。（註一四三）

賴和的同情勞動者，和他的出身背景有關，他本身就是出身民間而又回到民間去的人，總是站在弱者的立場，是十足的人道主義者。搭乘火車的途中，賴和想及過去文化協會所提倡的破除迷信，然而也不禁這樣想：

迷信破除也不切實際，（假）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與何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衆，像這些燒金客呢？這樣想來我不覺茫然地自失，惘然地感到了悲哀。（註一四四）

賴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單由他這樣自然流露的溫情，也可以略窺一二了。文中賴和描寫火車繼續向前行，他無意間聽到了兩個紳士風的日本人、台灣人就文協開會的消息閒談，那個紳士風的台灣人結論中批評文協的人是這樣的情形：

……那些中心分子，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鬭爭，只見三不五時（台灣成語，偶而）開一個講演會而已。（註一四五）

聽到這樣的談話，賴和不覺又感到一陣悲哀。正在等待換乘小火車時，他碰到了一位同樣赴會的同志，因對方乘坐的是一等車廂，而他買的是三等票，「只是幾句寒暄便就分手」，雖是十分簡潔的描寫，但諷刺意味極為強烈。這裏點出了文協的理事們畢竟還是出身大地主居多，像那位同志為民衆奔波，還是要搭一等車的，賴和當然不是搭不起一等車，是一種與民間一體的意識使然吧。在小火車上，他又聽到了農民對於清朝時代霧峯林家霸佔農民土地的批評，以及林家對於田租的計較等等。賴和以一路上聽來的對話，一點也不渲染地呈現了他的觀點與立場，這次赴會的結果，已經顯現了賴和未來的轉折路線。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他這樣寫道：

……兩派的爭執，似有不能相妥協的形勢，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為前提，一派以民族意識做根據，力圖團結全民衆為目的。議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結。（註一

## 四六

歷史之發展文化協會終於分裂，結果是以連溫卿為首結合新入會的「無產青年」佔領了文協，舊文協的幹部以後退出另成立台灣民眾黨（註一四七）。賴和以舊時淵源仍和舊文協保持聯繫，然而已漸漸傾向新文協，於是有參加《台灣大眾時報》之舉。

在日本發行的《台灣大眾時報》創刊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以這一天為發生日，不是偶然的。五月七日乃是五七國恥紀念日，就這一點而言，這階段新文協的抗日與中國大陸的抗日，都具有強烈反帝國主義的傾向。

賴和〈前進〉一文載明五月一日，極有可能是為《台灣大眾時報》預定五月十日出版的「五一紀念號」（註一四八）而寫。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賴和的〈前進〉，標示了他隨着時代的潮流前進。了解這樣的背景，再來分析內文，除了欣賞文學之美外，賴和寫作本文的義理，當更能深刻體會。

在這篇散文裏，賴和首段以「駭人的黑暗」來象徵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然後引出主題：

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或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註一四九）

母親的內在含義即是中國，後母無疑就是日本，而離家出走的孩子，隱然已呈現了日後吳濁流所描寫的「孤兒意識」了。這裏賴和提到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內在含義指向新舊文協，是台灣不同出身背景的兩個主要抗日團體，未來台灣希望。主觀上賴和希望兩方面能像兄弟般互相提携前進：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在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携着手，堅固地信賴地互相提携；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脚步。前進！盲目地前進！無目的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携，爲着前進而前進。（註一五〇）

時代思潮繼續不斷地往前推動，這是莫可阻却的勢力，同是時代的菁英，自然

必須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然而這一階段的新文協以「階級鬭爭」做為指導原理（註一五二），舊文協爾後成立的台灣民衆黨，雖然標明「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註一五三），但實質仍是「民族運動」的內容。兩者之間，究竟存在着矛盾。賴和在〈前進〉一文中，也指明兩兄弟不是「先知」，只因在黑暗中，不得不前進，「依然向着夢之國的路，繼續他們的前程」。途中兩兄弟之中的一位，「不知是兄哥或小弟」，當另一位在休息的時候，繼續獨行：

此刻，他才感覺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忽惶回顧，看見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

跟來！趕快！（註一五三）

賴和在這裏顯露了他內心的傾向，並且希望舊日同伴跟上前來，但是這種主觀的意願，並不能改變客觀的事實。全文結尾處，賴和飽滿着感性的語調描寫外界的景觀：

……黑暗的氣氛，被風的歌唱所鼓勵，又復濃濃密密屯集起來，眩眼一縷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再恢復到前一樣的暗黑，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

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着前進。

前進！向着那不知到着處的道。……（註一五四）

在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之後的台灣胎動期，賴和以他的這篇散文呈現各種不同的動態。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是新文協有左傾的動向，但究竟與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在初期仍是不同的派別（註一五五）。賴和在《前進》中是「向着那不知到着處的道。……」，僅是烏托邦的理想，是奮鬥的必然過程，並沒有預示着任何「天堂」的遠景。

《台灣大眾時報》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創刊。由於原本準備設在台中，後來移往東京發行，賴和因此不再介入編務。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台灣民報》刊載一則有關報導：

台灣大眾時報社因為台灣當局不許其台灣設置支局，故不得不停止刊行，以致該報受了

重大的打擊，而民衆也很因之失望。(註一五六)

從這則新聞報導看來，《台灣大眾時報》大約發刊一年(註一五七)，然後於一九三〇年內籌辦再刊行《新台灣大眾時報》(註一五八)賴和可能亦未參與其事。

此一階段，楊克培主持的《台灣戰線》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創刊，其發行四期，全遭總督府查禁(註一五九)。賴和雖參加《台灣戰線》，但實際他主要的活動，已經漸漸又在《台灣新民報》這邊。一九三〇年民報爲紀念十週年，賴和於七月十二日擬定紀念文章的題目：「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在這篇文章中賴和極爲感慨的寫道：

實際上既有所謂支配者許可，既須受許可，若經過許可以後，已不是未被許可以前的面目了。說明白些，報紙須受到許可才能發行，經過檢查始得發賣，等到展開於讀者眼前，所謂純的被支配者的言論，不是一片烏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對於日刊的發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點可以期待的，就是當事諸君的妙筆，要使所發表的能夠通過檢查，而又不致於全部抹殺我們的意志。這樣當事諸君的能力，些少可以安慰像我這樣抱有未來憂

慮的人。(註一六〇)

處在這種檢閱制度底下的苦悶，足以令人窒息。賴和又是對時代感受極為敏銳的知識分子，他的參加《台灣戰線》源於文化層面居多，政治運動相對而言是比較少的。自一九二七年元月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賴和與左翼政治運動接觸，均可從這一角度觀察。同一時期除了《台灣戰線》，賴和又和《台灣新民報》的黃呈聰等人計劃刊行《現代生活》。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台灣新民報》刊載一則報導：

這回由彰化黃呈聰、楊宗城、林篤勳、賴和、許嘉種諸氏為發起，以普及合理的新智識，提倡〔倡〕高尚的趣味，改善社會的實生活，計劃發刊半月刊雜誌，其名稱叫做《現代生活》。

(註一六一)

刊物於十月十五日創刊。賴和除了發表小說《棋盤邊》，亦有一篇短篇：《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着》，強調要「唱道〔倡導〕平民文學、普及民衆文化」，認為在「現社會的狀態益感到新文學的普及必要，新倫理建設的緊重」(註一六二)。由此可



看出賴和向來所關心的主題，努力的方向，這是不必然和馬克思主義連結在一起的。《現代生活》僅出刊一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賴和未再參與王萬得等人將《伍人報》與《台灣戰線》合併的《新台灣戰線》。

一九三一年如同一九二七年是台灣社會內在變化非常劇烈的一年。在日本政治、經濟雙重壓榨下，左翼運動加速發展，從一月六日新文協召開中央委員秘密會議宣佈支持台共，即可看出徵兆（註一六三）。二月十八日，總督府下令解散台灣民眾黨，六月，日本警察當局在台灣全島搜捕台共分子，癱瘓的台灣共產黨與農民組合部分會員，相繼走入地下活動。

這一年的元月賴和已擔任《台灣新民報》的顧問並兼學藝部編輯，在全島搜捕台共份子的名單中，並未被列入（註一六四）。他走的仍是民族運動的路線，而非階級運動。賴和的同情勞動者，究竟是源於追求平等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的思想傾向廣義的社會主義，而非激烈的共產主義。誠如王詩琅的論述：

他（賴和）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也同情窮苦階級，但是他決不會躍身其中，去領導運動。俠義的正義感，才是他的思想的真面目。（註一六五）

何況日據時代台灣直接在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雙重壓榨下，爲了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左右傾辯」的歷史發展極爲複雜，我們也不能完全拿現在的尺度去衡量。

#### 附註

註一三〇：其餘選錄的小說，亦都未載明發表刊物。

註一三一：全集，頁二三七。

註一三二：塚本照和稱這本未能出版的《台灣小說選》爲「幻影之書」；下村作次郎有一論文〈台灣新文學の一断面——一九四〇年發禁，李獻璋編《台灣小說選》から〉，發表於《啞啞》第廿一・廿二合併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這本小說選在序的第一頁有「乞校正」三字，筆者亦從賴家借得，除了少數較複雜的字尚未排上，已近印刷前的清樣。

註一三三：守愚〈報顏閒話十年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頁六四。

註一三四：參閱《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復刻版改題《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頁二一九—二二。

註一三五：《台灣人士鑑》，台灣新民報社，頁三九八。

註一三六：此項記錄刻在賴和墓誌上。

註一三七：《台灣新民報》，第三百四十五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頁二八。在這之前，一九三〇年

元旦，《台灣民報》，第二九四號，頁二四，亦有名單，未見賴和之名。

註一三八：同註一三五；另參見《台灣民報》二八六號，記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新文協第三回全島

大會於彰化開會時，賴和被推為副議長。頁二。

註一三九：參閱若林正文〈中國雜誌解題：台灣大眾時報〉，《アジア經濟資料月報》，一九七五年一月號，頁二。

註一四〇：同上註，頁三。

註一四一：同註一三九，頁四。

註一四二：賴和在寫於東京創作用紙的原稿上，題目前，標記一九二四，不知是稍後回憶一九二四年的文協理事會，還是寫於一九二四年。〈赴會〉一文的所有文字比他第一篇正式發表的〈無題〉還

要好，技巧也十分成熟。

註一四三：〈赴會〉收於全集，比對原稿，文字稍有不同，俱已依原稿。爲了查閱方便，仍引全集頁碼，

頁三〇九—一〇。

註一四四：同上註，頁三一〇。

註一四五：同註一四三，頁三一—二。

註一四六：同註一四三，頁三一四。全集，民族意識，誤排爲民衆意識。

註一四七：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七十二年十月），頁三四七—八。

註一四八：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二二〇；另據若林正文〈中國雜誌解題：台灣大衆時報〉一文，

頁三。

註一四九：全集，頁二三四。

註一五〇：同上註。

註一五一：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五〇。

註一五二：同上註，頁三六六。

註一五三：全集，頁二三七。

註一五四：同上註。

註一五五：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起，新文協新選出的中央委員秘密集會，決議支持台灣共產黨，這時台

灣文化協會才成爲台共的外圍團體。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五三。

註一五六：《台灣民報》，二五九號，頁六。共發行幾期不詳。

註一五七：若林正文〈中國雜誌解題：台灣大眾時報〉一文，僅提到創刊號至第十號（七月九日）。

註一五八：參見若林正文，前揭文，頁八。

註一五九：參見塚本照和〈台灣文學年表〉，《南方文化》第八輯，天理大學出版，頁二八四。

註一六〇：全集，頁二三九—四〇。

註一六一：《台灣新民報》，第三二九號，頁五。

註一六二：尚未能見到《現代生活》，但從內文判斷，即是發表於此，收於全集，頁三五五—六。全集編者李南衡認爲這一篇「可能是最早期的作品，即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初期，一九二四年前後。」筆者認爲不可能這麼早。

註一六三：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五三。

註一六四：居伯鈞在〈內政部平反賴和先生一案經過〉，代表內政部說明：「我們把現有資料以及侯立朝先生所提供的資料交給政府專司調查機關，請他們查覆。經有關機關調查的結果，……民國廿年，台北警察署在全台灣搜捕台共份子名單中，亦無賴和之名，……可確定其非文協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收於《賴和先生生平反

紀念集》，頁二一—三。

註一六五：王詩琅〈賴懶雲論〉，全集，頁四〇〇。

## 八、文學內涵分析——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

賴和在日據時代是個具有反抗精神，追求自由平等的作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剛剛起步的時候，一九二六年他就強調「由來文學就是社會的縮影」（註一六六），他的文學作品也就深刻揭露了台灣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所受的政治、經濟双重壓迫。賴和的文學觀是透過社會實踐而來，從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擔任理事以來，歷經路線轉折，而一直沒有脫離社會運動的主流，和時代進步的脈搏一起跳動，從而他也是不能不和時代聯繫起來評論的作家。

賴和的作品是由現實出發，透過寫實主義與藝術的觀照，深刻表現日據下台灣殖民地的眾生相，尤其是一群被壓迫的弱者，從而強烈地表現了「我值強權妄肆威」（註一六七）的時代，也傳達了「被侮辱人勝利基」的訊息（註一六八）。

綜合來看，賴和一方面從文化革新的角度，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一方面由弱小民族抵抗的立場，譴責統治者不義的法。由於是透過一群弱者、被壓迫者悲慘境況的寫實面的描寫，賴和的文學控訴，顯得強而有力，也傳達出時代的心聲，屬於

積極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抗議文學。

以下爲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將他的兩個主要文學主題，分開來探討。

### (一)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

舊社會是故步自封的，尙存封建社會的殘像。賴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鬪鬧熱〉，就是以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批評舊社會迎神賽會所引起的鋪張的、無意義的競爭。小說裏的人物，其中之一說：「在這個時候，救死且沒有工夫，還有閒時間來浪費有用的金錢，實在可憐可恨，究竟爭得什麼體面」（註一六九），這是賴和觀念的具體呈現。以歷史的發展來看，隨著日本殖民體制的進入台灣，「四城門」的解體，象徵著不管願不願意，已步入近代的轉型期。如果仍被舊社會的習俗所操縱甚至爲迎神賽會，使得窮人家也要耗盡老本（終老喪費）來迎合舊俗，這是落後的，阻礙社會進步的。〈鬪鬧熱〉中發起、奔走的人都是學士、委員、中學畢業生和保正，都是當時有學問、有地位的人。賴和以他進步的觀點，批評了這些人。

〈蛇先生〉一文，是醫生探索傳聞中的秘方，加以研究的故事，是賴和行醫的



片斷記錄。秘方也是舊社會的產物、半神話式的、不完全實證的。小說中的蛇先生因治療蛇毒而出名，他有實在的一面，但對一般大眾也不免使用一些江湖手法，「明明是極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點，不教他們明白，明明是極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貴一點，不給他們認識，到時候他們便只有驚嘆讚美，以外沒有可說了」（註一七〇）。西醫後來終於得到了蛇先生的秘方，交給一位從事藥物研究的朋友，利用近代科學，化驗它的構成、檢定藥效以估定治療上的價值，花了一年十個月研究的結果，確定並沒有特別神奇的效力。這篇小說，賴和寫來生動有趣，是啓蒙時代破除舊社會「迷思」(myth)，導引進步觀念的作品。

〈棋盤邊〉是賴和反映一九二九年鴉片吸食特許問題的一篇作品。小說裏的角色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舊士紳，認定「吸食特許」是比文化協會的請願運動更具民意的民意，因為簽署的人更多。賴和透過「第一等人烏龜老鴉，唯兩件事打雀燒鴉」（註一七一）的反諷，諷刺了這一群落伍的舊士紳。這篇小說發表在「以改善實社會生活」為主旨的《現代生活》上，賴和的創作意念，更是清楚可見。

批評舊士紳，從而展現舊社會的陰暗面，以〈可憐她死了〉一文，最具有衝擊性。富戶阿力雖然有大小三個太太，仍買來窮人家的十七、八歲少女阿金做爲「獸

性蹂躪」的工具，不僅沒有絲毫溫情在內，而且是打著經濟的算盤，因為買個女人，比時常上妓院花費還要「便宜到十倍」。富戶阿力在小說中刻畫得極為深入，是賴和批判舊士紳的典型敗德人物，他們的世界愚昧、黑暗。富戶阿力透過他的經濟力量扮演著「性壓迫」的角色，阿金未死之前，已經又再託人「替他物色一個可以供他蹂躪的小女人」（註一七二）。賴和將有力者和弱者，對比的呈現出來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這是沒有人性尊嚴的世界，封建時代的殘影，在這篇小說中，仍顯現了它黑暗的勢力。

在另外一篇，賴和生前未發表的〈未來的希望〉（註一七三），阮大舍爲了要有後代承繼他的家產，在太太死後，「續娶了一房正妻，和幾房側室，正妻子又賠〔陪〕嫁來一個俏俊有宜男相的婢女」（註一七四），這使得本來求取子嗣的正當行爲，一開始就蒙上荒唐的色彩。篇中盡是使用著詼諧的語調，寫出一個只知求神託佛、求取秘方的封閉世界。

賴和的小說，之所以一部分主題著眼於批評封閉的舊社會，自然是源於進步意識的要求，是他反封建的表現。

## (二) 譴責統治者不義的法

在〈一桿『稱仔』〉裏，首先呈現出賴和文學這一重要的主題。「官廳專利品」的標準稱仔，因巡警索賄不成，被打斷擲棄，然後認定善良的農民秦得參違犯度量衡規則，在除夕夜裏罰關他三天。代表國家執行法律的警察可以予取予求，顯現了「法」的不準確度。「小說以『稱仔』為主題，這個作者在標題上特別加上引號的稱仔，除了象徵秦得參所代表的善良正直百姓，在那觀念上代表公正，而事實上只是統治者專利品稱仔之上，個人尊嚴和價值可以隨時被摧殘和否定的事實，同時更深刻地揭露了隱藏在法制、平等、人權等思想口號中的欺罔性，這一點透過因它而存在的殖民帝國主義的壓迫掠奪行為，表現得尤其赤裸、尖銳。」（註一七五）賴和這一桿實物中的稱仔，在他技巧的處理下，已成爲稱量日本殖民統治的一桿觀念的稱仔，更重要的是這桿稱仔，是被代表日本法律的警察所打斷擲棄的。秦得參在一群圍觀的群眾中反問：「什麼？做官的就可以任意凌辱人民嗎？」（註一七六），這是一聲正義的怒吼，那麼他「懷抱著最後的覺悟」，終於以自己的生命和警察同歸於盡，正是

必然的反抗行爲。賴和在另一篇小說的一段話，正可以拿來這裏做爲註腳：

在優勝者的地位，本來有任意凌辱壓迫劣敗者的權柄。所以他們不敢把這沒出處的威權，輕輕放棄，也就忠實地行使起來。可不知道那就是培養反抗心的源泉，導致反抗力的火戰。(註一七七)

〈豐作〉一文，透過蔗農的被製糖會社榨取的剝削，反映殖民地經濟被掠奪的一面(註一七八)。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壓縮在蔗農身上表現了出來。農民添福爲了希望獲得會社超額生產獎勵金，以便給兒子娶媳婦。辛苦終年，就等待著收成。製糖會社却發表了新的採割規則，剝奪蔗農的利益，引起了蔗農的騷動，「大家要包圍會社的時(候)，他也不敢去參加，他恐驚因這層事，叛逆會社，得獎勵金的資格會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別人加三四倍的功夫，去栽培去照顧，這勞力豈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總在觀望，在等待消息。」(註一七九)。這樣守分的農民，仍然被製糖會社，使用不正確的磅秤，硬被剋扣了四千斤，一切美夢因之全落空了。經由這魔法般的磅秤，表現出與「一桿『稱仔』」同樣的主題。添福怨恨的一聲：「……」

伊娘咧！會社搶人！」是台灣殖民地被榨取的農民的心聲（註一八〇）。

〈不如意的過年〉，進一步刻劃了警察的統治心態，背後也是關鍵著「法」的問題。對於查大人的作威作福有著直接而尖銳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作者介入的觀點：

且法律也是在人的手裏，運用上運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日語，關係、方便），實際上它的效力，對於社會的壞的補救，墮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轉〔反而〕對於社會的進展向上，有著大的壓縮阻碍威力。（註一八一）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不能沒有法，沒有警察，這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法是彈性的，有運用上的方便，那麼即使是良法，在殖民統治者的手中，都會變成惡法。查大人的威勢建立在這上面，他那種「做官的不會錯，現在已經成爲定理」、「典型的優勝者得意的面容」（註一八二），益發襯托出殖民地悲慘的命運。

在〈歸家〉裏，可以看到警察權威的無所不在。畢業歸來的學生，加入祖廟口擔販的閒談，聽聽他們對於日本統治的不滿言辭，最後以有人警告警察來了，大家四散做爲結束。在〈惹事〉中，警察的權威甚至更擴及其所飼養的一群雞：

大家要知道，這群雞是維持這一部落的安寧秩序，保護這區域裏的人民幸福，那衙門裏的大人（日據下台灣人對警察的尊稱）所飼的，「拍（打）狗也須看著主人」，因為這樣關係，這群雞也特別受到人家的畏敬。（註一八三）

這是權威的無限輻射，「當權威成爲不可懷疑，不可反抗的力量時，附著在權威左右或屬於權威內的任何事務，便都成了權威的化身，無力的民衆完全無法逃脫於權威的各種化身之外，甚至一群雞也足可讓人畏懼，只因這群雞是權威的化身，賴和很深刻地掌握了殖民地政治情態中最淒慘的這一點。」（註一八四）小說裏的中年寡婦，由於到她家來自投羅網（桌罩）的雞，被警察誣爲偷雞的證物，竟是百口莫辯，驚惶到極點。以下引述賴和對於這一小節的描寫，可以看出他的意念，借著文學的演出，所達到的水平：

「啊！徼倖（可憐）啲！這是那一個作孽，這樣害人。」她看見罩在裏面是大人的雞仔，禁不住這樣驚喊起來。

「免講！雞仔拿來！衙門去！」

「大人這冤枉，我……」寡婦講未了，「拍」又使她嘴巴多受一下虧。

「加講話〔多嘴〕，拿來去！」大人又氣憤地叱著。她絕望了，她看見他奸滑的得意的面容，同時回想起他有一個晚上的嬉皮笑臉，她痛恨之極，憤怒之極，她不想活了，她要和他拚命，纔舉起手，已被他覺察到，「拍」，這一下更加凶猛，她覺得天空頓時暗黑去，眼前却迸出火花，地面也自動搖起來，使她立腳不住。

「要怎樣？不去？著〔得〕要縛不是？」她聽到這怒叱，纔覺得自己的嘴巴有些熱烘烘，不似痛反有似乎麻木，她這時候纔覺到自己是無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開始綴著悲哀的露珠。（註一八五）

就在這裏，賴和結束了「惹事」第二節的描寫。中年寡婦的弱者型像，兀立在讀者的眼前，在代表「法」的警察權威籠罩下，弱小民族，所受到的屈辱，就在這對比中被具體呈現出來了。〈惹事〉是賴和技巧純熟之作，在冷靜客觀的表現中，蘊含了無限的悲憤（註一八六）。

殖民地的統治是以治安的維持與社會的安定為必要的條件。一九二〇年在任的

田健次郎總督更是賦予警察絕對的權力。日人鹽見俊二對於日據時代台灣警察的研究，曾這樣說明：

當時台灣的警察，不但對於經濟政策，對於任何政策都是首當其衝的「實行者」。這樣強大的「警察國家的體制」是世界上得未嘗有的。（註一八七）

台灣當時是處在典型的警察政治之下，相對的，被警察網密覆著的台灣民衆，更被任意欺凌了。警察仗勢欺壓民衆，一般民衆絕大多數也厭惡日本警察，賴和自少年時代即對警察懷有惡感：

那時代的補大人，多是無賴，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橫行直撞，爲大家所側目，說起大人，簡直就是橫逆罪惡的標本，少（稍）知自愛的人，皆不願爲。（註一八八）

在一九二七年發表於東京《新生》雜誌的小說〈補大人〉，賴和描寫了一個台灣人，當上巡查補之後，在鄉間頤指氣使，一副「田舍皇帝」的派頭，甚至對於自己



的母親也不例外。某日清晨，爲了清掃街道的問題，竟然出手打了罵他「死囡仔」的母親，兩人糾纏到派出所，引來人群圍觀，他的母親「就如社會運動家，在路旁演說一般，向衆人訴說伊的不平。」（註一八九）。補大人這種乖違倫常的行爲緣於有「法」做爲他的靠山。賴和經由扭曲的人倫，造成強烈的衝突情節，一方面譴責了日本統治者的嚴刑峻法，並且批判了殖民體制「共犯結構」下甘心當異族走狗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則由受辱的台灣人母親，深刻表現了被殖民者的悲哀以及不甘心而引發的反抗強權。

賴和呈現主題富於藝術技巧，〈補大人〉一文，僅單純地掌握人性，即抓住了殖民地統治下因法而強的強者與被法所治而弱的弱者之間的對立面。千古不易的道德誠律，都可以輕易地被打碎，「法」之威嚴，彰顯了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在賴和的多篇小說裏，時常以警察欺凌百姓造成情節的高潮，當然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具有社會的寫實性，這只要重翻當年標明「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即隨時可見這類的新聞報導。賴和在文學中，主要是以警察爲殖民統治者的代表，針對那背後看不見的「法」。在「蛇先生」裏，賴和就直接的指明殖民統治者對於法律「保有專賣的特權」：「法律的營業者們，所以忠實於職務者，也因為法律於他們有實益」

(註一九〇)；〈辱?!〉一文裏，借著圍觀的一個小市民說：「法是要百姓去奉行的，若是做官的也要受到拘束，就不敢創這多款出來了啊」(註一九一)；「浪漫外紀」裏也有「法由他們定，罪也是由他去罰」(註一九二)，在在呈現出殖民統治下「法」的不義性。隨著小說情節的演述，我們看見了被壓迫的人民，也看見了日本統治者「恃權久失法尊嚴」(註一九三)的一面。賴和透過文學，十足表現了抗議精神。

### (三)現實與理想

賴和客觀地觀察台灣的各种社會現象，以冷靜的態度來塑造小說世界裏的人物。「雖然他自有他的藝術觀點和思想方向，但是他並不以自己的藝術觀點和思想方向，一廂情願地把他的某些人物理想化，也不將這些人物間的關係簡化，所以故事的發展並不見得要指向一個理想的方向」(註一九四)。在他的小說裏看不見救贖式的人物，一般人都是能忍則忍，雖然也有「歸家」、「惹事」裏的正直青年，但是沒有行動力，〈赴了春宴回來〉呈現著虛無的生活，〈一個同志的批信〉，特別顯現了知識分子的矛盾性。〈一桿「稱仔」〉裏的秦得參忍無可忍的時候，與欺壓他的警察同歸

於盡，是最激烈的行動了，但這種個人的行爲，即使報導恐怕也會被曲解、壓縮在新聞的一個角落；〈善訟的人的故事〉裏，「生蕃的後裔」張房林先生爲民請願，最後他所代表的群體的力量是勝利了，但我們不要忘記，時代是放置於清朝，回到以歷史爲背景的唐山。這反而顯現日據下的悲哀，亦即日本殖民統治的冷酷無情。我們只要從賴和也曾參與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代表們屢次上京（東京）請願，亦無法達成民意（註一九五），也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在賴和的小說裏，我們看見一羣被舊社會的有力者不管是經由什麼方式壓迫下的弱者，也看見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恃法壓迫的人民，這正是賴和生存時代的寫照，他以他的文學作品客觀表現了出來。

賴和的文學除了小說之外，詩亦佔了重要的地位。在詩的表現上，賴和通常經由客觀的事件，在發展的過程中表達了他強烈的意念。儘管最重要的兩首作品〈流離曲〉、〈南國哀歌〉，在他生前發表的時候，由於檢閱制度，被日本有關當局禁刊了最具強烈批判精神以及對抗暴最熱情歌頌的部分，但即使以原來發表的情形而論，已足以表現弱小民族的抵抗。爲了呈現賴和詩的強烈抵抗精神，以下我們分析時，被禁刊的部分，亦以賴和的創作原貌，來加以討論。

〈流離曲〉是日據時代氣勢最磅礴的一首敘事詩，全詩長達一百九十二行。賴和寫作這首長詩，主要是針對一九二五年起，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以極廉價將農民辛辛苦苦開墾出來的三千八百八十六甲餘的土地，准由三百七十人的退職官承購，實施「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註一九六），以致農民流離失所，土地糾紛長達三、四年的抗議之作。全詩共分三節：（一）生的逃脫，（二）死的奮鬥，（三）生乎？死乎？原詩在《台灣新民報》共分四期發表（註一九七），但最後一小節，僅刊到「法的範圍不容有些或跨」（註一九八），以下尚有八十八行，在民報三三二號上，被開天窗。在第一小節賴和以洪水來襲，刻劃出一幅生動的流民圖：

流離失所、何處得到安息？

田畑淹沒、何處去種去作？

也無一粒米，

活活受飢餓，

餓！餓！

自己雖攪得腹肚（自註俗音剝島）

也禁不住兒啼哭！（註一九九）

這是台灣開拓過程中宿命的天災，農民猶可忍耐。爲了生活，爲了讓兒女不再跟著不幸的父母受苦，有時忍痛賣兒鬻女，強忍住親情的依依不捨；然而只要還有一絲力氣存在，只要還有砂石荒埔，就努力去開墾。賴和以急促的音節，生動地描寫農民的奮力開荒拓土的情形：

墾墾！開開！

忍苦拚力！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鋤鋤！掘掘！

土黑砂白，

開開！墾墾！

石火四迸。

幸福就在地底，  
努力便能獲得。

鋤鋤！掘掘！

土黑砂白，

開開！鑿鑿！

石火四迸！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忍苦拚力，

鑿鑿！開開！（註二〇〇）

那些複合詞，彷彿是農民勞動的聲音，短句表現出勞動時的分秒必爭，形式與內容之間，達成了完美的結合。這是賴和文學的特色之一，如果空有理念，而沒有技巧表現，就無法貼切地描寫出農民的勞動圖。拚命開墾出來的土地，當然彌足珍貴。等到可以休養生息的時候，土地却被日本當局，以無斷開墾的理由，廉價交給退職

官承購，這當然引起農民的反抗了。

《台灣民報》也曾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發表論評關於「無斷開墾地的政府之責任和態度如何？」（註二〇二）替農民說話。在賴和的詩裏，我們看到統治者濫用法律，威脅農民的情形：

座上是威嚴的判官，

傍邊是和善的通譯，

台下是被疑的百姓，

悲愴！戰慄！

如屠場之羊、砧上之魚

絕望地任人屠殺割烹。（註二〇二）

在殖民地統治下，寫出這樣的詩句，是必要具有十足的道德勇氣，也是賴和一貫精神的表現，雖然日本當局將最強烈的八十八行開了天窗，但賴和的原稿猶存，仍然呈現農民的斑斑血淚，永遠對日本不義的殖民統治提出正義的控訴。

同樣的情形，也在一九三一年的〈南國哀歌〉裏呈現出來。這首詩賴和直接反映了對於一九三〇年底霧社事件的看法，全詩七十六行，至第四十三行以下被開天窗（註二〇三）。

賴和對勇敢起義抗暴的泰雅族原住民極為同情：

舉一族自愿同赴滅亡，

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

敢（豈是）因為蠻性的遺留？

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註二〇四）

賴和向來對原住民的態度，遠超乎一般漢人的傳統之見，在他初期的散文裏，稱呼原住民為「住在山內那些我們的地主」（註二〇五），後期〈善訟的人的故事〉，那位放棄自己的收益，遠赴唐山為窮人請願的張房林先生，是正義的化身，「聽說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後裔，現在沒人曉得，但是他的性質（性情）却很率真果敢」（註二〇六），賴和不經意留下的這段話，傳達了他不是漢族自我中心論者。賴和的民族



意識是針對強權統治的異族，比方他反而稱日本人過新曆年是「番仔過年」（註二〇七）；對於弱小民族，他有兄弟般的友愛。底下〈南國哀歌〉被禁止刊出的第一段，是對抗暴者的熱情歌頌：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鎗！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兄弟們！

來！和他們一拚！

憑這一身！

憑這雙腕！（註二〇八）

霧社事件，戰爭前後持續了兩個月之久，日軍以新式武器和部落民作戰，飛機轟炸，甚至使用國際公法禁止的毒瓦斯，屠殺了霧社泰雅族民，加上戰敗自殺者男女老幼共九百多人，約佔霧社地區的三分之二（註二〇九），對於日本統治者向來誇耀的山地政策是極大的諷刺。《台灣新民報》在事件發生後，一再報導，並有諸家見解的專欄（註二一〇），賴和當時雖未陳述，但透過〈南國哀歌〉，他強力的譴責了日殖民統治者。這首詩的最後一段，賴和再次強調：

兄弟們來！來！

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用處），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爲著子孫鬥爭。（註二一一）

這不僅是對原住民的抗暴行爲肯定而已，也是賴和對台灣民衆的熱情呼喚，並且是

賴和一生堅定抗日精神之所繫，是為著後代千千萬萬子孫著想，而不是為著自己眼前的幸福。這樣強烈的呼聲，緣由賴和對有些台灣同胞軟弱怕死的殖民地性格之不滿。在他寫〈南國哀歌〉不久前的一篇〈隨筆〉賴和藉著在墳場裏，偶然間看到一塊刻著「受勢壓李公」的墓碑，診斷了這種殖民地性格：

我們島人（台灣人），真有一種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權者的凌虐，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正堂堂，和他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點牢騷，就已滿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裏咒詛，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受勢壓李公」的子孫，也只是這種的表現，這反足增大弱小者的羞恥。（註二）

（二）

賴和的反抗精神，使他看不慣這種退縮到墓碑上的抗議方式，雖然就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表現也極為慘痛，但究竟於事無補。賴和著重的是「覺悟」，只有覺悟，才能產生抵抗的決心，在他的詩文中，「覺悟」兩字屢次提到，也是他反抗精神的來源。可是，反觀日據下普遍的心理狀態，面臨痛苦、不滿，是期待超人的出現。賴

和在小說〈辱?!〉一文裏，藉由民衆的熱衷於看戲，提出了他的批判：

我想是因爲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壓縮似的苦痛，不明瞭的不平，沒有對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惡；不斷地在希望這悲哀會消釋，苦痛會解除，不平會平復，怨恨會報復，憎惡會滅亡。但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這樣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蹟的顯現，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來替他們做那所願望而做不出的事情。這在每個人也都曉得是事所必無，可是也禁不絕心裏不這樣想。（註二二三）

這段話已不僅是作家賴和在表達意見，也是醫生賴和在診斷台灣殖民地的病根。當然在現實世界裏，超人是不會有的，只有像泰雅族原住民勇敢的以血肉之軀，「捨此一身和他一拚」，才會有得救的希望。這種死亡與再生的強烈表現。在寫〈南國哀歌〉的同一年，賴和在另一首詩中，亦強而有力的歌頌毀滅的力量：

我獨立在狂飈之中，

張開喉嚨竭盡力量，

大著呼聲爲這毀滅頌揚，

並且爲那未來的不可知的

人類世界祝福。(註二一四)

一九三一年，在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在日本採取高壓政策壓制社會運動的關鍵時刻，賴和以這樣強烈的詩，表現了他的感慨。這種被壓迫者的大聲吶喊，我們追索他的傳統詩，亦曾屢屢表現出來：「縱然血膏橫暴吻，勝似長年鞭策苦」(註二一五)，「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爲義鬪爭」(註二一六)，「滿腔碧血吾無吝，付與人間換自由」(註二一七)，「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註二一八)。

死亡，原是殖民地民衆，追求掙脫殖民統治，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而更重要的是再生。這是賴和文學的精神。在日本「明火執仗之盜」(註二一九)的統治，在「世間久矣無公理，民衆焉能唱利權」(註二二〇)的時代，賴和以他的新文學，爲廣大的沈默大眾，道出了被壓抑下潛藏深處的心聲。

附註

註一六六：〈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全集，頁二〇九。

註一六七：〈贈陳虛谷三首〉，全集，頁三八五。

註一六八：〈讀印度泰戈爾詩集竊其微意以成數首明火執仗之盜人固不奈他何〉，全集，頁三九〇。

註一六九：全集，頁六。

註一七〇：全集，頁三三。

註一七一：這幅對聯還是以懷素的筆意，寫著掛在客廳裏，更具諷刺性。全集，頁四五。

註一七二：〈可憐她死了〉這篇小說，是賴和這類型作品刻畫的最傳神的小說，藝術性亦極高。引文見

全集，頁八四。

註一七三：這篇小說寫在《大眾時報》的稿紙上，署名「灰」，可能是賴和最後寫的一篇小說。純粹是

中國白話文，不像是以筆名「灰」最後發表的〈一個同志的批信〉以台灣話文為基調。賴和

的醫學知識，在這篇小說裏，有所發揮。收於全集，頁三〇三—八。

註一七四：全集，頁三〇五—六。

註一七五：施淑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析》（台北，長安，七十三年二月），有關賴和部分的精闢見解。

頁九八一—二。施淑的這一看法，早先也呈現在另一篇論文〈稱子與稱錘——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台灣文藝》八〇期，一九八三年元月出版，這篇論文是近年來研究賴和小說，最具深度的文章。

註一七六：全集，頁一五。

註一七七：見賴和第一篇發表的小說〈關關熱〉，全集，頁五。

註一七八：矢內原忠雄曾強調：「以糖業為中心之台灣帝國主義發展史，也就是以台灣糖業為中心之日  
本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史。」參見《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台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頁九六。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常透過蔗農被壓榨的情形，來表現日本的經濟掠奪。  
賴和如此，稍後的楊遠在〈送報伕〉、呂赫若在〈牛車〉莫不如此。

註一七九：全集，頁一一一。

註一八〇：全集，頁一一七。

註一八一：全集，頁二三。

註一八二：全集，頁二五—六。

註一八三：全集，頁九八。

註一八四：引見林邊（林載爵）〈忍着蒼生含辱——賴和先生的文學〉發表於《台灣文藝》革新號第八

期，一九七九年元月。後收於全集。引文見全集，頁四六六。林載爵的這一篇論文，是七〇年代研究賴和文學最具創見的文章。

註一八五：全集，頁一〇二。

註一八六：賴和《南音》的同仁，芥舟（郭秋生）在讀過〈惹事〉之後曾這樣說：「懶雲兄的〈惹事〉，真的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了，這樣的題材，確是非他的關心不能把握，非他的伎倆不夠以表現出來的。一種不可抑制的悲憤，油然爆破我們的心頭，使我們聯想到其他的一切，而在腦海裏低徊著，豈有此理？堅堅有此理奈我何？……無奈他何啊——看到我們的真影，再認了一回台灣的現實社會重估了一回台灣人的生存價，前途還在這麼黑暗著……啊！作者的用心可算是夠了，請大家再一味看看吧。」這時候是一九三二年七月，見《南音》最後一期，一卷十一號，頁二五。

註一八七：周憲文譯文，見〈日據時代之警察與經濟〉一文，收於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一九八五年八月），頁八七。

註一八八：〈無聊的回憶〉，全集，頁二三〇。

註一八九：〈補大人〉是由當時留學日本的楊雲萍向賴和邀稿，發表於文學、思想性的綜合雜誌《新生》（編輯委員包括楊雲萍、陳紹馨、高天成、黃達成、張聘三……等留學生）。《新生》僅刊出



一期即停刊。楊氏有存書，但尚未查獲。引文轉見於鐵英（張良澤）〈巡查補〉一文，一九七七年五月二日發表於《自立副刊》，收於《鳳凰樹專欄》（台北，一九七九年三月，遠景）頁二。在〈巡查補〉文中，鐵英云：「賴和一生影響後人甚深。楊逵取其抗議精神，故有〈送報伙〉之作；吳濁流取其嘲諷意味，遂有〈陳大人〉之發。」

註一九〇：分別見於全集，頁二九、三一。

註一九一：全集，頁五六。

註一九二：全集，頁六四。

註一九三：〈書憤四首〉，全集，頁三九三。

註一九四：見梁景峯〈賴和是誰？〉一文，收於全集，頁一九一。

註一九五：詳見若林正文〈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收於《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及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第四章「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註一九六：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第九章，頁五一九。

註一九七：《台灣新民報》第三二九—三三二號，其中三三二號的曙光欄全部空白，即是〈流離曲〉被

禁刊的部分。

註一九八：《台灣新民報》，第三三一號。在這之前的五行是「時代是已經開化／文明也放出了光華／

夢一般的世界早被打破／遂造成了現代國家／併制定尊嚴國法」，頁一一。

註一九九：全集，頁一四六。賴和自註部分，見《台灣新民報》，第三二九號，頁一一。

註二〇〇：全集，頁一五一—二。

註二〇一：這篇論評也強調農民開墾出來的土地「未必全是無斷墾」，賴和在〈流離曲〉裏第一節關於  
洪流流失土地，農民再開墾，也是有事實根據的。參見《台灣民報》第一百十三號，頁二。

註二〇二：全集，頁一五七。

註二〇三：〈南國哀歌〉下篇發表於《台灣新民報》曙光欄，僅刊了以下六行：「恍惚有這呼聲，這呼  
聲，／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一系系涼爽秋風，／忽又急疾地爲牠傳佈，／好久已無聲響  
的雷，／也自隆隆地替牠號令。」以下全部空白，頁一一。

註二〇四：全集，頁一八一。

註二〇五：〈忘不了的過年〉，全集，頁二一七。

註二〇六：全集，頁一一九。

註二〇七：同註二〇五，全集，頁二一六。

註二〇八：全集，頁一八二。

註二〇九：參見溫吉編譯《台灣番政志》（台北，台灣文獻委員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頁八七八。

註二一〇：《台灣新民報》第三三七號，開始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導，第三三八—九號各有報導；第三四

五號載有包括台北李友三、台中陳逢源、北港林麗明、麻豆黃信國、台南盧丙丁、高雄楊金

虎、宜蘭林火木……等人的見解。頁二三。

註二一一：全集，頁一八四。

註二一二：〈隨筆〉，全集，頁二四三。

註二一三：〈辱?!〉，全集，頁五七。

註二一四：〈低氣壓的山頂〉，全集，頁一九三。

註二一五：〈書憤四首〉，全集，頁三九三。

註二一六：〈吾人〉，全集，頁三八七。

註二一七：〈李君兆蕙同黃張二君過訪因留住勸之以酒書此言志〉，全集，頁三七八。

註二一八：〈飲酒〉，全集，頁三八二。

註二一九：這是賴和因讀印度泰戈爾詩而引起的感觸，見全集，頁三九〇。

註二二〇：〈癸亥元旦小集書感〉，全集，頁三七一。

## 九、結論——賴和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涵，而台灣新文化運動，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這是已經辯明的問題（註三二）。台灣新文學也受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影響，這從黃呈聰、黃朝琴、張我軍、蔡孝乾……等人的文學理論，即可理出其間的脈絡。創作方面可以預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台灣小說選》為代表。同時代的作家楊雲萍為這本選集寫序，就台灣新文學發生的源起，正反兩方面的言論，做了全盤的鳥瞰式的比照。楊雲萍的結論是：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運動與成就所影響，所促進。既是台灣  
的運動，當然保持了多少的台灣的特色。（註三三）

這是十分客觀的結論，尤其楊雲萍是與賴和同時出發的台灣第一期作家，而且本身也曾以編輯人的身分，創刊了台灣第一本白話文學雜誌《人人》，也參與了後期的新

文學運動，他的結論是不容忽視的。

即以賴和而論，他本身是作家，一九二六年即主持《台灣民報》文藝欄，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奠基者。在他為數極少的文學論中，一九二六年元月最早發表的文學評論，也可看到他受到陳獨秀的影響，而陳獨秀是最早支持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人，隨後寫了《文學革命論》加以聲援，引起波濤壯闊的新文學運動。賴和在他的文章裏說道：

新舊的接近，不知誰被進化，現在的台灣雖尚黑暗，却也有一縷的光明可睹，若說到禮教文物的中華，那舊殿堂已被陳獨秀的四（誤植為七）十二生的大砲，所轟廢了。（註二二

三）

這段話是來自標舉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而引起深遠影響的《文學革命論》，結論裏的熱情高呼：

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

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爲之前驅！（註二二四）

因之，我們回觀賴和在與反對新文學之人的辯論中，他一再強調進步的文學觀，是與五四文學革命的理論合流的。在同一篇文中，賴和亦提及：

台灣的新文學，雖不是創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輸入品，決不是贓物。……新文學是新發見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墾植，廣闊地開放著，純取世界主義，就是所謂大同者也，不過碰著荆棘的荒埔，不能不用力斫拔排除。（註二二五）

這些話已提供了我們探討賴和文學位置的一個最初的起點。賴和通過他辛苦的創作歷程，因應日據下台灣的環境，從「中原文學」（註二二六）的源流，他開創了台灣新文學的一片新天地。十年間的新文學活動，賴和「成爲台灣創作界的領袖」（註二二七）同時代的年輕一輩作家，王詩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發表的〈賴懶雲論〉，即予賴和這樣的肯定評論：

台灣的新文學能有今日之隆盛，賴懶雲的貢獻很大。說他是培育了台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恐怕更爲恰當。前年（一九三四）當台灣文藝聯盟成立之時，他立即被公推爲聯盟的委員長。單從這件事來看，就能知道他在台灣文壇中是怎樣的一種存在。（註二二八）

情形的確如此，不過賴和謙辭文藝聯盟的委員長之職，後來由張深切擔任（註二二九），發行機關雜誌《台灣文藝》，將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向高潮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文聯成立後，賴和仍繼續寫作，但已越過了他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創作力最豐沛的時期；一九三七年六月漢文欄取消，賴和雖未完全停筆，但已經以文化抵抗的姿態全心的傳統詩的寫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曾受賴和指導寫作的楊逵，以他先前被賴和推薦到《台灣新民報》發表的《新聞配達夫》（中途被禁刊）（註二三〇），重新再以日文寫過，刊載於東京《文學評論》，獲第二名（第一名缺），是第一位登上日本文壇的台灣作家（註二三一）。一九三六年四、五月，胡風的中文譯稿《送報伙》，分別選錄於上海出版的《山靈——朝鮮台灣小說集》、《弱小民族小說選》（註二三二）。當楊逵告訴賴和的時候，賴和激動的掉淚。楊逵在賴和平反紀念會上公開的說明這段經過：

賴和先生看到中文版的〈送報伏〉當然很高興，後來他看到這篇文章又在〈朝鮮台灣小說集〉、〈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楊逵誤記，正確名稱是〈弱小民族小說選〉）刊登出來，更感動得掉下眼淚。這些話我過去從沒說過，今天爲了感念賴和先生栽培，才說出來作說明賴先生如何鼓勵後進的實例。當時賴先生跟我說：「你（在）這幾本書的譯文，勝過我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了。」我相當地感動，就因爲如此，我要永遠跟賴和先生一起前進。（註二三三）

這是我們思考賴和文學位置，一段相當重要的記錄。誠如上述，賴和先以中國白話文寫作，加上一些台灣語調，以加重台灣色彩，自然具有台灣意識，在日據時代這是對立於日本意識，而非對立於中國意識（註二三四）。爾後本土色彩越來越重，弱小民族的意識也漸呈現出來，這是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必然的回應。台灣的出路在那裏？一九三〇年代這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再回觀楊逵的這段話，賴和看到中文版的〈送報伏〉，很高興，以賴和一生堅持用中文寫作，這是必然的反應。當他看到楊逵的〈送報伏〉被收錄於《弱小民族小說選》，感動得掉下眼淚，並說這樣的成果，「勝過我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這裏面當然有鼓勵後進的意味在內，但也是真



情的流露。回到中國的文學傳承當然重要，而弱小民族的處境，也回應了台灣被割讓於日本的深刻悲哀。賴和曾有舊詩云：

我生不幸爲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

弱肉久矣恣強食，至使兩間平等失。（註二三五）

這是賴和的深刻感受，原來「漢族的遺民」並不比他族差，祇是因為滿清政府積弱不振，致使台灣成爲替罪的羔羊。乙未割台之役，台灣同胞是經過激烈的抵抗，而不是拱手奉送。這種情形，誠如鄭學稼所言：

我由日軍佔台的經過，發現（原註：以前不知道）台灣同胞偉大的抗日戰爭。李鴻章以全國之師，不過半年多，就以割地賠款結束。台灣同胞以一省無援地抗日，使日帝動員全部陸海軍，在八卦山會戰，結束初期的佔領軍行動。李鴻章沒有打死一個校級軍官，台灣抗日軍却能打死能久親王和一位少將（原註：前者日人說是「病死」），日軍士兵死者無可靠數字。抗日英雄的英勇和慷慨就義，使後代崇敬。（註二三六）

言簡意賅點出了台灣乙未抗日戰爭的精神。賴和生長在彰化，八卦山戰役是絕不會陌生的，他的抗日精神，不管就社會運動，或是文學抵抗，也必然有一部分，直接導源於此。然而時過境遷，在日本式的教育下，年輕一輩已漸漸被同化，他不能不憂心，他的新文學一再譴責日本不義的統治，強調弱者的抵抗，自然也是反映著在日本的統治下，台灣淪為弱小民族的悲苦歷程，賴和承受著民族的悲哀寫作。在他的一首傳統詩，道出了他潛藏的一面：其詩云：

黃虎旗。此何時。閒掛壁上網蛛絲。

彈痕戰血空陸離。不是盛名後難繼。

子孫蟄伏良堪悲。三十年間噤不語。

忘有共和獨立時。先民走險空流血。

後人弔古徒有詩。黃龍破碎亦已久。

風雲變幻那得知。仰首向天發長嘆。

堂堂日沒西山陸。（註二三七）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以及義軍的英勇抗日，在近代亞洲史是極為驚心動魄的一幕，對於晚清的革命志士也必然有所啓發，終於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然而隔著台灣海峽的「漢族的遺民」，却「忘有共和獨立時」，在「黃龍破碎亦已久」，賴和是多麼希望「堂堂日沒西山陞」。但在現實條件下，直到一九三六年，日本的太陽畢竟還是堂堂輝耀著。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台灣實質上仍是亞細亞的孤兒，那麼，賴和看到他所指導寫作的楊逵，〈送報伙〉以中文被選載於《弱小民族小說選》，賴和的激動掉淚，我們應當可以理解，弱小民族的意識，確實在他寫作過程中逐漸加重。

一九三六年停止新文學寫作的賴和，以醫生的身分盡著他的天職，他被當地的民衆稱為「和仔仙」（註二三八），也有人稱之為「彰化媽祖」。（註二三九）

一九三八年賴和醫生，因有患者感染傷寒症的初期病狀，未按法定傳染病規則向有關當局申報，這是當時醫界常有的事，但因賴和的抗日思想遭忌，日本政府遂利用這次機會強迫他停業半年（註二四〇）。賴和於是利用空間，前往日本。抵達之後，即被日本觀察監視（註二四一）。以後再轉東北，赴北平遊歷，因尚未發現留有記錄，

情況不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這一天，因日本憲兵和警務局的共同調查，遭到逮捕五十多天，因心臟病發，始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未能看到大時代的完成。

「天道還形自有時，留此雙睛一看之」（註二四二），賴和曾留下這樣的詩句，但還是遺憾而逝。出殯時民衆自動路祭，「參加葬禮的人衆，多達五百多人」（註二四三）。葬於乙未八卦山戰役的八卦山上。

賴和因他無私的奉獻精神，死後墓草被當地民衆傳說可以治病，甚至還有賴和當城隍的傳聞（註二四四）。一般民衆不會了解賴和在社會運動、新文學運動中的貢獻，他以仁醫的形象活在廣大的民衆心中。

賴和不僅立德而已，他還是立功立言者，誠如應社詩友陳英方（渭雄）在悼念他的詩中云：「廿載仁聲聞遠近，半生熱血見文章」（註二四五）。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賴和以抗日志士的身分，入祀忠烈祠（註二四六）；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又被以「台共匪幹」的理由撤出忠烈祠（註二四七）；賴和生前因抗日思想，繫獄以致病發，「病因積憤醫難救」，沒想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仍一度「死

為沈冤恨莫消」(註二四八)。經過文化界熱心人士多年的奔走呼籲，終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內政部查明：

彰化「和仔仙」賴和先生原為抗日烈士，確曾蒙冤屬實，本部業已另函台灣省政府，即以辦理恢復入祀忠烈祠。(註二四九)

賴和生前留有詩云：「紛紛擾擾世相異，是非久已顛倒置。老天無奈權力何，賢才易惹衆人忌」(註二五〇)，這是日據時代的強烈感嘆。戰後又蒙冤二十六年，終獲平反。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賴和九十歲冥誕，距離他逝世已過了四十年，各界在彰化舉行紀念會，並在當天再度入祀忠烈祠。

賴和的新文學經過我們從他的遺稿以及已刊稿的一番清理，回復他的原始面貌。通過他的文學歷程，我們深刻感受，在日據時代，賴和以他的文學作品，為時代留下了「真正的印象」(true impression)，並且給予極為強烈的文學控訴，充分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之聲。這是寶貴的文學遺產，不僅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佔有主導的作用，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具體實踐，並且由於當時台灣直接處在帝

國主義的壓迫下，他的文學表現也更為強烈、深刻、動人；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也相對的反映了文化啓蒙期的進步意識，我們有理由給予賴和崇高的評價，並需反省其所處的位置。

（本文寫作期間承哈佛燕京學社研究補助，謹此致謝。）

#### 附註

註二二一：參見林載爵〈五四與台灣新文化運動〉，收於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一九七九年五月）。

註二二二：李獻璋編《台灣小說選》（日據時代禁刊），序，頁一；另見李南衡編《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頁二〇四。

註二二三：〈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全集，頁二一一。

註二二四：《獨秀文存》（上海，亞東，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頁一四〇。

註二二五：同註二二三，頁二一〇。

註二二六：「中原文學」是賴和所使用的名詞，見〈謹復某老先生〉一文，頁二一二。

註二二七：楊遠〈台灣新文學二開拓者〉，《文化交流》第一輯，一九四七年一月。

註二二八：王詩琅〈賴懶雲論〉，全集，頁四〇〇。

註二二九：見張深切〈文聯報告書〉，《台灣文藝》二卷一號，頁八。

註二三〇：參見林梵〈楊遠對照年譜〉，收於《楊遠畫像》（台北，筆架山，一九七九年九月），頁二六二。這也是楊遠一名使用的開始，故楊遠稱賴和為「命名之父」，參見〈追憶賴和先生〉，全集，頁四一六。

註二三一：其後楊遠亦將賴和的作品〈豐作〉翻譯為日文，登載於日本《文學案内》二卷一號，一九三六年一月。

註二三二：塚本照和〈台灣文學年表〉，《南方文化》第八輯，頁二九七。

註二三三：楊遠〈希望有更多的平反〉，收於《賴和先生生平反紀念集》，以下簡稱紀念集，頁二七。

註二三四：詳見尹章義〈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文季》二卷四期。

註二三五：〈飲酒〉，全集，頁三八一。

註二三六：鄭學稼〈台灣抗日的光榮史蹟〉，紀念集，頁三六。

註二三七：〈讀林子瑾黃虎旗詩〉，全集，頁三八三。

註二三八：毓文（廖漢臣）〈甫三先生〉，原刊《台灣文藝》二卷一號，收於全集，頁三九七。

註二三九：楊雲萍〈追憶賴和先生〉，原刊《民俗台灣》三卷四號，收於全集，頁四一一。

註二四〇：採訪賴和哲嗣賴榮所得。

註二四一：見陳逸雄〈我對父親的回憶〉，收於《陳虛谷選集》，（台北，鴻蒙，一九八五年十月），頁四

九六。

註二四二：「飲酒」，全集，頁三八二。

註二四三：同註二三七。另楊遠〈追憶賴和先生〉一文，對於賴和出殯時，彰化市街民衆對於賴和的感

念，有極爲傳神的描述，見全集，頁四一八—九。

註二四四：一剛（王詩琅）〈懶雲做城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頁一一七。

註二四五：渭雄（陳英方）〈哭懶雲社兄〉，原刊《文化交流》第一輯，收於全集，頁四三三。

註二四六：行文見平反集，頁七九—八〇。

註二四七：同上註，頁八一。

註二四八：兩句詩俱見笑儂（楊樹德）〈哭懶雲社兄〉，原刊《文化交流》第一輯，收於全集，頁四三一。



註二四九：同註二四六，頁八二。當時內政部長是林洋港。

註二五〇：〈書憤四首〉，全集，頁三九四。

二、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



## 一、前言

醫生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以文學傳世，在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首先以反映台灣現實的新文學創作崛起文壇，並成爲中心人物，主導新文學的繼續開展，在生前即已博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稱譽（註一），其作品是二、三〇年代台灣新文化啓蒙時期的重要收穫，歷久彌新絕對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註二）。

賴和的另一個身分是抗日志士，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以來，在日據下波濤洶湧的社會政治運動中，堅定的站在反抗者的立場，屢經統治當局搜家、拘禁，始終不改其志；在文化協會發展過程中面臨分裂，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成爲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他在此雙元結構下活動於兩個主要的派系間，超越過台灣總督府所利用的分化政策；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即遭下獄，由憲兵及高等警察（思想警察）加以調查，顯示在總督府當局中，他是個危險的敵人，五十餘日後始因病重釋放，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賚志以歿。

台灣光復，賴和入祀彰化忠烈祠（一九五一年四月），數年之後，又遭人檢舉，

以「台共匪幹」罪名逐出（一九五八年九月），談論其人其事，一時成爲禁忌，不僅賴和的抗日事跡埋沒，連文學遺產都呈現斷層現象，直到新一代的人成長，始有〈賴和是誰？〉一文（一九七六年九月），突破塵封的歷史（註三），其後再經各界多方努力，終獲平反，再次入祀於忠烈祠（一九八四年二月）。其中波折，反應了賴和在日據時代抗日運動的複雜面，也間接呈現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台灣抗日運動各種路線的評價問題。

本文試圖透過賴和所參與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尤其是台灣文化協會的脈絡，從成立、分裂、再分裂以迄結束活動，探討賴和在路線轉折之際的微妙角色。由於在文化協會分裂前後，賴和致力於展開新文學運動，主要活動範疇在文化層面。他不像蔣渭水、王敏川、蔡培火……等政治領袖人物，未具明顯的政治性格，甚至在整個運動中，看不到闡釋他政治理念的文章；也不類後起的無產青年，在強烈的意識形態之下，不顧一切橫衝直撞，掀起巨大的衝突。賴和有他的原則與彈性，比較而言，他不是閃亮的政治人物，而是屬於中間地帶的意見領袖。由於這一屬性，使得賴和不管在號稱「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或者在日本官方記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他的言行事跡，比起第一線帶頭的社會政治運動家，都

要相對的減少。這也是在戰後傑出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論著中，賴和或未提及或被一筆帶過的原因（註四）；然而從現存史料的蛛絲馬跡，田野工作採訪所得，參照賴和生前發表的作品以及遺稿，仍可以觀察出在抗日運動的過程中，賴和從爭取台灣殖民地的政治權利出發，以及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傾辯」的對峙裏，處身於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兩條政治路線中，賴和站在被異族殖民統治的反抗者立場，主要反抗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他以不具領袖慾的性格，以他的包容力，再加上他的行醫收入，支援了日據下左右翼的政治運動，仍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 附註

〔註一：王錦江（詩琅）首先於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賴懶雲論〉（《台灣時報》二〇一號），提出賴和「是培育了台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全文收於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以下簡稱全集，頁四〇〇；另見朱石峰〈回憶懶雲先生〉，原刊《台灣文學》三卷二號，全集，頁四二三。

註二：請參見拙著〈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的論證。《成功大學歷史學報》十二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註三：梁德民（景峯）〈賴和是誰？〉原刊《夏潮》一卷六期，一九七六年九月；距離該文最近一期的「一剛（王詩琅）〈懶雲做城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一九五四年八月，整整二十二年之久，賴和無人論及，是台灣文學斷層現象的一個極好例證。另外台灣醫學之父杜聰明是賴和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屆的同班同學，早年兩人關係密切，但在《杜聰明言論集》三大卷一千七百多頁中，僅在彰化召開的景福會聯合同學會第十五屆（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第廿三屆（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日），依慣例表揚當地出身的醫生，連帶提及賴和但未加以表揚。見《杜聰明言論集》第二輯（高雄，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六月），頁六四七；第三輯（台北，基金會，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二六九；杜聰明《回憶錄》（台北，基金會，一九七三年八月），亦僅一次提及：「筆者在醫學校時代，同級生王青山、賴和、詹阿川、吳定江對漢文有很深的素養」，頁五八。可見在賴和以「台共匪幹」罪名，逐出忠烈祠一事，在台灣當時環境下是一大禁忌。就此意義（賴和是誰？）一文，實具有承先啓後的關鍵地位。

註四：如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書，未提及；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一九八三年一月），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一章中，製作了表格，賴和列名其中，但出生年一八九四，誤為一八九三；文化協會理事，誤為有力會員。見頁二九。此皆可以反映出賴和在社會政治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明顯。

## 二、啓蒙運動與社會運動

一九三七年台灣新民報社出版的《台灣人士鑑》，舉凡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實業各界重要人士，不問階級悉加以收錄（註五）。賴和的生平經歷記載如下：

賴和（懶雲）〔附有相片〕

賴和醫院主 日章商事公司監事

（現）彰化市彰化字市子尾一六〇

〔經歷〕：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四月二十五日，賴天送之長男出生於現住所。性情溫厚篤實之熱情家，自幼修習漢學長於漢詩。二十一歲時畢業於台灣醫學校，在故鄉彰化開業，以醫德特別博得患者之信賴。夙來盡力於台灣社會運動，經歷許多之曲折，文化協會評議員或云分裂後之代表（員），又以台灣民衆黨幹事擔任重要角色。另外在台灣文壇上有許多的創作及新詩發表，對於台灣文藝貢獻良多。趣味是圍棋、象棋、遊玩。

〔家庭〕 妻王氏草以及三男一女。（註六）



這是賴和爲時人所知悉的學經簡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之後，賴和同時列名於文化協會及退出文協之會員重新組織之民衆黨，顯現在日據下台灣社會運動，領導階層因民族運動或階級運動的分野，趨於分裂形成左右兩條路線，賴和所處的位置，顯得相當特殊。

爲了解析這一現象，必要檢討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容納台灣島內島外各派人才，以及賴和加入的過程。

台灣文化協會恰在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一半的第二十五年成立，當時有兩股思潮衝擊全球各地，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九一八年）掀起的民族自決思潮，在世界各國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以及印度爲擺脫英國統治的不合作運動……；皆是民族自決思潮下的運動；另外則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思潮（一九一七），以階級解放爲號召，中共、日共、台共……的成立，是此一思潮排山倒海衝擊亞洲的結果。一九一〇年代後半葉，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民族差別待遇之下的台灣人，利用日本「大正民主」時期，首先由林獻堂集合了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黃朝琴、陳炳、吳三連……等留日學生，於

一九一八年夏天在東京成立啓發會，再於一九二〇年一月發展爲台灣新民會，乃有一九二〇年七月《台灣青年》的創刊，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倡「德模克拉西」（民主）與民族運動的主流中，亦有彭華英於《社會主義の概説》介紹了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蔡復春則發表了《階級鬭爭の研究》（註七），這種一開始即呈現的雙元現象，將影響到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

促成台灣文化協會應時而出的人是台北大稻埕大安醫院院長蔣渭水，蔣氏「頭腦明晰、果斷，且有組織的之性格」（註八），所以他能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間，結合台北醫專學生吳海水、李應章、甘文芳、張梗、何禮棟、林麗明、丁瑞魚……等人，醞釀組織啓發文化向上的青年會，利用一九二一年一月第一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之時機，透過林獻堂的影響力，結合海內外各種不同的力量，再經他的奔走聯絡，終於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假台北靜修女學校行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列名會員總共一〇二二人，網羅了台灣各界的菁英，形成「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爲目的」之文化模式的統一戰線。（註九）

蔣渭水是有「政治熱」的人，他回憶文化協會成立時的情景，曾回述他醫學生時代的經驗云：

老實說來，我的政治煩悶的魔病，是自醫學校時代，便發生起來的了。在這學窗時代，做出了種種的事項，什麼艋舺金和盛酒館的學生大會，和尚洲（蘆洲）、水埔莊的柑園會議、冰店的開業、東瀛商會的創設——冰店和東瀛商會，雖是商業，卻都帶著公務的之使命——，國民捐事件，袁世凱問題……，這些學窗時代所做了的活劇，今日靜靜地回顧起來，真是津津有味；也有可笑的、也有可驚的、也有可悲憤的、也有可痛恨的、也有很危險的，——同志在上海被鄭汝成鎮守使拘執將被銃殺，幸得救出——若一一寫出來，可做一篇的小說。（註一〇）

蔣渭水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沒有明白說出其中細節。這裏所提的即是辛亥革命前後階段，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社團「復元會」——同盟會在台灣的外圍組織——，復元取義於恢復健康，亦隱含「光復台灣」之宗旨，後來擴及國語（日語）學校，農事試驗場，是當時台灣最高學府裏的年輕知識分子，不甘心被日本統治醞釀而成的結社。賴和在醫學校時代與杜聰明、翁俊明同班（一九一四年畢業），高蔣渭水一班，以此因緣，在學校時代時有往來（註一一）。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任專務理事，另有理事四十一人，評議員四十四人，總計幹部八十八人（註一二）。文化協會成立當天，賴和遠在彰化行醫，並未出席，後經蔣渭水之推薦，以林獻堂總理的名義指定為四十一名理事之其中一人（註一三）。這一年賴和虛歲二十八歲，自廈門博愛醫院辭職歸鄉開設醫院約兩年左右，這是他參與台灣社會運動之始。

懷有人道主義及民族意識的賴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懷著強烈的感嘆：

愚民處苦久遂忘，紛紛觸眼皆堪傷。

仰事俯畜皆不足，淪作馬牛膺奇辱。

我生不幸為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

弱肉久矣恣強食，至使兩間平等失。（註一四）

這首詩的內涵，反映出賴和一生中的兩個方向，一是追求人間的平等，一是追求種族間的平等，他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始終貫徹了這兩種精神。

處身於異族統治下，即使賴和身為醫生，仍無法得到應有的尊嚴，因為台灣的

醫生隸屬於警務局衛生課的管轄之下（註一五），仍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對待，收入雖然比一般民衆來得高，但並不能擺脫掉殖民地被統治階層的苦悶，「處處都有法律的干涉，時時要和警吏周旋。他覺得他的身邊不時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視他，他不平極了，什麼人們的自由？……但是他空曠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脫的方法來」（註一六）。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前，賴和仍一如傳統文人，以漢文化遺民自居，寫漢詩自娛，「飽來抱膝發狂吟，篋底殘篇閒自理」（註一七），平時交從的對象，主要是入總督府醫學校前，昔日彰化小逸堂書房的學友，以及醫學校時代的同學，賴和曾有詩云：「念我平生交，南北各一處」（註一八），小逸堂的書房教育，使他和文化中國的大傳統沒有脫節；醫學校的教育，使他成爲殖民地的新知識分子。當在日本的台灣學生經由《台灣青年》、《台灣》介紹各種新思想的時候，台灣和世界的思潮接頭了。賴和回思這一階段曾寫道：

台灣雖被隔絕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卻不能被海洋所隔斷，大部分的青年，也被時潮所激動，由沈昏的夢裏覺醒起來。而且有海外的留學生，台灣解放運動的先覺，輸進來世界的思潮，恰應付著社會的需求，迄今平靜沈悶的台灣海上，翻動了第一次風波。（註一

就是這思想所攪起的風波，掃除了賴和自廈門失望歸來的無力感，滙入台灣社會的脈動，成爲文化協會的會員。個性一向沈靜內斂的賴和，原先並未想到會被推薦爲理事，曾回函蔣渭水略云：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爲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僕亦台人一分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乞把理事取消。（註二〇）

衡之於賴和一生行事，推辭理事之舉，並非是膽小怕事，一則是因爲謙虛，一則是源於他並非是政治性格強烈之人，賴和願站在中間地帶，盡力協助一切提升台灣文化向上，爲台灣人的政治權利而奮鬥的團體，本身居名與否並不在意，此種個性在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分裂之後，更是可以清楚的觀察出來。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會務是由專務理事蔣渭水負責推動，他並未遵照賴和所囑，取消其理事資格，從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前後五次大會，賴和在理事多少

有所變動的情況下，一直身任理事（註二一）。台灣文化協會以啓迪文化爲號召，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與東京的新民會、台灣青年會、中國大陸的北京、上海、廈門等地各青年會，密切採取連絡提携，以促進台灣人的民族覺醒、指導政治自覺，……企圖推進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註二二）。前期主要著重於文化啓蒙運動，但已蘊含著社會政治運動；後期則以社會政治運動爲主體，既然是社會政治運動，就不免產生方向的問題。原有宗旨既標明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文協即以《台灣民報》爲中心，到處開設閱報處，以影響識字階層，而在當時一般民衆知識普遍低下，甚至文盲居多數的情況下，舉辦文化演講會，推行新劇運動，巡迴放映電影……更是有著立即而顯著的效果。其中尤以文化演講會，只須少數辯士（演講人）逞其利口，即能在地方上挑起莫大的風潮，文協經常舉辦以啓發民智。台灣總督府的官方記錄即針對文化演講會指責：

地方會員每逢有事，便邀請幹部開講演會，稱爲歡迎，動員無智的民衆，大鳴爆竹，作一種變相的示威運動，大開傍若無人的大歡迎會，以壯聲勢。幹部們對地方民衆這種態度，也洋洋得意，趾高氣揚，自任壯士，一味挑撥民族反感爲能事，……殊如發生地方問題，農

民爭端等情事之際，他們每事都必介入，以造成問題的糾紛，藉此收攬人心，及至遭受取締，即執拗地採取講演戰術和示威遊行，來表示其反抗態度，這些竟成爲台灣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的先蹤。(註二二)

由統治者的立場反觀，可見文化演講在啓蒙階段，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官方記錄中可以看出一九二三年起，文化演講會的次數逐年增加，被解散處分的次數則以一九二六年三十五次居最高位，參見下頁附表。

賴和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中，但非活躍型的風雲人物，一樣是醫生的蔣渭水，爲了推展運動，可以隨時放下醫務，南北奔跑，前往各地演說；他也不像擔任《台灣民報》記者的王敏川，可以順便採訪各地消息；亦不像專業型的蔡培火、連溫卿；甚至比台南的醫生王受祿、韓石泉都要少於活動。在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之前，能夠查出的演講記錄，賴和和上述諸人比較起來，都要相對的減少，以下是《台灣民報》報導的幾次，時地及演講題目列之於後：

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於文化協會彰化支部的通俗學術演講：〈對人的幾個疑問〉。(註二四)



文化演講會次數及被解散次數

| 州名  | 演    |      | 講    |      | 次    |      | 數    |      | 解    |      | 散    |      | 處    |      | 分    |      | 次    |      | 數    |      |
|-----|------|------|------|------|------|------|------|------|------|------|------|------|------|------|------|------|------|------|------|------|
|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 | 一九二六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 | 一九二六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 | 一九二六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 | 一九二六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 | 一九二六 |
| 台北市 | 四    | 五    | 九    | 九    | 三    | 一    | 四    | 〇    | 〇    | 〇    | 四    | 〇    | 〇    | 〇    | 四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 新竹州 | 〇    | 〇    | 二    | 六    | 〇    | 〇    | 一    | 〇    | 二    | 〇    | 一    | 一    | 〇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台中州 | 二    | 四    | 一    | 二    | 〇    | 二    | 二    | 七    | 二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台南州 | 六    | 三    | 六    | 八    | 六    | 八    | 八    | 八    | 〇    | 〇    | 一    | 一    | 〇    | 〇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高雄州 | 一    | 〇    | 二    | 三    | 〇    | 三    | 五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 合計  | 三六   | 三二   | 三五   | 三五   | 五    | 二    | 七    | 三    | 五    | 七    | 三    | 五    | 三    | 五    | 三    | 五    | 三    | 五    | 三    | 五    |

取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頁一五一—二

二、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於文協斗六支部演講：〈長生術〉。(註二五)

三、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於文協大甲支部第八回文化演講會演講：〈修己律〉。

(註二六)

四、同年十一月七日，於文協斗六支部農村演講會演講，題目不詳。(註二七)

五、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於彰化戲園，閩江中學校長許紹珊演講：〈中國之現狀〉，痛斥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鄙劣，許夫人演講：〈男女平等及福州的教育狀況〉，賴和接著演講，「各發揮其熱烈的雄辯，吐盡同胞會合的情緒」。(註二八)

由於未留底稿，《台灣民報》也僅報導消息而已。演講的內容並不清楚，單從題目來看，大抵是以醫生或文化人的身分，做些通俗的演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項，含著濃厚的民族情感，這是賴和抵抗日本統治的一個重要源流，也是當時文化協會民族運動下自然的傾向。賴和演講的次數，可能還要更多。在他生前未發表的稿子，就有一次有關一九二五年竹林事件的農民，前往丁市聽文化演講的回憶：

一日應丁地同志的邀請，到那邊去演講。……他們（農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的，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希望能為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註

(二九)

竹林事件緣於日本三菱會社於據台初期，以廉價強奪竹山、竹崎、古坑總面積達一萬五千六百餘甲的廣大竹林地域，造成農民生計陷於困難，農民於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間由強烈抗議，演變而成的政治問題，當時農民向伊澤總督請願，有「我們乃非吃飯不可之人類，我們已不能束手待斃，以供作三菱之犧牲矣」（註三〇），這樣痛切的訴求，請願無效，只有轉而尋求文化協會之聲援，文協隨著農民事件的增多，而轉向農民運動。這是台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爲了掙脫枷鎖求取活路，不得不然的趨勢。

賴和演講的地方，不出台中州的範圍，在整個文化協會的活動中亦僅占少數，但他還有不畏強權支持文化演講會的一面。

一九二三年暑假，東京台灣青年會組織文化講演團回台灣展開文化啓蒙運動，以吳三連爲團長，呂靈石、黃周、謝春木、林仲輝、郭國基爲團員，原先準備在台北展開首場演講，但遭到警方的阻擾，首先不顧一切加以聲援的便是賴和所屬的彰化同志青年會。賴和曾有如下的回憶：

東京的留生組織一團演講隊，想為台灣家的文化向上盡一點微力，但是支配階級，一方面被久來的傳統思想所支配。以為民眾是冥蒙無知，較易統治，若使他們曉得有所謂民權，有所講正當的要求，曉得官民原屬平等，便於他們的統治上有所不便……所以對於這一團講演隊便多方阻礙，務使他們不能向民眾開口。（註三一）

當時賴和是改組過的彰化同青年會的委員，他與許嘉種、林篤勳、李中慶、楊木……等委員在背後盡了心力，「使講演隊得向大眾們發出第一聲的呼喊，這聲音波動傳到世間去，激動著平靜的空氣，台灣頓時颳起了風颳」（註三二），但是賴、林、李、楊等四位開業醫，隨即遭到警方的報復，當時醫生都可自由在藥品中使用鴉片粉末，警方卻以「阿片取締細則」加以告發。當時在東京發行的《台灣民報》有一則記載：

據台灣的新聞報道，說彰化醫師林篤勳、賴和、李中（誤為長）慶、楊木四君，因有關聯某事件，被家宅搜查，聞其結果亦無何等之得，只以阿片令違反的事故，處科料（誤為科）金三圓、五圓、七圓、十圓而已。……李、林、賴、楊四君是中部青年中錚錚的人物，改革

台灣的社會最熱心的青年，有相當的抱負與覺悟，素為我們所崇敬的青年了，祈強飯加衣些兒罷。(註三三)

林篤勳(醫·十屆)、賴和(十三屆)、李中慶(十九屆)、楊木(二十屆)，四人都是在彰化北門附近的醫學校前後屆同學(註三四)，一向熱心支持台灣文化協會展開的活動。從《台灣民報》的這一則報導，可以看到日本警方藉故騷擾支持文化協會活動的一個例子，也可看出台灣海內外同胞聲氣相通，充滿溫情的一面。文化協會的另一彰化籍健將黃呈聰，在〈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一文中，曾舉出日警當局對賴和等開業醫生干涉壓迫的案例，說明彰化被御用新聞宣傳是思想惡化的地方，起因是由於壓迫的反動，黃呈聰含蓄的提出結論云：

彰化的青年是富於進取的氣象，不像老人家過於保守，……過去的老台灣，是老人家的台灣，現在的新台灣，是青年的台灣，有氣力的青年才可以改造社會，有新思想的青年國家才能進步，如青年沒有元氣，還是抱舊的思想，其國家便成了老朽的舊國家，……彰化的思想本來是好的，因為受了當局做出無理解的壓迫。所以成了一二過於急進的青年，這也是反

動的自然生出來的。(註三五)

黃呈聰的言論，是對賴和等人的聲援；彰化的開業醫對文化協會的盡心維護，還可從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文協彰化支部成立於北門外，附設了讀報社及施行實費診療制，賴和、陳英方、林篤勳、李君曜、李中慶、王倫魁、楊樹德、楊木、蘇炳垣、謝德斌、吳起材、李俊哲等十二位醫生，以實費來診療病患，一則嘉惠窮苦的病患，一則提高文化協會在民衆間的影響力(註三六)。這類的工作是經常性的，細水長流的方式，當然也就不可能耀眼醒目了，但是在考量賴和對台灣文化協會的貢獻，絕對不能忽略他是醫生的身分。出力的部分，尚可從發起「政談演說會」，請人演講，這一願的報導，觀察出來(註三七)；出錢的部分，則不易探索，但以他晚年下獄，在獄中還須爲債務所苦(註三八)，那麼他行醫的收入，相當比率支援各運動團體，當非僅是猜測之辭而已。

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關係密切，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密不可分，從他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參加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註三九)，一九二三年一月參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註四〇)，在台灣被禁止結社後，二月十六日再建於東京，亦

列名其中（註四二），隨後治警事件下獄，這些事跡可充分印證賴和參與的程度。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督府警務局檢舉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北自宜蘭，南至高雄，同日同時將全島台灣議會運動關係人一網打盡，當天被搜查並被扣押者四十一人，被搜查並被傳訊者十一人，被搜查者十二人，被傳訊者三十五人，總共九十九人罹難（註四二）。依當日亦遭到搜查的林獻堂秘書葉榮鐘之說法：

事件是總督府警務局經過周密的計劃與極度保密而發動的。所以事件發生後，一切對外交通，無論電話、電信除官方外，私人的通信，均被控制。街頭巷尾以及公共場所，均有特務人員在監視，一面對於漏網的同志，也派有特務人員跟蹤。（註四三）

整個情勢的發展，是總督府施行的恐怖政治，以鎮壓台灣覺醒的政治意識，賴和在這次治警事件中遭到搜查並被扣押。葉榮鐘晚年回憶有關賴和的遭遇云：

彰化市有多少人（被扣押）現在已記不清楚，不過老一輩的林篤勳醫師、許嘉種先生兩位都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員，他們平時和蔣渭水、林呈祿等台灣議會主腦人物往來頻

繁，他們受牽連自是意料中事。賴和比較他們是後一輩，這一輩中像陳虛谷、吳蘅秋、陳英芳、楊木等都安然無事，唯獨賴和一人被拘，似乎使人無法解釋。（註四四）

此一無法解釋，反面而言，可以印證賴和即使僅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普通會員，涉入的程度也比他人更深。在日本統治者的眼中，賴和是打擊的對象之一，因此在這次的治警事件中，賴和首次入獄。初囚台中銀水殿，賴和有詩云：

一死原知未可輕，吾身不合此間生。

如何幾日無聊裏，已博人間志士名。（註四五）

後移送台北監獄，亦有詩云：

功疑惟重罪疑輕，勅法何嘗喜得情。

今日側身櫻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註四六）



台灣民間到底有與總督府官方不同的評價，也點出了日本國的台灣籍民，畢竟是殖民地的被統治者。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賴和始以不起訴處分出獄（註四七）。經過治警事件之後，給了賴和更深的醒悟，徹底的和日本統治者畫開了界線，他在爾後的文章中寫道：

受到這次壓迫，對於支配者便非常憎惡。把關聯於他們的事務，一律辭掉，決意也不和他們協作。覺得此後的壓迫一定加倍橫虐，前途阻礙更多，但他並不因此灰心退縮，還是向著唯一光明之路前進。（註四八）

治警事件鍛鍊了台灣的抗日志士，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事件一周年，被拘捕的同志於台北、彰化、台南同時召開「同獄會」，公然與總督府繼續抗爭（註四九），賴和每年也以這一天為紀念日，他在〈隨筆〉中言及：

這一日是向平靜的人海中，擲下巨石，使波浪汹涌沸騰的一日，這一日曾使我一家老幼男女，驚唬駭哭併累及親戚朋友，憂懼不安的一日，這一日是我初曉得法的威嚴？公正？的

一日。所以對於這一日我總有特別的情感，同人們有什麼計劃，我都高興去參加。（註五〇）

被監禁的人不以下獄爲恥，反而組成「同獄會」，年年在當天聚會紀念，這正是反抗者的特色。

賴和與日本統治者絕不妥協的態度，尙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答覆民報特設五問〉中清楚的看出，其中《台灣民報》第二問：「五年以來發生的重要事項」，賴和舉出五則，其中一、二兩則分別是：

一、對議會請願者的經濟壓迫，月給（月薪）生活者的鹹首（解雇、革職），因此乃知爲政者的哀（胸）襟，促起吾人多大的覺悟。

二、攝政官（即後來的昭和裕仁天皇，當時還是皇太子）之御幸台（一九二三年來台巡遊），一面證明台灣統治的成功，一面證明吾們的馴良易治。（註五一）

從第一則回答裏，可以看到殖民地的被統治者，即使是在合法的請願之下，仍受到另眼看待，覺悟的人轉向文化協會去活動，是一九二三年以後文協大活躍的原因（註

五二) , 第二則的回答出於賴和常用的反諷筆法, 這在一九二六年元月〈答覆民報設問〉中, 更加的辛辣, 含義深刻, 在眾多的答問之中, 特別引人注目。其答問如下:

一、保甲制度當「廢」呢? 當「存」呢?

答: 存。我們生有奴隸性, 愛把繩索來自己縛束, 若一旦這個古法廢除, 則沒有可發揮我們的特質。

二、甘蔗採取區域制度當「廢」呢? 當「存」呢?

答: 存。我是資本家飼的走狗, 若這特權喪失, 連我這做走狗的, 恐怕也沒噉飯處。(註

五三)

這樣的反面作答, 令人過目難忘, 也徹底表現出殖民地民衆的無奈。

無論是參與「同獄會」, 出席或支援文化演講, 或是在《台灣民報》上表達意見, 賴和都表現了抗議者的精神。當時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人, 普遍得到台灣民衆的支持, 賴和是文化協會理事, 也是彰化地區推展啓蒙運動的中心之一, 具有民間所稱「文化的」特色, 而「文化的」一詞是當時台灣社會分化過程中識別的指標。親身

經歷此一運動的葉榮鐘曾深刻的指出：

台灣議會運動發軔，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後，民衆之間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一句新名詞「文化的」。這是指和台灣議會、文化協會有關係的人無論是會員與非會員，凡站在文協這一邊的人包括在內，甚至其人與文協毫無瓜葛，但因他好議論或愛打抱不平，尤其是攻訐警察，批評御用紳士，都會被人指稱「他是文化的」。與「文化的」對稱自然是「御用的」，即御用紳士，這一名稱自何時起被使用，現在無從稽考，但在文協創立以後膾炙人口，開始流行，則毫無疑問。……台灣到這個時期，社會上已經涇渭分明，在民衆的眼中，那個是文化的，那個是御用的，分得清清楚楚，一清一濁，絕不容許涇渭混淆。（註五四）

賴和這種「文化的」特色，還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並且成爲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內涵。賴和的新文學創作，最早發表的一篇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刊載於《台灣民報》上的〈無題〉，爾後在台灣文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賴和的作品有很強烈的現實感，並且技巧圓熟，除了他本身的才情志趣之外，他的創作呼應了《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系統，陳炳、陳端明、林南陽（攀龍）……等留日青年，以及黃呈聰、

黃朝琴、張我軍、蘇維霖、蔡孝乾……等具有大陸經驗的青年，當時所提倡的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之主張，賴和將文學理論，轉化為具體實踐，從而取得輝煌的文學成就。

賴和作品強烈的現實感，與他參加文化協會以來，和台灣社會脈動有極深的關聯。二林事件是極為具體的例證之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廿三日彰化二林地區，蔗農與製糖會社因甘蔗採收發生爭執，以致警察逮捕蔗農八、九十名，並擴大事件逮捕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並經由法院於二林庄實施戒嚴，引發二林事件（註五五）。在彰化行醫的賴和得知消息，隨即寫下〈覺悟下的犧牲〉，副標題標示：「寄二林的同志」（註五六），清清楚楚的表明了牠的立場，絲毫不畏統治者的權威。全詩共分九節，四十七行，充滿了抗議性，稱誦被逮捕的人為「我的弱者的鬪士們」，第七小節尤見其憤慨之情：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註五七）

賴和直斥官商勾結欺壓農民的一羣是「虎狼鷹犬」，肯定的站在弱小者的一方，具有毫不妥協的抗議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原稿上載明「十月二十三日」（註五八），這是事件發生當天的直接反應。如此緊扣現實的文學作品，是賴和創作的特色之一。在以後有關抗議「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的敘事長詩〈流離曲〉，反映霧社事件的〈南國哀歌〉，都是這種精神的進一步發揚，因此均遭到檢閱人員從中腰斬的處分。（註五九）

總結一九二七年元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前，賴和公開發表的新文學作品，加上答覆《台灣民報》的兩題問卷，僅有區區九作，然而賴和以〈覺悟下的犧牲〉，寫下了詩人的身分，以〈一桿「稱仔」〉，取得了小說家的身分（註六〇）。他的反抗者的立場非常鮮明，參加文化協會以來，終生站在日本統治者的對立面，也充分表現在文學上。

社會運動中的賴和與文化運動中的賴和，彼此互為表裡，必要這樣來衡量他，文化協會理事之一的賴和，他的貢獻才能具體的呈現出來。

此外，賴和的本職是醫生，廈門歸來之後，一直在彰化市子尾的賴和醫院懸壺

濟世，身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醫生，也無非是個工具而已（註六一），換言之亦即是奴隸，和民間窮苦的農民、小販、工人……接觸越多，越能體會社會下階層的苦況，衆人眼中的仁醫（註六二），由是更要關心「奴隸的奴隸」（註六三）；在左翼思潮不斷高漲的時代裏，賴和以他的人道主義精神，迎向時代的考驗。

附註

註五：《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一九三七年），〈再版の辭〉，扉頁。

註六：同上註，前揭書，頁三九八—九。

註七：〈社會主義の概説〉（上）刊於《台灣青年》二卷四號（一九二一年五月），（下）則未見刊出；

〈階級闘争の研究〉刊於《台灣青年》三卷四號（一九二一年十月）。

註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同學杜聰明之言，見〈蔣渭水君之學生時代及臨終病狀〉，收於《杜聰明

言論集》，頁四一二。

註九：參見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鄉，一九八八年五月），〈文化協會的成立〉及〈台

灣文化協會會則》，頁二五三—六。

註一〇：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六十七號，頁四四。

註一一：參見拙著〈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二小節：「民族意識與復元會」。

註一二：同註九，前揭書，頁二五三。

註一三：見賴和自傳體小說〈阿四〉，文中包括邀請東京留學生文化講演團於彰化首次演說，治警事件……等等，可惜係未完成的殘稿，收於《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以下簡稱全集，頁三三四；以總理名義指定理事一節，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二五三。

註一四：〈飲酒〉，全集，頁三八一。

註一五：參見《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總督府，一九四二年一月），警務局衛生課業務。

註一六：同註一三，頁三三三。

註一七：〈歸去來〉，全集，頁三七一。

註一八：賴和未刊稿。

註一九：同註一三。

註二〇：同註一三，頁三三四。

註二一：參見〈台灣文化協會會報〉，一九二四年度，理事六十二名，《台灣民報》二卷四號，頁一五；



一九二五年度，理事六十八名，《台灣民報》三卷一號，頁二三；一九二六年度，理事八十三名，《台灣民報》七十九號，頁一五。賴和一直列名其中。

註二二：《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八。這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觀點，亦是實情。

註二三：《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二七二。

註二四：〈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計畫講演〉，《台灣民報》二卷廿五號，頁三。

註二五：〈各地文化講演之盛況〉，《台灣民報》三卷十六號，頁五。

註二六：〈文化講演消息〉，《台灣民報》七十五號，頁六。

註二七：〈文講日記〉，《台灣民報》八十二號，頁一四。

註二八：〈名士各地講演〉，《台灣民報》一百三號，頁六。

註二九：同註一三，前揭文，全集，三三七。

註三〇：〈請願之旨趣〉，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七一年），頁五一六。

註三一：同註一三，前揭文，全集，三三五。

註三二：同上註；另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留學生文化講演圖〉一節，亦提及「七月二十三

日，在彰化發出宏亮的第一聲」，頁九二。

註三三：〈時事短評〉，《台灣民報》七號，頁九。李中慶名字誤為李長慶，乃因「中」與「長」台語諧

音。

註三四：參見《景福會會員名簿》（台北，台大景福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各人屆別及地址。

註三五：劍如〈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下）〉，《台灣民報》二卷十八號，頁四—五。

註三六：〈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台灣民報》二卷十九號，頁一二。

註三七：〈彰化初次政談演說會〉，係賴和與吳石麟發起，賴和且是政談演說會的司會者，《台灣民報》一百廿一號，頁七。

註三八：參見〈獄中日記〉，原發表於《政經報》，收於全集，頁二六八—三〇二。

註三九：這是以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為基礎的政治結社，後來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而停止活動。

賴和列名為普通會員，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協會會員與各種結社的關係〉，頁二九一。

註四〇：賴和亦是列名為普通會員，同上註。

註四一：亦是普通會員，同註三九。

註四二：名單參見〈「治警事件」始末〉，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六—九。

註四三：同上註，頁二一〇。

註四四：葉榮鐘〈詩醫賴懶雲〉，收於《台灣人物羣像》（台北，帕米爾，一九八五年八月），頁一三四。

註四五：〈囚繫台中銀水殿三首之一〉，全集，頁三七六。

註四六：〈繫台北監獄〉，全集，頁三七六。

註四七：〈「治警事件」始末〉，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九。

註四八：同註一三，頁三三七。

註四九：〈同獄會概況〉，《台灣民報》三卷二號，頁四。

註五〇：〈隨筆〉，全集，頁二四三。

註五一：《台灣民報》六十七號，頁五四。

註五二：參見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台北，自印，一九八一年六月），頁一四八。

註五三：《台灣民報》八十六號，頁二四。

註五四：〈形成社會的分化〉，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三一五—六。

註五五：參見〈林糖紛擾事件真相〉，《台灣民報》七十九號，頁四—六。

註五六：《台灣民報》八十四號，頁一五—六，副標題在全集中改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全集，頁

一三九。

註五七：全集，一四一—二。

註五八：原稿上的標記，但於《台灣民報》八十四號發表時另有一行一四、一一、一三之題記。當以原

稿爲準。

註五九：請參見拙作〈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八小節：「文學內涵分析——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

註六〇：同上註。

註六一：葉榮鐘在〈詩人施家本〉一文中，說及：「國語學校畢業，醫專畢業，充其量也不過做日本統治的工具而已。」收於《台灣人物羣像》，頁一四〇。

註六二：王詩琅〈閒談懶雲〉曾提及這麼動人的一段：「懶雲執壺以來，對窮人相當的照顧。例如他在每年年底，便將病患者所欠的舊帳焚毀。……懶雲先生在世時，素得民衆尊重，喊他『和仔先』」。收於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出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頁一六六。

註六三：李篤恭在〈憶敏川叔〉一文中，提及賴和的口頭禪是「大家愛關心奴隸的奴隸」，這是賴和參與政治社會運動基本的出發點。收於《王敏川選集》（台北，台灣史研究會，一九八七年九月），序文，頁二三。

### 三、分裂的年代

在時代思潮不斷衝激之下，台灣文化協會的啓蒙運動，越來越偏重社會政治運動，尤其一九二五年介入竹林事件、二林事件之後，「朝實際運動去」成爲文協的口號（註六四）；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已發展成爲全島性的組織，曾受文協啓發和指導的農民運動，此後更是高潮迭起，反過來刺激了文化協會運動路線的爭議。另外，早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即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這是一九二三年七月，蔣渭水、石煥長、蔡式毅、連溫卿、謝文達……等人，發起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先驅（註六五），這種在提倡民族運動時，亦有些人注意及階級運動的雙元現象，正是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介紹世界思潮的島內反應。這類組織雖遭總督府彈壓，但有些知識份子仍越來越左傾化，以青年會、讀書會等名義，合流於文化協會讀報社內，爾後部分激進派以「無產青年」名義活動，宣傳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雖然人數並不多，但因有意識形態上的武裝，左翼運動者成爲文化協會最有組織性的骨幹（註六六）。其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兩人，一是受日本山川主義

(Yamakawaism)影響的連溫卿，一是受福本主義(Fukumotoism)影響的王敏川，他們的左翼思想，在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的時刻裏，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十六日兩天召開於霧峯萊園的文化協會理事會，已經明顯的面臨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分歧點了。《台灣民報》有關這次文協理事會議，報導消息如下：

下午三時開有志者會議，先議「組政治結社」的問題，聞其綱領或其根本方針及其組織，議論紛紛，又無具體的提案，可為討論的中心，所以各人各立案，將其私案定本年七月廿日為限，交蔣渭水氏，蔣氏將其提案集齊，印刷分與各人，則再召集會議討論。(註六七)

此一問題之所以議論不絕，係由於政治結社有背文協不干政治之主旨。但又事關爾後文協之路線，這次理事會眾說紛云，乃是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召開第六次年會，導致正式分裂的先聲。

身為文化協會理事的賴和，參加了萊園理事會議。在他生前未發表的遺稿〈赴會〉一文，提到了「普及漢文教育」、「普及羅馬字」兩案，正是此次會議議決的主

題之一（註六八）。有關政治結社一案所引發的爭論，賴和寫道：

次日的會議，顯然提出了二派的爭執，似有不能相妥協的形勢，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為前提，一派以民族意識為根據，力圖團結全民眾為目的。議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結。（註六九）

賴和於〈赴會〉全文中，未曾明言他到底傾向那一邊，但在行文裏，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則做了批判：

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鬭爭，只見三不五時（偶而）開一個講演會而已。（註七〇）

比照賴和在文化協會裏的活動情形，這樣的批判，含有對自己所處地位的反省，這是賴和在時代的挑戰之下，能與時俱進的原因之一，在文中他藉著佃農對大地主階層霧峯林家的批評，側面呈現出他對於勞動者的同情與關懷。賴和將他所聽來的佃

農之間的談話，以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

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拼〔拼命努力〕也無定着〔或說不定〕。

他們不是講要替台灣人謀幸福嗎？

講的好聽！

今日聽講〔聽說〕在霧峯開理事會。

阿罩霧〔霧峯舊名，意指霧峯林家〕若不是霸咱搶咱，家伙〔家產〕那會這樣大。

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阿彌陀佛，一甲六十餘石，好歹冬〔年冬〕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討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講。（註七）

這樣生動的對話，是文學家賴和採自民間的實錄，反映出民情的一面，也呈現了賴和對大地主階層保留的態度，這和他出身民間，行醫又長年與勞苦的民衆接觸，深知民間疾苦，由此衍發的人道主義精神有關。

長期擔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在論及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資金來源時，曾特



別舉出林獻堂爲例說：

他是台灣議會運動的領導者，自然出錢也最多，他是標準的地主，唯一收入是租穀。他每年收入的稻穀約一萬石，……一個人能夠把其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提供出來，說他已經盡力以赴似乎不太離譜吧？（註七二）

這是無可爭議的實情，林獻堂爲了台灣人的政治權利，絕對是盡了心力。然而透過賴和筆下林家佃農的不平、不滿，觸及了日據時代地主階層無法避免的兩面性，一則爲了台灣人的政治地位，出錢出力；但另一方面又由於唯一的收入是租穀，要和農民站在同一立場奮鬥，又絕無可能，這也是絕大多數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地主，終必要站在民族運動的範疇的主要原因。

賴和的家族，從其祖父賴知以來，三代以道士爲業（註七三），和民間關係密切，「積儉初起家，未容事奢侈」（註七四）；賴和憑其聰明才智，當了醫生，在他從事社會運動時，其家族也是擁有六甲良田的小地主（註七五），由於賴和的民間性強，他站在強調「關心奴隸的奴隸」之人道主義立場，處身於當時思潮的衝擊之下，一九二

七年元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賴和列名新文協臨時中央委員。在萊園的理事會議中，未見賴和的發言記錄，但從〈赴會〉取材角度以及結尾處，賴和即景隨興，詩云：

詩人劫後多悲哀，合抱殘篇滿草萊。

題碑儘有成名者，朽樑雖多是棄材。（註七六）

由櫟社題名碑，賴和發抒所感，顯見他已不甘以傳統文人和櫟社諸人，在異族統治下以棄材自居；賴和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與時代的脈動合拍，〈赴會〉一文記錄了他參加萊園理事會時的心境，並預示了他未來的動向。

萊園理事會如前所述，呈現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的前兆。五月十六日「正午十二時閉會，一同攝影，為紀念」（註七七）；從〈林獻堂先生年譜〉，可以翻檢到這一張相片。（註七八）（見附圖六）當時文協理事攝影留念時，總理林獻堂居中而坐，理事們分列兩邊，或坐或站；在集合攝影前，由各人無意識中所排列的位置，已能觀察出左右分裂的無可避免。以在文協分裂行動中居主要角色的四人：連溫卿、王敏川、蔣

渭水、蔡培火所居的位置來看，連溫卿坐於林獻堂左手邊，王敏川站於連溫卿正後面；蔣渭水坐於林獻堂右手邊，蔡培火站於最右邊，正表現出來左右分裂後的大勢；右邊蔣渭水與蔡培火的關係位置，正巧是未來蔣渭水所言「右之左及右之右」的陣式（註七九）。在文協理事中不甚顯眼的賴和站立於左邊最後一列，隱約只照出了一些身影與頭像。這種團體照相時各人無意識排列出來的關係位置，依深層心理學而言，正反映出各人潛在的運動路線，不僅僅是巧合而已。

萊園理事會已預示了文化協會因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的路線之爭，即將而來的洶湧波濤。當時「政治結社案」未予解決；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台灣民報》未署名的論評〈政治結社的必要〉一文，已高揭非政治結社不可的論說：

應該要組織一個政治結社，舉行大大的政治運動，像現在的請願設置民選議會，或差別待遇的撤廢，或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的自由。或產業政策、和教育制度的改善，或保甲制度和砂糖原料採取區域制度的廢止等問題，都要先行調查研究、宣傳運動，然後要求施設或改廢，才得把一切的壞制度改革，而會實現適合輿論的政治。（註八〇）

政治結社本是人民應有的權利，但由於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統治者眼中台灣人民並不具備是項權利。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台灣治安警察法施行，台中州警務部長本間善庫，鑑於文化協會之行動越來越注重社會運動，曾於一月十六日與文協總理林獻堂簽下「覺書」（備忘錄），其中第二款如下：

甲（本間）：文化協會為非關政治之結社，亦將來雖謂不欲存續使成為有關政治之結社，倘以文化協會之運動有抵觸政治運動之場合，將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處分之，請預先知悉。

乙（林）：知道了。（註八一）

因有這項備忘錄之簽署，林獻堂及部分理事對於政治結社頗感顧忌；掌握《台灣民報》筆政的文協理事，訴之輿論將政治結社問題突顯出來，以取得多數人的支持。在次期的論評《甚麼是『文協主義』》，進一步說明並非「要造成台灣人的思想惡化」，言簡意賅解釋云：

「文協」主義是要獲得大眾的生活——衣食住的具體之表現，並不是僅止於觀念。而脫離實生活的，……簡單說一句，文協主義不過是要使民衆脫離制度上的奴隸之地位而已。（註八）

## 二)

再次側面強調應從啓蒙的文化運動，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此外，自五月十六日起《台灣民報》，陸續刊載張我軍翻譯自日本左翼社會運動理論家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 一八八〇—一九五八)的〈弱少民族的悲哀〉一文（註八三），連續九期（一〇五—一〇八號；一一〇號；一一二—一一五號），長達兩個月，借着各種統計數據，突顯出殖民地台灣的悲慘情境，在關鍵的時刻裏，起了重大的作用。張我軍在譯者附記中言及：

我在翻譯之間，一陣陣的悲哀、慚愧和痛快之感，輪流着奔到心頭！有許多自己所不知的，或知而不詳的事，——且與咱們全島民的死活有大關係的事——山川先生却詳細地，在日本第一大的雜誌《改造》宣佈出來。又有許多自己所不敢說的，或說不得的，或說而不說到痛快的話，山川先生却替咱們痛快地吐露於日本第一有權威的雜誌《改造》上面。（註八）

從張我軍的深刻感觸，亦足以反映台灣人被統治的悲哀，此文在文協面臨分裂的階段，以大篇幅連續刊載，對師法山川均的連溫卿一派助力極大；另一方面，自一九二六年八月至二七年二月，《台灣民報》上的「中國改造論爭」，以同樣是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在聯俄容共政策，已臨分裂的中國改造論爭之名，探求台灣社會的特質及改革路線（註八五），亦可看出台灣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年分裂的年代裏，台灣亦無可避免地走上分裂之途。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於新竹召開第六次總會，由於修改章程案而使分裂表面化，只好將理事及評議員任期延至次年一月三日召開的臨時總會，另由議長林獻堂指名鄭松筠、連溫卿、謝春木、蔡培火、蔣渭水、林幼春、陳旺成、陳逢源等八人為起草委員。賴和代表彰化支部出席大會，未發表意見。（註八六）

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一日於霧峯林家舉行起草委員會，提出蔣渭水、連溫卿、蔡培火三議案；以同是委員的謝春木所觀察而言，連案「以俄為師」，蔣案以「中國國民黨為師」，蔡案則是儘量維持文化協會的傳統（註八七）。十一月廿一日《台灣民報》

刊載未署名的評論〈左右傾辯〉，具體而微呈現了一九二六年以來左右路線之爭，是此階段極為重要的論說，於文中分析了兩派的長短：

左傾派的長所，大都富有進取的、戰鬪的精神，他們自然不怕壓迫，不顧生命財產的存亡。他們的短所，便是無視一切的傳統，無視一切的國情，只好翻譯外來的思想為思想，只好採用外來的手段為手段。

右傾派的長所，大都先認清〔誤為請〕他們所屬的民族的傳統，與他們所屬的國家，或是社會的情形，嚴戒空虛無補的行動，一步一步地組織實力起來。他們的短所，便是因認社會的情形太清，容易被現實所牽掛，沒却了高遠的理想，容易墮落為妥協主義。（註八八）

這是極為平實的分析，反映台灣知識分子在世界性赤潮澎湃的衝激之下，能洞悉左右傾派的長短，並且也警惕到兩派水火不容，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窘局：

左派攻擊右派為妥協主義，右派攻擊左派為小兒的空想病，因此不得立腳在共同戰線，以致失掉勞動運動的威力。（註八九）

〈左右傾辯〉一文出自蔣渭水之手（註九〇），爲了力圖挽回文協的分裂局面，在文中亦譯介了左派對右派的六大戰術，試圖站在「中間」的位置。然則客觀形勢的發展，並無法以主觀願望來加以逆轉。在一九二七年元月二日發刊的《台灣民報》新年號，連溫卿的〈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蔣渭水的〈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蔡培火的〈我在文化運動中所定的目標〉三文，一起刊出，就其本身的立場各逞所能（註九一）；同日下午二時，文協於台中東華名產株式會社召開理事會議，出席理事三十七名，審查議案，連溫卿案以多數決得勝，遂以連案爲基礎，將逐條審議。蔡培火、陳逢源、王受祿、韓石泉……及其他十數名理事棄權退席（註九二）。當事人連溫卿日後回憶云：

當連案通過以後，蔣渭水既發揮折衷主義之本性，極力欲制定大眾文化之意義，意即將自己所擬好的八大政策重新恢復，做爲綱領之說明。於是本案雖稱爲連案，亦可以稱爲蔣案。（註九三）



由於有以上之波折，議案最後由在場之十六名理事：王錐、林冬桂、王敏川、周天啓、吳石麟、張信義、林糊、鄭明祿、林碧梧、彭華英、吳庭輝、連溫卿、洪石柱、邱德金、賴和、黃石輝等人，討論至深夜十一點半始告完畢（註九四）。

賴和在這次理事會中有何發言，現有資料未詳，在這一階段，賴和與連溫卿、王敏川同一立場，應無疑義，以後文協再次分裂，則與王敏川同一戰線。

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下午二時，文化協會臨時總會於台中公會堂召開，出席會員計有一百數十人（註九五），最後選出臨時中央委員三十名，名單如左：

林獻堂、王敏川、黃細娥、邱德金、林幼春、連溫卿、蔡孝乾、鄭明祿、林冬桂、洪石柱、賴和、蔡培火、蔣渭水、林碧梧、周天啓、林伯廷、洪朝宗、王萬得、黃運元、白成枝、吳庭輝、林資彬、彭華英、莊泗川、張信義、高兩貴、吳石麟、黃石輝、林糊、王錐（註九六）。

依據左右兩派關於這次正式導致文化協會分裂的臨時總會開會情形，兩派各有不同的說法。葉榮鐘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云：

屬於連溫卿派的大甲、彰化以及由台北大批擁進會場的左翼青年佔大多數，他們以連溫

卿爲中心，佔據坐席的中央，大有睥睨全場的氣勢（註九七）。

當事人連溫卿則針對文協全被無產青年奪去一節，加以反駁說明：

其中新加入的會員只有十二名，彭華英亦在其中，並非全部都是無產青年。其中九名的介紹者爲急進民族主義者之蔣渭水，三名爲連溫卿所介紹，前者皆爲普通青年，而後者可以視爲無產青年也未可知。（註九八）

連溫卿亦不免偏向本身立場，以彭華英而言，既已參加元月二日的理事會，自然不會是新加入的會員。那麼葉榮鐘所云大甲、彰化、台北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加以注意。因連溫卿、王敏川主要的活動地點在台北，具有影響力極爲自然；文協彰化支部向來極爲活躍，賴和以地緣的關係，在彰化向來有影響力，亦會前往大甲講演；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賴和與吳石麟繼前兩天彰化磺溪會舉辦的「全島雄辯大會」，在彰化發起「政談演說會」（註九九），邀請連溫卿、鄭明祿、洪石柱、彭華英、林冬桂等人演講，由於日警干涉，未能出場，由賴和司會，與李中慶、李

金鐘撐大局，因演說激烈，被命中止、解散；當天情況，《台灣民報》報導，敘說原因，並有如下場面的描寫：

是夜，大雨傾盆似的降下，但聽眾毫不減少於前夜的雄辯大會，約有五千餘人，把個曠濶的戲園擁擠的幾乎沒立錐餘地。（註一〇〇）

從前後三天，彰化政治演說的盛況，可知文協彰化支部向來的活動力。彰化在日據時代向來被視為思想惡化的所在，這是其來有自，乙未八卦山之役是日軍與民軍勝負的一大決戰，彰化人抱着亡國滅種之痛，民族意識十分強烈；以賴和而言終生是不甘於當日本籍民，受過當時台灣最高的醫學校教育，絕不以日文發表文章，行醫常穿「台灣服」（本島衫）（註一〇一），不書日本年號（註一〇二），就日本統治者而言，自然是思想惡化的人物之一。

由於賴和是文協彰化支部的核心之一，對彰化地區的青年有其潛在性的影響，吳石麟是出身彰化世家吳德功家族的激進青年（註一〇三）。吳是王敏川在彰化第一公學校任教時的學生，深受王敏川影響，台北工業學校中途退學，回彰化積極參與

文化協會活動；而王敏川與賴和是居住彰化北門附近的世交，大賴和六歲，時有往來；一九二三年王敏川畢業早稻田大學政經科後，回台灣任《台灣民報》記者，是文協理事中極爲活躍的一人；又有同樣地緣關係，一樣出身國語學校與早稻田大會的施至善，在文化協會中擔任評議員，亦服務於《台灣民報》，王、賴、施三人關係極深，彼此影響，情誼維繫終生（註一〇四）。政治理論並非賴和所長，但他人道主義精神，使他自然傾向左翼社會運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抵抗精神從未衰退，因此彰化地區的激進青年樂於和他親近，遂成爲無形的中心之一。

一九二七年元月，文化協會分裂，是以連溫卿、王敏川爲核心取得文協的領導權；蔡培火、洪元煌……於選出臨時中央委員之後，相繼退席了。蔣渭水曾以他的提案附於連溫卿的提案，後來也跟着退席了。依葉榮鐘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提出的看法云：

蔣渭水與連溫卿本來是共同戰線的提攜者，但因兩者思想上有不可逾越的界線。在理事會席上又因「總理制」的主張與連溫卿之間發生摩擦，導致無法妥協的地步，所以他也不屑留在連派旗下共事，乃聲明辭去中央委員而退席（註一〇五）。

台灣文化協會就在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的臨時總會結束時分裂了。賴和與王敏川同一陣線，俱擔任臨時中央委員。分裂後的文化協會，首先由連溫卿掌握實權，從民族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彰化青年蔡孝乾在〈轉換時期的文化運動〉一文中，分析一九二〇年七月《台灣青年》發刊以來，以迄文協的分裂，強調說明：

有了思想界的轉換，才促成了文化協會的有意義的改組，同時有了文化協會的改組，才證明了台灣思想界的有意義的轉換。（註一〇六）

蔡孝乾以唯物辯證法的概念，認為文協分裂是必然的現象，並且認為這是「台灣解放運動的展開」，也「必然的又推移到更進步的新的階段」（註一〇七），顯示馬克思主義在日據下的台灣，愈見抬頭的趨勢。

賴和並非是完全受左翼思想支配的知識分子，亦沒有政治人物的領袖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三日新文協召開的臨時中央委員會，他並未任常任委員（註一〇八）。另一方面，文協舊幹部則於二月十日集會於霧峯林家，醞釀成立台灣自治會（註

一〇九)；五月一日，《台灣民報》報導台灣自治會被總督府當局禁止(註一一〇)；五月八日，舊文協派再以林獻堂爲主共四十六人籌組台政革新會，以「期實現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註一一一)，此一現象，顯示出在新文協的強力刺激下，舊文協亦提高其政治綱領；五月二十九日，正式宣告成立，同時改稱台灣民黨，賴和在當天的發會式出席並被選爲臨時委員(註一一二)。僅經五天，即於六月三日被總督府當局依據治警法第八條第二項，以妨害治安命令禁止(註一一三)，當局在禁止的理由中云：

台灣民黨(台政革新會)爲文化協會員中比較穩健分子所計劃，在不違背帝國根本方針之下所組織，但其綱領政策猶使用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之標語，顯然是唆使民族反感，妨礙內台之融和，使人懷疑其懷抱民族主義。(註一一四)

七月十日，以台灣民黨爲基礎，修正遭總督府當局忌諱之字句，成立台灣民衆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消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爲綱領」(註一一五)，是日據時代台灣首次以黨的名義出現的政治結社。依蔣渭水在民衆黨第一次的政談

中云：

民衆黨的根本精神，在反對現時三權握做一手的總督府專制政治，要求三權——司法立法行政——分立的立憲政治，改革假裝的地方自治，實施民選而有議決權的真自治，改除警察萬〔誤爲葛〕能的制度。（註一一六）

這是台灣殖民地民衆追求政治權利的理想，因此在各地的政談演說中，甚得民衆的歡迎。

賴和以台灣民黨的臨時委員亦隸籍台灣民衆黨，由是橫跨於新文協與台灣民衆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彰化磺溪會邀請各黨派假彰化座舉行「社會改造問題大講演會」，賴和與邱德金以同屬新文協和民衆黨之身分被大會邀請（註一一七）。

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分裂之後，左右兩派迭有紛爭。五月十五日《台灣民報》，未署名的評論〈中台改革運動兩潮流〉一文，以中國大陸北伐中途國共分裂的情勢演變，予以比擬：

右派是主張以農工階級爲基礎的民族運動，左派是主張階級鬭爭——共產主義——故又可看做右派是奉三民主義，左派是奉共產主義，所以結局文協也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紛爭。：台灣宛然是個小中國。(註二八)

這樣的比喻，不見得貼切，但倒是點出了分裂情況之嚴重。如果這些政治運動者如同國共兩黨手中握有武器，情勢將更加惡化。但台灣處在日本殖民統治直接的壓迫下，殖民地民衆反抗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以期解開套在身上的枷鎖。在異民族統治下，辯論「農工階級爲基礎的民族運動」與「階級爭鬥包民族膜」(註一九)，雖亦有本末輕重之分，但偏執一方，容易流於意氣之爭，也容易受到主要敵人的分化。賴和在此一關鍵年代，橫跨新文協與台灣民衆黨具有調節的作用。

另一方面，台灣總督府當時確有分化台灣文化協會的對策。經日本台灣史家若林正文於一九七八年四月挖掘公之於世(註二二〇)，此即收存於台灣第十一任總督(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八年六月)《上山滿之進關係文書》中的〈文化協會對策〉，若林研究判斷是總督府警務局(局長本山文平)之幹部，於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月間寫成，呈送上山，以爲文化協會取締措施草案之資料(註二二一)。



該對策中將台灣文化協會之主要人物分成穩健派與急進派兩個派別：

(一)、穩健派

此派不提帝國統治權之當否，專以統治之改良為主，以求撤除內台之差別，增進本島人之利益幸福，可視為比較穩健者：

林獻堂（台中）、蔡培火（台南）、陳逢源（台南）、蔡式毅（台北）、王受祿（台南）、韓石泉（台南）、謝春木（台北）、鄭松筠（台中）、楊振福（高雄）、黃周（台中）

(二)、急進派

此派奉民族自決主義，或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動輒有反抗帝國國權之傾向：

連溫卿（台北）、蔣渭水（台北）、鄭明祿（台北）、王敏川（台北）、邱德金（台北）、高兩貴（台北）、黃白成枝（台北）、王萬得（台北）、洪朝宗（台北）、蔡孝乾（台中）、莊泗川（台南）、彭華英（台中）、楊良（新竹）、潘欽信（台北）、吳廷輝（新竹）、洪石柱（高雄）、黃運元（新竹）。

以上以地區觀之，則台北、苗栗、彰化、屏東、基隆等地歸急進派之手，而台中、霧峯、台南、高雄等地則屬穩健派；大略言之似可謂為北方急進、南方穩健（註

一一二)。

以上所述係日本警方對台灣文化協會活躍人物的觀察研判，賴和之名，未在其中，但正如前文分析，賴和起先以蔣渭水的推薦，擔任文協理事，長期於彰化支部後援文協的活動；並與王敏川因地緣關係是多年的知友，彼此互相影響；與賴和在文化協會分裂後，同時隸屬於新文協與民衆黨的邱德金亦是被認為急進派，因之賴和的政治觀，如同蔣渭水、王敏川、邱德金同屬於民族自決主義者而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註一一三）。

文化協會既有穩健與急進之兩大派別，統治者當局在文協分裂之際，亦有一套分化、破壞的策略，並充分體認「若經外部施加壓迫，反使內部團結堅固，故寧可使內部起內訌，造成潰裂為良策」（註一二四），因之對穩健派給予援助及善導。使轉向爭取參政權運動；策劃使急進分子之間亦生分裂，以及在嚴密監視之下，令急進分子左傾至社會輿論不容之地步，然後採取最後手段，下令禁止（註一二五）。觀察爾後新文協會員對於台灣民衆黨的挑釁，一九二九年底新文協的再分裂；以及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從台灣民衆黨撤退出來，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事，正是一步步走向「文化協會對策」一文中擬定的方案。激進派與穩健派各自

分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是台灣政治運動力量的分散；左右兩極化愈趨嚴重，相互不容，殖民統治者更可以兩害相權取其輕，導向無法動搖其統治基盤的一方。一九二〇年代後期以迄三〇年代中期，台灣的政治運動比起文化協會分裂之前，更見蓬勃，且一九二八年四月台灣共產黨成立之後，在台灣的地下活動也次第展開，又以再次分裂的新文協爲外圍團體，加強農工運動，但終究被鎮壓下去。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台灣更被軍司令部強制禁止所謂「非國民之言動」，唯一存在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被強制解散。

回觀在文化協會分裂之初，賴和同時屬於新文協與台灣民衆黨，而兩方也都接納，顯得別具意義。從他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全程加以觀察，賴和最大的成就在新文學運動方面，對於文化的啓蒙盡了全力；而他的文學之所以顯得突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與台灣的現實社會緊密連結，表現了殖民地的抗議之聲；這又跟他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有密切的關連，然而賴和不必以政治爲「職業」，也不必在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這使得他具有彈性，包容力也較大，換言之，主要敵人是異民族的日本統治者，一味強調被支配民族的「左」、「右」之分，反而容易分散抗爭的力量；文協彰化支部是最激進的地區，賴和在當地具有影響力，新文協與民衆

黨的對立，賴和橫跨其間，具有調和的作用。《台灣民報》一九二七年有一則民衆黨八月三十一日在彰化開政談演說會的報導。午間黃周、盧丙丁，相繼演講，被下令中止，而蔡培火講演時，「反對派的揶揄之聲漸起，但蔡在以極熱誠的態度對付，以致聽衆大表同情，以聽衆之力壓制了反對者的騷擾」（註一二六）；晚間邱德金、韓石泉、蔣渭水相繼演說，賴和於閉會時致詞，晚間的演說「反對者銷聲匿跡，收了很好的成績」（註一二七）；在彰化新文協與民衆黨彼此攻擊激烈（註一二八），賴和儘量減少了左右兩派不必要的纏鬥。

可以拿來做爲對比的是被目爲穩健派的蔡培火台南一派。在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的文協大會上，以舊日關係被舉爲臨時中央委員，「既刻聲明絕對辭退不受」（註一二九），但仍具有會員及舊幹事身分，在他領導下的台南支部，文協舊幹部於十月一日寄出〈脫離文化協會聲明書〉聲稱：

彼等如此行爲只有破壞共同戰線，而招專制政府與壓迫階級之侮蔑，彼等行爲是誠何心，我等深信同胞之勤敵實係專制政府壓迫階級，御用劣紳與走狗。而今新文化協會一派高唱階級鬭爭，否認人道，所行莫非破壞從來之事業，而反對吾人之主張，鼓勵同胞相殘，使

漁夫得利，於此彼等若不痛改前非，我等斷難再與共事，是故脫離一切關係，使彼等肆行其志，我等亦行我等所是，於茲組織台灣民衆黨，力爭台灣民衆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註一三〇)

站在右派觀點，與左派水火不容；而曾任專務理事與台灣文化協會關係特別密切的蔡培火，抱持「文化協會這個好名我是愛護到底，所以別的舊同志，雖然很多退會了，我也不甘脫離」(註一三一)，在左右鬭爭激烈的情況下，終於被台灣文化協會臨時委員會以懲戒委員會的名義，在十月六日發出〈除名通知書〉，將蔡培火除名了(註一三二)。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新文協於台中召開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一百十七名，宣言書中強調「文協願永遠爲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戰鬭團體」(註一三三)；取消林獻堂先前提出的「文化協會不涉及政治」的備忘錄，以及組織台灣民報不買同盟等等。

這次大會，有關賴和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剛於七月十五日與其四弟賴通堯結婚的劉素蘭(註一三四)，擔任中央委員，並主持婦女部(註一三五)。劉素蘭畢業於彰化

女中，在這之前並沒有政治活動的記錄，與賴通堯結婚之後，寄籍賴和同一戶籍內。知友王敏川則主持宣傳部。以此推理，賴和身兼民衆黨，可能有感不宜直接介入新文協太深，而以賴通堯、劉素蘭爲其代言人，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新文協被禁，賴和是新文協的代表員（評議員）。

一九二七年是台灣從文化運動轉入以政治運動爲主體的一年；中國大陸國共合作失敗，導致分裂的現象，也影響到以漢民族爲主體的台灣。當時台灣的政治運動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推進民族運動，一派強調謀求台灣人的解放，應以社會主義的階級鬭爭爲主體。以文化協會分裂的要角連溫卿當時的看法，他從左翼觀點認爲：

前者的主張，是以少數的利害關係爲根本要求，所以和當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吻合一致，其限界是止於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援言之，他們所主張的是以設立台灣議會爲其極限。又後者所主張的，因爲是以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爲其目的，……於是民族主義者全部總退卻，結集其勢力，組織台灣民衆黨，來跟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註一三六）

就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與台南支部比較而言，向來在日本統治者的眼中就有急進

與穩健之分；分裂之後的結果，台南原文協的幹部、會員退會的退會，除名的除名，轉入台灣民衆黨繼續貫徹原有的理念；賴和原是負責彰化支部的文協理事，在時代思潮的衝激與王敏川的影響下，任新文協臨時中央委員，也同時加入台灣民衆黨，由於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沒有往左翼路線急速分化而去，但亦不完全排斥社會主義的觀點，故能容納左翼運動。在當年的政治運動者不一定能充分警覺除了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峙之外，總督府也利用時勢暗中採取一套分化策略，賴和不完全受意識形態的支配，同屬於新文協與民衆黨，以他在彰化地區的影響力，無形中有了消弭總督府官方的分化策略之作用。

## 附註

註六四：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台北，台灣新民報社，一九三一年一月），頁三八。

註六五：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一百卅八號，頁一二；及參見《台灣社會運動

史》，《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頁三二四。

註六六：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三二七—三三三。

註六七：〈文協理事會議〉，《台灣民報》一百七號，頁五—六。

註六八：同上註。漢文委員為林幼春、林伯廷、王敏川、洪石柱、蔣渭水等五人；羅馬字委員為蔡培火、

陳逢源、謝春木等三人。

註六九：〈赴會〉，全集，頁三一四。其中民族意識「族」字誤植為「衆」字。

註七〇：同上註，頁三一—二。

註七一：同註六九，頁三一—四。

註七二：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一九七。

註七三：祖賴知、父賴天送，以及出生即因迷信送給彰化廖姓人家的賴和胞弟葵冬，戶籍名廖棟，成年

後亦隨生父天送學做道士。採訪自賴和哲嗣賴榮及廖棟外孫施俊吉。

註七四：〈大人五十一生日奉詩稱慶〉，全集三九〇。

註七五：六甲土地皆在市子尾一帶，採訪賴榮所得。

註七六：同註六九，頁三一—五。

註七七：同註六七，頁五。

註七八：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年譜》（台中，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該相片說明標



識：民國十五年於霧峯攝影。

註七九：〈「台灣民眾黨」出現〉，《台灣民報》一百六十六號，頁四。蔣渭水在會議中談及：「左右的分裂，是政府所喜歡的，今更要使之分爲右之左及右之右」，蔣渭水具有政治運動者之敏感，似已看出總督府的分化策略。

註八〇：《台灣民報》一百八號，頁三。

註八一：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一四〇。

註八二：《台灣民報》一百九號，頁二。

註八三：原刊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號《改造》，《台灣民報》刊出時副題：在「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和政策」下的台灣。

註八四：《台灣民報》一百十五號，頁九。

註八五：參見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及文集》（台北，中研院三研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二八六—七。

註八六：〈文協第六回總會概況〉，《台灣民報》，頁八。

註八七：謝春木《台灣人的要求》，頁三九。

註八八：《台灣民報》，一百卅二號，頁三。

註八九：同上註，頁五。

註九〇：參見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北，自印，一九七六年九月），頁九九。

註九一：《台灣民報》一百卅八號。三篇文章在這期新年號中佔了首要的篇幅。

註九二：〈文協會則大改〉，《台灣民報》一百四十一號，頁五—六。

註九三：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一六一。

註九四：同上註。

註九五：出席人員數目不一，《台灣民報》一百四十一號報導：「到會會員一百數十人」，頁七；葉榮鐘

於《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共一百三十三人，頁三四〇；連溫卿於《台灣政治運動史》則云一百九十名，頁一六三。葉與連兩人的數目差距，可能牽涉部分會員的入會資格鑑定問題。

註九六：《台灣民報》，一百四十一號，頁八。

註九七：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三四〇。

註九八：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頁一六三。

註九九：《台灣民報》一百廿一號，頁七。

註一〇〇：同上註。

註一〇一：賴和在《獄中日記》中云：「我的穿台灣服也是在開業後就穿起來，純然是爲着省便利的起

見，沒有參合什麼思想在內。」人在獄中，不能不這樣寫，其實正如王詩琅所言確有台灣精神的存在。參見全集，頁二八七—八。

註一〇二：參見拙著〈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二小節「民族意識與復元會」；另賴和所屬的彰化台灣人醫師會給總督的建議書竟亦以西元紀年。〈彰化醫師會為總督乞建議書〉，《台灣民報》，三百一號，頁一〇。

註一〇三：於彰化採訪吳石麟之子吳開第所得。

註一〇四：王敏川、賴和、施至善三人，被稱之為「彰化三支柱」，三人決心實質上成爲義兄弟，王敏川女兒嫁賴和三弟，施至善大女兒嫁王敏川長男，因其時賴和兒女年幼。託李篤恭於彰化採訪所得。

註一〇五：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三四一。

註一〇六：〈轉換時期的文化運動(二)〉，《台灣民報》一百四十三號，頁一一。

註一〇七：〈轉換時期的文化運動(三)〉，《台灣民報》一百四十四號，頁七。

註一〇八：〈文協改組後的分化〉，《台灣民報》一百四十六號，頁六。

註一〇九：〈台灣自治會將出現〉，同上註。

註一一〇：〈文協真分裂了〉，《台灣民報》一百五十五號，頁一三。

註一一一：〈新出現的台政革新會〉，《台灣民報》一百五十八號，頁八。

註一一二：〈台灣唯一的政治結社台灣民黨〉，《台灣民報》一百六十一號，頁六。

註一一三：同上註，頁八。

註一一四：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頁二二八。

註一一五：〈台灣民衆黨的出現〉，《台灣民報》一百六十六號，頁五。

註一一六：〈民衆黨的政聲第一談〉，《台灣民報》一百六十七號，頁四。

註一一七：參見連溫卿〈分裂後之潮流〉，《台灣政治運動史》，頁一七八。

註一一八：副題：國民黨分左右派，文協也分左右派，《台灣民報》一百五十七號，頁二。

註一一九：蔣渭水〈對台灣農民組合聲明書的聲明〉，《台灣民報》一百六十一號，頁一四。

註一二〇：若林正文〈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東京，

龍溪書舍，一九七八年四月）。

註一二一：參見若林正文前揭「文化協會對策」，頁一五九。

註一二二：參見若林正文前揭「文化協會對策」，頁一六四。

註一二三：參見若林正文前揭「文化協會對策」，一六五。

註一二四：同上註。

註一二五：參見若林正文前揭「文化協會對策」，一六六。

註一二六：〈民衆黨在彰化開政談演說會〉，《台灣民報》一百七十三號，頁四。

註一二七：同上註。

註一二八：〈兩派的傳單戰〉，《台灣民報》一百七十三號，頁六。

註一二九：〈文協會則大改〉，《台灣民報》一百四十一號，頁八。

註一三〇：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三四八。

註一三一：〈被文協除名的蔡培火氏談〉，《台灣民報》一百七十八號，頁七。

註一三二：同上註。

註一三三：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三六一。

註一三四：賴和家族戶口名簿登載。賴通堯係賴和堂弟，按家族大排行，賴和向來稱之四弟。

註一三五：第一回全島代表大會所決定，參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三六七—八。

註一三六：連溫卿〈一九二七年的台灣〉，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三五八—九。

#### 四、分裂再分裂的年代

一九二七年元月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形成左翼佔領文化協會，右翼則退出另組織台灣民衆黨的態勢。當時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則呈現恰好相反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二月，新文協臨時中央委員鄭明祿、王敏川、王萬得……等人從台灣民報社退出來。舊有關係者掌握住《台灣民報》，形同民衆黨的機關報，再分裂之後，則屬於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註一三七），這和出資者主要是地主階級有不可分的關聯。在思想、路線激烈衝突的時候，掌握言論機關，必然居於較有利的地位，這從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新文協召開「一大」，決議之一，「組織台灣民報不買同盟」，此一事實可清楚的呈現出文協分裂之後，《台灣民報》雖然兩派的消息都加以報導，但無疑較偏重台灣民衆黨。

《台灣民報》的前身是《台灣青年》、《台灣》，原先「不過是一群知識青年的思想表達的機關而已，還沒有普遍報導的機能」（註一三八），但自改組為《台灣民報》之後，由半月刊、旬刊，而至週刊，一九二五年八月廿六日第六十七期，發行「創

立五週年，發行一萬部」的臨時增刊紀念號，標示了《台灣民報》的成長及在輿論界的重要地位（註一三九）。以後發行份數迭有增加，爲了更擴大影響力，從東京遷回台灣島內發行，成爲民報努力的方針之一，但是直到文化協會分裂之前，一直不被台灣總督府允許，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台灣民衆黨成立之後，才於七月十六日得到總督府允准在台灣島內印行。此一事實，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向來認爲這是蔡培火與當時警務局保安課長小林光政折衝的結果（註一四〇）。其實並不然，從上節引述的台灣總督府秘書文書〈文化協會對策〉的脈絡來加以觀察，這正是總督府適時採行的分化策略，以加入日文報導做爲遷移台灣島內的條件，僅是表面的理由，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右翼的穩健派來打擊左翼的急進派，質言之，台灣總督府以「恩賜放寬」的姿態（註一四一）來遂行其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

《台灣民報》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林幼春爲發行人，社址設在台北市下奎府町（今南京西路），發行第一百六十七號。當期的社論〈民報的轉機〉，樂觀的認爲，這是「台灣統治方針更新的暗示」，結論是：

試看古今東西的各國殖民地統治史的歸結，同化是滅族政策的假面具，自治是共存共榮

的秘訣方，鐵證昭然，不容強辯。向來日本的政治家，都是沒有經營殖民地的經驗，所以往往有妄想實行強制同化盡量榨取的政策。然而近來內外的情勢日變，階級鬥爭的鬧鼓亂打，民族運動的警鐘大敲，若一失了足，必遭千古之恨。況且在日本內地已定實施普通選舉，無產階級也已經起來活動，而提倡制定台灣憲法的聲浪，在政界上也已日高一日了。當此時局轉變之秋，雖是在此孤小的島地，當局已經順應時勢，而容認民報在島內自由議論了。（註一四二）

社論中雖將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並列，但無疑也暗示《台灣民報》將立在穩健的立場；此在同一期中《和文民報發刊之際》一文裡，更可以觀察出來：

本報做爲嚴正的台灣言論機關，務必基於台灣全住民的總意，反映出真正的輿論。因之，台灣四百萬住民中包含十八萬以上的內地人，必要認定相互之間意思之傳達。（註一四三）

當然就《台灣民報》而言，亦可以說是基於本身策略的需要，但是既須遷就台灣總督府的政策，言論亦難免相形矮化。由這些背景，再來看蔡培火在《民報島內



發刊所感》一文，歷數在內田總督時，請求許可在台灣發行，「不但不肯取睬，將我們同志一拼（併）都拋下獄去了。以後經過伊澤總督，眾同志輪流參香不斷地披誠懇請，總都是像對石頭公說話」（註一四四）的現象，何以在上山滿之進總督任內，就在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台灣民衆黨成立之初，突然「恩賜」《台灣民報》准於在台灣島內發行，其中實含有統治當局有意因勢利導，以打擊台灣左翼運動的策略在內。

彰化醫師，也是文協分裂之後，台灣民衆黨的幹部林篤勳，在《台灣民報》於島內發行時，曾有詩云：

在京忍過七年間，論及強權心就寒。

當局良心雖出現，發刊豈是無刁難。（註一四五）

林篤勳亦是從台灣總督府良心出現的觀點來看，這反應當時多數人，並不能充分明瞭統治當局的分化策略，賴和在後來紀念民報十週年的文章中，曾敏銳的感受到背後的陰謀，語重心長的指出：

民報還未移入台灣以前，我們民衆運動的主體的台灣文化協會，已經就發生了左右派的分裂了。文協的分裂和民報移入台灣，表面上雖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民衆那裡不會懷疑呢？以前是受全民所信賴所擁護的我們的先鋒，更（竟）然受了一部民衆的懷疑了；……現在民衆所缺乏的，已經不是訴苦的哀韻，所要求的是能夠促進他們的行進的歌曲，民報呀！我們唯一的言論機關的民報，血管裡過去豈不是會流著紅的血嗎？切不可這些被懷疑，而丟棄了一切的歷史的使命要緊呀！（註一四六）

這是《台灣民報》移入台灣發行三年後，賴和對民報的由衷期待，期待民報是「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也可看出《台灣民報》遷移之初，表面上看似與文協分裂無關聯的兩件事，當時已有包括賴和的一些人，覺得背後並不單純。雖然並未明言後出於台灣總督府的分化策略，但對照史實，正是分化策略的大勢所趨。

一九二七年八月《台灣民報》正式遷入島內發行，正好陷入台灣總督府的既定分化策略，在檢閱制度下對統治當局不利的言論，隨時被挖空，形成砌磚式的文章，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五日蔣渭水的〈北署遊記（三）〉，整個被拿掉即是一例（註一四七）；一九二八年十月廿一日的報導，整頁被挖空，更是赤裸裸的顯示出對言論的壓

制（註一四八）；另一方面，《台灣民報》批判左翼運動的文字恆常存在，無形中造成左翼是專門捏造謠言的「造謠派社會運動家」之印象（註一四九）。在這種情況下，極不利於分裂後新文協的活動，左翼在沒有宣傳機關的情況下，先是有「一大」組織民報不買同盟的決議，爾後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廿五日新文協核心幹部，集資二萬圓，創立「株式會社大眾時報社」，林碧梧任社長，王敏川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張信義、邱德金、黃信國、楊老居、莊孟侯任取締役（理事），張喬蔭、林三奇、賴和、吳石麟、莊泗川任監查役（監事），陳崑崙、陳培初、李文彬、洪石柱、楊耀南、林德旺、陳耀恭、陳寄生、蔡孝乾、鄭明祿、王禮明、林冬桂、方泉松、連溫卿任相談役（顧問），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申請，結果不准，在此情勢之下，新文協派遣王敏川、洪石柱、吳石麟等人前往東京籌備發刊，任命蘇新為編輯發行兼印刷人，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發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註一五〇）。

《台灣大眾時報》社務編制如下：

編輯部主任王敏川，記者蔡孝乾、李曉芳、莊泗川；囑托（特約）記者：翁水藻——即翁澤生（駐中華）、蘇新（駐東京）、楊貴、賴和、莊孟侯（註一五一）；營業部主任連溫卿（兼記者），外務吳石麟，計算（會計）陳玉瑛，發送陳總，台南支局主

任洪石柱（註一五二）。

《台灣大眾時報》是新文協掌握的宣傳機關，具有與台灣民眾黨掌握《台灣民報》相抗衡的作用。從投資者及實際運營刊物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賴和均列名其中，充分顯示在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左翼運動中，他亦是出錢出力的人士之一。

《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撰寫者及編目如下：

創刊辭

祝創刊

布施辰治 對於大眾時報之使命的希望

楊 貴 當面的國際情勢

蔡孝乾 日本普通選舉制的批判

連溫卿 台灣社會運動概觀

莊泗川 台灣婦女的運動

迎 紅 台灣智識界婦女的使命

洪石柱 日本社會運動與無產政黨

黃石輝 中國革命的前途

賴和 前進

(註一五三)

九篇具名文章，論及日本、台灣、中國及國際情勢，涵蓋社會運動與婦女運動。除了賴和的〈前進〉一文，以象徵性的文學手法表現之外，其餘皆直接呈現左翼觀點。

列名慶祝《台灣大眾時報》創刊的團體，共計有三十五團體，以性質而論包括如下：

本部：台灣農民組合、舊勞働農民黨（日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無產青年會、勞働組合統一同盟（日本）、日本俸給者組合評議會、在日本朝鮮勞働總同盟、在日本朝鮮青年同盟、朝鮮新幹會、檢閱制度改正期成同盟（日本）、在東京台灣青年會、自由法曹團（日本）。

報社：勞働新聞社（日本）、無產者新聞社（日本）。

工會：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基隆工業協議會、彰化總工會。

研究會：東京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東京磺溪會、東京義華會、台南新人研究會。

讀書會：羅東、苑裡、台中、豐原、彰化、北港、朴子、嘉義及台南無產者讀書會。

婦女會：台灣婦女協進會。

文藝團體：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日本)台灣文運革新會、彰化新劇社、屏東礪社(註一五四)。

除了文化協會本部及日本的團體之外，台灣農民組合、工會、研究會、青年讀書會、婦女會、文藝團體，皆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以前文協所影響或掌握的急進派力量，以此據點，新文協透過本身的各地支部，展開左翼運動。

〈創刊辭〉文末署名「敏」，當是王敏川的論著。文中首先說明殖民地被剝削的現象：

現時所謂世界強大國，對於殖民地，概是重視其財源，不甘放棄。由其國的資本家，藉強權的護符，於商業方面，盡量輸入其過剩商品，壟斷市場；工業方面，利用低廉原料品，和工資的供給，便可自由在殖民地製造商品，財政方面，建立銀行，以操縱金融，發行鈔票，以增大資本的流動，其他還有種種的權利，皆入帝國主義的掌握，這都是填滿了資本家的財囊，致使殖民眾窮苦得不堪，因此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便不斷地而進展起來了(註一五五)。

王敏川由這觀點來闡釋左翼運動的正當性，並且強調台灣的情勢已經由「少數的紳士閥運動，而進展到大眾運動」，由是申明《台灣大眾時報》，「不僅要做政治的指導者，而且要做大眾的組織者，是要擁護全台灣民衆的利益。」（註一五六）

王敏川的觀點，在台灣文化協會本部的〈祝發刊〉一文中呈現得更淺白清楚：

在這時候，我們若非自造成力量，大家去鬥爭，獲得完全的解放，只放任數個資本主義的紳士閥，向支配階級去哀願妥協，做了資產階級本位的民族運動，要望享甚麼幸福，這不過是一場笑話吧了！（註一五七）。

新文協認為台灣民衆黨從事的是資產階級本位的民族運動，或亦有爭辯的餘地，然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強調左翼的階級運動，必然遭受更大的鎮壓，這是毫無疑義的。舊勞農黨顧問布施辰治(Fuse Tatsuji)在〈對於大眾時報之使命的希望〉一文中，除了祝賀《台灣大眾時報》的創刊之外，亦說到「恐遭發禁的彈壓致其武器被奪去」，布施辰治強調云：

在近來反動的支配階級更露骨地發揮言論壓迫的專制暴威之下，要完成解放運動之武器的《大眾時報》的使命，怕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願同志諸君有必死的覺悟吧！（註一五八）

《台灣大眾時報》的言論充滿了戰鬥性，因此，賴和的〈前進〉一文，在創刊號中顯得相當特殊，因全文並未從左翼的觀點著手，他只是從文學家的有感時代的變化，以象徵手法，表現出文化協會分裂之際的內在感受。（註一五九）賴和以兩兄弟的暗夜行路，來象徵分裂後的新文協與民衆黨，主觀上希望左右派能像兄弟般扶持前進，這是他同跨新文協與民衆黨的內在心靈的投影。在「駭人的黑暗」又有重重的阻礙之下前進，終於累倒了，「黑暗的氣氛愈加濃厚起來，把他們埋沒在可怖的黑暗之下」，象徵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左右兩翼的運動，歷經各種努力，仍然無法掙脫出殖民地的黑暗歷史。最後的情況是其中「受到較多的勞苦的一人」，在黎明之前兀自起來趕路前進：

此刻，他纔感覺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惶惶回顧，看見映



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跟來！趕快！（註一六〇）

賴和這樣的描寫，又是發表在左翼的《台灣大眾時報》，其暗喻不難理解，尤其文中提到在起來趕路之前，感覺「大自然已盡改觀」，何嘗不是世界觀改變之後所感受的現象。當其中一人呼喊著「跟來！趕快」，正反映跨在新文協與台灣民眾黨的賴和，在心靈深處，希望在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兩派能夠步履一致。然則在時代思潮衝擊之下，「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前進！向著不知到著處的路上。……」（註一六一）顯現著賴和前進的決心。

賴和以如詩的散文，反映了他一九二七——二八年間的心靈世界，〈前進〉的標題也點明了賴和在時代的挑戰下，從未落伍下來。在此觀點之下，〈前進〉不僅是一篇文學作品而已，是文協分裂後賴和心靈的告白。

在考察賴和此一階段所處的位置，尚可透過同一戶籍的四弟賴通堯以從側面了解。曾受其支援前往日本留學的賴通堯，一九二七年從日本大學中途退學回來，在警察當局的記錄是新文協的有力會員並是彰化新劇團的代表人，新婚的太太劉素蘭

則是新文協的中央委員，並主持婦女部（註一六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時，賴通堯是無產青年的代表（註一六三）；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新文協系台中總工會成立，賴通堯是主要役員之一（註一六四）。凡此皆顯示賴和是有其潛在的影響力，賴和參與《台灣大眾時報》，更是充分印證他與新文協關係密切。

《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在日本已通過官方的納本檢閱，五月十七日由王敏川帶回台灣（註一六五），但十三日台灣支局早已收到總督府當局的查扣命令：「因創刊號有妨害治安，所以禁止分布並押收」，還是王敏川、連溫卿屢次到警務局去抗議、交涉，才取消查扣的命令，但是內容還是再次遭到檢閱、割削：

對於創刊號裡的所謂不妥（？）的文字盡被割削了。創刊號二十四頁之中，被蹂躪的地方共七處、三頁餘，被蹂躪的本報創刊號到讀者手裡的時候只是剩（剩——漏印）些骸骨罷了。（註一六六）

此一事實，足以顯現總督府當局對《台灣大眾時報》的敵意，相對而言，即是新文

協系統的《台灣大眾時報》，比之同一時期的《台灣民報》言論更見激烈。

《台灣大眾時報》除一至三號，刊有作者姓名之外，其餘以新聞記事及時事評論佔絕大多數，並以戰鬥的姿態，面向統治者，第七號有〈我們的戰鬥的政治新聞〉之報導：

爲要徹底的和一切的腐敗政治戰鬥，以完成戰鬥的政治新聞的使命！全被壓迫大眾  
啊！死守我們的戰鬥的政治新聞——大眾時報！（註一六七）

鼓吹各地的讀者發起愛讀同盟，但也由於《台灣大眾時報》正面相抗的政治態度，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行的第八號，在東京即遭查禁（註一六八）；七月九日發行第十號後，未經預示而終告停刊，前後僅歷時兩個月而已。新文協失掉刊物之後，只能在台灣各地借著演講會展開運動，還是有賴於《台灣民報》的報導。

賴和同時在新文協與台灣民衆黨兩方活動，這說明了基本上他是個文化人，而非受意識形態支配的政治人，故能支持所有與統治者相抗的力量；另一方面，由於是未具鮮明色彩的地方潛在影響者，故也同時爲兩方所接受。他參與創辦《台灣大

衆時報》，呈現了與時俱進的性格，發表的〈前進〉一文，則在觀察他的政治路線方面，顯得特別重要。尤其與王敏川同列名於《台灣大眾時報》，顯示兩人關係確是密切，這與一九三〇——三一年新文協的再分裂，賴和偏向王敏川的立場，是有著決定性的關聯。質言之，在整個台灣文化協會的十年歷程中，文化人賴和的政治傾向比較接近王敏川。

賴和比王敏川小六歲，一九〇九年賴和考進總督府醫學校，同年王敏川回到賴和的母校彰化第一公學校（今中山國民小學）任教。賴和向來敬重王敏川，爾後王敏川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期間，彼此亦有書信往來。兩人之間的情誼，在賴和寫於一九二〇年的〈書答敏川先生〉一詩中，表現極爲真切。詩云：

幼年失學壯何知，有負先生賞識之。  
未是駑駘甘戀棧，鷺門一蹶力猶疲。  
已覺人間無賞音，逢君燃起未灰心。  
感恩重滴兒時淚，愛我情殷望我深。  
往哲名言實可懷，人生心死最堪哀。

方今社會無思想，專賴先生改造來。（註一六九）

此詩的內容，表現了賴和從廈門博愛醫院掛冠歸來，灰心喪志之時，得到王敏川的鼓勵，故有「已覺人間無賞音，逢君燃起未灰心」之言，詩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方今社會無思想，專賴先生改造來」一句。王敏川留學早稻田大學政經科，一九二〇年加入新民會，七月十六日《台灣青年》創刊時即列名其中，是台灣的先覺者之一（註一七〇）。

王敏川在早大求學階段，深受社會主義的洗禮，爾後其思想接近日本左翼社會運動理論家福本和夫(Fukumoto Kazuo)的理論，亦即福本主義之影響；新文協另一主導人物連溫卿則師法另一理論家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此則山川主義。山川均在日本共產黨於一九二三年六月遭到大檢舉之後，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無條件的移植於日本，且日本資本主義正在發展中，革命的情勢尚未成熟，在現階段不必以非法的共產黨來秘密活動，必須以合法的「無產政黨」來結合一般社會大眾，從事於反資本主義鬥爭，山川均的看法，發展成爲日本勞農派的指導理論（註一七一）；福本和夫的理論，概言之，是將左翼運動斷然分爲三個階段：一、經濟主義

性的工會運動。二、工會主義性的政治鬥爭。三、社會主義性的政治鬥爭。針對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依福本的看法是從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的過渡期。因此，勞動階級必須跨躍其自身之意識，朝無產階級意識發展轉化，而革命的知識份子，必要以戰鬥的唯物論，真實的集合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由是強調在結合革命的知識分子之前，非先要徹底清除搖搖分子不可，此即「分離結合理論」（註一七二）。

山川與福本的論戰，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起在山川均主辦的《馬克思主義》月刊展開激烈的理論鬥爭，福本主義較受革命知識份子的歡迎，因此佔於優勢。一九二八年以後，山川均離開日共，以勞農派的中心理論家，依然活躍於左翼運動的陣營裏。（註一七三）。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理論鬥爭，延續到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則成為王敏川與連溫卿的路線之爭，也因為山川主義在日本的失勢，影響連溫卿在新文協的地位。

另一方面，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以蔣渭水為核心的台灣民眾黨，雖標榜民族運動，在時代思潮的刺激之下，亦不能不面對階級運動的問題。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於新竹召開臨時中央委員會議，關於階級問題的態度，決議六項，其中二、五列之如下：

二、擁護農工階級就是階級運動之實行。

五、本黨要顧慮農工階級之利益，加以合理的階級調節，使之不致妨害全民（民族）運動之前進（註一七四）。

因之，亦十分重視工人運動，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在蔣渭水的運作下，以南京總工會為藍本，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註一七五）。

新文協爲了與台灣民衆黨爭奪工人運動的主導權，六月，連溫卿主張以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爲基礎，成立左翼的台灣總工會，王敏川則提案成立台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票決之結果，連案失敗，王案根據的理由如下：

一、對於勞動者而言，並無左翼、右翼之分，他們對資本家都具有同樣的利害關係。所以，在左翼、右翼工會統一之前，僅僅結合左翼工會，自然會使左、右兩翼的對立尖銳化，並導致不可能統一。

二、全島單一工會（左右工會之會合），非經長期的鬥爭不可。因此，立即結合成左翼總工會（左翼的全島工會），不會有真正的群衆基礎，結果僅是勉強將幹部湊合在一起而已。

三、雙重工會主義在國際上已決定是謬誤之舉。

四、左翼（工會）的全島結成，僅是反動派連溫卿的主張，絕不可行（註一七六）。王敏川與連溫卿兩派的鬥爭，除了路線之爭外，其實內在主要是爭奪新文協的領導權。尤其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於上海法租界成立之後，台共成員謝雪紅、林日高、吳拱照……，返台後，進入新文協，環繞在王敏川周圍，形成「上大派」，對抗受山川主義影響以連溫卿為首的「非上大派」。台灣共產黨成立時，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台共的〈政治綱領〉裡，針對新文協即有如下的策略：

現在必須先利用文化協會，使其成為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即一方面先克服文協的幼稚病，拉攏工農先進份子及青年加入文協；同時又須極力暴露民衆黨的欺瞞政策，使其領導下的群眾逐漸左傾，再將文協變成革命的聯合陣線之中心，當到達一定期間內，把新文協改造為大眾黨。（註一七七）

當時台共的策略，新文協的中心人物王敏川、連溫卿本身並非台共成員，無從知悉，新文協路線之爭，由於台共的介入，就越形表面化了，上述關於成立工會的爭議，



導致新文協台北特別支部（連溫卿派）與中央本部（王敏川派）的對峙。

一九二八年九月王敏川與連溫卿因指導反對台南墓地移轉事件，同被日警拘捕（註一七八），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始被保釋出獄（註一七九）；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新文協於台中醉月樓召開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因王、連兩人皆被拘於台南刑務所，並未處理兩派間的爭議。

新文協「二大」更見急進的左傾色彩，會旗是「星章中有鐮刀和槌子交叉，現出於紅地的一端，因事先被禁止使用，故被沒收」（註一八〇）。大會於下午八時二十分被日警命令解散。因議案審議未完，又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在文協本部召開中央委員會，推楊貴為議長、林冬桂為書記，其中關於文化協會的本質決議如下：

並非大眾黨組織。雖是思想團體，仍與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有關。屬於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團體。（註一八一）

新文協於「二大」之後，曾整理會籍，原先有會員一〇三三名，停止資格者一五五人，脫會者二〇六人，新加入五人，現有會員六七七人；以賴和所屬的彰化支部而

言，原有會員一一六人，停止資格者三一人，脫會者二〇人，現有會員六五人。（註一八二）對於會籍的整理，是「分離結合理論」的實踐。

賴和在一九二八年底，新文協調查專業從事文化協會運動者名單中並未列名，其居於同一戶籍的四弟賴通堯則是台中州十八名中的一人（註一八三），但賴和保有新文協的會籍，則是可以確定。在新文協史上具關鍵性地位的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於彰化街的彰化座召開，楊老居任議長，賴和任副議長。「三大」中議決再次發刊《台灣大眾時報》，並通過抗議連溫卿反動案，除名與否，在大會中經過論戰，尚無結果（註一八四），通過修訂台灣文化協會會則，其綱領揭示：

五）我們要糾合無產大眾，參加大眾運動，以期獲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自由。（註一八

在新文協「三大」之前，《台灣民報》於十月六日的報導中已有「全島大會前的文協的風雲，反幹部派謀退會」（註一八六）之報導，反映王敏川、連溫卿兩派鬥爭相當激

烈，「三大」雖未解決，緊接著十二月十九、二十日兩天新文協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連溫卿就被開除會籍了，其情形就如同一九二八年六月，簡吉與楊貴爭奪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一般，楊貴亦遭到開除（註一八七）。在新文協中，連溫卿與楊貴是被歸之為連楊反幹部派的。

這種派系間的鬥爭，並未影響賴和與楊貴的關係。賴和對於後輩的楊貴向來極為照顧，一九二八年楊貴於彰化組織讀書會時，與葉陶同居，其位於賴和住宅附近的居所，即是賴和為他尋找的，楊貴並以賴和醫院為聯絡的中心；一九三二年楊貴的成名作〈新聞配達夫〉，經由賴和的介紹發表於《台灣新民報》，筆名楊達即是賴和所取；一九三五年底楊達翻譯賴和的作品〈豐作〉為日文，取代原先預刊的自己作品〈蕃仔雞〉，刊於一九三六年日本的《文學案內》新年號「朝鮮·台灣·中國新銳作家集」，作為台灣作家的代表作（註一八八），並未因楊貴是屬於連、楊一派而有所影響。此亦側面說明了文化人比起政治人物，較能超越教條，而具有更彈性的空間。

賴和在社會運動中，始終與時俱進，但也保持舊有的關係，一九二九年一月廿七日，他初任台灣新民報社相談役（最高顧問）（註一八九）；一九三〇年八月，左翼的《台灣戰線》發行，賴和與謝雪紅、楊克培、郭德金均列名其中（註一九〇）；同一

月分，被聘為《台灣新民報》客員，主持文藝欄（註一九一）；九月，參與《現代生活》創刊事宜（註一九二）；從這些文化活動，可以觀察出賴和堅定的反日立場，獲得不同派別的人同時接受；另一方面，日本警方也視賴和為打擊的對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新文協彰化支部舉辦「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全島巡迴講演會」，賴和醫院就遭到日警搜查（註一九三），可見在警方當局，賴和始終是個危險人物。

一九三一年台灣政治運動風起雲湧，新文協的機關刊物，《新台灣大眾時報》經過籌畫，決定在東京印行。這是一九二九年新文協在「三大」中的決議。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一日，張信義與賴通堯由基隆啓程前往東京，於東京市郊外代木上原設置新台灣大眾時報社事務所，透過布施辰治的介紹，時常出入於法律戰線社、產業勞動時報社、戰旗社，謀與東京左派份子取得連絡。（註一九四）

一九三一年一月四日，新文協於彰化街的彰化座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七十七人，旁聽者一百餘人，「四大」是新文協的再一次轉向，對「三大」的綱領再加以批判，強調：

小資產階級層要徹底的解放，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是不可能，要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

才能達到其解放，而且應該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不會阻礙無產階級的運動，……否則其獨自的發展，不但沒有利于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反而漸次對立無產階級的運動，或陷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泥濘（註一九五）。

「四大」王敏川當選中央委員長，並決議以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改組的日期，做爲「文協節」。在〈紀念我們的文協節〉傳單中云：

我們的解放運動變爲國際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一個關連的現在，左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更愈意識的反動化，台灣民衆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的反動團體，則以台灣議會請願、台灣地方自治等，更露骨地欲欺騙擴大的工農、無產市民、青年學生，永遠（做）資本主（誤爲生）義社會的奴隸，故我們文協亦和工農堅決地結合，不斷地向那些反動勢力抗爭了。（註一九六）

「四大」之後，新文協更急速左傾化，堅持「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普遍化之必要」，以做爲戰鬥的政治團體。（註一九七）

《新台灣大眾時報》的創刊，就在「四大」之後。編輯兼發行人兼印刷人賴通堯（註一九八）是賴和的四弟。一九三二年正月號命運相當坎坷，先是原稿失蹤，繼則印刷所發生故障，然後發賣禁止，繼又全遭查扣，以致二月號亦休刊，直到三月號，才印行正、二月合併號，題簽第二卷第一號，以一張掙斷鐵鍊的台灣地圖做為封面，目錄兩頁，漫畫一頁，國際書局的廣告一頁，本文一百四十頁。（註一九九）。

《新台灣大眾時報》三月號，是問世的第一號，目錄如下：

社說 支持中國××（革命）

論評 台灣農民組合當面之任務

台灣文化協會當面之任務

蘇聯五個年計畫 高山洋吉、暴君譯

台灣文化協會第四次全島代表大會宣言

霧社蕃人蜂起的真相與我們左翼團體的態度

中國××（革命）問題

批評台灣民衆黨的新綱領政策 東紅

民衆黨減稅運動的本質

論壇 粉碎楊（連）一派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農組

一九三一年劈頭的第一聲

大同促進會的本體是什麼？

巨彈……………

資料 神岡信用組合不正事件曝露

文協中央委員會之議決

台灣農民組合當面的運動方針

情報 左翼的活動情勢

指令 …………… (註二〇〇)

由於需要納本檢閱，《新台灣大眾時報》所刊的內文，打××之處甚多，以後幾號亦然，但卻是欲了解新文協轉向期的一手史料。

賴和在一九三一年仍是同跨於新文協與台灣民眾黨，一月十六日，賴和出席台灣民眾黨彰化支部黨員大會，任議長（註二〇一）；二月十八日，台灣民眾黨在本部舉行第四次黨員大會，出席的黨員一百六十人，在民眾黨左翼的主導下，決議修改綱領及政策，警務局以其顯然主張階級鬥爭，依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命令解散，

並檢束蔣渭水、陳其昌、盧丙丁、白成枝……等人，又全島二十個黨支部，亦於同日全部被解散（註二〇二）。總督府禁止結黨的理由如下：

台灣民眾黨乃是先在結黨時就被命令一個解散的台灣民黨的後身，……漸次由強烈的民族主義者蔣渭水所領導的左派所把持，……反對始政紀念日，制定類似中華民國國旗的黨旗，……顧問林獻堂、蔡培火、蔡式毅等幹部相繼脫黨，……仿效日本大眾黨、勞農黨及南京總工會的綱領政策，而修改該黨綱領政策，擬以農工階級為基礎來進行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勢必違背我台灣統治的根本方針，並妨礙內台融和，以致對本島的統治惹起重大影響。（註二〇三）

向來被視為代表右翼的台灣民眾黨，其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在新竹公會堂召開第三次黨員大會時，其發表的宣言已逐漸左傾化了。在宣言中分析國際及台灣的情勢，在〈今後的方針〉中強調云：

吾人綜觀世界日本及台灣之情勢，帝國主義國家間及帝國主義國內之矛盾日益擴大顯



著，其基礎已經發生動搖，其崩潰定必不遠，世界一切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之互相聯絡，共同鬥爭已成爲其致命的打擊。然而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衆之結合未能堅固，連絡不能緊密，則將招致彼等反動勢力遞加其暴威。（註二〇四）

這主要導源於蔣渭水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之後，致力於工人運動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向左轉，加上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認爲其崩潰期已爲期不遠；同一階段，新文協的極左路線，仍將之視爲右翼工會，並在連溫卿欲成立左翼工會時，又導致新文協的再次分裂。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的可能，在極左意識形態的支配下落空了。一九三〇年八月，台灣民衆黨內部再次面臨分裂，八月十七日，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地主階級，不滿「民衆黨的政策顯然有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註二〇五），乃退出另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僅以「確立台灣地方自治」爲綱領（註二〇六），無疑是一種軟化、退縮的表現。

在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中，台灣民衆黨首先遭到強制禁止結社，亦足以呈現在極左與極右的中間地帶，民衆黨對農工群衆確實亦有一定的影響力，以這樣的基礎繼續左傾化，將對台灣總督府的統治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

一九三二年二月，台灣民衆黨被壓制之後，新文協的機關刊物《新台灣大眾時報》，對蔣渭水、陳其昌等人依然持攻擊的態度，以〈被結社禁止後的民衆黨——反動幹部的蠢動〉一則報導爲例：

民衆黨自結社被禁止後，御用報紙每日大吹特播著，什麼再建?????不一而定。

現在那些反動幹部蔣渭水、陳其昌等，還在極力蠢動，想找那較巧的手段，要來默殺大眾的××（革命）運動。要叫（糾）合那些土著資本家地主做主體，組織什麼平民聯盟，而再整頓有聲無影的農民協會、工友總聯盟。極力要逞其毒勳攪亂我們無產大眾的陣營，而飽其獸欲——默殺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註二〇七）

不僅未加以聲援、尋求成立統一戰線的可能，反而稱民衆黨爲「迷衆黨」，文章中時有攻擊民衆黨的言論（註二〇八）。殖民地台灣的社會運動者兄弟鬩牆，正好給日本統治者各個擊破的機會，左翼運動的教條化，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六月，總督府開始鎮壓地下黨之台灣共產黨，新文化協會本身的工作亦幾乎陷於停頓。王敏川稍後雖籌組台灣赤色救援會，但年底被偵破，新文協亦面臨瓦解。

## (註二〇九)

一九三一年是台灣近現代史上極具關鍵性的一年，尤其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滿州，代表著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全面抬頭，政治勢力朝向法西斯一面倒，處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更無政治運動的空間了，僅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點綴性的存在，柔性的政治運動，相對的也就缺少鬥爭的氣力，走的幾乎是十年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老路。十年前是進步之舉，歷經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十年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的歷程，結果依然故態，未免有昨日黃花之感，此亦反映出殖民地台灣處於日本統治者更深的壓迫之下。

賴和是新文協的一員，但未曾參加台灣赤色救援會，所以王敏川等人遭逮捕時，未被波及（註二一〇）；他亦是台灣民眾黨的一員，當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因民眾黨左傾，因而退出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時，他並未退化參加，這顯出在極左與極右之間，他依然有其原則。歷經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三一年全程運動的賴和，也參與台灣民眾黨一九二七—三一年的全程；當所有與日本殖民統治對抗的運動被壓制之後，一九三三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十五次請願，也是最後一次的請願，賴和是中部收集請願簽名書的人之一（註二一一），這又顯出他具有彈性。

賴和畢竟是個關心政治的文化人，而不是完全受意識型態支配的政治人。處身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在文化、社會、政治各種階段的運動中，他在新文學運動裡自然形成的文壇領袖地位，支援了各式各樣的運動，雖然不是政治運動的風雲兒，但在台灣文化協會中，畢竟是無可取代的人物。

#### 附註

註一三七：參見劉枝萬《南投縣革命志稿》（南投，文獻會，一九五九年六月），頁一九二。

註一三八：楊肇嘉《台灣新民報小史》，收於《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頁四二二。

註一三九：依一九二四年四月警務局的調查，當時台灣的報紙，發行部數，《台灣日日新報》一八九七月，發行達到萬部，顯示其重要性。以上數據參見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六十七號，頁四五。

註一四〇：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五五二。此時是上山滿之進總督任內，葉氏誤為上一任伊澤多喜男任內。准許《台灣民報》遷移島內發行的時間，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葉氏誤將其提前一年。其原因乃是將蔡培火《民報島內發刊所感》一文中：「唉！我們的台灣民報，自去七月十六日起，已經受過當局台准在島內發行了」，依當時記事習慣「去」是上個月之意，並非是去年。

註一四一：楊肇嘉謂「恩賜放寬」是台灣總督府的姿態，同註一三八，頁四二六。

註一四二：《民報的轉機》，《台灣民報》一百六十七號，頁二。

註一四三：《和文民報の發刊に際して》，同上註，頁九。

註一四四：蔡培火《民報島內發刊所感》，同註一四二，頁七。

註一四五：同註一四二，頁六。

註一四六：賴和《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台灣新民報》三百廿二號，頁九。

註一四七：《台灣民報》一百八十六號，僅剩題目及署名，頁八。

註一四八：《台灣民報》二百卅一號，頁一〇。

註一四九：《專門捏造謠言的社會運動家》，《台灣民報》一百七十九號，頁四。

註一五〇：參見若林正文《中國雜誌解題：台灣大衆時報》，《アジア經濟資料月報》一九七五年一月。

號，及《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所列名單。

註一五一：莊孟侯的名字，係在《台灣大眾時報》第五號〈社告〉中補入，封底。

註一五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社員名單。

註一五三：見《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封面，工農手拿旗幟，是每期的固定封面。

註一五四：見《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頁三一—一〇及二六—七。

註一五五：《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頁二。

註一五六：同上註。

註一五七：同註一五五，頁一〇。

註一五八：本文文末註明孝乾譯，《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頁一一。

註一五九：參見拙著《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七節：「路線的轉折——〈前進〉的探討。」

註一六〇：〈前進〉係以賴和本名發表，這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是特殊之例。《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

頁二六。

註一六一：同上註。

註一六二：台灣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身世調查表〉，及〈文化協會支持團體〉表格，參見王詩琅譯《台

灣社會運動史》，頁三七三、三七五。

註一六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東京，龍溪書舍），頁一〇五二。

註一六四：〈台中總工會成立了〉，《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頁九。成立大會時，賴通堯任書記。

註一六五：參見《台灣大眾時報》第五號，頁六。

註一六六：同上註，頁一〇。文中提及創刊號共二十四頁，係誤記，全本共二十八頁。

註一六七：《台灣大眾時報》第七號，頁一一。

註一六八：見《台灣大眾時報》第十號之報導，頁一五。

註一六九：賴和未刊詩稿，寫於己未——辛酉之間稿本。

註一七〇：王敏川生平經歷，請參見莊永明〈更留痴態在，書卷當良儔——王敏川傳略〉，收於《王敏

川選集》及楊碧川〈抗日過激〉的「台灣青年」——王敏川〉，收於《台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註一七一：參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蓬島文化公司，一九八〇年九月），頁五六五。

註一七二：參見田中美知太郎編《二十世紀アジアの展開》（東京，平凡社，一九六六年三月），頁三二

〇——一。

註一七三：同註一七一，頁五六六。

註一七四：《台灣民報》一百八十二號，頁三。

註一七五：〈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了〉，《台灣民報》一百九十七號，頁三。蔣渭水在成立大會時發言，說明是依南京總工會的會則而制定會則。

註一七六：《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一二八四——五。

註一七七：同上註，頁六一〇。

註一七八：參見《台灣民報》二百六十四號，頁五及二百六十五號，頁四。

註一七九：同上註。

註一八〇：《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四〇八。另依〈文協的全島大會〉之記事，開會前曾發生會旗爭奪戰，見《台灣民報》二百卅三號，頁一〇。

註一八一：《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四一一。

註一八二：〈會員整理狀況〉，同上註，前揭書，頁四一九——二二。

註一八三：〈文化協會運動專業從事工作者調查〉，前揭書，頁四二二。

註一八四：參見〈文協全島代表大會〉之記事，《台灣民報》二百八十六號，頁二；另見〈文化協會第

三次大會舉行經過〉，《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四二七——三一。

註一八五：《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四三一。

註一八六：《台灣民報》二百八十一號，頁二。



註一八七：參見林梵《楊遠畫像》（台北，筆架山，一九七八年九月），頁九七。

註一八八：參見下村作次郎〈台灣的作家・賴和の「豐作」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百四十八輯，

頁二一。

註一八九：《台灣民報》二百四十六號，頁四。

註一九〇：見《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五〇八。

註一九一：《台灣民報》三百二十六號，頁一一。

註一九二：〈彰化有志計畫發刊《現代生活》〉，《台灣民報》三百廿九號，頁五。

註一九三：《新台灣大衆時報》三月號，頁一二四。

註一九四：《台灣社會運動史》，頁四六三。

註一九五：《新台灣大衆時報》三月號，頁二六。

註一九六：同上註，頁一三七。

註一九七：〈文協中央委員會的議決〉，《新台灣大衆時報》三月號，頁一〇二。

註一九八：見《新台灣大衆時報》，每月底頁之登載。

註一九九：見《新台灣大衆時報》三月號；另現有六月號、七月號的封面設計是工、農握手，中有一星。

註二〇〇：見《新台灣大衆時報》目錄，另從內文補入「資料」遺漏部份。

註二〇一：《台灣新民報》三百四十九號，頁九。

註二〇二：〈民衆黨最後的全島黨員大會〉，《台灣新民報》三百五十二號，頁三。

註二〇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五一—四。

註二〇四：同上註，頁四八三——四。

註二〇五：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四二一。

註二〇六：同上註，〈決議文〉，前揭書，頁四五三。

註二〇七：《新台灣大衆時報》三月號，頁一三八。

註二〇八：同上註，頁一三九。

註二〇九：王敏川因赤色救援會事件，被判刑四年。有一說王敏川被捕係由於吳石麟之密告，仍存疑。

註二一〇：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七九六——九九。

## 五、結論

歷經前面三節的論證，闡明從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分裂、再分裂，以迄遭到台灣總督府的壓制，賴和在每一環節中所處的位置，反映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長達十年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中，台灣近代知識分子挺身與日本統治者對抗的一個斷面。賴和在動盪變化的時代中，並非是靜態的人物，他不斷地和時代進行對話，並調整前進的步伐，不管在民族運動或階級運動的兩翼活動裡，他或顯或隱從未脫離台灣社會脈動的主流。因為這一特性，討論賴和不能機械性的將他只放在民族運動或單置於階級運動中來觀察，必須從交錯複雜的雙元結構的網絡中，才能透過他看到在異民族統治下，台灣近代知識分子探索台灣出路掙扎的動向之一。

賴和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一生不甘於被日本統治，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前，基本上是個民族運動論者，他在文化啓蒙的重要內涵新文學運動中，以同是漢民族的一分子，承襲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理論，並以中國式的白話文，寫下了深刻動人的作品，主導了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形成了二〇年代

中期台灣文學的特色；但在時代思潮衝擊之下，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愈見發揚，更是同情「奴隸的奴隸」，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而傾向支持農工的階級運動，在他的文學或社會、政治運動中都逐漸加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兩者是截然劃分開來的，賴和並非是教條主義者，他只有一個單純的信念，做爲被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不管短程的爭取政治地位的改善，或長程的設法擺脫日本的統治，都是應該努力的方向，因此能同時在分裂後的新文協與台灣民衆黨兩派之間活動，並以一個關心政治的文化人，而非政治領袖人物，也被左右兩翼的政治運動者同時接受，在幕前、幕後出錢出力，支援了左右兩翼與日本統治者對抗。在左右兩翼的運動中，賴和保持了原則與相當的彈性，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台灣大衆時報》創刊號上發表的〈前進〉，呈現了他與時俱進的傾向。

日據下二、三〇年代，以台灣知識分子爲主的抗日運動，不可能脫離世界性的反帝潮流——社會主義，而與握有絕對優勢地位的日本統治者單獨對抗，左翼社會政治運動的出現，是時代的趨勢之一。以當時台灣的情況而言，無論透過民族運動或階級運動，如能有效運用，均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中，暴露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不義性。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際，以連溫卿爲主的左翼，認爲民族運動

容易走向和當局標榜的內地延長論吻合一致，其主張僅以設立台灣議會為其極限，而強調階級運動，從根本上以動搖支配者的統治基礎。連溫卿關於民族運動的看法，在異民族統治下的台灣容或有爭論的餘地，亦即對某些人而言，設立台灣議會可能是目的，對某些更富於鬥爭意識的人則僅是手段而已，完全要看運動的內涵而定。台灣民衆黨右派於一九三〇年八月退出，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即是此一現象的最佳說明。質言之，「進步」與民族運動不一定是相背離的，還須檢驗實質內涵（註二二二）。從另一方向觀察，以當時台灣殖民地民衆，普遍生活於貧窮底線，被日、台資本家、大地主剝削、壓榨的經濟情況下，提倡階級運動，對日本統治者而言更具危險性的，即使在日本本土都要加以鎮壓，何況台灣殖民地；台灣總督府對於提倡民族運動的大地主階層，尚可施於經濟上的壓力或以利益來軟化其鬥志，使之局限於爭取參政權的範疇之內；對於提倡階級運動的急進分子，則嚴密監視其行動，當左傾至社會輿論不容時，即強行鎮壓，這在台灣總督府的〈文化協會對策〉清楚的顯示出來。

賴和處於這樣的時代背景，身為台灣殖民地被訓練出來的醫生，如果沒有充分的自覺，可能淪為統治者的工具。他反而挺身而出，投注於台灣社會的召喚，關心

殖民地的政治。當左翼運動興起時，並沒有爲了自身的安全而迴避，是人道主義精神之發揚，也是不畏強權之表現，並且也不僅是出於左傾幼稚病（當時稱之爲左傾小兒空想病）而已，他與台灣民衆黨的關係，具有調節當時政治運動左右衝突的功

能。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之後，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即使師法中國國民黨的蔣渭水，在他領導下的台灣民衆黨主流派，在後期都難免呈現左傾的現象，導致右派退出，此一事實，反映了手無寸鐵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者，面對異民族的高壓統治以及惡劣的經濟狀況，爲了改善大多數農工的生活，不能不試著以左翼的意識形態加以武裝。民族運動的左翼化，雖然仍被新文協的急進分子視爲右翼運動的一部分，但台灣總督府當局仍以其顯然主張階級鬥爭，而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台灣民衆黨第四次大會，強制禁止結社。其企圖是先發制人，截斷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匯流的可能，否則將會造成更大的反抗聲勢。雖然理論上的可能性，在實際政治運動中不一定能具體實現，但是總督府的此一措施，顯現了統治台灣用心深刻之處。對照蔣渭水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病逝前的遺言：

台灣社會運動既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註二二三)

更能清楚地觀察到時代的一個動向，這是台灣特殊結構下回應的方式之一。一九三〇年代殖民地台灣的出路在那裡？猶是個開放性的問題 (open question)，答案並非唯一，左右兩翼都在試圖尋求解答，並不斷地回應時代而修正其路線，儘管所有被日本統治者視為激進的社會、政治運動團體，在軍國主義抬頭的「超非常時代」(註二二四) 都被強力鎮壓了，但在台灣社會的底流裡，仍然脈動不已。

賴和以一位民族自決主義者，比蔣渭水更早涉身左翼社會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他以原是理事的資格在新文協擔任臨時中央委員，並和王敏川所代表的台灣革命派接近，弱小民族意識日益強烈，越是體認台灣的現實面，越傾向階級運動，這是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雙元結構下的位移現象。由於賴和本身且是個文學家，尚可從新文學運動層面來觀察，一九三〇年八月新文協的黃石輝掀起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三一年七月郭秋生進一步掀起台灣話文論戰，從而由中國白話文學的支流

——「在台灣的文學」——逐漸凸顯出全體性的「台灣文學」之具體概念，這在日本

學者松永正義 (Matsumaga Masayoshi) 的研究中，認為係「傾向於一島性改良主義」(註二一五)。質言之，在社會寫實主義抬頭的時期，提倡大眾文藝，不能不強調本土的經驗，既然在內容上要充分展現台灣色彩，那麼就面臨形式上必須以大多數人的語言來表現的台灣話文問題，寧可屈文就話，亦即牽就口語來寫作的表音論，而不採用新文學運動的前一階段，屈話就文的表義論，以致某些無法以漢字表達的台灣方言，寫下來的字和讀音，必須兩相分開才能以方言閱讀。這兩次的論戰，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性之表現，亦即對台灣本體之正視，不以附屬中國白話文的表達方式為限(註二一六)。關於這兩次論戰，賴和都有其回應，首先見於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對於本土民間故事及歌謠的整理，賴和給《台灣新民報》編輯黃周的信上提及：

講要把民間故事和民謠整理一番，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是大贊成，若不早日著手，怕再幾年，較有年歲的人死盡了，就無從調查，現時一般小孩子所唱的豈不多是日本童謠嗎？想著了還是早想方法纔是。(註二一七)



這是對保存民族文化的關心，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核心問題。賴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於《台灣文藝》二卷一號發表的〈善訟的人的故事〉，即是取材自彰化的民間傳說（註二二八）；其次有關於台灣話文問題，一九三二年二月賴和於《南音》一卷三號，發表〈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並嘗試以台灣話文創作〈一個同志的批信〉，發表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這顯示出在台灣話文論戰之後，賴和充分意識到作為表現社會現實的文學，如何尋求「音義一致」來凸顯台灣本體是重要的論題。但是由於台灣的語言，無法充分以漢字來表達，由是牽涉到創造新字的問題，賴和的新文學創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已將表現的形式（台灣話文），提昇到不下於內容（表現一位墮落的社會運動者）的重要地位。賴和應用台灣話文寫作，因無法使形式與內容充分契合，自覺嘗試失敗，而終止新文學的創作，反映出意識與實踐間的差距，對他而言是巨大的困擾；以後賴和又轉向傳統詩文的寫作，而發表於新文學刊物的作品則是〈田園雜誌〉、〈新竹枝歌〉等帶有民間風格的歌謠式作品（註二二九）；賴和放棄他在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中，賴以首先崛起的中國白話文表現方式，嘗試台灣話文的寫作，和弱小民族尋求表現自我本體，有其內在的關聯（註二二〇）。

賴和這種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動態性，同樣也呈現在他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歷程中，兩方面是互相影響的。質言之，不管在文化、社會、政治運動中，他總是回應著時代，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停留在原地。當然亦非每個環節都很明朗，賴和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元旦《台灣新民報》的〈隨筆〉，先在第一小節「這一日」，提到他是個無神論者，緊接著第二小節「自己清算」，則比較清楚地展現他在此一階段意識形態上的傾向，賴和剖視自己而言：

想想看！你這個自己是什麼人物？值得清算？政治上有你插嘴的餘地？經濟界有你立足的處所？有貢獻科學的發明？有激動思想的議論？這幾項可以不用提牠，在咱這地方至少也須有，擁護道德的呼喊，拯救貧窮的善舉，不然在另一方面，你也須是受盡打毆監禁的社會主義信徒，也須是飢寒交迫困苦流離的勞工，纔有可清算的資料。（註二二一）

謙遜的賴和，在文中幾乎完全否定了自己，但以相當的文學技巧側面點明了他是「失業的救助者」、「農工的擁護者」（註二二二），另外一九三一年十月發表於《台灣新民報》的〈低氣壓的山頂〉長詩創作，全詩充滿了被壓迫的氣息，但其中一段寫道：

塘漠漠的圍圃，  
一疊疊綠浪翻飛，  
啊！這是飽漿的甘蔗。  
平漫漫的田疇，  
一層層金波湧起，  
啊！那是成熟的稻仔。  
種田的兄弟們啣！  
想你們鐮刀早已準備？（註二二三）

以田園即將收割的歡欣，帶出了毀滅與再生的希望，代表農民身分的「鐮刀」，是一種隱喻，表達了賴和在此一階段傾向左翼的社會運動；一九三一年十月，新文協已面臨被總督府壓制的末期了，賴和在這首詩的最後一段，滿懷激情寫出了痛苦中的希望：

人類的積惡已重，  
自早就該滅亡，  
這冷酷的世界，  
留牠還有何用？  
這毀滅一切的狂飆，  
是何等偉大淒壯！  
我獨立在狂飆之中，  
張開喉嚨竭盡力量，  
大著呼聲爲這毀滅頌揚，  
併且爲那未來的不可知的  
人類世界祝福。(註二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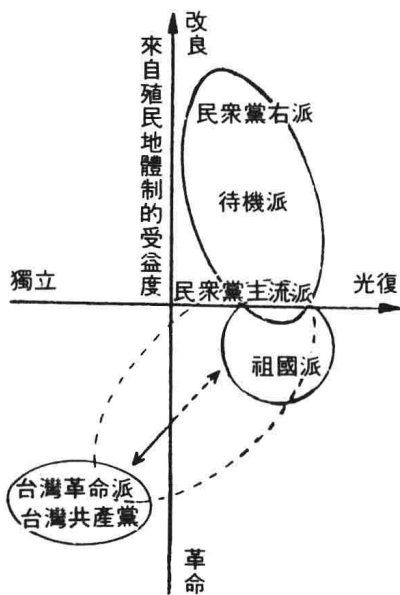
〈低氣壓的山頂〉，在標題下註明了八卦山，賴和平日常與友人到此地散步；乙未（一八九五）八卦山之後，台灣義軍重大傷亡，緊接著全台淪入日本之手，甫生一年的賴和從此一生在日本的統治之下，一九三二年底，賴和在八卦山上醞釀了這首

詩，象徵了台灣殖民地的吶喊，以及對不可知的世界之期盼。對照賴和參加分裂後的新文協，支持《台灣大眾時報》的創刊，四弟賴通堯涉入左翼社會運動的程度，以及他與台灣文化協會最後一任的委員長王敏川之深切關係，賴和的政治態度傾向台灣革命派。在軍國主義抬頭的時期，他與遭鎮壓之後的左翼殘餘勢力仍保持聯繫，因此會被台灣總督府視為危險人物（註二二五）。賴和與革命派不同的地方，如前所述，他不是教條主義者，保有比較彈性的空間，因此在文化協會分裂之後，他與台灣民衆黨主流派亦有關聯。

如果以簡單的座標軸來界定賴和在台灣抗日運動中的位置，借用日本學者若林正文(Wakabayashi Masahiro)研究台灣抗日運動的圖型及日據下「台灣解放構想」的四種類型（註二二六），作為參考，那麼賴和在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他的位置大致如下頁附圖所示。

質言之，來自殖民地體制的受益度（革命↓改良）與對中國的期待度（獨立↓光復），兩線交叉的座標來看，賴和的涵蓋面相當廣，相對於蔡培火的民衆黨右派、黃呈聰的右翼待機派、蔣渭水的民衆黨主流派、王敏川的台灣革命派，賴和是左翼的待機派，時代越往後越移向台灣革命派的方位。對於殖民地的被統治者而言，爲了擺脫

說明：虛線圓圈是賴和所處的位置



異民族的統治，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都是努力的方向，而反抗度越強烈，越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日據下改良派的民族運動，即使帶著妥協的色彩，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現在都受到肯定，那麼左翼的社會運動，也並非台灣共產黨的專利。傾向台灣革命派的賴和，並沒有否定民族運動，絕不能因抗日過激而受到非難，反之，應充分肯定他的抗日精神，這是對台灣抗日前輩的尊重。

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努力的成績，印證了他代表了時代的、社會的良心；仁醫的形象，則充分說明了他是個人道主義者；賴和並不複雜，是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抗日的決心，使他顯得複雜。台灣文化協會在左右衝突之中是分裂了，但賴

和認清主要的反抗對象是日本統治者，他的行為事跡說明了他並未「分裂」。賴和處於相當特殊的位置，但足以呈現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掙扎的痕跡。賴和不幸的世代是在歷史中退隱消失了，但他與時代的對話，猶待我們思索。

附註

註二一：見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一五七。

註二二：文化學家魯凡之提出一個概念：「在三十年代，『進步』與『民族主義』終於走向結合，而構成爲當時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思潮運動。」參見《中國文化發展形態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香港，精英，一九八五年），頁四八。

註二一三：蔣渭水的遺言日譯文見於《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二編中卷，頁五二〇——二一；見證人是羅萬俤、李友三、杜聰明、蔣竹南、賴金圳、蔣渭川六人。蔣氏遺言公葬時被禁止發表，一九五二年八月重建於六張犁蔣氏墓碑，由盧丙丁署名，但修改爲：「台灣革命運動，業已進入第三期，吾人預期之勝利，迫在眉睫，凡我同志必須不屈不撓，極力奮鬥，以竟全功，

舊同志尤須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鞏固吾人精神力量，為同胞解放而努力。」黃煌雄於《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一書中則修改為：「台灣革命運動，已進入第三期，台灣人的勝利，亦經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頁一六七。兩文皆諱言「無產階級勝利」之言辭。

註二一四：參見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四九一。葉氏強調云：「在台灣自荻洲台灣軍參謀長赴任以來，對台灣人的猜忌日深，壓迫日劇。」

註二一五：松永正義《台灣文學の歴史と個性》之見解，係日譯台灣現代小說集《彩鳳の夢》（東京，研文，一九八四年二月）之解說，頁一八八。

註二一六：論戰參見拙著《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台灣史研究會會訊》第二期，頁三一—四。

註二一七：引自醒民（黃周）《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台灣新民報》三百四十五號，頁一八。

註二一八：此文後來收於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協會，一九三六年六月），是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話文論戰之後的具體收穫之一。

註二一九：《田園雜誌》發表於《台灣新文學》一卷五號，《新竹枝歌》發表於《台灣新文學》一卷六號，未發表的詩作如以山歌形式表現的：「讀書不是為做官，講到做官起畏寒，幾人讀書做



官好，傀儡有抽即會行」，皆富於民間精神。

註二二〇：參見拙稿〈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六小節：「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松永正義對此一論題甚感興趣，在七十七年六月於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之論文中，提出評論，認為是第六小節的核心問題；日文修訂稿〈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近現史研究》第六號，頁一七一—一八八。拙文本篇之寫作，未從賴和的文學論與台灣文學史的研究來探討，而廣泛從賴和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關係來探究其位置，亦可說是對松永正義提出問題的另一方式之回應。

註二二一：〈隨筆〉，《台灣新民報》三百四十五號，頁一九。

註二二二：同上註。

註二二三：《台灣新民報》三百八十八號，頁一一。

註二二四：同上註。

註二二五：王敏川於一九三八年出獄後，與賴和仍然時常相聚，李篤恭在〈憶敏川叔〉一文中，提及：

「王敏川先生與賴和先生是二位一體的，不能分開談論的」，見《台灣社會運動先驅者王敏川選集》，序文，二二頁；另外，謝雪紅於一九三九年出獄之後，時常出入賴家，賴和一九

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病逝，出殯時謝提孝燈，採訪自賴和哲嗣賴榮。

註二二六：參見若林正文〈台灣抗日ナシヨナリズムの問題狀況〉，《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頁一六七

—七七；另參見若林〈台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台灣座標」〉，《當代》十七期，

頁四〇—五一。賴和亦可放在若林提出的「台灣解放構想」的四種類型來觀察。日本學者的研究，提醒我們對日據時代台灣史的探討，必要放寬視野。



三、賴和〈獄中日記〉及其晚年情境



## 一、前言：殖民地的心聲

殖民地反抗者，被統治當局拘禁入獄，是極為平常的事，日據時代台灣志士進出牢獄，不知凡幾。蔡惠如、林幼春、蔣渭水、林呈祿、范本梁、張深切、賴和王詩琅、王白淵、楊達……等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但將獄中記事發表出來的並不多見。蔣渭水是坦蕩的政治運動者，每次下獄，隨即發表感想於《台灣民報》，留下了不少文獻，如〈入獄日記〉、〈獄中感想〉、〈獄中隨筆〉、〈北署遊記〉……等等，尤其治警事件的〈入獄日記〉充滿豪情壯志、慷慨高吟：

在昔宋朝既有莫須有禍矣

於今大正豈無那能無殃哉（註一）

被日本統治者拘捕入獄，反以坐牢為榮，充分表現了台灣人的志氣，不僅是台灣抗日史上的寶貴記錄，也是台灣新文學史上散文的代表作。

台灣新文學的奠基者賴和亦留有〈獄中日記〉，這是日本軍閥發動太平洋戰爭之際，縲絏獄中五十餘日，偶然間留下來的記事。也是賴和一生中唯一見存的日記，當時未必想及將會留之於世，因此更值得重視。從這份在獄中寫於粗紙上的手記，可以窺看賴和在強大壓力下生命受威脅時的彷徨、無告、苦於家庭經濟，甚至整體反映出被壓迫者的殖民地心聲。

〈獄中日記〉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迄隔年的一月十五日，總共留下三十九日的記事，僅以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標示日期。從日記中得知賴和受困獄中第八日，始於雜記帳中發現鉛筆及塵紙（粗紙），乃試著回憶前七天的經歷，第三日記事且補記於第八日記事中段，可見僅留供個人排遣獄中無奈的歲月。原稿現已不存，現在所見的這份手記題名〈獄中日記〉，也不是賴和親自定名，而是在戰後初期，友人楊守愚整理遺稿，發表於蘇新主編的《政經報》，冠上題名，始見之於世（註二）。

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主編《賴和先生全集》出版，收存〈獄中日記〉，但在戒嚴體制下，爲了減少無謂的困擾，將楊守愚所寫的序言刪略了，十分可惜。楊守愚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創作量最豐富的人之一，也是彰化地區賴和所屬的

應社成員，一生深受賴和的鼓勵與影響。這篇寫於一九四五年「光復慶祝後二日」的序言，反映了台灣人對新文學之父賴和的高度評價，文中也提及賴和推崇魯迅，對於賴和有「台灣的魯迅」之稱，從精神面上提供了我們了解的訊息。爲了探討〈獄中日記〉，首先將序言附錄於後，一則補《賴和先生全集》〈獄中日記〉缺漏部分，再則有助於增進對賴和的認識。

### 賴和〈獄中日記〉序言

這一篇獄中記，是大東亞戰爭勃發當時，先生被日本官憲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置場所寫成的。可以說是先生獻給新文壇的最後的作品。在這裡頭，我們能夠看出整個的懶雲底面影，這一篇血與淚染成的日記，就是他高潔的偉大的全人格的表現，也就是他潛在的、熱烈的意志的表現。

身犯何罪？姑勿論先生自己不知道，試一問當時發拘引狀的州高等課長，怕也挪不出明確的答案吧！「莫須有」，還不是宋時三字獄的把（巴）戲？因爲先生生平對於殘虐的征服者，雖然不大表示直接抗爭，但是他卻是始終不講妥協的。即當時一部人士所採取的，所謂

「陽奉陰違」的協力，他都不屑爲的。他這一種冷嚴的態度，我想這就是他被拘的理由。

先生生平很崇拜魯迅先生，不單是創作的態度如此，即在解放運動一面，先生的見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合致。所以先生對於過去的台灣議會請願、農民工人解放……等運動，雖也盡過許多勞力，結果，還是對於能夠改變民衆的精神的文藝方面，所遺留的功績多。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因爲先生覺得，只要民族意識不滅，只要大家能夠覺醒起來，不怕他帝國主義者的強權怎樣厲害，他是相信我們總有一天是會得到出頭的。

不是麼？台灣已經是光復了！被壓迫的兄弟都得到自由了！

在這萬衆歡呼之中，反而使我不禁流出眼淚來。很遺憾的，著力於改變民衆的精神的懶雲先生，他不能等著這光明的日子到來，他不能和我們一齊站在青天白日旗下額手歡呼，便被凶暴的征服者壓迫而死了！

雖然，我相信他在天之靈，一定在慰安地微笑著啊！

先生的肉體雖然是與世長別，但是先生偉大的精神，是永續地在領導民衆，在激勵省內的文學同志呢！

當著這歷史的轉換期，爲紀念故人生前的功績，爲激勵文學同志的奮起，這一篇台灣新



文學運動的先鋒賴雲先生的遺稿的刊載，是有著多大意義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光復慶祝後二日

守愚誌

——錄自《政經報》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附註

- 註一：蔣渭水〈入獄日記〉，連載於《台灣民報》二卷六號至十一號。引述聯語見二卷九號，頁一一。
- 註二：賴和〈獄中日記〉，連載於《政經報》一卷二號至五號，以〈我的祖父〉，〈高木友枝先生〉兩文為附錄；本文收於李南衡《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頁二六八—三〇二。
- 為了參閱方便，有關〈獄中日記〉引文，皆引自《賴和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

## 二、我生不幸爲俘囚

賴和一生中曾經兩次繫獄。第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治警事件」，總督府警務局檢舉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北自宜蘭南至高雄，將議會運動關係人一網打盡，當天並扣押四十一人。這是總督府施行恐怖政治，以鎮壓台灣人覺醒的政治意識。事件發生時，台灣一切對外通訊都被當局所控制，特務橫行，全島一時風聲鶴唳，民心惶恐。蔣渭水將此事件稱之爲「台灣的獅子（志士）狩」（註三）。三十歲的賴和，亦被囚於台中銀水殿，後移送台北監獄，迄隔年一月七日始以不起訴處分、出獄，總共被監禁二十四天。在獄中有〈囚繫台中銀水殿三首〉、〈囚中聞吳小魯怡園籠鶴〉、〈繫台北監獄〉、〈讀佛書〉……等詩，被釋放之後又有〈出獄作〉、〈出獄歸家〉等……作品，反映了賴和在治警事件中的志氣與豪情。賴和在〈囚繫台中銀水殿三首〉中詩云：

食飽眠酣坐不孤，枝頭好友黑頭烏；

知人睡晏精神減，破曉窗前即亂呼。

坐久心安外慮忘，憐他枝上鳥啼忙；

無端最是芭蕉雨，攪亂閒情思轉長。

一死原知未可輕，吾身不合此間生；

如何幾日無聊裡，已博人間志士名。（註四）

這是賴和初次繫獄時之心境，即使在獄中亦能食飽眠酣，而且還有閒情欣賞獄窗外的景緻，不愧是個青年志士。〈繫台北監獄〉亦有詩云：

功疑惟重罪疑輕，勅法何嘗喜得情；

今日側身櫻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

幽囚身是自由身，尺蠖聞雷屈亦伸；

我向鐵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天人。（註五）

在日本政府同化主義下，台灣的「新附民」，要求在台灣特殊情況下能有台灣特

別立法，以成立台灣議會（註六），終究不容於台灣總督府當局。大日本帝國台灣籍民的賴和「模糊身世始分明」，正是台灣殖民地民衆深刻的悲哀，往後賴和更是徹徹底底地和日本統治者劃開了界線，在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分裂後的新文協，都起了極大的作用（註七）。在詩中亦顯現了出身道士家庭的賴和，他的宗教觀傾向於佛教，使用了達摩面壁的典故，將坐牢和悟道巧妙地結合起來，洋溢著豁然開朗的曠達。在獄中讀佛書，於第二次入獄之〈獄中日記〉亦屢有記載。在賴和的漢詩中有一首〈上圓瑛大師〉，極有可能是民初圓瑛於閩南遊方時，賴和當時正在鼓浪嶼博愛醫院任醫官，曾經親炙圓瑛；爾後歸台，亦時與關子嶺碧雲寺的屯圓接近（註八）。無神論者的賴和，不但不排斥衆生平等的佛教，而且從唯心主義的佛學中得到了內在動力。

賴和於治警事件〈出獄歸家〉詩，曾生動地呈現出台灣志士出獄時受群衆歡迎的情形：

莽莽乾坤舉目非，此身拼與世相違；

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註九）

並且在出獄後，隨即與同志組織了「同獄會」，每年在十二月十六日定期聚會，充分顯現了反抗者的精神。

以上概述了賴和第一次入獄的情境，年輕的賴和這時的身分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理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一九二五年八月始有新文學作品〈無題〉，刊於《台灣民報》，從此成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以作品實踐了張我軍等人鼓吹的新文學理論，恰如旭日初升，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業。

第二次入獄，發生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亦即珍珠港事變的當天，美國和日本宣戰後，中國的戰況，也因美國的參戰，而有了重大的轉機。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總督府這時發動警務局和憲兵單位僅拘捕賴和一人，目的是爲了查明賴和與台灣醫學校同班同學翁俊明的關係。當時翁俊明在香港籌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對台灣進行工作。賴和早年就讀台北醫學校時參與了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爲核心的「復元會」（註一〇）；爾後於一九一九年之間亦一度前往廈門鼓浪嶼行醫。一九二一年以迄三一年在台灣是文化協會核心人物之一，並且因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而越來越傾向階級運動，雖然賴和可以確證不是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但亦在

幕後支持了台共。從賴和思想的歷程，以及回台灣之後並沒有和身在中國的翁俊明交往的記錄來看，他在思想與行動的路線和翁之間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差距。然則在抗日戰爭中翁俊明主持對台工作，翁或許會因舊有關係而進行聯絡也說不定。四十八歲的賴和因此遭了一場牢獄之災。日本憲警違反常例，一直未告知逮捕他的理由，直到第二十九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始由州高等課詢問與翁俊明的關係，早已平白被關了二十九天，然後又繼續拘留。也因為憲警長期的不告知逮捕理由，使賴和更顯得彷徨、無告，這或許也是憲警的心理作戰之手段。

楊守愚在發表的〈獄中日記〉序言中云：

身犯何罪？姑勿論先生自己不知道，試一問當時發拘引狀的州高等課長，怕也挪不出明確的答案吧！「莫須有」，還不是宋時三字獄的把（巴）戲？因為先生生平對於殘虐的征服者，雖然不大表示直接抗爭，但是他卻是始終不講妥協的。即當時一部人士所採取的，所謂「陽奉陰違」的協力，他都不屑為的。他這一種冷嚴的態度，我想這就是他被拘的理由。（註

一一）

楊守愚對此事件的理解，雖未必盡然，但足於顯現日常生活中「諧謔多妙語，心竅最玲瓏」（註一一）的賴和，對於日本統治者是絕不妥協的。除了不肯陽奉陰違的協力之外，即使在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在殖民地台灣逐步推展皇民化運動，對於違反日本國策的人，每每斥之為非國民；在這樣的巨大壓力下，賴和還會以他的機智與幽默，與彰化地區的文友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文學俱樂部，戲稱「半線俱樂部」，「半線」是彰化的古地名，如果以日語發音，恰好就是「はんせん」，與日文的「反戰」同音，於是以詩文聚會的「半線俱樂部」，聽起來就變成「反戰俱樂部」了（註一三）。在戰爭期間，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這樣的人當然是日警嚴密監視的對象，一有風吹草動，自然會對他採取行動，更何況他在台灣文學界及社會政治運動中，均有極大的影響力。

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開展期間，以他出色的作品，在文壇上取得崇高的地位，一九三五年底以台灣話文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困擾於語言使用的問題，從此不再發表新文學作品，轉寫漢詩、竹枝詞，以古典文學的形式避開台灣話文無法充分書寫的難題。賴和的文學創作過程是「先用漢文思考，用北京話寫了之後，再改成台灣話」（註一四），這對台灣人而言是很大的負擔。〈獄中日記〉是在牢中的記

事，絕無閒情餘暇再經修飾，可以拿來印證他思考及行文的特色。茲舉一例以方便檢討：

這幾日來，我真反省，對於我的平生，我行年四十八了，廿三歲辭了醫院出來做醫生，和這社會周旋，便漸得到世人的稱許，漸博信賴，為業務所費消的時間，比較讀書修養，占去四分之一以上。不讀書，自然不能有資於修養，且因為忙，自要求些慰安，就只偏於娛情的小說詩歌，及至第一次歐戰終了，世界思想激動，台灣亦有啓蒙運動的發生，我亦被捲入其中，我對於此運動，缺乏理解，無有什麼建樹。繼而有政治運動，我亦被拉入去，其所標榜，亦只於顧慮台灣特殊事情，法律制度，不能一同內地。本島人要求參與其立法，但於內田總督時一受解散，已有消散無有留存。及到了自治制施行，在彰化結成一個市政研究會，當其在發起會紀念講演時，我考台灣人善與環境適合，消極生存，沒有改善環境的魄力，若這樣下去，台灣人是會滅亡，這一語受到停止，不知是這一句的話，成為不滅的罪嗎？（註

一五）

這樣的行文是以漢文為思考的基礎，有台灣話文的特色但又非以台語能夠順



讀，其間又加入了一些由日文轉化而來的台語如「費消」、「慰安」、「本島人」等詞彙，但通篇可用北京話來讀，並不會覺得礙口。大體而言，賴和的小說創作行文亦有這樣的特色，然而經一九三〇年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三一年台灣話文論戰之後，追求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派在理論上取得上風。王詩琅（王錦江）在〈一個試評——以《台灣新文學》為中心〉一文中有一個總結的論評：

台灣文學是要用甚麼話文表現的問題還未確定。……自所謂鄉土文學的討論以來，一般有關心的人雖積極的要解決，卻仍未見就緒。作家們於用語言問題，依然還在彷徨。不過在最近，台灣語式的白話文之嘗試者漸增，而也漸漸地決定為它的主要方向，由我們看起來，固然是個必然的歸趨。（註一六）

賴和隨著台灣左翼運動的深刻化，台灣主體意識增強，亦嘗試以台灣話文創作，然而身處殖民地，台灣話文是絕不可能成為標準語的，通篇以台灣話文書寫，反而造成表現的困難，讀者理解也因新字的使用而增加困難，在這種雙重困難的情形下，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遂成為他唯一的一篇台灣話文作品，爾後也未再發表小

說新作了。持平而論，台灣話文理應追求並且也需要有人嘗試，但賴和寫慣了中國式白話文，也確能在行文之間展現台灣的特色，大可以原有的表現模式，繼續創作，或可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留下長篇作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也說不定。

關於〈獄中日記〉，我們還可以從賴和的三十九日記事中，觀察到一些賴和個人以及時代的訊息。在日本軍閥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對於台灣島內的控制更加强了，憲警當局此時不說明理由將賴和監禁，長期不予審問，造成他心理的恐慌，一向充滿抵抗精神的賴和在牢中也不免流露出膽怯、害怕，甚至因不久前三弟賢浦之病逝而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在第十二日的記事中有一段賴和的自我譴責：

當國家非常時，尤其是關於國家民族盛衰的時候，生為其國民者，其存在不能有利於國家民族，已無有其生存的理由。況被認為有阻礙或有害之可虞，則竟無有生存餘地。但國家總不忍劇奪其生，只為拘束而監視之，已可謂真寬大，僕之處此，又何敢怨。（註一七）

身在牢中為求脫困，在記事的「再錄」中寫下這些譴責之詞，不能當真（注意是寫在「再錄」中，是對日本官憲的辯解），相反地更顯現了統治者的橫暴。台灣人

究竟不是大和民族，國家更是被迫不得不接受的國家，賴和漢詩中曾有這樣強烈的感嘆：

我生不幸爲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

弱肉久矣恣強食，至使兩間平等失。（註一八）

這才是賴和的真精神，殖民地人民當然有權利抵抗。另一方日本殖民統治者則十分霸道，小如日常穿台灣服，也成爲賴和被指控的理由：

事變後，參加救護班，到市役所〔市公所〕輪值，便直接受到柴山助役的質問和非難，我便答應他在次回當值〔值班〕時便要穿洋服。……榑原氏（署長）也以台灣服爲題，教我要注意，我不想在衣裝也會生起問題來，這真是吾生的一厄。（註一九）

賴和在〈獄中日記〉辯解他穿台灣服，不含台灣的精神，然而賴和行醫經常是一襲台灣服，這也是他給同時代交往的文化人一種極強烈的印象，說不含台灣精神，

連日本人都不會相信的，問題是人當然有選擇穿衣服的自由，外觀的衣著都被干涉的話，還有什麼自由可言？

賴和在〈獄中日記〉中，亦間雜寫些漢詩，第二十八日詩云：

豎壘已收馬尼刺，東亞新建事非難；

解除警戒容高枕，囚繫哀愁亦少寬。（註二〇）

第三十三日又有一首：

忽聞街上有遊行，說是軍人要出征；

好把共榮團建設，安全保護我東瀛。（註二一）

這類詩作，與賴和向來漢詩中表現的精神，本質相差極大。應從他盼望早日出監來理解，不宜責其反抗精神之墮落。第十七日在牢中屢遭蚊子咬叮，寫了一首：

嚶嚶只想整人來，吾血無多心已灰；

你自要生吾要活，攻防各盡畢生才。（註二二）

以蚊子象徵日本帝國主義，雖然牢中之人被吸取了很多血，然而各有各的立場，被支配者總要掙扎著活下去，這才是賴和真精神的表現。

在獄中除了政治的壓力之外，記事中也時呈現了經濟壓力。主要原因是住家及醫院剛改建完成，向銀行貸款而有了債務的負擔，然而自己被困於牢中，出獄又遙遙無期，心情更顯得慌亂。在入獄的第十二日，清算自己的負債總計二萬圓，於是盤算出售住屋及股票還債（註二三）。

第十七日則記載了支出的經費，深感苦於經濟的壓力：

我一個月經常支出約須三百圓，若併及薪水公課（税金），平均要五百圓。若及教育費算在內，將要六百圓。若併此次建築所負的債，勸銀（勸業銀行）每月須要還者總算在內，將近千圓。我一日不能勞動，即一日無收入，所有現金皆填於這兩次的建築，可謂現金全無，若檢束（拘留）繼續一個月，就要生出一千圓債務，若繼續到明年三月，則家將破滅，那能

不愁苦？（註二四）。

身為醫生，竟然受困於經濟生活，極為罕見。台灣俗諺云：「第一醫生，第二賣冰」，意謂都是靠賣水賺錢，醫生是收入豐富的行業，然而賴和是仁醫，病患雖多，收入則仍然有限。曾在文學上受賴和提攜，並且在彰化附近地區從事農民運動，時常出入賴家的楊逵，在賴和的喪禮中，曾生動地記錄下村里鄰人們的議論。總結而言：

賴醫師每天看的病人總有百人以上，但他的收入卻比每天看五十個病人的醫生還少。有些病人請賴醫師除下藥錢。但對於看來不可能還錢的病人，是連帳都不記下的。（註二五）

聽了這些議論的楊逵由是感觸，賴和不管在看病或不看病時，「都生活在奉獻的大我之境」（註二六），這絕非過譽之詞。他的行醫收入一大部分支援了抗日的各種團體，雖然如同默默行善不為人知，但從賴和出殯時，台共重要領導人謝雪紅以女兒的身分爲其提孝燈（註二七），亦能了解他對最激烈的抗日團體台灣共產黨，不管在精

神上、物質上都曾給予相當的支援，而贏得了尊敬。賴和另一文化界的朋友楊雲萍在追憶文章中亦云：

做爲一個醫師，先生是彰化數一數二的最孚人望的醫生，至於被民衆稱爲「彰化媽祖」的程度。他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一百名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後，卻留下了一萬餘圓的債務。他的生活是那麽樣的簡樸。據說一張處方箋，還收不到四十錢。原來醫生也有好幾種的啊！（註二八）

這是對仁醫賴和極高的禮贊。從楊雲萍關於處方箋的記載，一張不到四十錢，而每天看百名病患以上，扣掉除帳的窮人家，一天約略是四十圓的收入，再扣掉休診時日，賴和一個月的收入約略一千圓左右，他在〈獄中日記〉中所載，被關一個月就要生出一千圓債務，誠然不虛。賴和〈獄中日記〉顯現的是至情血淚之文，令人讀之三嘆！

在這樣困窘的局面下，身在牢中仍有警察借機「敲詐」，第二十三日有一則記載：

(張) 金鐘君姪女要出閣，要先借金壹百圓，也煩代為傳言，教其辦點祝儀為賀，托其盡力。(註二九)

賴和醫院中雇有藥劑生、人力車夫，加上稅金一個月支出也只不過兩百元而已；借金一百，已超過一般人家一個月的收入了，更何況賴和家中此時已無餘款，身在牢中操心家庭經濟，卻仍不得不應付，以求早日脫身。

日據時代警察是殖民地統治的代表。賴和在小學畢業後，一度還有人勸他去做「補大人」(巡查補，即候補警察)，在他的回憶文中曾提及：

我自己看他們在威風的過著享福的日子，是有些心癢，無如自己生成羞恥心強些，怕被人家笑話。因為那時代的補大人，多是無賴，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橫行直撞，為大家所側目，說起大人，簡直就是橫逆罪惡的標本，少(稍)知自愛的人，皆不願為。我心裡雖在欣慕，今日眼睜睜地看他們有錢有勢，只怨自己生來缺少膽力。(註三〇)



年輕的賴和寧可先到雜貨店學生意，一波三折，終於當醫生，並且走上反抗之路，在他的文學創作中諸多以警察為統治的象徵，而大加批判，反映了台灣民衆的心聲。

〈獄中日記〉中總共出現了二十五名警察，從高等主任平塚喜一以迄台灣人警察，而前述張金鐘就是前來拘捕他的人（註三一）。當然牢中亦有對他有所善意的人，然則終究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的不平等關係。第九日記事云：

午飯後，水野樣（巡查水野平雄）來監存問，要代買雜誌，對其好意，真為感謝，因此又知事屬匪輕，不易有到社會之日。（註三二）

第十日記事云：

見到吳錦衣君，又煩為主任懇求。在此內見一熟人，似遇救主。（註三三）

第二十日又有記事云：

晚飯後，不意見到豎山樣（查部長豎山盛義），恍惚遇到救主。懇其代求書籍的差入，問其何時可得釋出，正月中有可能無，彼亦含糊其辭，說須仰州（台中州）的意見，真使我失望。（註三四）

賴和與台灣左翼社會運動關係密切，又因與翁俊明聯絡嫌疑被捕繫獄，本身不知被拘捕的理由，心中更是不安，在獄中屢有讀佛經的記載，漢詩作品率多充滿佛家色彩，並有「人從地獄才成佛，我到監牢始信天」（註三五）之嘆，這類作品但求心安居多，但亦偶有佳作，如：

欲渡迷津過，提攜及衆生；

衆生登彼岸，大道始完成。（註三六）

這種大乘入世的精神，和他素來傾向社會主義，試圖解放「奴隸的奴隸」，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獄中日記〉提及的台灣人警察劉先炳，在一九四一年度的警察名冊，已響應皇民化運動而改名村上炳次郎，據云就是平日負責監視賴和的警察。囚禁中的賴和第三十七日心悸亢進發作，第三十九日痛感「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註三七），日記絕筆。五十餘日後因體衰出獄。劉先炳則繼續監視，以後終成爲好友（註三八）。

附註

註三：蔣渭水〈入獄日記〉（一），《台灣民報》二卷六號，頁一五。

註四：《全集》、《舊詩詞集》，頁三七五—三七六。

註五：同上註，頁三七六。

註六：詳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台灣》三年二號，漢文之部，頁三一—一。

註七：參見拙稿〈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文，《台灣風物》三十八卷四期至三十九卷一期。有關賴和

參與的政治、社會運動，皆請參見此文。

註八：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採訪賴和哲嗣賴榮所得。

註九：《全集》，頁三七七。

註一〇：有關「復元會」，請參見拙稿〈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號，第二小節「民族意識與復元會」。

註一一：《政經報》一卷二號，頁一一。

註一二：應社詩友陳虛谷〈哭懶雲兄〉詩句，《全集》，頁四二九。

註一三：一九八六年夏天採訪自賴和哲嗣賴浚。此則記錄曾在台灣研討會演講中提及，見〈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台灣風物》三十九卷三期，頁一六八。

註一四：賴和友人李獻璋在〈台灣鄉土話文運動〉中的說法，《台灣文藝》一〇二期。王詩琅在〈賴懶雲論〉（日文原刊於《台灣時報》二〇一號），亦有類似的看法。

註一五：《全集》，頁二七八。

註一六：《台灣新文學》一卷四號，頁九五。

註一七：《全集》，頁二七七—二七八。

註一八：〈飲酒〉，《全集》，頁三八一。

註一九：《全集》，頁二八六。神原壽郎治後來調昇台北州南警察署長。

註二〇：《全集》，頁二九四。

註二一：《全集》，頁二九八。

註二二：《全集》，頁二八四。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前往南投訪問賴和醫學校同班同學吳定江老先生

（年九十六歲）時，他以台語吟誦此詩，並表示佩服之意。

註二三：《全集》，頁二七七。

註二四：《全集》，頁二八三。

註二五：〈憶賴和先生〉，原文刊於《台灣文學》三卷二號，譯文收於《全集》，頁四一八—四一九。

註二六：同上註，頁四一九。

註二七：採訪自賴和哲嗣賴榮。

註二八：〈追憶賴和〉，原文刊於《民俗台灣》三卷四號，譯文收於《全集》，頁四一一。文中提及楊雲

萍到台大醫院探望病危時的賴和，兩人曾談到魯迅，可以看到魯迅在賴和心目中的地位。

註二九：《全集》，頁二九一。

註三〇：〈無聊的回憶〉，《全集》，頁二三〇。

註三一：見〈獄中日記〉，第一日記事，文中僅提到「警官張棟（先生）」，查一九四一年度，《台灣總督

府警察職員錄》，當年彰化警察署張姓警察僅有張金鐘一員。

註三二：《全集》，頁二七四。

註三三：《全集》，頁二七六。

註三四：《全集》，頁二八八。

註三五：《全集》，頁三〇〇。

註三六：《全集》，頁二九七。

註三七：《全集》，頁三〇二。

註三八：賴和故宅懸有「賴和紀念館」匾額，劉先炳亦與其他友人列名其上，監視云云，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採訪自為賴和平反盡力的李篤恭；至於劉先炳改名為村上炳次郎，見《台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頁八六。

### 三、結論：回顧與展望

一九二六年春天，台灣新文學運動正熱烈展開之際，首先攻擊舊文學而大張新文學理論的張我軍，偕同夫人羅心蕓回台灣省親，曾南下遊覽，在彰化見過賴和，聆聽賴和批評台灣的舊文人毫無現實的「批評眼」，對其意見大表贊同，留給他印象深刻的尚有：

最引起我的興味的，是懶雲君的八字鬚。他老先生的八字鬚，又疏又長又細，全體充滿著滑稽味，簡（檢）直說，他的鬍子是留著要嘲笑世間似的，和我想像中的懶雲君完全不一樣。（註三九）

其實，賴和當時並不老，當三十三歲的壯年，一月間才在《台灣民報》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鬪鬧熱〉。賴和留鬚，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治警事件出獄後之舉，漢詩中有五古〈留鬚〉一首，以誌其事：

齒落不再生，搖搖悲欲脫。髭剃悲復長，每苦勞人拔。

悠悠縲絏中，忽焉將一月。繞頰森如戟，得意更怒發。

一捻一回長，臉皮癢復熱。載盆莫望天，坐使肝膽裂。

豈無丈夫氣，豈無男兒血。悲欲示吾衰，聊與少年別。（註四〇）

賴和從此留鬚，以示與日本官憲抗爭，倒非是爲了嘲笑世間。在日常生活裡，賴和是幽默的、慈祥的、溫暖的仁者形象。一九三〇年代見過賴和的廖毓文曾有生動的描寫：

賴和先生，一見差不多有四十多歲，肥胖的身材，圓圓臉兒、慈祥的眼睛、柔弱的口髯，好像「火燒紅蓮寺」裡的智圓和尚的另一個模型兒一樣，差的是智圓和尚的性格鄙陋，他的人格高尚而已。筆者還沒和他見面以前，就常常聽著人家極口稱贊他爲人和藹仁德，直至親過他的儀表，接過他的咳唾，越加景仰他仁德過人。（註四一）



這樣溫馨的仁者，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是堅強地站在對立面的，參加了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至三一年十年間全程的運動，付出諸多心血及金錢，對於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最徹底的台灣共產黨，亦以階級運動的相同理念，在背後默默支持。賴和亦珍視自己的盛名，絕不逃避反抗者的義務，漢詩〈吾人〉中云：

鬱鬱居常恐負名，祇緣羞作馬牛生；

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註四二）

一九四一年底的入獄，賴和在〈獄中日記〉中，表現了人性最真實的一面，他亦有平常人徬徨、受驚、膽怯……的弱點，由是更令人佩服他一生中堅強的反抗者的作為，畢竟賴和也是血肉之軀，也是芸芸衆生中的一人，而在殖民地台灣，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絕對是要付出代價的！〈獄中日記〉是真實的、歷史的文獻，也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感人作品。戰後楊守愚發表遺稿〈獄中日記〉，也曾以文學作品視之：

這篇獄中記，是大東亞戰爭勃發當時，先生被日本官憲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置場，所寫成的。可以說是先生獻給新文壇的最後的作品。在這裡頭，我們能夠看出整個的懶雲底面影，這一篇血與淚染成的日記，就是他高潔的偉大的全人格的表現，也就是他潛在的、熱烈的意志的表現。（註四三）

這是知音之言，事隔將近半世紀，仍然擲地有聲。台灣這些年來，各方面變遷甚大，做爲反映現實的文學也取得相當的成就，作家宋澤萊反省台灣文學的特質，大力提倡「人權文學」，以彰顯文學的道德正義性。賴和寫於日據時代的〈獄中日記〉，做爲台灣人權文學的代表作，足可當之無愧！

在〈獄中日記〉序中，楊守愚亦提及賴和一生崇拜魯迅之事。自從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家黃得時將賴和比擬爲「台灣的魯迅」（註四四），此一觀點幾乎已是台灣文壇一致的見解。既是醫生也是作家的吳新榮，在一九四八年對賴和亦曾大加推崇：

賴和在台灣，正如魯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聯，任何權威都不能漠視其存在。賴和路線

可說是台灣文學的革命傳統，談台灣文學，如無視此一歷史上的事實便不足瞭解台灣文學。有人說台灣的過去沒有文學，其認識不足才是笑話呢。（註四五）

吳新榮的看法，一則反映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海峽兩岸文學自由交流中，代表當時主流的中國大陸作家對台灣文學認識之不足，一則也是台灣本土作家對賴和文學的高度禮讚。以作品多寡而論，賴和比起魯迅或高爾基而言，的確有所不足，但以賴和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堅持用漢文創作，在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展之際，以福佬話為日常生活語言的人，要將所見所思轉化為文學作品，其負荷之大是前兩位無法相比的，至於文學的內涵、抵抗精神以為帶動整個文學世代前行的影響力，則確有相通的地方。

在台灣文學日漸受到重視的今天，如何深化賴和及其文學的研究；更進一步展開賴和、魯迅、高爾基之間的比較研究，從而多了解三〇年代文學的思潮、動向與影響，正是今後重要的課題。

附註

註三九：〈南遊印象記〉(三)，《台灣民報》九十三號，頁一二。

註四〇：〈留鬚〉，《全集》，頁三七九。

註四一：〈甫三先生〉，原刊於《台灣文藝》二卷一號，後收於《全集》，頁三九七—三九八。

註四二：〈吾人〉，《全集》，頁三八七。

註四三：《政經報》一卷二號，頁一一。

註四四：見〈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台灣文學》二卷四號，頁九。

註四五：以筆名史民在《文藝通訊》中，強調賴和在台灣是革命傳統。楊遠主編《台灣文學》第二輯，

頁一二。



四、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魯迅與賴和



## 一、魯迅與台灣人

魯迅文章中最早提到「台灣人」一辭，見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寫作的一篇雜文，由鬍子式樣的改變，而談到中國歷史的糊塗帳。他懷疑蒙古人「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台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註一）。

後一句話不甚好解，依《魯迅全集》的註解，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各地愛國群眾紛紛展開抵制日貨運動，日本福州領事為破壞這個運動，於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其中有台灣流氓）和便衣警察，毆打表演愛國新劇的學生，次日又打死、打傷學生和市民多人，造成福州慘案。

魯迅之言，是否針對此事，暫且不論，然而由其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是將蒙古人、台灣人與中國人區別開來，魯迅何以有這樣的觀念，是中了日本人的「毒素」？還是客觀的看待近代國家的民族問題？

魯迅最早接觸到台灣人，依其日記，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有一則記載：「張我軍來並贈《台灣民報》四本。」（日記十五），《全集》卷十四，頁六一一—二二

這一次的見面，使得魯迅對台灣人有比較清楚的印象：隔年他在廣州爲台灣青年張秀哲（張月澄）的譯書《勞動問題》，寫了一篇前言，一開頭就說：

還記得在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軍）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全集》，卷三，頁四二五）

事隔一年，魯迅將張我軍的名字記錯了，然而對於當日的會見則印象深刻，這和張我軍送他《台灣民報》不無關係。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起，張我軍翻譯反映台灣殖民地實情的山川均論文〈弱少民族的悲哀〉，開始連載於《台灣民報》（一〇五—一〇八、一一〇、一一二—一一五期，總共刊載九期），至七月二十五日刊畢。以常情而言，一個台灣青年前去拜訪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前輩，可能將刊有自己譯文的刊物送給對方。這四本《台灣民報》大約即是這中間的幾期（註二）。所談論的問題，脫離不了台灣事情。

魯迅在〈寫在《勞動問題》之前〉接著云：「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



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爲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全集》，卷三，頁四二五）這種情形相當類似一九一〇年林獻堂在橫濱往見梁啓超的狀況，當時梁啓超說：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之抗英。（註三）

也極類似一九一三年林獻堂秘書甘得中在東京往見戴季陶的情形，戴季陶云：

祖國現在因爲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爲，爲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須一番整頓，所以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台人。（註四）

清末，中國自顧不暇：民初，中國自顧不暇：北伐前夕，中國也是自顧不暇。魯迅當時主要的角色是扮演「精神界之戰士」，口誅筆伐腐敗的社會現象，奮力清除頑強的舊文化渣滓，即使能體會台灣弱小民族的悲哀，也是無能爲力的，而且他深

知「本國太破爛」，仍得經過一番改造。魯迅實事求是，不打高空。在廣州時，他偶和張秀哲、張死光（張深切）、郭德金等台灣青年見面。張秀哲戰後回台灣亦有回憶云：「他（魯迅）在中山大學當教務長的時代，對我們台灣的民族運動倍加同情和聲援，這是我們非常感激他的。」（註五）現在所知，魯迅和台灣青年的接觸，就是張我軍、張秀哲等人；然而魯迅和台灣極有因緣，在張我軍往見之前，他的作品早已到了台灣，並且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萌芽時期，起了促進的作用。

#### 附註

註一：〈說鬍鬚〉，《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一九八七年三刷），以下簡稱《全集》，卷一，頁一七五。

註二：中島利郎在〈台灣文壇における魯迅の影響（覚え書き）〉一文，收於日本《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十一、十二期。頁一三五，推算張我軍送給魯迅的是《台灣民報》一百十三期至一百十六期，筆者倒以為更有可能是一百十二期至一百十五期；因一百十五期正好張我軍〈弱少民族的悲哀〉

譯文刊載完畢，並有譯者附記，張我軍收到之後，送給魯迅，並談台灣事情。這無關緊要，不過倒希望北京或上海的魯迅紀念館有所收藏。

註三：見葉榮鐘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八三年十月），頁四。

註四：同註三。

註五：《勿忘台灣》「落花夢」（台北，東方，一九四七年八月），頁四五、六。

## 二一、三十年間際不語（賴和詩）：初步比較

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展開新文學運動時，除了提出各種文學主張與介紹文學理論之外，《台灣民報》亦不時轉載了胡適、魯迅、郭沫若、周作人、梁宗岱、冰心等中國新文學家的作品，提供借鏡，其中以魯迅的作品最多，起了作用也最大。這也說明了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文化人有眼光欣賞優秀、傑出的中文作品。

茲將《台灣民報》轉載的魯迅作品及譯作，按照發表時間之先後，列表如下：

| 篇名     | 刊載期間  | 回數 | 日期            | 備註                   |
|--------|-------|----|---------------|----------------------|
| 1 鴨的喜劇 | 41    | 1  | 1925.1.1.     | 轉載自《吶喊》              |
| 2 故鄉   | 50—51 | 2  | 1925.4.1—4.11 |                      |
| 3 犧牲謔  | 53    | 1  | 1925.5.1      | 原刊於《語絲》18期 1925.3.16 |
| 4 狂人日記 | 55—56 | 2  | 1925.5.21—6.1 |                      |
| 5 魚的悲哀 | 57    | 1  | 1925.6.11     | 未說明係愛羅先珂作品           |
| 6 狹的籠  | 69—73 | 5  | 1925.9.6—10.4 | 轉載自《愛羅先珂童話集》         |

|        |                        |   |                     |                           |
|--------|------------------------|---|---------------------|---------------------------|
| 7 阿Q正傳 | 81—85 ; 87<br>—88 ; 91 | 8 | 1925.11.29—1926.2.7 | 刊至第六章〈從中興至末路〉，轉載自<br>《吶喊》 |
| 8 雜感   | 292                    | 1 | 1929.12.22.         | 署名迅，轉載自《華蓋集》              |
| 9 高老夫子 | 307—309                | 3 | 1930.4.5—4.19       | 署名迅                       |

按：（中島利郎在《台灣文壇における魯迅の影響（覚え書き）》首先查證，筆者再查，做了備註說明。）

後兩篇〈雜感〉、〈高老夫子〉轉載於《台灣新民報》較晚，已是台灣文學運動第二期了，不予列入統計。自一九二五年元月至一九二六年二月，短短一年又一個多月中，《台灣民報》四十一期至九十一期，一共五十一期裡，刊載魯迅的作品、譯文一共七篇，出現了二十期，佔百分之三九點二，亦即平均每三期就出現一次以上。以此階段《台灣民報》的作者而言，魯迅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位。

《台灣民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報，當時日本統治下「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並非是純粹的文藝刊物，闢有學藝欄，說明《台灣民報》承續《台灣青年》、《台灣》等啓蒙雜誌的理想，注意及新文學在文化運動中的重要性。

從上表備註中，可以發現《台灣民報》轉載魯迅的作品，譯文主要來自《吶喊》、《愛羅先珂童話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犧牲謨〉一文，原刊於《語絲》十八期，出版日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一個半月後即轉載於五月一日出版的《台灣民報》五十三期，充分顯示出台灣人對於中國新文學刊物並不陌生。大量轉載魯迅的文學作品及譯文，提供了台灣人寫作的參考。當然有的人可以直接購買中國的出版品閱讀，但經由《台灣民報》的轉載，無疑的可以擴大影響力，尤其《台灣民報》自六十七期起發行已超過一萬部，閱讀的人更多。

當時沒有版權的觀念，魯迅沒拿過《台灣民報》一毛錢的版稅，甚至作品被轉載了也不知；然而他的作品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註六）。

賴和發表新文學作品，也就在這時候。雖然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已有〈祝南社十五週年〉的白話詩錄在漢詩的稿本中（註七），正式刊行的第一篇新文學作品〈無題〉，一九二五年八月底，發表於《台灣民報》六十七期。同一期的〈台灣民報特設五問〉中，他是少數特別強調文學的人。賴和將「文學革命之呼聲漸起，新舊思想之衝突漸烈」列為是台灣五年來的重大事項，希望民報多刊載「有台灣地方色彩的文學，世界思潮學術的介紹」：勿刊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學」（見《台灣民報》六十

七期，頁五十四），這是賴和最早揭之的文學理念，也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衡之魯迅的文學也是極富鄉土色彩，並且絕非「歌德派」之作家。在另一篇〈答覆民報設問〉中，被問及「保甲制度當『廢』呢？當『存』呢？甘蔗採取區域制度當『廢』呢？當『存』呢？」，賴和反面作答，頗有「魯迅風」，賴和云：

一、存 我們生有奴隸性，愛把繩索來自己縛束，若一旦這個古法廢除，則沒有可發揮我們的特質。

二、存 我是資本家飼的走狗，若這特權喪失，連我做走狗的，恐怕也沒有噉飯處。（《台灣民報》八十六期，頁二四）

魯迅「匕首式」的雜文，時常流露出這種深刻的反諷，這只要翻翻他和「正人君子」的唇槍舌劍，即可一覽無餘。魯迅在《熱風》的〈題記〉就曾經這樣說過：

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

《熱風》。(《全集》，卷一，頁二九二)

賴和的筆法在這方面，頗能得其神脫其形。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於浙江紹興，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生於台灣彰化。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賴和，終其一生未曾見過魯迅，但深受魯迅影響。依其友人楊守愚的說法：

先生生平很崇拜魯迅先生，不單是創作的態度如此，即在解放運動一面，先生的見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合致。（註八）

魯迅曾經習醫，後來放棄醫學致力於文藝；賴和是開業醫生，且贏得仁醫的美名，但他亦以文學來醫療社會疾病，試圖改變國民精神。做爲一個作家，以當時台灣的條件——早期僅有一份《台灣民報》，環境是比魯迅差多了，何況賴和只能利用醫療之暇寫作，所以作品的量比起魯迅來也是少得多了，但都經由文學反映了所處社會



的重大問題。

比如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暴露出舊禮教的弊病，拈出「吃人」兩字，足以令人毛骨聳然；〈阿Q正傳〉在詼諧的筆調中，以精神勝利法，概括了漢民族的弱點；〈故鄉〉則在平淡中，揭出了階級的鴻溝；〈祝福〉的祥林嫂則是封建禮教下受害的活標本……；魯迅以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揭露、解剖重重的黑暗，恰如醫生操刀，目的是醫療病體。賴和的第一篇小說〈鬪鬧熱〉，以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批判了舊社會迎神賽會所引起的鋪張的、無意義的競爭；〈蛇先生〉破除對於秘方的迷信；〈棋盤邊〉透過「第一等人烏龜老鴿，唯兩件事打雀燒鴉」的反諷，諷刺落伍的舊士紳；〈可憐她死了〉將有力者和弱者，對比呈現出弱肉強食的世界，沒有人性尊嚴的世界……；凡此種種，也是將台灣社會的病症攤開來檢視。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還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政治的壓迫，一是經濟的剝削，賴和也都不懼強權的加以表現，如〈一桿「稱仔」〉、〈惹事〉皆透過譴責執法的警察，將抽象的政治問題形象化表現出來：如〈豐作〉針對製糖會社的剝削，表現了農民被壓迫的慘況；〈善訟的人的故事〉，脫胎於清代的民間故事，表現了窮人的群體性力量終於因公理而得到最後的勝利。賴和面臨的是殖民地解放的問題，他的反抗精神，藉

著這些作品充分表現出來。由於賴和生存的時空，直接受到日本殖民體制之宰制，在這方面他比魯迅表現的更為深刻。

偉大的作家皆能反映時代的重大命題，在這點上賴和是不讓魯迅的；至於在創作的風格上，賴和亦善用諷刺的技巧，冷峻中有著諷諧。

魯迅和賴和當然不能機械性的比較，魯迅比賴和大十三歲，在新文學出發亦早於賴和。那麼賴和向魯迅學習了嗎？筆者以為是有的。以曾轉載於《台灣民報》的〈犧牲謨〉為例，這一篇收於《華蓋集》，向來皆被視為雜文，但筆者認為這是一篇形式創新的小說。題目是仿《尚書》中〈大禹謨〉、〈皋陶謨〉而命名，「謨」原是記君臣謀略的，魯迅在〈犧牲謨〉中刻意起了副標題：「鬼畫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來達到諷刺的效果。文中有情節，以一個一無所有的「同志」向舊日「同志」求援開始，而遭到對方刻薄的消遣，最後被趕出去，還要他爬著出去。全文採用會話體，更特別的只有單邊會話（消遣人的一方），語言極盡刻薄之能事。另一方則是隱藏性的角色，對話沒寫出來，然而一直留在場景中，因此講話的一方並非是獨白而已，在行文中可以充分感受另一方的話總是被打斷，在段落的轉折之間，構成了情節。全文有對話（雖然只以單邊會話出現）、有情節，已充分構成了小說的條件。這樣的

表現形式，極具前衛性，魯迅是多樣的文體家，又得一例證。賴和新文學創作生涯中最後的一篇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全篇以台灣話文寫作。其情節是以獄中同志向舊日同志求援開始，然而已經從政治運動撤退的一方，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捨不得寄錢給對方，最後在官方募捐的壓力下，將捨不得寄出的款項挪用捐給官方，置獄中同志於不顧。賴和在呈現情節方面，多了一些敘述，而全文有三分之二以上皆採用單邊會話體，內容則同樣是同志遺棄同志的情節。

將魯迅的〈犧牲謨〉與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兩文比較（註九），透露出賴和學習魯迅並加以創造性轉化的痕迹。

#### 附註

註六：開創台灣新文學之一的楊雲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紀念魯迅〉（《台灣文化》卷二期）一文中，

認為魯迅對於台灣的啓蒙運動影響最大，並云：「他（魯迅）的創作如〈阿Q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省的雜誌上，他的各種批評、感想之類，沒有一篇不為當時青年所愛讀，現在我還記著

我們那時的興奮。」

註七：參見拙稿〈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第四小節「由舊文學進入新文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號（台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關於賴和邁入新文學的練習階段，有所舉證說明。

註八：楊守愚在賴和的〈獄中日記〉之序文，《政經報》一卷二期，頁十一。引用魯迅的話則出自於《吶喊》之〈自序〉。

註九：魯迅〈犧牲謨〉收於《全集》，卷三，頁三三～六；賴和〈一個同志的批信〉收於《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頁二四六～五一。

### 三、死亡與復活

魯迅以他一生韌性的戰鬥，不愧是中國的脊梁。

賴和在殖民地台灣，「醫德很高，一生為窮苦群眾所仰望。凡台灣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先生無不公開參與或是秘密援助」（註一〇），以致一生兩次下獄，確是台灣的良心。

他們兩人都以文學才情，在新文學運動中，斬荆披棘，開闢了一片文學的新天地，並且無私地提攜後進，使得文學在促進文化向上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都關心政治，都有為勞苦大眾請命的精神，但並沒有完全泛政治化。他們一生的行誼，不僅教育了當代人，也教育了後代。

賴和在日據時代就贏得「台灣的魯迅」之稱號（註一一），說明台灣人對賴和、魯迅都是有所理解的，台灣的左翼文學也確是當時文學的主流。

賴和的環境比魯迅差，且沒有租界可躲（魯迅謂之為且介，「且介」半租界者也），當時發表園地也很有限，所以賴和的作品少，生前甚至沒能出版一本書，但以

他這樣少數的作品，同樣寫漢詩也邁向新文學的陳虛谷即斷言云：

賴和生於唐朝中國則可留名唐詩選；生於現代中國則可媲美魯迅。（註二）

這是知音者之言。既是醫生，也是作家的吳新榮，亦曾推崇：

賴和在台灣，正如魯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聯，任何權威都不能漠視其存在。（註三）

每個作家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反映的問題也不一樣。吳新榮的說法，宜將這三位文學健將等量其觀。「台灣的魯迅」不應做「小魯迅」解，正如「中國高爾基」的魯迅，絕非「小高爾基」，如果不這樣看，就忽視了作家的主體性。

賴和本人，一直到臨死之前，心中都有魯迅存在，可見魯迅在台灣作家心目中的分量。賴和友人也是同一時期寫出優秀新文學作品的楊雲萍，一九四三初賴和住院於台北帝大附設醫院時，曾前往探望，楊氏追憶云：

話說得起勁，就講到魯迅，便談到《北平箋譜》了。……過了一會，賴和先生突然高聲說：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我詫然地注視著賴和先生。他把原來躺臥著的身體，撐起上半身來，用左手壓住著苦痛著的心臟。我慌忙地安慰他：不，等過了三、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是一定會被後代的人記念起來的。（註一四）

楊雲萍這段記述，充滿了感性，我們看到了文學家臨死之前關心文學的一幕。楊雲萍的預言也果真實現。一九七〇年代經過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被扭曲的台灣文學，在諸多有心人的努力之下逐漸復活，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的研究已蔚成風氣，原先被摒棄在學院之外的台灣文學，也在大學、研究所中開課了。從而三〇年代台灣左翼文學必然要重新評估，影響台灣文學發展之一的中國左翼文學也必要重估，左翼文學的靈魂——魯迅，在台灣也必然要重新復活。

附註

註一〇：楊遠語，見於〈台灣新文學二開拓者〉，《文化交流》第一輯，頁十九。

註一一：行之文字首見於黃得時〈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台灣文學》二卷四號，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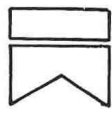
註一二：見陳逸雄〈我對父親的回憶——陳虛谷的爲人與行誼〉，收於《陳虛谷選集》（台北，鴻蒙，一九八五年十月），頁四九六。

註一三：一九四八年九月吳新榮以筆名史民在楊遠主編的《台灣文學》第二輯〈文藝通訊〉欄，強調賴和在台灣是革命傳統，頁十二。

註一四：楊雲萍〈追憶賴和〉一文，原以日文刊於《民俗台灣》三卷四號，題爲〈賴和氏追憶〉，後經譯成中文，收於《賴和先生全集》，可是文中講到魯迅的地方，編者善意改爲「中國一位文學家」，當時談魯迅仍是禁忌。引文見《賴和先生全集》，頁四一〇。







# 輯一





五、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



## 林本源基金會第六十四次台灣研究研討會記錄

主席林衡道：

林瑞明先生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的老師，今天的講題是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各位知道日據時期，就像詩人所說的「厚厚的冰底下有水流著」，日本人加以種種的迫害，但日據時期的老百姓仍發展出來的台灣文學，有的用日文寫，有的用中文寫，賴和是其中有名的一位，賴和用中文寫的時候用「懶雲」的筆名，例如李獻璋先生等編的《台灣民間文學集》的序文，就是用「懶雲」的筆名寫的，我對這方面非常外行，不耽誤各位的時間，我們讓主講人多一點時間，另外今天楊老、黃老兩位文學泰斗在此，我希望兩位對我們多多指教，另外文學史的後起之秀陳少廷也在此，也請多多指教。

林瑞明：

主席、楊老師、黃老師、各位前輩，我今天來這裏談「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其實內心十分惶恐。在座起碼有兩位大老，都曾經參與過台灣新文學運動，對賴和

先生的生平志業，相當清楚，而且也有前輩對台灣新文學史做過研究。我今天這個報告，可能無法全面性的呈現賴和文學的特色，不過提出一點研讀作品的心得，就教於各位。以下就各位手上的綱要來加以解說，這綱要有兩頁，其中一頁是經過整理的賴和先生的作品目錄，一頁摘錄了他的漢詩以及新詩，等一下我會引用，因為怕口齒不清，所以印出來，請大家自行參考。

## 一、世界主義下的台灣新文學

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網羅了全島菁英於台北靜修女學校成立，二十八歲的醫生賴和在蔣渭水推薦下擔任理事；十一月在地球的另一端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由法國文學家安那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獲得了當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的評語是：「認定他輝煌的文學成就，乃在於他高尚的文體、寬憫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個真正法國性情所形成的特質。」這兩件事情似乎毫不相干，然而關聯是有的，以「法國」（France）為筆名的法朗士，影響了遠在台灣賴和。四年以後，三十二歲的賴和，以他生活於殖民地台灣的體驗，站在被支配者的立場，寫下了他抗議日本人不義統治的一篇小說：〈一桿「稱仔」〉。

小說的內容描寫貧苦的農民秦得參由於租不到田，只好當長工，又因過分勞累而得了瘧疾，看西醫服藥每次就需三天的工錢，他是個窮人，沒辦法負擔，只好四處找草藥服用，過了好幾個月，好不容易才不發作，但已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爲了使一家能活命下去，他把妻子向娘家借來的一根金花拿去抵押做資本，並向鄰家

借來一桿稱仔，到小鎮上賣菜。才做了幾天生意，就碰到一個日本巡查光顧，他先是拿幾莖好菜孝敬巡查，對方卻假意推辭，於是他便將菜過秤，本有兩斤足，他甘心一斤以十四兩出售，原以為少算斤兩計價，便能討得對方的歡心。不料巡查卻勃然大怒，把他借來的秤仔當場折斷，還記下姓名、住所；隔日是除夕日，巡查又故意來找麻煩，秦得參頂嘴，巡查即將他押進衙門，法官判下違犯度量衡規則罪，因不願（也捨不得）繳交罰金，判處坐牢三天。妻子設法借錢將他贖出來，好圍爐過年。秦得參感到莫大的悲哀，覺得生不如死，於是當夜殺死了日本巡查，自己也自殺了。整篇小說的結構相當精簡，賴和以批判性寫實主義的手法，將農民秦得參的處境冷靜地推展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在結尾地方達到了高潮，產生了爆發性的力量，令人讀過之後久久難以忘懷。為什麼特別引用〈一桿「稱仔」〉這篇小說呢？因為賴和所有的作品，只有在這篇小說寫下後記，說明其寫作緣由，他是這樣寫的：

「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著筆。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覺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裏，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給文家批判。」



這是賴和在作品中，談到外國作家僅有的一次。這裏提及的《克拉格比》，我們單看中文標題，無法了解究竟是法朗士的那一部作品？也就不清楚賴和受了什麼影響，甚至他開始寫作小說時「模仿」了什麼？我加以追查，得知《克拉格比》是法朗士一九〇一年的作品《恐怖事件》(L'Affaire Crainquebille)，比較正確的音譯是《克蘭克比爾》，賴和不懂法文，想必是透過日文譯本讀了這部作品。法朗士在《恐怖事件》中，通過了一個小販的不公平遭遇，表明了他仇視資本主義秩序，最終導致他擁護社會主義。賴和一生，也有這樣的心路歷程，尤其是文化協會分裂後，他繼續參與新文協的左翼社會運動，直到新文協遭到彈壓，這都可以證明他傾向社會主義。前面提到法朗士得到諾貝爾獎的評語，我覺得也可以放在賴和身上，只要將法國改為台灣即可，因為賴和一輩子都在為台灣的解放而奮鬥。

談到這兒，我們可以檢討幾個問題。首先從前面引述的後記之行文，可以看出這是純粹的中文，而不是台灣話文；用北京話可以完全朗讀出來，使用台語則無法朗讀。這顯示出一九二〇年七月陳炳發表〈文學與職務〉一文以來，歷經甘文芳、陳端明、林南陽（攀龍）、黃呈聰、黃朝琴、蔡孝乾、秀湖生（許乃昌）……，尤其

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張我軍大力推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主張「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確實影響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出發的台灣第一代新文學家，不只賴和，在座的楊老師，年輕時代的第一篇小說〈光臨〉，（同樣是批判代表日本支配階級執法者的警察，比賴和的〈二桿「稱仔」〉早一個半月發表於《台灣民報》），也是通篇可以用北京話來讀，其他如張我軍、陳虛谷、楊守愚……大體都是這樣。台灣新文學之所以展開，除了五四白話文學理論的推介之外，和第一代台灣作家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亦有關聯，像賴和、陳虛谷、楊雲萍、楊守愚……等人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不會講北京話，創作時查字典，也可將台語轉化成北京話。第一代作家和三〇年代以日文創作的作家如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巫永福、呂赫若……，相當不一樣，第二代作家年紀較輕，較少傳統的包袱，更能接受日本文學，他們的文學素養主要是靠閱讀日本作品而來，兩代文學的表現，所接續的源頭，是有明顯的不同；第二代的台灣作家可以說他們未受中國大陸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然而實事求是的話，絕不能否定第一代作家曾接收了此一資源，這是文獻俱在的；在台灣第一代作家尚未寫出新文學作品之前，《台灣民報》除了介紹白話文運動的理論之外，一九二五年以後還曾大量轉載了魯迅、冰心、郭沫

若、胡適……的作品，可以說台灣作家透過這些作品學習，自然也免不了受到影響。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當作家以漢文自豪以排除被統治者視為落後文化的自卑情結，初期尚未自覺到以台灣話文寫作，又不願以日文創作（追風——即謝南光除外），借用發展中的中國白話文，是極為自然的現象。換句話說，這裏頭尚存有以古老漢文明的傳承者之傲氣，以對抗借用漢字的日文之心理背景存在。

第二：也必須說明台灣第一代的作家賴和等人，雖以中國白話文的基調寫作，但他們不能忽略他們那一代人也都會受過完整的日文教育，亦能透過日文直接吸收世界文學的資源，只是不用統治者的語言寫作而已。賴和閱讀法朗士的《恐怖事件》，吸收其菁華寫作即是一例。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台灣文學的源頭，不只是中國大陸的五四新文學運動而已，一開頭就有著更為寬廣、開放的世界性。

第三：五四運動的提倡者，除了胡適留學美國之外，其他如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都曾留學日本多年，他們也曾透過日文去吸收世界思潮，周氏兄弟在東京翻譯東歐、北歐等弱小民族的小說，出版《域外集》，即是一例。簡單來說，中國大陸的新文學運動，亦如同台灣作家得力於日文而受到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不說亦曾受惠於日文。台灣由於是日本的殖民地，

知識分子雖是被迫接受日文教育，但普遍的日文水準，必然高於中國大陸。賴和對於台灣新文學的展開曾經表示過意見：

「新文學運動，純然是受西學的影響而發動的，所以有點西洋氣味，是不能否認，又且受著時代的洗練尚淺，業績猶未完成，也是事實。」

「台灣的新文學，雖不是創作，卻是光明正大的輸入品，決不是贓物。」

「新文學是新發見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墾植，廣闊地開放著，純取世界主義，就是所謂大同者也。」（〈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

在賴和的這些話裏，已間接對爭論不休的台灣新文學起源論做了解答，台灣新文學是受西學影響的「輸入品」，是採世界主義，我剛才在這段的標題用「世界主義下的台灣新文學」，即取義於賴和的文學觀。再進一步說明，台灣第一代的作家賴和等人，的確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吸取資源，而「文學革命」並非近代中國獨特的產物，含有西學的因素；台灣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即具有世界主義的傾向，資源廣闊。將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視為中國新文學的支流、亞流，是忽略了當時台灣處於日本殖民

統治下的特殊環境，也是窄化了台灣新文學。日本台灣文學研究者尾崎秀樹比較研究，提出了這樣的結論：

「台灣文學的短暫歷史，因中間介入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遂成爲與中國文學的歷史及日本文學的歷史，皆不相同的變則性發展。」（決戰下の台灣文學）

這是相當客觀的結論，換句話說台灣文學非中國文學，也非日本文學，具有其獨特性，我們必須從這種「變則性」去思考台灣新文學的起源與發展。

## 二、賴和小說的特色

賴和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一條以中國白話文爲基調，但儘量容納台灣方言的表現方式，這種「亦中亦台」的表現方式，在一九三一年台灣話文論戰尙未掀起之前，雖難免偏向「屈話就文」（主要是台語有些土音無法以漢字充分表達的緣故），但儘量融入方言、俚語、俗語，確實能呈現出鄉土特色。

賴和的作品，從〈一桿「稱仔」〉以後，抗議統治者不義的法理，一直是賴和文學的重心之一，〈豐作〉這一篇曾由楊逵翻譯爲日文，刊於一九三六年日本的《文學案内》新年號，「朝鮮·台灣·中國新銳作家集」，作爲台灣作家的代表作。在這篇小說裏，賴和透過蔗農被製糖會社的嚴重剝削，反映殖民地經濟被掠奪的慘況。因爲要談小說，我將情節略作說明。安分守法的農民添福，爲了獲得會社的超額生產獎金，辛苦終年，就等待收割，會社卻發表了新的採割規則，剝奪蔗農的利益，以致引起所有蔗農的騷動，當別人成羣結隊去包圍會社抗議時，他一直忍氣吞聲，寧可遷就新的採收規則，不去抗爭，以免拿不到獎金，但結果硬是被製糖會社，使用

不正確的磅秤剋扣了四千斤，以致達不到超額生產的標準，給兒子娶媳婦的美夢也因之落空了。在〈豐作〉一文裏，經由支配者魔法一般的磅秤，表現出與〈一桿「稱仔」〉同樣的主題。仔細閱讀賴和小說的人，會發現賴和在〈一桿「稱仔」〉這篇作品的標題，「稱仔」兩字是加了雙引號的，這並不合一般小說取題的慣例，其實這裏頭含著賴和的微言大義，本來秤仔是量重量的工具，必需具備精確度，照理說是絕對客觀的，「法」亦必需精準、客觀始成爲法；台灣人民在統治者制定的法令下，戰兢兢地過生活，一切都要守法，否則必定受到處罰。然而在上面提到的小說〈一桿「稱仔」〉也好，〈豐作〉也好，象徵精準、客觀的磅秤，都會出問題。秦得參爲了討好日本巡查，二斤少算成一斤十四兩不行（其實對方是想白拿）。小說裏的稱仔，在賴和的處理下，已成爲稱量日本殖民統治的一桿「觀念」的稱仔，竟然被代表執法者的日本巡查折斷；蔗農添福想得超額生產獎金，不僅沒能夠「添」，硬是遭到剋扣四千斤。賴和借著理應絕對客觀的工具，徹底揭露出支配者執法的不準確度，象徵了號稱法治的日本統治者，還有什麼「法」可言？無非是無法無天罷了。這充分反映出殖民地民衆的悲哀，賴和的小說處理的非常有技巧，理解這一層象徵意義，即使只是反映菜農、蔗農的小說，都可擴及牽涉法度的問題。賴和的精神是不妥協

的，他的文學是人格的反映，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以來，參與全程的政治、社會運動，遭到恐嚇也好、下獄也好，賴和絕不退縮。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賴和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這種反抗精神，也是台灣文學的特色。

賴和小說的另一特色，表現在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鬪鬧熱〉，即是以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批評舊社會迎神賽會所引來的鋪張的、無意義的競爭。民間宗教、民俗信仰及活動，沒錯，是有其正面功能，但如果迎神賽會，使得窮苦人家也要耗盡老本來迎合舊俗，這無疑也有其負面的影響。賴和批評舊社會陋習的作品，基本上是源於他個人的進步意識（我們不要忘了，賴和家族三代以道士爲業，其家庭在文化上不免較具保守性）。〈蛇先生〉則是以他身爲醫生的眼光，批評了半神話式的，不完全實證的秘方；〈可憐她死了〉則著眼於批判舊仕紳三妻四妾，以女性爲洩慾工具的敗德行爲，富戶阿力的世界愚昧、黑暗，透過經濟力量扮演著「性壓迫者」的角色，賴和將有力者和弱者，對比呈現出一個弱肉強食的陰慘世界，同時也將三〇年代台灣封建時代的殘影，具體表現出來；賴和生前未發表的〈未來的希望〉，阮大舍爲了求得後嗣繼承產業，在太太死後，續娶正妻之外，還要幾房側室及宜男相的婢女，使得本來求取子嗣的正當行爲，一開頭即蒙上荒唐、



好色的世紀末色彩。賴和在小說中處理的方式是以詼諧的語調，寫出了一個只知求神託佛、求取秘方的封閉世界。這類型的小說充分表現了賴和反封建的精神。批判了台灣內部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一方面受到統治者壓迫，另一方面則是扮演壓迫弱者的角色，賴和筆下的舊仕紳、阿舍之類的封建型人物，遠遠落於時代後面，只能在沒有光的世界裏作威作福。這啓蒙時代作家，追求進步的世界，常要面臨處理的題材。在這意義上，賴和的小說，同時具有啓蒙時代作品的特色。

賴和還有一篇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尤其值得多談談，這是他晚期的代表作，應李獻璋編《台灣民間文學集》而寫的，脫胎於清代流傳於彰化民間的傳說。小說裏描寫一個窮苦的知識分子林先生爲死去的窮人爭取一塊葬身之地，不惜和頭家打官司的故事。他若站在頭家立場，當然很好過生活，可是他最後卻選擇爲民上京請願。作品以打官司爲中心線索，揭露了當時台灣社會土財主的霸道，也批判了官府和地主勾結的惡風。最後林先生代表的羣體性力量得到了勝利。這個林先生是賴和筆下理想型的人物。（現實上賴和也曾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一員，日據時代台灣人也一再上京請願，只不過這一次上京請願的地點是東京。）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是在賴和筆下，林先生「聽說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後裔，現在沒人曉得，但是

他的性質卻很率直果敢」；顯示了賴和對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偏見，並且給予很高的評價。（在散文〈忘不了的過年〉賴和稱原住民爲「住在山內那些我們的地主」，在漢族中心的台灣社會中，賴和跨躍了漢族中心的局限性，真是難能可貴。（他的新詩〈南國哀歌〉，是少見的反映霧社事件的作品），塑造出林先生這樣的人物，象徵了賴和心目中理想的有勇氣的台灣人實是不分漢人、原住民的，台灣社會的解放，各族羣應該合力打拼。更有意思的是，小說結尾的地方，林先生爲窮人打贏官司之後下落不明，那位爲林先生出主意寫訴訟書的茶客，更是一個無名無姓的人。賴和筆意大有這類正義的化身，正是散布於廣大的羣衆中。不突出個人的英雄色彩，也是賴和一生行爲事跡之所以感人的地方。以賴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十年（一九二一—一九三一年）的歷程來看，充分顯示他的思想與時俱進，可說是文協的靈魂人物之一，但他絲毫沒有領袖慾，在背後出錢出力，不出風頭；即使在生前被稱爲台灣新文學之父，也是渾然天成，絕非強求而來。〈善訟的人的故事〉中林先生爲民請願，取得勝利，而最後消失於羣衆之中，使得作品更增加了耐人尋味的藝術性。這也是曾參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賴和所憧憬的吧？！然而在日據時代請願運動終歸無效，這不能不說是出生隔年即遭逢割台而變成日本籍台灣人的賴和之悲哀吧。賴和漢詩中

有「我生不幸爲俘囚」之嘆，有「勇士當爲義鬪爭」之理，他的一生也以此貫串，文學反映了他的抵抗精神。

### 三、詩：追求解放的心聲

賴和的詩，包括漢詩及新詩兩部分。他的漢詩卓然成家，畢竟是深受漢文化濡染的人。這些漢詩有些表達了他的思想、感情，有些則透露了他的身世，現在李南衡編的《賴和先生全集》，主要是取自《應社詩薈》中的《懶雲詩存》，僅是賴和漢詩的一小部分，現在我手頭上收集了更多的手稿，還需要時間整理，希望不久之後能提出研究的結果。這兒僅先提出一首有關他身世的漢詩，恐怕在座的前輩都不知道賴和的先人是客家人吧，他正是散居彰化各地的福佬客之一員。在他的《發大料坎》一詩中，賴和詩云：

我本客屬人，鄉語竟自忘。

戚然傷懷抱，數典愧祖宗。

初見時頗為驚訝，因為從來沒有人提及賴和是客屬人。我在研究賴和的過程中，和

賴和的家眷常有接觸，在日據時代賴家的戶口除戶簿之登記，從賴和父親賴天送以下，在種族欄中俱登記為福佬族，所以從來不曾懷疑賴和是福佬人，直到從塵封的漢詩作品中，方確定他是講福佬話的客家人之後代。後來我跟賴和的兒子賴桑、賴汝兩兄弟提到他們是福佬客，他倆頗為驚訝我怎麼會知道，其實就是從讀賴和的漢詩得知的；他們也向我提供了線索，賴家是從花壇鄉搬到彰化來的，賴和的祖父仍是講客家話，父親那一代客家話已不靈光，以後子孫就使用福佬話了，所以賴和詩中有「鄉語竟自忘」之語。我想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混合了客家系、福佬系的血液，是兩族羣的結晶，客語系的台灣人也會很高興吧。其實賴和在〈善訟的人的故事〉，連原住民的後裔都包容了，台灣人實應該具有包容性，才能有充分的開展性。

我們回過來談賴和的新詩，他的新詩比小說還要早發表在《台灣民報》上。第一首發表的新詩是〈覺悟下的犧牲〉，這首詩是針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發生在彰化二林的蔗農抗爭事件，原稿題記寫於十月二十三日，這是事件發生的當天的直接反應，副標題標示「寄二林同志」，稱頌這些被日警逮捕的人為「我的弱者的鬥士們」，賴和當時站在肯定農民爭取權益的正當性立場，最後一節是：「唉，覺悟的犧牲！／覺悟地提供了犧牲，／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這是多麼光

榮！」賴和向來站在農人工人弱勢的立場，這也是賴和之所以能成就抗議文學的重要原因。

另外原有一首反應日本官方實施「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侵佔農民辛苦開發出來的田，所引發的農民事件之長詩〈流離曲〉，長達一百九十二行，後面的最強烈的八十八行，被日本當局禁止發表。第一小節「生的逃脫」開頭兩段是：

澎湃！澎湃！

憲憲！窸窸！

澎湃的眞像把海吹來，

窸窸地甚欲併山捲去，

溪水也已高高漲起，

森茫茫一望無際。

猛雨更挾著怒風，

滾滾地波浪掀空。

驚懼、忽惶、走、藏、  
呼兒、喚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嗥、  
混作一片驚號慘哭，  
奏成悲痛酸悽的葬曲，  
覺得此世界的毀滅，  
就在這一瞬中。

像這樣的文字表現功力，不要說中國大陸三〇年代初期的詩人不見得寫的出來，即使今天台灣的詩人，普遍具掌握文字的技巧，也未必能表現得這麼貼切逼真，更不要說賴和的抗議精神了。這首詩的結尾第三小節，賴和寫道：

天的一邊，地的一角，  
隱隱約約，有旗飄揚，  
被壓迫的大眾，

被搾取的工農，

趨趨！集集！

聚攏到旗下去，

想活動於理想之鄉。

這種色彩，恐怕是賴和被誣指為台共的肇因之一，其實這是抗議詩人的理想，表達了他追求解放的心聲。一九三一年四月發表的〈南國哀歌〉，反應了一九三〇年底的霧社事件，全詩七十六行，至第四十三行以下禁止發表，結尾處賴和這樣高唱：

兄弟們來！來！

捨此一身和他一拼！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用處〕，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鬭爭。



在日本的強力鎮壓下，有這樣的聲音才是彌足珍貴，不追求解放，難道任統治者宰割？賴和的新詩，正如同他的小說，都是重大事件的反響，亦詩亦史，具體表現了在高壓統治下，台灣的胎痛。儘管作品不是很多，但份量絕對不輕，在台灣新文學史上是屬於重量級的作品。

賴和本於人道主義的信念，使他時時都站在弱者、被統治者的一方，表現在文學上則是他抓住了多數，抓住了台灣的痛楚，從而產生了極為感人的力量。他的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亦是本於人道主義的信念，並非完全出於政治理論，或是執著於政治教條。他的政治路線主要是跟著年輕時代的好友（以後還結為姻親）王敏川。一九二八年五月發表於東京《台灣大眾時報》的散文〈前進〉，把他在文化協會分裂時，參與新文協的路線轉折充分表現了出來。在文學的表現上是篇不可多得的散文，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則反映了他的進步性；一九三一年六月台共遭到彈壓，全台灣的政治空氣陷入空前的低潮，賴和在三十一年十月發表的〈低氣壓的山頂〉，最後結尾處，大聲疾呼：

人類的積惡已重，  
自早就該滅亡，  
這冷酷的世界，  
留它還有何用？  
這毀滅一切的狂飆，  
是何等偉大淒壯！  
我獨立在狂飆之中，  
張開喉嚨竭盡力量，  
大著呼聲爲這毀滅頌揚，  
併且爲那未來的不可知的  
人類世界祝福

這是台灣殖民地的吶喊，也是詩人賴和的痛苦和希望。我認爲讀賴和的詩，除了從文學的角度去看，也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得其真髓。

## 四、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台灣話文

在研究賴和的過程中，關於他使用台灣話文寫作及其呈現的台灣主體意識，對我是個相當大的挑戰。我們打開賴和的創作年表目錄，可以看到一九三五年底發表的〈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最後一篇發表的新文學作品，這篇小說完全使用台灣話文，不像以前的作品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再儘量融入方言、俚語以塑造台灣色彩；可以說在他的新文學活動過程中，是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發表之後，被批評為「很難懂」，從此之後，賴和轉寫民間歌謠、竹枝詞以及繼續寫漢詩，再也沒有新文學的創作。以前一般的說法是賴和堅持以中文創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全面開戰之後，在台灣禁止以漢文發表作品，賴和沒有刊物好發表作品，所以停筆了。但事實上，早在一年半之前，賴和完成台灣話文的〈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就已經自動停止新文學的寫作了，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卓然成家的賴和又走回傳統文人的老路呢？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我們知道，日據下三〇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運動有兩次重要的論戰。一次是一

九三〇年新文化協會會員黃石輝所引起的鄉土文學論戰，主要論點是因為生活在台灣，頭頂台灣天，腳踏台灣地，所以作家的天職是以他的健筆描繪台灣經驗，熱愛台灣的鄉土；到了一九三一年郭秋生又掀起台灣話文論戰，郭秋生以及同戰線的人，認為作家既然要描寫台灣的喜怒哀樂，最好就是以大多數人的語言為工具，寧可屈文就話，也就是以表音為主，才能真正貼近大眾的心靈；另一派的人則主張沿用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屈話就文，以中國白話文為主調；台灣話文論者認為屈話就文那根本是「事大主義」（在《南音》的台灣話文討論欄中，常可見到這個名詞）。換言之，強調台灣文學應該有她的主體性。兩派展開論戰，台灣話文派有取得上風的趨勢；但在實踐上，台灣話文的創作首先就會碰上一個不容易解決的難題，因台語確實有一些土音，無法以漢字表達，所以作家寫作時各創新字，以致作品不容易讀。要擁抱鄉土、接近大眾，結果並不是那麼容易。關於創造新字，賴和也曾於一九三二年二月於《南音》一卷三號發表了〈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認為應儘量容納漢文，萬不得已才創造新字，這足以顯現他對台灣話文的關切。延續到一九三五年底他終於寫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嘗試以台灣話文創作。結果如前所說，比起以前的作品變得不好懂了。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可能，一是回到原來以中國

白話文爲基調的寫作方法，在他而言，這是駕輕就熟的老路；一是繼續嘗試台灣話文的寫作，繼續以作品實踐台灣話文的可行性，但他都沒有。選擇轉向寫田園歌謠、竹枝詞（當然形式是舊的，但精神可是新的）。我覺得此一關鍵問題，不僅關係到賴和研究，也關係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應該提出解釋。有人也許認爲賴和已寫了十年，創作力枯竭，已江郎才盡了，但我以爲這說不通，他的文學才情在漢詩裏，仍然虎虎生風；我剛才提及賴和新文學晚期的代表作〈善訟的人的故事〉，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底，三五年底也寫了〈赴了春宴回來〉，雖然氣勢上弱了一些，並還有反諷的味道，顯然不是創作力枯竭的問題，應該是他台灣話文論戰之後，更加强了他台灣主體的意念，但是台灣話文新字的問題沒有解決，繼續寫一些「不好懂」的作品，倒不如轉寫舊形式的歌謠體；雖以台灣話文爲主，因有韻腳的關係，還容易讀，我以爲他這些田園歌謠、竹枝詞大有舊瓶裝新酒的意味。

另外，停止新文學的創作，是否由於賴和失掉了文學的戰鬥力？查查他的作品和生平對照，顯然也不是。因爲中日戰爭時期，即使在逐步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壓力下，賴和與彰化地區的文友還曾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文學俱樂部，戲稱「半線俱樂部」，「半線」是彰化的古地名，如果用日語讀起來，恰好是「はんせん」，即與「反

戰」同音，這裏頭有著賴和的機智與幽默，但也借「反戰」的日音來表達他的不滿。可能也是因為成立了半線俱樂部，文友們一聲聲「はんせん」，惹火了憲警當局，使得賴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當天，他就被日本憲警關到監牢，關了五十多天。意外的留下了〈獄中日記〉，使得我們能多了解一些他晚年的生活狀況及思想。在獄中高等警察及憲兵追查他與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的同班同學翁俊明之間的關係。翁俊明這時正在香港積極籌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正在進行對台工作。（不要忘了中國共產黨也納在抗戰的陣營中）賴和一方面是因為翁俊明的關係，一方面也因「反戰」俱樂部被抓。這證明即使到了世界大戰期間，賴和在官方的眼中仍是個危險份子。在賴和的漢詩中對日本也是不假辭色，像「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存；人間苦樂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暗示著日本統治沒多久，台灣天又快了。所以不能認為賴和失掉了文學的戰鬥力，才停止新文學的創作。

我的看法是一九三一年台灣話文論戰之後，台灣主體意識在賴和身上更強化了；他在社會運動的路線也能支持我這個看法。（關於這一問題、論證繁瑣，請參考最近在《台灣風物》上發表的拙稿〈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一九三一）〉。

可惜的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漢文被禁止發表，台灣話文運動能夠推展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六年，失掉了一個繼續成長的機會，如果有比較長的時間，比較多的人從事台灣話文的寫作，台灣話文可以走出一條路來；就賴和而言，他關切此一問題，但也僅僅寫了一篇〈一個同志的批信〉而已，沒有繼續在新文學方面發展，頗為可惜。賴和的田園歌謠、竹枝詞應該併到此一範疇來看，更可以看到他對台灣話文的關切。賴和不愧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新文學播種、萌芽、成長、開花的過程，至於結果仍需後輩文學家的繼續努力。

## 五、抵抗的精神、抵抗的文學

剛才已談了許多了，但也許在座仍有人質疑，賴和在一九二五年至三五年間，十年的文學歷程，正式發表的新文學作品，只有四十多篇，生前也沒能結集出版一本他個人的集子，真能稱得上是台灣新文學之父嗎？我的看法是絕對肯定的。衡量一個作家是不是重要、偉大，不在於作品多寡，其中之一，在於是否植根於現實，反映了重大的問題，張我軍等人介紹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到台灣來，如果僅有理論，而沒有堅實的作品，是沒辦法使新文學運動取得實質成就。賴和在作品的發表上，起步很早，他正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即被同時起步的楊老在戰後稱許為「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優婉」，顯見賴和有極大的文學才情。大家都知道又是詩人，又是史家的楊老是不輕易讚美人的，對於賴和，他向來敬佩；更重要的是賴和的作品，絕大多數緊扣著台灣的重大問題而寫，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政治，一是經濟，他都觸及到了。政治上，他批判警察，因為警察是執法的代表，如〈一桿「稱仔」〉、〈惹事〉等篇，透過



譴責執法的警察，可以將比較抽象的政治問題，落實下來，給予形象，達到批判的目的；經濟上，主要針對製糖會社，因為甘蔗是台灣三大經濟作物，在他的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小說〈豐作〉都反映了經濟問題，〈流離曲〉反映了土地問題，也表達了農民被壓迫、剝削的慘況；更難得的，他尚且同情原住民的遭遇，〈南國哀歌〉，反映了霧社事件，給人與原住民同命的感受，是日據下台灣文學少數反映原住民問題的作品之一。簡單的說，凡是重要的問題，賴和經過思考在文學上都有了回應，並且提出了批判性的看法。我認為這是衡量一個作家，是不是重要作家的基準點；賴和的作品又充分具備了藝術性，量雖不多，質卻絕對經得起分析，所以賴和是個重量級的作家。

也許在座年輕人有人會質疑賴和掌握中文的表達力，會覺得他的作品不容易讀。讀慣了陳映真、黃春明、宋澤萊……作品的人當然一開頭不習慣讀賴和的文章，但我要提醒年輕人，賴和是啟蒙時代的作家，應該放回他的時代來看。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他選用漢文創作新文學，從思考到化成文字，中間是個相當困難的過程，是很辛苦的事。前輩學者李獻璋，年輕時也曾參與台灣話文論戰，並編了《台灣民間文學集》，對賴和有相當的認識與了解，他曾經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值得我們反覆

思考，他說：

賴和曾向筆者提及，他在創作之初，先用漢文思考，用北京話寫了之後，再改成台灣話。台灣人在台灣政治命運上所負荷的重十字架，他以一個無術可遁逃的作家的心情，自己一個人承擔這個重荷，替我們寫下了精神食糧。賴和和其他人不一樣，他以台灣人的苦惱為自己的苦惱，而生存下去，這是他作品中的歷史意義。（〈台灣鄉土話文運動〉）

這段話具體生動的說明了賴和在創作上文字的轉換過程，充分顯示了一個沒有充分文字標記語言的族羣的悲哀。台灣話文的標準化，是一個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然而現在我們要了解賴和其人及其所反映的時代，應多讀他的作品，撥開文字障，直指內心才更重要。

關於前面提到的〈獄中日記〉，我再講一則我個人的經驗。在我研究賴和的過程中，儘量去接觸一些曾和賴和有因緣的人，請他們談談賴和，因我出生於戰後，不可能親見賴和，訪談賴和的親友，可增加一些具體的印象。一九八六年初夏，我前往南投市訪問賴和的同班同學，吳定江老先生，他剛結束漫長的眼科醫生生涯，當

時他已九十六歲高齡，世事幾乎已遺忘了。在他歷時有年的幽暗的診察室中，我請教他有關醫學校時代的賴和，對於七、八十年前的事情，幾乎已不復記憶，一再重複說賴和是個人格者。談了幾近一個鐘頭，他突然以台語吟誦了賴和的一首詩；

嚶嚶只想整人來，吾血無多心已灰。  
你自要生吾要活，攻防各盡畢生才。

這是賴和〈獄中日記〉裏的一首詩，蚊子無疑是象徵著日本統治者，賴和身爲被關的台灣人，當時他已體弱多病，又煩惱著家中的經濟問題，然而仍堅持要活命下去，各有各的立場。當吳老先生以鄉音緩緩吟誦時，令我不禁熱淚盈眶，在微弱的光下，一時之間，我彷彿面對了賴和先生，同承擔了他的苦難，令我終生難忘。賴和的一生，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不管在新文學運動或政治、社會運動中都堅持反抗的精神，我覺得這種精神是台灣文學中最可貴的精神。

## 討論部分

林衡道：

我們很感謝林教授精闢的演講，我相信在座各位與我應有一個共同感覺，以往研究近代台灣文學的人很少談政治，林教授突破談政治以外，也談文學要素，這很重要，比如說，賴和受到安那托爾·法朗士的影響，這個作法以往很少，難能可貴。另外常常有年輕人來問，台灣近代文學運動究竟受五四運動還是受日本影響，林教授指出了階段性，第一階段是受五四影響，後一階段是日本影響，很清楚，非常感謝。另外我個人有一個要求，以後請林教授就晚近法國文藝社會學觀點，專門研究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做一番考察，其實台灣近代文學是沒有人看的，至少很少人看，多數人看的都是最無用的「可愛的仇人」等，這是今後的問題，現在請兩位大老指教。

楊雲萍：

我想講話，但感慨無量，沒想到賴和有今天的評價，你們大概知道，他要死以

前，我去台大醫院看他，這個事情我寫在〈追憶賴和〉，他看到我就說，我們兩個做的台灣文學完了，我跟他說，「不，三十年後，一定有人提到我們」，這句話今天應驗了，除了楊雲萍之外恐怕沒有人知道，但對賴和已經有這樣好的研究，可見楊雲萍有先見之明。不過，他曾說，他看到我的〈光臨〉才感覺到文字有這麼大的力量，他批評警察，是因為他看到我的〈光臨〉，警察的問題，你們查一查可以知道日本統治的權力，最直接的就是警察，所以對警察的批評，即對整個日本統治的批評，而批評的第一個人是楊雲萍的〈光臨〉，不過，後來我感覺台灣人根本不知道文學，所以我把自已改在歷史方面，我不知道這對我自已是好是壞，還是難說。

另外賴和的日文問題，我記得，他要學英文時，我還送他一本英文字典，去年我去彰化，他的兒子說那本字典還在，日本時代，我們真的是透過日文去接觸外國文學，尤其大正民主期，許多東西介紹到日本，我們用日文來接受外國東西，我自已也覺得，我寫日文比中文容易。

至於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很少，現在有「新文學大系」，但買不起，我自己寫詩，只買了詩的部份，其中有幾首可以，其它連中學生的程度都不如，所以我們根本是受日本的影響及日本所翻譯的外國文學影響，尤其是大正時代是民主

時代，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魯迅、共產主義是受到日本的影響，關於賴和講起來，他表面非常溫和，但內心非常火熱，就像他常穿台灣服，好像是鄉下人，但不可以用表面來看他。要研究賴和先生，除了他的文學、思想之外，應多研究當時日本的文學思想，如果有機會，我來講「楊雲萍認為的賴和」。

黃得時：

本來台灣新文學運動，一般社會人士、學術界都無人研究，但近年來學術界開始關心台灣文學現狀，對賴和的研究早應有人做了，但直到林先生在成大歷史學報那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才等到，最近已經有多人注意台灣新文學運動，如輔仁大學有一女學生的碩士論文，寫有關舊文學的問題，所以光復以前的學術研究，現在已慢慢開始，另外在日本研究台灣新文學運動有兩個中心，一個在東京，一個在天理大學，這樣台灣新文學研究，已由困難的地方走進各大學，今天林先生做的賴和研究，就是他們保持先賢的研究，希望以後更多研究以報答先賢一片苦心。

其次，我講賴和與我個人關係，因為賴和主編台灣民報，後來賴和離開台灣民報，短時間找不到人，我在大學畢業後，就去主編中文副刊，以及日文副刊，因賴和是老前輩，所以那時我特別到彰化去拜訪賴和先生，去時賴和先生正在看病人，

他不穿西裝，穿白的台灣服，看完病，和我們談了半天，很關心台灣文學以後如何走，也問了一些如何繼承他辦台灣民報的問題。

有人認為他是左派，所以將他的牌位從忠烈祠中遷出來，後來地方父老、中央民意代表，各方面查證，向內政部陳情，後來內政部也認為應遷回，在台灣有座談會，我去參加後來寫了有關文章，有人認為在日本時代凡反對日本政府大都思想有問題，若未反對則屬忠貞之士，賴和是抗議作家，所以有人誤會賴和是左派，後來好在地方父老和中央民意代表向內政部陳情，今年五月四日，我寫了一篇五四運動對台灣影響的文章，登在中央日報，裏頭我也提到了賴和先生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本人受賴和很多影響，讀過他很多作品。

如果講賴和是小說家，他的作品實在太少，只有二十篇，這點和魯迅一樣，魯迅今天講他是偉大的作家，但魯迅的作品也不多，只有兩本，一本是《彷徨》，一本是《吶喊》，其他都是隨筆、書信，賴和先生，我寫他是台灣新文學的創造者，我不稱他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關於台灣話文問題，在過去有一段時期，也有很多人主張小說應用台灣話文來寫，但那時很多人都失敗，有台北郭秋生、屏東黃石輝及廖漢臣，但台灣話文仍不普及，因為有音無字，故無法表達，為勉強表示，也有找歌仔

戲詞本，看看該如何使用，但都不成功，最近自立晚報向陽先生用台灣話做新詩，出了一本詩集，很不錯，所以台灣話文問題仍可繼續改進，但實在是有些困難，有待後進努力。

今天我本來找編《賴和先生全集》的李南衡先生來參加，但剛好他要去日本，所以沒來，賴和作品中有很多不懂意思的地方是台灣話轉變而來的，都是由他註解的，林先生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研究很好，我認為年輕人應該更多對先賢的研究，如連雅堂先生，至今也尚未有一篇學術研究作品，有待後進努力。

陳少廷：

我趁這個機會，向林教授請教，剛才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我很同意，但賴和在中國大陸只有一年多，究竟他在中國行醫之外，直接受到中國新文學影響有多少，你的論文我看過，但似乎沒有考證，到底資料如何？第二，剛才黃得時、林衡道先生都提到過，最近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很多，我曾寫過文章介紹，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人物是張我軍、賴和，他們強調重點雖是反封建、反帝，但更強調的不是站在台灣人立場，而是站在中國人立場，強調中國漢民族主義精神，但我認為，賴和的立場是站在台灣人立場強於站在中國人立場，中共的資料



大都是強調他的中國立場，有關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很多書的第一章，或文章的前面都是寫賴和，比如第一屆中國文學會議，就有賴和研究，不知林教授對這些文獻，有何評估？

楊雲萍：

事實上，賴和未曾對我提過在中國的時期的事情，很奇怪，即使是我曾去他家和他一起到八卦山去喝酒醉，一起睡覺，他都未曾向我提起過。

第二點，張我軍和賴和要分開來看，張我軍是受中國大陸影響，賴和受中國文學影響少，而是站在台灣立場，尤其他討厭日本人，因為他曾被抓去關。張我軍受五四運動影響，他的《亂都之戀》是張我軍在北京受的影響而寫成，但賴和受日本文學影響比中國文學多，雖有唸舊文學，彰化有一些漢學，但這兩者要分開，另外，大正時期日本民主思潮的影響也很大，所以要研究台灣，必須研究日本的思想。若研究中國文學反而無效，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是光復以後的事，甚至可以說，台灣的作家是用日文在感覺、在思想，所以日本對台灣的影響，才是決定性的影響，他從未提過在大陸時期的事情，可能是這個時期對他沒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很好。

林瑞明：

依我的了解，賴和是有大陸經驗，但相當不愉快，他們到廈門的鼓浪嶼博愛醫院當醫官，博愛醫院是總督府的機構，等於是廈門人口中台灣呆狗中較高級的一部份，他對這部份的生活經驗感到苦悶、疲憊、厭煩，所以他回來，但他在一九一九年到大陸時正好是白話文學運動展開，資料中可以看到他有閱讀刊物的記錄，而且一九二一年回台後，他開始在稿本上練習白話新詩，這白話新詩比較接近五四，所以說也不是都沒有影響，經驗不愉快是另一回事。但做爲一個作家，不用日文寫作，自然用漢文寫作，中國式白話文爲基調自然是免不了。整個來說，我認爲他早期因爲要對抗日本，所以把漢民族意識提得很高，可是文化協會中扮演的角色，又見他傾向於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所以，他大致有兩個階段，有個轉折，簡單來講可能與一九一九年前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經驗不愉快有關，至於中共對台灣新文學的研究，大體看來統戰性大於學術性，以上是我簡單的回答。

陳少廷：

我大致同意，也就是說，賴和接近王敏川有社會主義精神，而其實日本也是社會主義精神爲主。

楊雲萍：

彰化地區有很多舊詩人的背景，故賴和受舊詩的影響也很大，也很值得檢討。

林衡道：

感謝各位，現在每年愈來愈多寫有關日據時期的論文，但都把日據時期當作一天來看，在此我要強調，日據時期有階段性，最通俗的分類，應分為軍政、民政、大正民主期、昭和法西斯時期、向戰爭邁進五個時期，否則寫什麼都沒有意義。

楊雲萍：

台灣人受日本人影響而反日本人，這也值得深思。

林衡道：

現在有人認為日本時代好，有人認為日本時代壞，其實是大正民主期好，昭和法西斯時代壞，就這麼一回事。

六、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



王詩琅是日據時代以來，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相當活躍的一位作家、評論家、編輯人，從三〇年代延續到八〇年代，歷時半個世紀有餘，也身經不同的政權，然而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台灣文獻的整理與保存，在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賴懶雲論〉以王錦江筆名，列為「台灣文壇人物論之四」，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時報》二〇一號，日文原長約四千七百字左右，是日據時代賴和作品論中最傑出的一篇。今天讀來，仍處處閃耀著真知卓見的靈光。

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主編《賴和先生全集》出版，明潭將王詩琅的原作全文翻譯成中文，收於全集內，中文約五千字。對於賴和研究提供了相當助益。

〈賴懶雲論〉對於賴和的描寫極為貼切傳神，指出他不是那種才氣煥發的才子型人物，是所謂良心的知識階級典型。從賴和寫作通常要一稿、二稿、三稿……，不斷修正，才完成作品，確是如此；從他一九二二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歷經轉折，而始終與時俱進，不曾退卻，試圖解放「奴隸的奴隸」，也的確是個有良心的文化人。王詩琅對於賴和作品的理解，亦能指出其優點、缺點（如說賴和的作品，由於全力貫注在事件的發展，而常常失去具象性，人物也比較不生動），善盡了評論家的角色。他評論賴和一九三二年發表於《南音》的〈惹事〉，三言兩語就闡釋了賴和小說的特

色：

這一篇作品所給予我們的感動，是夏目漱石《少爺》中的幽默，加上略為沖淡了的魯迅的辛辣所混合的味道。這種既幽默又辛辣的描寫，正是賴懶雲所喜歡的典型，卻可說在這一篇中描寫得最為生動、多彩。

賴和的筆法冷峻，而又混雜著詼諧，針對表現的題材，常又一針見血直逼入問題癥結的所在，字裡行間每每又流露出深刻的反諷，足以促人深省，在這方面頗有魯迅之風。《惹事》中的少年，甫出校門少不更事，有他的衝動（在魚池旁邊與另一少年打架之情節），也有他的正義感（當警察誣指村婦偷雞時，少年生起和自己力量不相應的俠義心來），小說中的情節，多少具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夏目漱石筆下的《少爺》（《坊ちゃん》），亦是取材於夏目剛到松山任教時的急躁魯莽，而又充滿正義感的特性。這兩篇小說都有著向既成觀念以及黑暗勢力挑戰的風格。

賴和的《惹事》在《南音》刊畢的次期（一卷十一號），即有郭秋生（芥舟）的評論云：

賴雲兄的〈惹事〉，真的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了，那樣的題材，確是非他的關心不能把握，非他的伎倆不夠以表現出來的。一種不可抑制的悲憤，油然爆破我們的心頭。

王詩琅針對〈惹事〉，他不僅從表現的題材與技巧來看，還指出其風格的特色，顯示出他對文學認識之廣度。此外，他還從在日本統治下正開展中的台灣新文學，指出影響台灣文學發展的多元化現象。王詩琅客觀地說：

從某一個角度說，台灣文學是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交流，而一般的台灣作家，都受到雙方面文學的影響，很少只受其中一方面的影響。但是賴懶雲卻是這個受到單方面影響較大的人。較之日本文學對他的影響，他可說是由中國文學培養長大的作家。

這和賴和選擇用漢文創作有關，台灣第一代的新文學作家，絕大多數具有傳統漢學的修養，都能寫出極為出色的漢詩，以突顯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原有的文化特色。賴和、楊雲萍、陳虛谷、楊守愚……等人，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和櫟社、南

社……等詩社的漢詩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年紀較輕的一代，不僅有文化遺民的意識，在二〇年代隨著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風潮，亦邁入了新文學的領域，形成台灣第一代的新文學家，自然受到中國新舊文學較大的影響。因為以漢文創作，中國文學形成顯性的基因，但另一方面，賴和一代的文化人亦受日本教育，他們藉著日文閱讀日本文學及吸收西洋文學思潮，這些知識遂成爲隱性的基因。台灣第一步的漢文系新文學作家，絕不類同於三十年代出發的第二代日文系作家，如楊逵、巫永福、張文環、龍瑛宗……等人。隨著日本統治時間的增長，第二代作家的主要影響因素，無形中轉換了，亦即日本文學成爲顯性的基因，而中國文學對於日文系作家而言，則必須透過翻譯來吸收，變成隱性了，甚至有些第三代作家如周金波、陳火泉……等，精神、意識受到日本文化較大的影響，在決戰期中寫下了皇民文學。這是殖民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特殊現象。研究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必須扣緊時代來看，方能看出「世界主義下的台灣新文學」之多元化，從而釐定各個階段不同的特色。

王詩琅評論賴和是中國文學培養長大的作家，從客觀現象來看，這是相當中肯的看法。現在有些文評家，因爲台灣本位之關係，硬要將台灣新文學之中國因素抽



離，這完全抹殺了事實。比較之下，還是日據下的王詩琅看得清楚。王詩琅〈賴懶雲論〉中還特別強調賴和是：

一個不能不和我們這樣的時代聯繫起來評論的作家。但丁通過他的《神曲》、哥德則通過他的《浮士德》來發抒他心中的悲苦；而現代人卻必須藉著對於現實的反映來傾倒自己心中不平的抑憤。

賴和做爲一個作家之外，他還全程參與了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和時代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如果將賴和的文學和時代抽離，無異於買櫝還珠，無法充分了解賴和文學和時代辯證的關係。賴和是個有反省力、有思想性的作家，他以文學見證了時代。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左右分裂後，擔任左翼新文協最後一任的委員長王敏川，曾有〈口占贈史雲〉一詩：

振起斯文志未灰，元龍豪氣謫仙才；

好將一管生花筆，寫出人間苦痛來。

以史雲稱文學家的賴和，不愧是知心好友的深切認識。傳統的觀念，總認為小說家所寫的作品，無非是稗官野史，然而歷史也是人寫的，「事實」本就不易探究。如果套用文學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精警之語：

從前的歷史家，是以「事實」的形式為我們寫出有趣的小說；近代的小說家，則是在小說的假面具下，為我們提供淡然無趣的事實。

賴和的部分小說，確能在乍看似無趣之中，傳達了台灣人民被政治、經濟雙重壓迫之下的痛苦，真正表現出了日本殖民體制下「反體制的時代精神」。

王敏川在〈口占贈史雲〉詩中，起句就提及「志未灰」，加上這首詩發表於一九四〇年十月的《瀛海詩集》，繫年於一九三七年的〈喜兒子面會〉之前一首，可以判定這首詩是賴和以筆名「灰」（這也是僅有的一次），發表台灣話文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台灣新文學》創刊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之後不久的作品。此時賴和的台灣主體意識愈見強烈，嘗試全篇以台灣話文創作，然而卻因台灣話文書寫的困

難，而有了挫折感。王詩琅在〈賴懶雲論〉中，亦看出了這問題所反映的危機，王詩琅云：

他（賴和）的藝術手腕，有一種把事象淡然地，不焦燥、不喧囂地向讀者娓娓道來的大家風格。但是在他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裡，令人覺得他過去的強韌性顯得淡泊了，創作的火把也顯得抑弱了。如果筆者的這個觀察沒有錯誤，這是做爲一個作家的危機。

在這篇小說裡，不僅賴和署名「灰」，連主角的名字也命名爲施灰，被關在監牢裡的同志則取名許修（許、苦台語同音，即苦修），全篇當然亦有反諷的意味，形式也頗創新，然而帶著灰色調，大體也反映出台灣社會、政治、運動被全面鎮壓後的苦悶、低調。這篇作品以台灣話文寫作，不像以前的作品能夠自由揮灑，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這是文字無法充分配合語言，所形成的困擾。王詩琅論及台灣新文學創作中的這道難關，歸結云：

文字是要求切實感的，是要求言文一致的，因此如何表現台灣語言，便成了一個難題。

賴和早先崛起於台灣文壇，是以中國式白話文，再混雜台灣的俚諺、俗語，形成一種具台灣色彩的折衷式白話文，他先前發表的作品，皆有這樣的特色。經一九三一、三二年郭秋生掀起台灣話文論戰，賴和亦曾於一九三二年在《南音》發表〈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表達他的看法。等到著手以台灣話文寫作全文時，卻真正碰到了某些台灣白話音有音無字的難題，反而造成讀者理解上的困難。在賴和發表的新文學創作繫年上，這是他最後發表的新文學作品。以後爲了避開書寫上的困難，轉回寫竹枝詞、田園歌謠等舊瓶裝新酒的創作，從此未再發表小說、新詩。距離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殖民政府禁止漢文報刊（僅僅剩下《風月報》），還有一年半之久。由此角度來看，賴和以台灣話文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創作危機。換言之，日本殖民政府尚未禁刊漢文作品，他即自動停止了發表新文學創作。從一九二五年七月發表散文〈無題〉於《台灣新民報》六十七號，新文學生涯前後十年半。前述王敏川的〈口占贈史雲〉是知心好友對他的鼓勵，當是希望他能以生花妙筆繼續創作新文學，以寫出民衆的心聲，但賴和因語文的困擾，反而陷入了危機。

賴和原本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隨著三〇年代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的深刻化，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意識愈見抬頭。在他眾多不斷修改的漢詩中，有一首〈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一〉，原詩云：

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  
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

這是針對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感慨歌詠，乙未抗日失敗，出生於一八九四年的賴和終生有「我生不幸爲俘囚」（〈飲酒〉）之嘆。當時台灣民衆爲了保鄉衛土，以落後武器對抗日本現代化軍隊的慘痛經驗，是台灣人深刻的痛楚。賴和在《懶雲詩存》中亦有表現，如〈定寨〉一詩是他登臨彰化八卦山（乙未抗日之役，中部地方最慘烈的一戰）的感嘆，其中詩云：

山河歷歷新，世代悠悠易；  
先民流血處，千載土猶赤。

將台灣中部地方貧瘠的紅土與戰爭聯想一起，而賦予新義。再如〈讀林子瑾黃虎旗詩〉，台灣民主國的國旗，更是令他感觸深刻，全詩云：

黃虎旗，此何時？閒掛壁上網蛛絲；

彈痕戰血空陸離，不是盛名後難繼。

子孫蟄伏良堪悲，三十年間噤不語；

忘有共和獨立時，先民走險空流血。

後人弔古徒有詩，黃龍破碎亦已久；

風雲變幻那得知，仰首向天發長嘆。

堂堂日沒西山陞。

黃虎旗的設計，虎首向天而尾翹，賴和詩中最後兩句的表現非常特別，一是緬懷台灣民主國之過去，一是期待統治台灣的日本之「日沒西山」，留下餘韻未言。就律詩的形式而論，表現並不完整，但彷彿空谷回音，令人迴盪心頭。

前引〈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一〉，在他後期的改稿詩中，原詩意義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可做為賴和台灣主體意識深刻化的例證。改作詩云：

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  
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改動的部分不多，僅僅八個字而已，然而這裡頭有對台灣民主國的無限惋惜，有對台灣歷史的反省，敢於從根本之處質疑史書之記載。在日本統治下的賴和，歷經社會、政治運動的衝擊、挑戰，以這樣的改稿，呈現了他「民族主義／國家主義」(Nationalism)前後期不同的面貌。

這種變化，也反映於賴和換用台灣話文創作，以及在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因台灣話文表現困難，從此不再發表新文學。

王詩琅在〈賴懶雲論〉中仍有所期待於他，該文結論云：

當我們按照他的年代順序通讀他的作品時，我們看見每一篇作品的發展情況。筆者毋寧

還對於作者今後的努力和成就，寄予期望。我不記得有誰曾說過這樣的話：三十而寫小說，至四十始能寫出真正的小說。在這個意味上，筆者仍願寄厚望於他。

然而，在新文學創作上，賴和令王詩琅失望了。這是弱小民族的悲哀，是沒有充分書寫文字的族羣的悲哀，賴和在猶當盛年之際，停止發表新文學創作的嚴肅意義在此，他的新文學生涯顯現了三〇年代台灣新文學家的掙扎，這不單是台灣文學史上的問題，也是台灣精神史上值得探索的現象。

王詩琅的〈賴懶雲論〉是三〇年代，問題意識極為深刻的論文，代表了當時文學評論的水平，絕不在今日之下。現時收於《賴和先生全集》的〈賴懶雲論〉中文譯文，對照日文原文，起碼有兩處應予更正，有助於對賴和作品的理解。

其中之一：

譯文：當時高舉新文學之大旗，而直逼舊文學之牙城，並發出激烈的砲火的，有張我軍和蔡孝乾等人。然而，處在喧囂的論爭之中的賴懶雲，卻正埋首寫著目前在台灣新民報連載的小說春雷譜，而稍後受到楊雲萍的評論。



日文：當時その大旗を掲げて舊文学の牙城に迫り、激烈に砲火を交へたのが、張我軍や蔡孝乾等であったが、その喧々囂々たる論争の最中であつて頼懶雲は、今台湾新民報に連載されている小説（春雷譜）を書きつつある楊雲萍に稍後れてデビューした。

關鍵處在於後半段誤譯了。首先明潭將日文外來語：デビュー（debut）——其法文是「初登場」之義——，誤爲レビュー（review）——評論——，再將語格關係錯置，遂有此誤譯。應譯爲：處在喧囂論争核心的頼懶雲，初登臨文壇，稍後於目前正寫著小説〈春雷譜〉於台灣新民報連載的楊雲萍。

由於明潭之誤譯，頼恆顏、李南衡合編的〈頼和先生年譜簡編〉，遂將〈春雷譜〉誤認是頼和的作品而載於一九三六年年表內。致使研究者誤以爲頼和一九三六年中除了刊於《東亞新報》新年號的〈赴了春宴回來〉（稿末註明完稿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之外，尙有新文學創作發表。由於〈春雷譜〉刊載於《台灣新民報》日刊部分，報紙不易保存，（台灣由於以前不重視日據時代的文獻資料，圖書館未見存有《台灣新民報》日刊），此條登載於頼和年表之內的記事，容易造成誤解。筆者一九

八五年發表〈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於《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號，列表說明賴和生前所發表的新文學創作，已將〈春雷譜〉還之於原作者楊雲萍。當時猶未找到王詩琅〈賴懶雲論〉之日文原文，僅能參考明潭之譯文，遂在表前說明：「〈賴和先生年表簡編〉中，一九三六年，記載《春雷譜》於《台灣新民報》連載，延續王詩琅之誤記」。僅一半正確，亦即〈春雷譜〉確實非賴和之作品，但卻唐突了前輩王詩琅。當時筆者亦曾請教於他，但畢竟年事已高，不復記憶。其實王詩琅在〈賴懶雲論〉的說法是正確的，錯誤在於譯文。比賴和年輕十二歲的楊雲萍，從事新文學，從文獻資料來看，也確實稍早於賴和。

其中之一：

譯文：楊逵說他「在某一個意義上說，是台灣關心大眾生活的文學的元老」。

日文：楊逵の「言はば，台灣プロ文學の元老」。

關鍵處在於身處戒嚴體制之下，談「普羅」(プロ)色變，因此譯文在這裡用了曲筆，這絕對可以理解。問題是王詩琅在一九三六年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時報》，

公然引用楊逵的「普羅」言論，說賴和「是所謂的台灣普羅文學的元老」，雖然王詩琅在文後亦稍加宛轉解釋「俠義的正義感，才是他的思想的真面目」，但引文中的楊逵正是普羅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也是農民運動的健將，他與賴和亦有很深的淵源，甚至筆名楊逵都是賴和為他所取的，取代了他一向嫌惡的原名楊貴。楊逵對於賴和的理解，可說是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於充分具有抵抗精神的賴和之普遍性的認識。反觀在七〇年代末期，在戒嚴體制之下，反共當道，連三〇年代台灣左翼的普羅文學，具有抗日的積極意義，都避之唯恐不及。賴和及他這一、兩代生存於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反抗作家，真實的形象也因之模糊了。

台灣文學道路是曲折的，這也反映了台灣歷史之多重面像，歷史之研究，理應還給他們真實。

由以上譯文的兩處問題，思及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究，七〇年代再次出發以來，雖然整體而言，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仍不夠。研究者在從事研究時，仍須返本溯源，仔細翻檢資料，其中如涉及日文文獻，必要設法取得原文閱讀，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

筆者寫這篇短文，主要是對評論家王詩琅業績的肯定，強調〈賴懶雲論〉是日

據下賴和論最有份量的一篇文章，藉以緬懷前輩；其間部分引申，補充拙作〈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之不足；亦經由比對原文，修正以往的研究，用以自我期許，也有所期待於年輕一輩的台灣文學研究者。

現在是認真的、嚴肅的以學術的態度正視台灣文學的時候了。



七、富戶人的歷史



## 導言

文學有如磷光體，它在將要熄滅之際才閃爍出最大的光輝。

——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

## 一、緣起

〈富戶人的歷史〉是賴和生前未發表的遺稿，一九七九年李南衡主編之明潭版《賴和先生全集》及一九九一年張恆豪主編之前衛版《賴和集》均未收存。本文是今年新春伊始筆者整理賴和文物時，於其故宅發現，原稿現存賴和紀念書室。

全文共計三稿，分別寫於「台灣文學週報社」十五字二十行稿紙（初稿），「東京創作用紙」二十字二十行稿紙（二稿、三稿）。只有初稿全篇完成，前頭筆跡工整，後面爲了一氣呵成，屢加刪改顯得凌亂；二稿僅改寫開頭一小部分；三稿則又加寫前言。現在整理發表於《文學台灣》之〈富戶人的歷史〉，本文分兩部分。首先爲了閱讀方便及完整性，第一部分是清稿，以初稿爲底本，二稿改動之處則依二稿，三稿前言一節則置於篇首。第二部分則是照原稿謄寫，保留初稿改動以前的面貌，括弧內的文字則是賴和或刪或改或加的地方，分別以「刪」、「改」、「加」……註明。如此繁瑣，主要是爲了提供研究。由於初稿後頭筆跡凌亂，雖經筆者小心抄錄，仍有一些文字不易判讀；清理之後，承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陳萬益教授比對原稿考



訂，謹此致謝。

## 二、初步的分析

〈富戶人的歷史〉初稿署名走街先，是賴和行醫往診之自況。原稿用紙之《台灣文學週報》是否曾經正式發行，現在資料依然不詳，不易由其使用的稿紙確定究竟寫於何時，但由其行文特色，應屬於賴和與新文學創作生涯中晚期的作品。

全文以走街先及前後兩個轎夫的對話來構成，在沿路閒談議論之中，經由幾個鄉野傳說，表現出這篇小說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勞苦大眾對富有人家發跡過程之批評，帶有濃厚的庶民性。這篇小說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發表的〈善訟的人的故事〉有相同的民間故事特質，可能是應李獻璋《台灣民間文學集》而寫作的系列作品，或許更在〈善訟的人的故事〉之後。

從初稿中可以發現賴和在改稿的過程中，最大的特徵是將全文修改成台灣話文，以便可以口語順讀。與賴和同時代的王詩琅曾說：

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每寫一篇作品，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白話文，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註一)

賴和初期新文學創作，可能會有先用文言文的階段；不過從這篇初稿改寫的痕跡中，倒沒有先用文言文，而是恰恰印證了李獻璋之說法：

賴和曾向筆者提及，他在創作之初，先用漢文思考，用北京話寫了之後，再改成台灣話。

(註二)

李獻璋與賴和接觸最密切的階段，在於一九三四—三六年編《台灣民間文學集》這一時期。該文集一九三六年六月由台灣文藝協會出版，賴和的序文置於篇首，他在序中表達了對民間文學的重視：

這些被一部士君子們所攆斥的民間故事與歌謠，到了現在，還能夠在民衆的嘴裏傳誦著，這樣生命力底繼續掙扎，我們是不敢輕輕看過的；何則？因為每一篇或一首故事和歌

謠，都能表現當時的民情、風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著當時民衆的真實底思想和感情，所以無論從民俗學、文學，甚至從語言學上看起來，都具有保存的價值。（註三）

賴和寫〈善訟的人的故事〉、〈富戶人的歷史〉即是這種理念的實踐。〈善訟的人的故事〉原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台灣文藝》二卷一號，後收錄於《台灣民間文學集》；〈富戶人的歷史〉同屬民譚轉化的新文學創作，與〈善訟的人的故事〉寫作時間，相差不會太遠。再從〈富戶人的歷史〉初稿，修改成台灣話文的痕跡裏頭有些用字、遣詞，如「粒積」、「荷老」、「春」錢、「厚」人……等等，和一九三五年底寫作的〈一個同志的批信〉（這是賴和最後公開發表的台灣話文小說）用法一樣，這些都是筆者認定〈富戶人的歷史〉是屬於賴和晚期作品的理由。

在〈富戶人的歷史〉一文中，頗能反映出一九三〇年代台灣猶存的民情、風俗。坐轎行醫已是陳年往事了，轎夫的行話，如「小！鎮路，帶溜」、「大無地，小掛角」、「小！溜，大步開」、「交纏！」、「踏步吞」……等等，賴和當時認為理所當然為大家所熟悉的，因此不加註解；然而時過境遷，如今早已不復存在。筆者曾詢問幾位老輩，無人知悉這些行話。小說中由於有這幾句扛轎人的口號，山行道中的情節顯

得生動、有趣。台灣傳統各行各業的行話，實在非常值得民俗學家去收集、研究，以增進對往昔世代的了解。

全文主題則建構在幾則「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的民間故事，像竹巷張姓娶妻、塗厝厝陳家招親，當事人都在乎嫁妝，轎夫極爲土直，稱呼得妻家財而致富的錢財爲「卵鳥仔錢」，表現出對這般行徑的看不起，頗有警世の意味；滷仔阮姓地主的起家，在轎夫老蔡的口中，猶如一則傳奇，黃姓頭家娘是個寡婦，前往原本佃農的尾吉處收租，突然天雨，避入寮中躲雨，因而成就了一番好事，佃農從此變成了地主；尾吉又因「爽文反」前插種的蕃薯，三、四年後因飢荒而賣得好價錢。這樣的致富方式，敘述者無以名之，稱之爲「天作成」。

在賴和筆下，「爽文反」時的慘狀，令人觸目心驚：

講起爽文反，實在真悽慘，反亂三、四年，種不能種，作不能作，百姓只有吃草根吞樹子，有錢沒處去買喰，所以餓死也真不少。像城內外，亂平，走反的回來，看見處處都是死人骨頭，有的全身排在眠床上，逐口灶厝內草都長到厝頂，灶空做了蛇穴，蝙蝠會撲人目睛，慢走的人沒留得一個。

這段取自流傳於台灣中部地方的口碑，將民變時的慘烈，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是大家手筆。乾隆朝進士趙翼（甌北）曾有〈諸羅守城歌〉其間描寫缺糧情形，詩云：

孤軍力支重圍中，草根樹皮枯腸充；

翻飛鳥雀不敢下，恐被羅取爲朝饔。（註四）

中部地方的悽慘實有過之！賴和在記述轎夫的談話，仍從俗採用「爽文反」三字，但是右側特別畫有〰〰〰，察其意實有同情林爽文民變之意（註五）。

文中又有一節涉及霧峰林家的故事，「林老五聽講也是拐騙當客的錢來起家的」，林老五指的可能是林獻堂旁系先祖林五香（字志芳），文中未再敘述詳情，轉接「拼大和尚的事」，大和尚即林和尚。依台大歷史學系黃富三教授之分析：

林和尚的身分是：正名爲林媽盛，原住柳樹浦庄或瓦礫庄（今霧峰鄉），任職團練總理

或兼莊總理，乃地方上重要頭人（註六）。

「拼大和尚的事」，涉及名聞全台的林定邦命案與林文察復仇的一段公案。賴和友人楊守愚應李獻璋編《台灣民間文學集》，寫了一篇〈壽至公堂〉，即是反應此一公案的民間傳說（註七）。賴和在〈台灣民間文學集序文〉，曾特別提及楊守愚寫〈壽至公堂〉五易其稿之慎重，並且論及處理民間傳說之態度，賴和云：

搜集故事之又一困難，就是一篇故事裏頭，間或涉及殷富大族的先人底行爲，致礙於情實關係，不肯照實說出；這是對故事有點缺少理解的。因爲先人的行爲，原無損于後人的德性，其實，故事要不是經過文字化，牠同樣是流傳於民間的；且由老年人的口中出來，衝進少年人的耳朵裏，其聲響尤覺洪亮；若年代一久，或者穿鑿其說，以訛傳訛，生出怪談，那更是故事本身的不幸。（註八）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賴和處理民間傳說，態度嚴謹。〈富戶人的歷史〉，藉著轎夫的

談話，表現出霧峰林家復仇，絲毫不留情的一面，諒非完全空穴來風，也隱然含有對於霧峰林家斬草除根之舉，頗不以爲然之意，充分表現他對失敗者一方的同情（註九）。

就此一情節而言，實與楊守愚的〈壽至公堂〉一文相互呼應。這亦是筆者斷定〈富戶人的歷史〉一文，是賴和晚期作品的理由之所在，甚至是一九三五年底賴和完成公開發表的新文學創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困擾於台灣話文的表現，而轉回寫可避免台灣話文表現之不足的田園歌謠、竹枝詞之後的新文學作品。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猶有甚多刊物發表漢文新文學創作，何以賴和未將這篇〈富戶人的歷史〉完稿、發表？其中一個理由，是涉及塗厝厝陳家、霧峰林家之事，當事人或其後代都是賴和認識的人，不方便陳述，但如依〈台灣民間文學序文〉，賴和理應有「照實說出」之心理準備；另外更可能的理由是創作台灣話文小說，雖經辛苦轉化，賴和猶覺得這樣的台灣話文，仍不能夠精純，仍不能滿意，所以未繼續修訂完稿。如果是後一理由的話，那筆者更要對賴和新文學創作生涯之晚期，堅持台灣話文寫作的理念，表達崇高的敬意。

即使〈富戶人的歷史〉，仍停留於草稿階段，但首尾一貫，相當完整；文中經由

轎夫的幾則談話，的確頗能反映出「民衆的真實底思想和感情」，也表現賴和一貫站在勞苦大眾一邊的左翼文學風格。更何況轎夫的閒談議論，可以沒完沒了的談下去，主題將因之而不够集中。賴和處理文章的結尾，實在結的高明；寫拼鬥失敗的大和尚一節，留下民間口碑，就〈富戶人的歷史〉之創作主題而言，更留下令人回味無窮的餘韻。

#### 附註

註一：王詩琅〈賴懶雲論〉，日文原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台灣時報》二〇一號。爲了參閱方便，引自《賴和先生全集》，明潭之譯文，頁四〇五。

註二：李獻璋〈台灣鄉土話文運動〉，林若嘉譯，《台灣文藝》一〇二期，頁一五五。

註三：〈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協會，一九三六年六月），〈賴序〉，頁一。

註四：〈諸羅守城歌〉，參見林文龍編《台灣詩錄拾遺》（台中，省文獻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頁一

三。



註五：連橫於〈台灣通史〉卷三十一，〈林爽文列傳〉，贊曰：「林爽文之役，南北俱應，倣擾三年，至調四省之兵，乃克平之。較之一貴，為尤烈矣。夫台灣之變，非民自變也，蓋有激之而變也。」筆者以為賴和在使用「爽文反」三字時，特別在右側畫線，一則從俗，一則有和連橫一樣的看法，應當不是過分推斷。

註六：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八七年十月），頁一二四。

註七：〈壽至公堂〉是李獻璋編《台灣民間文學集》的壓卷之作，頁二二九～二五四。有關這段公案，請參見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第四章〈林定邦命案與林家之復仇〉，頁一一七～一四九。

註八：同註三，頁三。

註九：賴和在他的漢詩遺稿〈讀台灣通史十首〉，其中之一即是記述此事，詩云：

小子何知更活埋，故應天怒起風雷；

世間更有傷心事，十里殷紅祇自哀。

（賴和）自註：林和尚之被害也，留一兒六、七歲，敵以斬草除根之想，命活埋之。坑已掘矣，而兒不欲倒臥其中，葬者蹴殺之。舉鋤欲掩以土，風電劇發，葬者亦被震死。

連橫於《台灣通史》卷三十三〈林文察列傳〉，記述林文察為父報仇，「旦暮跡和尚，猝擊之，力禽至父墳，剖心以祭」，其餘則不詳。賴和在〈富戶人的歷史〉此一情節之敘述，由此詩及其自

註參証，更顯示出其中必有隱情。

### 三、到處人爭說賴和

后來呢？

后來準煞去。

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畑，就安爾準煞去？

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阿……

現在賴和〈富戶人的歷史〉一文，原稿、清稿俱在，筆者期望它跑向民間去，也盼望文、史學界的討論。

## 富戶人的歷史

走街仔先（賴和）

現在發財的機會，是真不少，也真容易碰到，像株式期米，幾點鐘內，可以賺到整萬銀，但這是要有才能和資本，不是普通人可以夢想的。那些毛管出汗的人，任伊怎會粒積，也不過得以免至受餓，若像那富有幾萬甲的田園，積有幾百萬的錢銀的人，在現時的社會，雖不是稀奇，在以前除去賭博以外，真不曉得是啥方法，能賺來那樣大的家私。

俗語有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又講：「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儉」，一般大富戶不是橫來的便是天賜與的，所以凡是地方上稱道的富戶家，多有牠一段發財的傳說，有的是含著嫉妒的毀謗，有的是帶著浪漫的趣聞。

這是山行道中，和轎夫們的閒談，談話中有些可以做自家廣告，也有些可借來笑罵素所厭惡的人，所以要把它來發表。講話的人，有前后走三個，前者就是前后頭兩個轎夫，走者走街仔先自己也。中間有幾句扛轎人的口號，想是大家所共悉

的，恕不另註。

后：做人會得像佻太老，就算值啦，會有你這樣后進。

走：是佻「賢荷老」，我又不曾賺大錢，致蔭他老人家享福，反累他不時為我們操心扯腹。

后：無影咯，啥人不知，不過老大人本來多操煩，凡事他都可以不管了。

走：我們太不經事，勿會教他不操煩。

后：不是這樣講，因為你們太不忍心，也和人大計較，所以也有些拖累，也有淡薄拍損。

前：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啥人會相信。

走：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著操煩。

后：像古大醫生，比你慢幾年纔出來開業，現在聽講建置千外租，羅醫生也比你較慢，現在也起一座大厝，伊的春錢怎那樣快。

前：醫生是怕不時行，若會時行，怕伊無錢賺，現在這許多的醫生，啥人像你生意這樣好，就是公醫大人每年有萬餘圓賺，也無你的信用好。

走：我看人那款賺錢，也會目眶赤，但是賺錢另外有賺錢的本領，我會得大家

肯來相尋，大概是因為不會賺錢，設使我也要來賺大錢，就恐勿會時行了。  
后：無影咯，台灣人不是講單單曉得愛錢，勿會曉愛生命，若不是藥喰有應效，送人人也無愛。

前：總是做人較大概，本難得春錢。

走：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真講不出嘴。

前：原也是無錢所致，存意要走藥錢的人，有也真少。——小！鎮路，帶溜！

后：好！小，溜！

走：沿路講話，已經到大崎脚了。

前：以前我們扛恁太老，他老人家痛著我們太吃力，到這崎脚總落來行。

走：唉！上這樣崎，實在太辛苦，我昨夜暗暈，腰骨有點酸，不然我也就落來

行，好讓你們輕鬆一下。

前：不敢當，不過我是講恁太老真會體貼人。

后：恁阿公做人就更好啦，你那時尙細漢，怕勿會記得了，他老來人家更歡迎他，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裡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上去，回來時到總到街外就落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

伊講：「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實在失禮。」伊是多麼古道，現今的人，就不是這款……

前：大無地，小掛角。

后：好。

前：小！溜，大步開！

后：好，大步開。

看看已爬上大崎頂了，我聽他們頌揚我祖上的話，像是在嘲罵我，本不願意使他們休息，但坐在轎裡被搖上這一里多長的崎，腰骨竟真有點酸痛起來，便向他們說：

走：你們太辛苦了，歇一困再行！

后：歇息嗎？

前：好，垂手！

轎一垂下，我便鑽了出來，他們把轎移放樹蔭下，便各抽出披在肩頭의 脚巾，拭拭汗，隨即向轎簷解下煙管，喫起煙來，過了有些一下，前籤的老許把敲去煙灰的煙管，指點前面山脚向我說：

前：大肚溪就在那邊，你看！那彎折向北的地方，就是船仔頭，日本反的時候，就是由那邊渡過溪來，明明是天意，當時八卦山放出去的大砲，墜落去總不能開花。

后：聽講進前二三日，就有人看見日本兵，在這一帶山上瞭望。

走：永過的人那會這款式？一任敵兵來偵察地勢。

前：走反的時候，各人只顧生命，那管他怎樣。

后：永過的人，常遇到反亂，災殃真是受去夠額，反轉對牠不太關心，反來了只顧自己逃生，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做對頭。不管他怎樣，所以日本反的時，也打算是同款。

前：我們當初打算日本仔不久也會走返去，誰能想他竟會直到現今。

后：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台灣人終久是壞，以前逐項多輕省，總不滿足，常常反亂。

前：好來去咯！歇久了，話講多啦嘴也會乾。這所在只好飲牛尿。

后：免生氣啦！

走：你看，竹巷張姓去滿仔娶新娘返來啦！

后：伊娘的，堂堂的大富戶，怎專結交這跑衙門的。

前：聽講妝奩有三萬餘圓，結這一門親成，就較好平常人勞苦一世了，像我們就是三世人，也不敢想要賺三萬圓。

他們講話中間，轎已移到路上，我就鑽進去，他們隨即起肩，還是一路行一路講，好像講講話能使他們肩頭輕鬆一些，所以滔滔不竭。

后：富戶家的小姐，那些錢我怕只夠她的使費，一個嬪某嬪服侍不夠，又要雇一個老婆，茶煙吃食那一項不講究，衣服妝飾那一件不奢華。我想姓張的所長也不能有多少，反討個歹名聲，講得妻家財，討衰。

走：是啊！男子漢還是自己賺來的錢靠得住，想藉妻子的致蔭來享福，還是去做緣投好。

后：講雖是這樣講，我看現時的少年家，還是抱著這路想的多，現在一四界厚人議論的塗厝厝陳家所招的敢不是「讀冊仔」，惹下一場訴訟，還撥不清。

前：聽講他大姆死落，所有現銀真珠金仔約有三四萬。攏總被伊捲去，合妝奩四百石，也有六七萬圓，尚且不滿足？人的心肝咯！

后：我聽見講，那少年曾對人講：「世間只有錢上好，他現在只看見錢，一概



全都忘記，什麼情誼他猶記得了，什麼名譽他也顧不到了。哦！他不是也會和文化的出來講演？啊！人真……。

前：聽講他去日本留學，全是為著這層事去研究法律的。

我聽見他們這樣議論，實在也替現代青年過意不去，內心也自己慚愧起來，想把他們的話拖向別位去，就想出一個問題。

走：阮厝的家產實在大，不曉得他們祖上怎樣經營？

前：人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大富戶家有啥人是毛管出汗的。

走：唔！

后：現在已經是較了尾啦，十幾年前就真好，炭宗那一柱已經倒去，孽舍也被龜兩了去講百萬，孝男男，總被人扛去做大豬賣。

走：聽講他一家對子弟是這樣主張，不可給子弟去讀書，只教他們吃阿片，阿片一上癮家伙就保得住呢。哈哈！你看！因為他們的無知識，年年不知被人騙去多少錢？像某某幾人不都是騙他們的錢來做家伙的？

后：『卵鳥仔』錢，了也是合適的。

走：『卵鳥仔』錢！這是怎講？

前：你不知道嗎？他知道得真詳細。

走：講！講來聽！

后：我也是聽人講的，這有關係人家的名譽，怕有罪過。

走：不是這樣講，無影無跡，我們捏造出來亂講，纔是罪過。實在的事講來不過等於講古，不相干，講！

后：講來話是真長，你們少年輩，無聽見講，較有歲的人誰都知道，這雖是微倖，也有一點天意。

走：是怎樣？

后：以前的水圳，不像現今有紅毛塗可以造浮梘禦岸，小可下了幾粒雨，不是岸崩就是圳頭壞，所以像滿仔一帶水尾田，是常常沒有收成。

前：永過人煙比較稀少，田又闊作，作田人就不像現時要去巴結頭家，反轉是頭家要去巴結佃戶，所以租收不起也是常事。

后：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像滿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一帶的田佃，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永過敢真實這款式，可以搶人？

后：你聽我講！話長咯。

以下就是全是后籤老蔡所講的。

那起家的是魁仔，名叫吉，大家都叫他好尾吉。現時阮家新厝的東方那一塢田洋，講有五甲餘地，這就是他起家的基本，本來那田是姓黃的業，牒尾吉作。

這姓黃的主人已經是死去了，只剩一個寡婦當家，尾吉在他頭家未死的時候，納租已不「照起工」了，莫說只一個寡婦，他那猶有許爾天良？寡婦明知是佃人狡怪，若不計較一下，被他欺負到底，結局怕田也變作伊的，所以就尾吉喊來，問：

「這冬收成各處都好，怎樣你的粟多是二糟冇仔。又且沒納到額，以前欠去的可以免講，今年你怎樣打算？」

頭家娘！你也所知，我們敢是『挑意故』？那一帶水尾田常常吃無水，我們也是了本，教我們去羅來厚你，你也是不忍心，我也無本錢，總是頭家娘……

水吃無夠？水錢年年收去，那有這道理，敢只有咱的田吃無水，隔壁區人都收到足額，且有零五重。

冤枉！頭家娘！人的話你不可信，那有這路事？

今年雨水這樣充足，是不？

雨水過多受浸，稻仔也不好，這一冬就是著水涎害去咧。

不過田要作，要較天良些。

唉！頭家娘，你不相信，有暇請撥一霎時仔工來去看，田是怎樣？稻仔是怎樣？就不再講我騙你。

黃家這寡婦，曉得空用嘴『車盤』是無路用，便讓尾吉回去。從此她就下一個決心，她想若不表示一點強硬，只有受人欺負，所以當一個早冬，她探聽著尾吉的稻仔已經刈完，大約是曝乾的時候，便去雇來一班會相打的挑工，自己坐了轎到田佃尾吉家去。

這正是尾吉的運氣要透。

尾吉看見頭家娘親身來，又帶來一陣強壯的挑工，早曉得事情不大穩當，粟已全部曝在庭裡，再不能隱藏，沒法度他只有假裝好禮，要請她到家裡去坐，不打算他頭家娘這次竟真固執，堅堅不肯到伊家裡，要坐等粟乾好過風鼓，尾吉也只得讓她到更寮去坐涼。

過午天上忽湧起烏雲，更兼有風，西北雨已報頭，粟看看乾了。這寡婦便命他

們過風鼓，鼓淨就教挑工裝進布袋，尾吉看這樣子，似乎不肯給他留下一些，再忍不住了，便去哀求他的頭娘家，說：

頭家娘！留下些給我們做米母啦！

不是給你留下一大堆？那寡婦指著那二槽冇仔回答他。

啊！頭家娘，這些冇仔只好去飼畜牲。

怎樣？只好飼畜牲？你每年納給我們不是全都這樣？將這些留給你是極公道的。

頭家娘！這一冬纔收成好一點仔，我們幾個月工夫，頭家娘！發一點慈悲，留……

尾吉一面在哀求，那寡婦卻一味不答應，挑工只管鼓過的裝進布袋，尾吉便去搶住斜箕，方在掙持間，滄——西北雨落下來，一時大家忙亂起來，挑工移粟包，佃人蓋粟堆，那寡婦也自走進更寮去避雨。這一陣雨越下越大，沒有便歇的款式。尾吉蓋好粟堆，曉得頭家娘尚在更寮，想是怕頭家娘，一個人無聊，要去伺候她，便也走進更寮去，尾吉走入更寮，雨落得更大起來，一粒雨會打死幾個人，一直落到暗，到半暝。他頭家娘想是因為雨大不好教尾吉出去，便一同在更寮等到雨歇，

這時大概是半暝后了。

你想當這時候，一個寡婦，一個強壯的男子，（尾吉還未娶妻）同在寮仔內，他們不是剗割過的，誰敢保他們能無事？有人講是尾吉用強，究竟怎樣，在那樣風雨夜中，誰看見？結局是尾吉當他頭家娘的意，他就佃戶變成頭家了。

前：交纏！

后：好！交纏，——後來就實在有點天意，可見發財也不是隨便。水尾田晚冬因雨水少，播稻仔總沒有好收成，所以多是撒塗豆插蕃薯。

當「爽文反」的時候，反亂還未到幾月前，百姓間的風聲已經很緊，大家多感到不安，多在準備走反，獨尾吉不信，他原不是怠惰的人，所以田裡的工作，依舊照常做去。他五甲多地的蕃薯插完了不久，反亂到了，這時候生命要緊，那顧得蕃薯，尾吉在被同村的人嘲笑之中，和他們一起走反去。

講起爽文反，實在真悽慘，反亂三、四年，種不能種，作不能作，百姓只有吃草根吞樹子，有錢沒處去買食，所以餓死也真不少。像城內外，亂平，走反的回來，看見處處都是死人骨頭，有的全身排在眼床上，逐口灶厝內草都長到厝頂，灶空做了蛇穴，蝙蝠會撲人目睷，慢走的人沒留得一個。萬生反的時候，我已經會曉得了，

聽講沒有這次十分一。

亂平，百姓漸漸回來，但是田畑已經全荒廢了，耕作也須四五月日後纔有收成，

……

前：小！

后：好，小，——官府只曉得噲錢，收稅，管你百姓怎樣，雖然由商人們運來一些糧食，當時都是步擔，接濟不能周到，萬項都起到真貴。

這時候尾吉的五甲餘地的蕃薯，他走反前所插的，註死！三四年竟無被人偷掘去，你想！插了三四年的蕃薯，那是滿田都是，層層疊疊，掘起來就是，有的一條一貳「稱」重。那時候一塊銀賣多少斤，你猜一猜看？免著驚，講是頂便宜，六十斤，蕃薯條也值錢，你想！這些蕃薯被他賣多少？

走：唔！這是天作成，……

后：人講福至心靈，這時候他就曉得計算了。永過的田是真俗，不像現今算升算合，一塊銀若是較水尾可以買到一二石，田面又闊，舊丈一甲，差不多有現今新丈的二三甲，尾吉將賣蕃薯的錢，攏總買田，無人知道他買到多少，總是收來的噲勿會了，年年春，他又勤苦，一年一年，就成了大富戶

了。

走：啊！這是一篇真好的富戶人的歷史。

前：台灣的富戶，逐家伙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拼著毛管出汗白手成家的是真少。

走：是，就是林老五聽講也是拐騙當客的錢來起家的。阿罩霧，……

后：講到阿罩霧，要講二三日也講勿會完，單就拼大和尚的事來講，也要講一晷。

前：這一層事，講起來現在也會教人起雞母皮。

走：是啥款？那樣驚人？

前：大和尚的竹圍被攻破了，一家十幾人男婦老幼，剿到一個不留，單單一個五六歲的查埔囡仔，無剗死，活拿返去。但是斬草總要除根，留一把尾終久是有後患，他們想：處治囡仔，只有活埋較不費事，所以他便被煮到塚仔埔去。墳掘好了教他倒落去。這囡仔也作怪，不是講要放屎，就是講要放尿，幾下擺倒落去又再起來。受到主人的命令，要活埋他的人，等得生氣了，看他再要爬起來，便用腳把他躡下去，順手用鋤頭向天靈蓋一擊，



這時候，青天白日，忽然起了一下雷，這個人也就被槓死了。

走：那有這樣湊巧的事？

后：真真有這號事，不是虛詞的。

走：后來呢？

后：后來準煞去。

走：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畑，就安爾準煞去？

后：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阿……

前：踢步吞！

后：好！踢步吞。

走：要到了，講無幾句話恁真會行。

前：沿路行沿路講，不知道久，哼！行要一點鐘了。

歸途我因有些懶，一上轎就睡去了，不知他們再有講些什麼？

# 〈富戶人的歷史〉原稿清校

賴 和原稿  
林瑞明清校

## 稿前說明

一、依原稿，一稿、二稿、三稿之段落，順序排版。

二、〔 〕中的字，皆屬於清校者之說明或附註。

三、（ ）中的字，皆是賴和原稿自己更動之字句。清稿者僅在括弧內，註明其更動情形，簡稱如下：

改：更改；筆誤，改：亦是作者自行更改。

刪：刪除；筆誤，刪：亦然。

加：添加。

漏：原稿中之漏字，可明白判別者，清校者逕行加入。

〔二稿：〕

## 富戶人的歷史

走街先

這是山行道中，和轎夫們的閒談，所標註的前后者，就是前后頭兩個轎夫，走者走街仔先自己也。中間有幾句扛轎人的口號，想是大家所熟悉的，恕不付註。

〔三稿：〕

## 富戶人的歷史

走街仔先

這是山行道中，和轎夫們的閒談，談話中有些可以做自家廣告，也有些可借來

笑罵素所厭惡的人，所以要把牠來發表。講話的人，有前后走三個，前者就是前后頭兩個轎夫，走者走街仔先自己也。中間有幾句扛轎人的口號，想是大家所共悉的，恕不另註。

〔三稿：補入前言一段〕

## 富戶人的歷史

現在發財的機會，是真不少，也真容易碰到，像株式期米，幾點鐘內，可以賺到整萬銀，但這是要有才能和資本，不是普通人可以夢想的。那些毛管出汗的人，任伊怎會粒積，也不過得以免至受餓，若像那富有幾萬甲的田園，積有幾百萬的錢銀的人，在現時的社會，雖不是稀奇，在以前除去賭博以外，真不曉得是啥方法，能賺來那樣大的家私。

〔三稿，僅加入這一段〕

〔二稿：〕

俗語有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又講：「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儉」，一般大富戶不是橫來的便是天賜與的，所以凡是地方上稱道的富戶家，多有牠一段發財的傳說，有的是含著嫉妒的毀謗，有的是帶著浪漫的趣聞。

后：「唉！」（刪）做人像恁太老，就算值啦，「能」（改：會）有你這樣后進。

「晚景都不免煩惱」。（刪）

走：「嘻！」（刪）這算得「什麼」？（改：啥）我又不曾賺大錢，致蔭父母，累他老人家不時操心。「你看他近來多消瘦？」（刪）

后：他老人家自己太細心，凡事都可以付給你們兄弟了，他偏要自己來操心。

走：我們「還」（改：也）未經事，難怪他不放心「呢」（刪）。

后：不是這樣講，不過你太不忍心，和人家又不大計較。

前：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來嗰人會相信，「不能」（改：勿會）春錢？

走：所以他老人家放心不下。

后：像某人不是比你慢幾年纔出來開業，現在皆（改：聽講）建置有廿千「餘」（改：外）石「的」（刪）租，那纔發達「的」（改：得）快；像某人尙且起一座很體面的「醫院」（先改：病院，又改：大厝）。

前：醫生是怕不時行，一時行，總會賺錢「纔是」（刪），現時這「街裡的」（改：些）醫生，有「誰及得」（改：嗰人像）你，生意這樣好。那派頭頂粗魯的「某」（刪，又恢復）醫生，聽講一年有兩萬餘圓賺，他還沒你的信用在。

走：「某」（刪，又恢復）醫生嗎？看他那樣大賺錢，我也實在目睭赤，但是他有他「的榮光之手，能起死回生，所以自有他」（刪）賺大錢的本領，我的所以時行，是因爲不會賺錢，設使我要來賺錢春錢，怕就不能時行了。

后：那有這樣情理？

前：這也實在，做人較大概，是難得春錢。

走：沒有錢來不給藥的話，在我是真講不出嘴。

前：是，世間人「知」（改：曉）理的「是」（改：實在）真少。……小，鎮路，

帶溜！

后：好，走！

走：到大崎脚啦。

〔整段以二稿取代〕

〔三稿：〕

后：做人會得像恁太老，就算值啦，會有你這樣后進。

走：是恁「賢荷老」，我又不曾賺大錢，致蔭他老人家享福，反累他不時爲我們

操心扯腹。

后：無影咯，啥人不知，不過老大人本來多操煩，凡事他都可以不管了。

走：我們太不經事，勿會教他不操煩。

后：不是這樣講，因為你們太不忍心，也和人不大計較，所以也有些拖累，也有淡薄拍損。

前：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啥人會相信。

走：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要」（改：著）操煩。

后：像古大醫生，比你慢幾年纔出來開業，現在聽講建置千外租，羅醫生也比你較慢，現在也起一座大厝，伊的春錢怎那樣快。

前：醫生是怕不時行，若會時行，怕伊無錢賺，現在這許多的醫生，啥人像你生意「怎」（改：這）樣好，就是公醫大人每年有萬餘圓賺，也無你的信用好。

走：我看人那款賺錢，也會目眶赤，但是賺錢「的人」（改：另外）有賺錢的本領，我會得大家肯來相尋，大概是因為不會賺錢，設使我也要來賺大錢，就恐勿會時行了。

后：無影咯，台灣人不是講單單曉得愛錢，勿會曉愛生命，若不是藥喰有應效，送人人也無愛。



前：總是做人較大概，本難得春錢。

走：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真講不出嘴。

前：原也是無錢所「置」（筆誤，改：致），存意要走藥錢的人，有也真少。小！

鎮路，帶溜！

后：好！小，溜！

走：沿路講話，已經到大崎脚了。

〔二稿，到此結束。〕

〔以下皆是一稿：〕

前：「前回」（改：以前）我們扛恁太老，他老人家痛著我們太吃力，到這崎脚

總落來行。

走：唉！上這樣崎，實在太辛苦，我昨夜暗暈，腰骨有點酸，不然我也就落來

行，好讓你們輕鬆一下。

前：不敢當，不過我是講恁太老真會體貼人。

后：恁阿公（原註：（祖父））做人就更好啦，你那時尙細漢，怕「不」（改：

勿會）記得了，他「較有了歲數，不耐行走」（改：老來人家更歡迎他），

「要到遠所在賺錢去」（改：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沒有」

（改：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裡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加：上去），

回來時也總到街外就落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伊講：「咱不是做官人，

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恐怕」（改：實在）失禮。」。

「也會」（改：怕）被人議論」（整句刪除）。伊是多麼古道，現今的人，

「啊」（改：就不是這款）……

前：大無地，小掛角。

后：好。

前：小！溜，大步開！

后：好，大步開。

看看已爬上大崎頂了，我聽他們頌揚我祖上的話，像是在嘲罵我，本不願意使

他們休息，但「坐」（改：坐在）轎裡被搖上這一里多長的崎，腰骨竟真有點酸痛起來，便向他們說：

走：你們太辛苦了，歇一困再行！

后：歇息嗎？

前：好，垂手！

轎一垂下，我便鑽了出來，他們把轎移放樹蔭下，便各抽出披在肩頭의 脚巾，拭拭汗，隨即向轎簷解下煙管，喫起煙來，過了有些一下，前轂的老許把敲去煙灰的煙管，指點前面山脚向我說：

前：大肚溪就在那邊，你看！那「折向北彎曲處」（改：彎折向北的地方），就是船仔頭，日本反的時候，就是由那邊渡過溪來，明明是天氣，當時八「封」（筆誤，改：卦）山放出去的大砲，墜落去總不能開花。

后：聽講進前「兩」（改：二）三日，就有人看見日本兵，在這一帶山上瞭望。走：永過的人那會這款式？一任敵兵「去」（改：來）偵察地勢。

前：走反的時候，各人只顧生命，那管他怎樣。

后：永過的人，「遭受反亂慣了，反亂后常有幾年較好趁噏，大家多受牠幾年亂一回，又以爲反亂戰爭是做官的事，和百姓不相干，打算這一次也和以前反亂一樣，誰去管牠」。（改：常遇到反亂，災殃真是受去夠額，反轉對牠不大關心，反來了只顧自己逃生，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做對頭。不管他怎樣，所以日本反的時，也打算是同款。）

前：我們當初打算「日本仔」（改：×××）〔林註：理應回復「日本仔」三字〕不久也會「走的」（改：走返去），「誰想到竟會直到今日」（改：誰能想他竟會直到現今）。

后：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台灣人終久是壞，以前逐項多輕省，「竟」（改：總）不滿足，常常反亂，「現在那不能再亂一下看」（刪）。

前：好來去咯！歇久了，「多講話」（改：話講多啦）嘴也會乾。這所在只好飲牛尿。

后：你自己的嘴乾嗎？要飲牛尿誰也不阻「當」（筆誤，擋）你  
（稿紙註明：前頭的人似嫌這幾句話有較過火。）

(整句刪除，改：免生氣啦！)

走：「無用會咯」(刪) 你看！竹巷張姓去「滿雅娶親回來啦！」(改：滿仔娶新娘返來啦！)

后：伊娘的，「當當」(筆誤，改：堂堂) 的大富戶，怎專結交這跑衙門的。

前：聽講妝奩有「萬」(改：三萬) 餘圓，結這一門親成，就「勝」(改：較好) 平常人勞苦一世了，「要」(刪) 像我們就是三世人，也不敢想要賺三萬圓。

他們講話中間，轎已移到路上，我就鑽進去，他們隨即起肩，還是一路行一路講，好像講講話能使他們肩頭輕鬆一些，所以滔滔不竭。

后：富戶家的小姐，那些錢我怕只夠她的使費，一個嬖某嫺服「待」(筆誤，侍) 不「到」(筆誤，改：夠)，又要雇一個老婆，茶煙吃食那一項不講究，衣服妝飾那件不奢華。我想姓張的所長也不能有多少，反討個「不好的」(改：歹) 名聲，講得妻家財，「倒」(改：討) 衰。

走：是啊！男子漢還是自己賺來的錢靠得住，想藉妻子的致蔭來享福，還是去做「緣投」好。(林註：緣投右邊畫線，其意是小白臉。)

后：講雖是這樣講，我看現時的少年家，還是抱著這路想的多，現在「一四家乎人」（改：一四界厚人）議論的塗厝厝陳家所招的敢不是「讀冊仔」，惹下一場訴訟，還撥不清。

前：聽講他大姆死落，所有現銀真珠金仔約有三四萬。攏總被伊捲去，合妝奩四百石，也有六七萬圓，尚且不滿足？人的心肝「多難得講！」（改：咯！）

后：我聽見講，那少年曾對人講：「世間只有錢上好，他現在只看見錢，「什麼一切」（改：一概）全都忘「卻」（改：記），什麼情誼他「記不起了」（改：）

演：啊！人真……。

前：聽講他去日本留學，全是為著這層事去研究法律的。

我聽見他們這樣議論，實在也替現代青年過意不去，內心也自己慚愧起來，想把他們的話拖向別位去，就想出一個問題。

走：阮厝的家產實在大，不曉得他們祖上怎樣經營？

前：人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大富戶家有啥人是毛管出汗的。

走：唔！

后：現在已經是較了尾啦，十幾年前就真好，炭宗那一柱已經倒去，孽舍也被龜兩〔林註：似是人名〕了去講百萬，孝男團，總被人扛去做大豬賣。

走：聽講他一家對子弟是這樣主張，不可給子弟去讀書，只教他們吃阿片，「講」（刪）阿片一上癮家伙就保得住（改：呢）。（改：哈哈！）你看！因為他們的無知識，年年「被人騙去不知」（改：不知被人騙去）多少錢？像某某幾人不（改：都）是騙他們的錢來做家伙的？

后：『卵鳥仔』錢，了也是「當然」（改：合適）的。

走：『卵鳥仔』錢!?!（改：這）是怎講？

前：你不「曉得」（改：知道）嗎？他「曉得」（改：知道得）真詳細。  
走：講！講來聽！

后：「講人呆話」（改：我也是聽人講的，這有關係人家的名譽），怕有罪過。  
走：不是這樣講，無影無跡，我們捏造出來亂講，纔是罪過。實在的事講來不過等於講古，不相干，講！

后：講來「話長」（改：話是真長），你們少年輩，無聽見講，較有歲的人誰都知道，這雖是倣倣，也有一點天意。

走：（改：是）怎樣？

后：以前的水圳，不像現今有紅毛塗可以造浮規禦岸，小可下了幾粒雨，不是岸崩就是圳頭壞，所以像滿「雅」（改：仔）一帶水尾田，是常常沒有收成。

前：永過人煙比較稀少，田又「墾」（改：闊）作，作田人就不像現時要去巴結頭家，「不然就沒有田作，會餓死，以前全然沒有這種事」（刪）反轉是頭家要去巴結佃戶，「雖然」（改：所以）租收不起也是常事。

后：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就滿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帶的田畑，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加：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呼！就是搶人的？（改：永過敢真實這款式，可以搶人？）

后：你「講」（筆誤，改：聽）我講！話長咯。

以下就是全是后籤老蔡所講的。



那起家的是厝仔，名叫吉，大家都叫他好尾吉。現時阮家新厝的東方那一塲田洋，講有五甲餘地，這就是他起家的基本，本來那田是姓黃的業，孽尾吉作。

這姓黃的主人已經是死去了，只剩一個寡婦當家，尾吉在他頭家未死的時候，納租已不「照起工」了，「何況」（改：莫說）只一個寡婦，「更是可欺」（改：他那猶有許爾天良？）「一年納不上一半」，（刪）那寡婦明知是佃人狡怪，若不計較一下，被他欺負到底，結局怕田也變作伊的，所以就吧佃人尾吉喊來，問：

「這幾年收成多不壞」（改：這冬收成各處都好），怎樣你的粟多是二糟冇仔。又且納「不」（改：沒）到額，以前欠去的可以免講，今年你怎樣打算？」

頭家娘！你也所知，我們敢「愛」（改：是）『挑意故』？那一帶水尾田常常吃「不到」（改：無）水，我們也是了本，教我們去糶來「乎」（改：厚）你，你也是不忍心，我也無本錢，總是頭家娘……

水吃「不到」（改：無夠）？水錢年年收去，那有這道理，敢只有咱的田吃無水，隔壁區「人家收得」（改：人都收到）足額，且有零五重。

冤枉！頭家娘！人的話你不可信，那有這「種」（改：路）事？

今年雨水這樣充足，是不？

雨水過多受浸，稻仔也不「能」(刪)好，這一冬就是著「水涎」害去咧。

不過田要作，「須」(改：要)較天良些。

唉！頭家娘，「若」(改：你)不相信，有暇請撥「一遭」(改：一霎時仔)工來去看，田是怎樣？稻仔是怎樣？就不再講我騙你。

黃家這寡婦，曉得空用嘴「車盤」是無路用，便讓尾吉回去。從此她「抱下一個不示弱的」(改：就下了一個)決心，她想若不表示一點強硬，「終會」(改：只有)受人欺負，所以當一個早冬，她探聽著尾吉的稻仔「皆已」(改：已經)刈完，大約是曝乾的時候，便去雇來一「起」(改：班)會相打的挑工，自己坐了轎到田佃尾吉家去。

這正是尾吉的運氣要透。

尾吉看見頭家娘親身來，又帶來一陣強壯的挑工，早曉得事情不大穩當，粟已全部曝在庭裡，再不能隱藏，沒法度他只有(加：假裝)好禮，要請她到家裡去坐，不打算他頭家娘(加：這次)竟「根」(筆誤，改：真)固執，堅堅不肯到「他」(改：

伊)家裡，要坐等粟乾好過風鼓，尾吉也只「好」(改：得)讓她到更寮去坐涼。

「近」(改：過)午天上忽湧起烏雲，更兼有風，西北雨已起報頭，粟看看乾了，這寡婦便命他們過風鼓，鼓淨就教挑工裝進布袋，尾吉看這樣子，「似不給」(改：似乎不肯給)他留下一些，再忍不住了，便去哀求他的頭娘家，說：

頭家娘！留下些給我們做米母啦！

不是給你留下一大堆？那寡婦指著那二糟冇仔回答他。

啊！頭家娘，這些冇仔只好去飼畜牲。

怎樣？只好飼畜牲？你每年納給我們不是全都這樣？(加：將這些)留給你是極公道的。

頭家娘！這一冬纔收成好一點仔，我們幾個月工夫，頭家娘！發一點慈悲，留……

尾吉一面在哀求，那寡婦卻一味不答應，挑工「不便動手動脚」(改：只管把鼓過的裝進布袋，尾吉便去搶住斜箕)，方在爭持間，湃——西北雨落下來，「一齊便起忙亂」(改：一時大家忙亂起來)，挑工移粟包，佃人蓋粟堆，那寡婦也自走進更寮去避雨。

這一陣雨越下越大，沒有「便止的樣子」(改：便歇的款式)。尾吉「當他粟收好」

(改：蓋好粟堆)，曉得頭家娘尚在更寮，(加：想是怕頭家娘，一個人無聊，要去伺候她)，便也走進更寮去，「這時候」(改：尾吉走入更寮)，雨落得「尤起勁」(改：更大起來)，一「點」(改：粒)雨會打死幾個人，一直落到暗，到半暝「尾吉未進更寮去」(筆誤，刪)，他頭(漏：家)娘想是因為雨大不好教「他」(改：尾吉)出去，便一同在更寮等到雨「止」(改：歇)，「雨歇」(改：這時)大概是半暝后了。

你想當這時候，一個寡婦，一個強壯的男子，(尾吉還未娶妻)(林註：依原稿)同在寮仔內，他們不是割割過的，「現時那有柳下惠那樣人，」(刪)誰敢保他們能無事？有人講是尾吉用強，究竟怎樣，在那(加：樣)風雨夜中，誰看見？結局是尾吉「中」(改：當)他頭家娘的意，他就佃戶變成頭家了。

「走：呼！」(刪)

前：交纏！

后：好！交纏，——「話還長呢，」(刪)後來就實在有點天意，可見發財也不是隨便。水尾田晚冬因雨水少，播稻仔總沒有好收成，所以多是撒塗豆插

蕃薯。

當「那」(刪)「爽文反」(林註：原在右側畫~~~~以提醒注意，今以「爽文反」表示)的時候，反亂還未到到的幾月前，百姓間的風聲已(改：經)很緊，大家多感到不安，多在準備走反，獨尾吉不信，他原不是怠惰的人，所以田裡的「工作」(改：工作)，依舊照常做去。他五甲多地的蕃薯插完了不久，反亂到了，這時候生命要緊，那顧得蕃薯，尾吉在被同村的人嘲笑之中，和他們一起走反去。

講起爽文反，實在真悽慘，反亂三四年，種不能種，作不能作，百姓只有吃草根吞樹子，有錢沒處去買糧，所以餓死也真不少。像城內外，亂平，走反的回來，看見處處都是死人骨頭，有的全身排在眼床上，逐口灶厝內草都長到厝頂，灶空做了蛇穴，蝙蝠會撲人目矐，慢走的人沒留得一個。萬生反的時候，我已經會曉得了，聽講沒有這次十分一。

亂平，百姓漸漸回來，但是田畑已(加：經)全荒廢「去」(改：了)，耕作也須四五月(加：日)後纔有收成，……

前：小！

后：好，小，——官府只曉得噏錢，收稅，管你百姓怎樣，雖然由商人們運來一些糧食，當時都是步擔，接濟不能周到，萬項都「貴到未曾有」（改：起到真貴）。

這時候尾吉「那」（改：的）五甲餘的蕃薯，他走反前所插的，註死！三四年竟無被人偷掘去，你想！插了三四年的蕃薯，那是滿田都是，層層疊疊，掘起來就是，有的一條一貳「稱」重。那時候一塊銀賣多少斤，你猜一猜看？免著驚，講是頂便宜，六十斤，蕃薯條也值錢，你想！這些蕃薯被他賣多少？

走：唔！這是天作成，……

后：人講福至心靈，這時候他就曉得計算了。永過的田是真俗，不像現今算升算合，一塊銀若是較水尾可以買到一二石，田面又闊，舊丈一甲，（加：差不多有）現今新丈「有」（改：的）二三甲，尾吉將賣蕃薯的錢，攏總買田，無人知道他買到多少，總是收來的噏膾了，年年春，他又勤苦，（加：一年一年），就成了大富戶了。

走：啊！這是一篇真好的富戶人的歷史。

前：台灣的富戶，逐家伙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拚著毛管出汗白手成家的是真少。

走：是，「我做囡仔的時候，」(刪)就「聽見講」(改：是)林老五(加：聽講也)是拐騙當客的錢來起家的。阿罩霧，……

后：「聽」(改：講)到阿罩霧，要講二三日也講勿會完，單就(加：拚)大和尚的事來講，也要講一晷。

前：這一層事，講起來現在也會教人起雞母皮。

走：是「怎樣」(改：啥款?)那樣驚人?

前：大和尚的竹圍被攻破了，一家十幾人男婦老幼，剿到「無留」(刪)一個不留，單單一個五六歲的「男」(林註：衍字)查埔囡仔，無「殺」(改：剗)死，活拿返去。但是斬草總要除根，「這一個囡仔斷不能讓他活著」(刪)：留一把尾終久是有後患，他們想：「處治囡仔，只有活埋較不費「手脚」(改：事)，「這囡仔」(改：所以他)便被「帶到山脚去」(改：毛到塚仔埔去)。擴掘好了教他「臥下去」(改：倒落去)。「他」(改：這囡仔也作怪，

不是講要放尿，就是講要放屎，「幾也擺臥下去」（改：幾下擺倒落去）又再起來。受到主人的命令，要活埋他的人，等得生氣了，看他再要爬起來，便用脚把他踹下去，順用手鋤頭向天靈蓋一擊，這時候，青天白日，忽然「起雷」（改：起了一下雷），這個人也「被扎死」（改：就被損死了）。

走：那有這樣「錯巧」（筆誤，改：湊巧）的事？

后：真真有這「落」（改：號）事，不是「亂講」（改：虛詞）的。

走：后來呢？

后：后來準煞去。

走：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畑，就「安呢」（改：安爾）準煞去？

后：幾千萬的生命！一「個」（筆誤，刪）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改：咯），「也

況」（改：莫說）這小可阿……

前：踢步吞！〔林註：原文看不清楚，最後一字可能是吞。〕

后：好！踢步吞。

走：要到了，講「得」（刪）無幾句話恁真會行。



前：沿路行沿路講，不知「多」（改：道）久，（加：哼！）行要一點鐘了。

歸途我因有些懶，一上轎就睡去了，不知他們再有講些什麼？

八、民間的兒女——相思引言



## 〈相思〉引言

〈相思〉這首歌謠，寫於20字20行的「東京創作用紙」的半頁稿紙上，夾存於賴和的漢詩稿本中。現存日據時代文學刊物、文獻，未見刊出此稿。

由其飛灑的字跡，推斷是行醫之餘，以案頭的鴨嘴筆隨手寫下的歌謠。說不定是患者以歌仔調唱出，賴和采錄下來。

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有一首以筆名懶雲發表的〈相思歌〉，內容不一樣，但與此首是同一性質的歌謠，反映出賴和對於民間文學的關心。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在給《台灣新民報》的編輯黃周（醒民）的信上即言：

講要把民間故事和民謠整理一番，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是大贊成。若不早日著手，怕再幾年，較有年歲的人死盡了，就無從調查。現時一般小孩子所唱的豈不多是日本童謠嗎？想著了還是早想方法才是。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黃周斷言「可見有於固有民族文化保存的人們，都是能得這樣同感贊成」。賴和這類的歌謠作品〈新樂府〉、〈農民謠〉、〈相思歌〉、〈呆囡仔〉……等，即是此種理念的實踐。然而以台灣書面文學（台灣話文）而言，賴和在這首〈相思〉中有些地方仍不得不採用借音的方式表達，如「毋治大」（不相干）、「可憐代」（很可憐）、「無采」（可惜）……等等，這是莫可奈何之舉。

歌謠〈相思〉，表現出台灣人表達感情含蓄的一面，兩人心頭意愛，卻又怕閒言閒語，相思默放內心深處，結尾云「恨無鳥子（仔）雙箇翼，隨便飛入伊房內」，卻又充分顯現了熱情奔放的想像力。收斂與放縱，形成強烈的對比，而未著筆之處，自有餘音嫋嫋。

賴和的確是屬於民間的，是民間的兒女。

## 相思（歌仔調）

阮是兩人相親愛，若無說出恁不知；

阮著當頭白日來出入，共恁外人毋治大。

恁偏愛講人歹話，乎阮驚心不敢來；

娘子疑我甲伊歹，冥日相思真利害。

頭上貼著鬢邊膏，身軀消瘦可憐代；

伊正洗衫我返來，心頭歡喜無人知。

只爲身邊人衆衆，不敢講話真無采；

恨無烏子雙筒翼，隨便飛入伊房內。

九、關於賴和研究的幾點說明



〈新地文學〉於今年（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創刊。其中有三篇論文，許達然：〈台灣文學和歷史〉、松永正義：〈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施淑：〈台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其藝術〉，是一九八八年六月於清華大學召開的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的論文。日本學者松永正義教授的論文是關於拙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的評論論文。會前經旅日學者葉笛翻譯為中文，提供大會宣讀。松永回日本後，再經修改的日文原文〈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發表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六號（綠蔭書房，一九八八年十月），論證比起中文稿更為周延。對於拙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某些質疑、商榷，我以為松永確實抓住了問題的核心，也充分顯示了他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的內行。底下我想約略說明的是：

一、在台灣研究台灣文學是有「禁忌」存在的，尤其處於戒嚴時代。拙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申請了一九八三年度的哈佛燕京學社研究計畫但正式發表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十二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有關弱小民族架構下發展出來的「台灣意識」部份，僅能帶出問題，點到為止。（在處理這一部份，我過於謹慎、小心，雖然研究者都知道歷史命題不能被現實命題干擾，但面對敏感

的問題，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這種情結外國人不易理解。）

二、研究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必須深入當時展開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尤其像賴和這樣的文化人，從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全程參與了文協及新文協的活動，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人物，而且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有極爲深遠的影響，必須了解他在文化、社會、政治運動的位置，對他的意識形態部份能有比較充分的掌握。

三、一九八七～八八年我前往日本進修，就是爲了研究台灣文化協會，並收集有關資料。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協的機關雜誌是《台灣大眾時報》及《新台灣大眾時報》，這一階段新文協的活動，無法單從《台灣新民報》來觀察；賴和出錢出力，與在東京創刊的前述兩個刊物，關係極深；《新台灣大眾時報》的發行人賴通堯，是賴和的堂弟（按家族大排行，賴和向來稱之四弟，戶口登記亦同在一戶），他能前往日本留學是得到賴和的資助。在某一意義底下，賴通堯是賴和的代理人，考察賴和的活動，有些階段應將賴通堯視之爲「影武者」。由此角度觀察，更可以看到賴和的複雜性，研究者如果將賴和簡單化，無法掌握賴和的全貌。

四、爲了強化論證，回國後我寫了〈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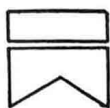


一文，全文分上、下兩期，分別發表於《台灣風物》三十八卷四期，三十九卷一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九八九年三月），扒梳了賴和在台灣文化協會的位置。

五、上文雖非全從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角度著手，但亦引證了賴和部份文學作品做爲例證，也側面回應了松永正義對拙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核心問題的質疑。

六、或許松永正義仍不能滿意。理未易明，衷心希望能再次得到指教；也希望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擺開現實的政治因素參與討論，畢竟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而研究賴和是研究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點。

——一九九〇、四、一六



# 附錄





## 台湾新文学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

——林瑞明「頼和与台湾新文学運動」

『国立成功大学歴史学系歴史学報』12号、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松永正義

この論文を読んでまず感じたのは、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史研究——正確にいえば、日本の植民地支配下における新文学運動史研究——も、いよいよ新しい段階に入った、あるいは、入るべきときに来た、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この「台湾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特集のなかで、単行書でも概括的な論文でもないこの論文をとりあげて、ちょっと物を言ってみたい気になった理由もそこにある。というわけで、まず一九四五年以降の、日本植民地支配下における新文学運動（以下「日抛下新文学運動」と略称する）に関する研究の流れを簡単にふり返ってみることからはじめたい。

一九四五年以降一九七〇年代までの日抛下新文学運動研究の流れ

は、およそ三つの段階に分けて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思う。第一段階は、一九四五年から五〇年前後までの光復直後の時期、いわば日抛下新文学運動の直接の継承と再出発をめざした時期である。文学に限らず、この時期の台湾文化界の課題は、植民地支配の傷痕を克服して、新生台湾文化の再建を推進するための台湾の取り戻し（台湾の固有文化の発掘と、日本時代の文化的抵抗運動の継承）と、中国の取り戻し（五四運動以来の中国新文化運動の学習、継承）にあった。日抛下新文学運動の研究もまた、そうした課題追求の一環として日本時代の文化的抵抗運動の当時者たちの手によって、彼らの光復後の諸活動の一環として行われた。それは歴史的研究という

よりも、現在の活動のための総括とでもいったふうに、当事者たちには意識されて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る。例えば、『台湾年鑑』(一)第十七章文化の章(王白淵執筆)の第一節文学の項で、王白淵はすでに日擬下台湾新文学運動史の簡にして要を得た概括を行っているが、彼はその項を光復後の文学界の沈滞の原因の分析からはじめ、「そして台湾は既に光復した」との象徴的な一句で閉じている。そもそも『台湾年鑑』そのものが、「本省今後の建設は、……(中略)……その着手のはじめには、必ずまず既往の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ぬ(同書序文)」との認識のもとに編まれたものだったのである。また、王詩琅「台湾新文学運動史料」(二)も、台湾文学の方向をめぐる当時の論争のなかで書かれたものだった(三)。

この時期の注目すべきものとしては他に、楊逵の創刊した雑誌『文化交流』創刊号(一九四七年一月)に、「紀念台湾新文学二開拓者」特集として頼和と林幼春をとりあげていること、また、頼和『善惡的人的故事』(民衆出版社、一九四六年。未見)、楊逵『鷺島の嫁入』(三省堂、一九四六年三月。未見)、楊逵『新聞配達夫』(送報社)(台湾評論社、一九四六年七月。未見)などの作品集の出版がある。これらもみな、皇民化運動期の空白を跳び越えて、二、三〇年代の文化的抵抗運動を直接継承するところから、光復後の活動を始めようとする志向の現われ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だが、二・二八事件後まかりうじて継続されていたこうした方向も(4)、五〇年前後の大弾圧によって影をひそめ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後述の葉石濤『台湾文学史綱』に附載された詳細な年表(林瑞明編「台湾文学史年表(未定稿)」)に徴してみても、一九五〇年から五三年までは、作品、評論ともにほとんど見るべきものが記載されていない。戦後文学それ自身の運命にともなつて、文学史研究もまたこうした決定的な断絶を経験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研究史の第二段階は、一九五〇年前後から一九七〇年前後まで、この時期はいわば「保存の時期」とでも名付けられよう。文学に限らず、台湾のことを研究すること自体が危険視されるような雰囲気、若い研究者たちがほとんどこうした研究に見向きもしないような世代の断絶のなかで、かろうじて研究を継続したのは、多かれ少なかれ日本時代の文学活動を経験した人々であり、そのセンター的役割りを果たしたのは、各地の文献委員会であった。なかで特筆すべきは台北市文献委員会の機関誌『台北六六六』(王詩琅)三卷二期、三期(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月)の「新文学・新劇特輯」であろう。同特集は執筆者に日本時代の文学運動の体験者を網羅しており、当事者の証言の書かれることが非常に困難であった状況のなかで、貴重な証言を多数集め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黄得時「台湾新文学運動概観」、廖漢臣「新旧文学之争」、廖漢文(廖漢臣)「台湾文学改

革運動史略」など、現在もなお踏まえらるべき基礎的な研究を多くふくみ、研究の大枠を決定したものと云ってよい。

この時期の他の活動としては、六四年四月に呉濁流の創刊した雑誌『台湾文芸』が、王錦江（王詩琅）「日拠時代の台湾文学」(三期、一九六四年六月)等を掲載し、また、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が第一巻に楊逵、陳火泉、呉濁流など日本時代から活動していた作家の戦後の作品を集めるなど、いずれも当時の土著の文学活動の掘り起こしに力を注ぎながら、日本時代を活動の視野の中に収めていたものとして評価される。また、葉石濤が六五年にすでに「台湾的郷土文学」(5)を書いて、日本時代の文学と戦後の土著の文学を「郷土文学史」として統一的に把握する視点を提出しているのも注目される。以上の三人は、日拠下新文学の七〇年代における再発見にあたって、いずれも大きな役割りを果たしている。

だが、この時期のこうした活動は、いずれも現在のな活動というよりは、歴史の根を絶やさないための意味あいのほうが強か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この時期を「保存の時期」と呼ぶゆえんである。それが現在の活動の踏まえらるべき伝統として正当に位置付けられ、研究されるためには、七〇年代を特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研究史の第三段階は、一九七〇年代、新しいナショナルリズムの勃

興にともない、自らの根ざすべき歴史として、また、反帝國主義運動の踏まえらるべき抵抗の伝統として、日本時代の文化的抵抗運動が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急速に資料の発掘や研究が進展した、いわば再発見と顕彰の時期であるといえよう。こうした動きの最も早い例として、陳少廷「五四与台湾新文学運動」(6)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よう(7)。陳は日拠下新文学運動の歴史を概述しつつ、それを五四運動の直接の影響を受けた啓蒙運動であり、抗日民族運動であると位置付け、自らの現在の運動の掘るべき直接の伝統としてこれを顕彰している。啓蒙と抗日に重点を置いた位置付けに、当時の状況を彷彿させるものがあるが、ともあれ、こうした口火が、当時の思想状況をリードした『大学雑誌』によって切られたことは、いかにもふさわしいものが感じられる。それはいわば、研究の第二段階を媒介しつつ、第一段階の志向性を再現するものでもあ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なお、『大学雑誌』ではこの後も「日拠時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運動座談会」(8)や「文学・時代・伝統」という総タイトルでのインタビュー集(9)を組んで、史実の発掘につとめている。後者はのちに若干内容を変えて『中国現代文学的回顧』(10)としてまとめられたもので、日拠下新文学のみを単独に扱うのでなく、大陸における文学活動や戦後文学と一連のものとしてそれを扱う点に特徴がある。また、陳少廷はのちに『台湾新文学運動簡史』(11)をまとめたが、これは台

湾最初の専著としての栄光を担うものである。ただし、その内容はほとんどすでに『台北文物』の二冊の特集によって知られていた事実のみ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って、いわば再発見の段階の終了とともにその使命を終え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ともいえる。

さて、陳論文の出した翌年には、『中外文学』に連続して顔元叔、張良沢、林載爵らの論文(12)が掲載され、より機運を盛り上げた。前二者は未見なのでなんともいえないが、林論文についていえば、楊述と鍾理和の精神を、郷土に根ざす文学精神の精髓としてとらえ、達成の貧しさをいうまえに、そうした精神をこそ受け継ぐべきであるとする、陳論文よりももう一步内在的な視点から、文学的伝統を掘り起こそ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た。以後、『中外文学』、『幼獅文芸』、『文季』、『夏潮』などの雑誌に、鍾理和(13)、楊述(14)、呂赫若(15)、頼和(16)らの作品が、発掘、掲載されてゆくことになる。さらに、単行されたものとしては楊述(17)、張我軍(18)の作品集、また、いづれも張良沢の編によって、鍾理和(19)、吳濁流(20)、吳新榮(21)、王詩琅(22)の全集などが出版された。

吳濁流の死後、鍾肇政が主編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の『台湾文芸』が、鍾理和、吳濁流、張文環、葉榮鐘、廖漢臣らの特集や、『日拋時期台湾文学日文小説訳作專輯』、『台湾小説中の太平洋戦争経験專輯』などの特集を組み、さらに改組されてのちも、張文環、王詩琅、楊

述、翁鬧、頼和などの特集を組んでいることも忘れられない(23)。

以上のような動きを受けて、日本時代の作品を集めた作品集も、明派出版社の『日拋下台湾新文学』(24)、遠景出版社の『光復前台湾文学全集』(25)の二種類が出され、さらに、日本時代の文学雑誌の主要なものをほぼ網羅して(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関係のものには欠落はあるが)復刻した『新文学雑誌叢刊』(26)が出されたので、先に復刻された『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報』、『台湾新民報』(27)とあわせて、主要な作品はほぼ手軽に読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えてよい。(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関係や日刊後の『台湾新民報』など、まだ容易には読め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また、『日拋下台湾新文学』の第五巻は『文献資料選集』として、日本時代の主要な資料とともに、『台北文物』の特集二冊の主要論文をほぼ収めているから、いわば最底路まえるべきものはほぼすべて、容易に見うる形になったといえてよい。

研究のほうも、先にふれた『中国現代文学的回顧』(注10)、『楊述画像』(注17)のほか、葉石濤『台湾郷土作家論集』(28)、黃武忠『日拋時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伝』、同『文芸的滋味』(29)、彭瑞金『泥土的香味』(30)、高天生『台湾小説与小説家』(31)など単行書としてまとめられてきている。(以上はわたしの見ることのできたもののみを挙げたので、遺漏も多いことと思う)

以上のように見てくるならば、再発見と顕彰の段階は、もはや終

わったものと見ていいだろう。今後は『台北文物』二冊の範囲を超えた資料の博搜による諸事実の発掘と、多様な視点による作品論、作家論の深まりが期待されるところである。では、そのような新しい段階はすでに来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わたしは、来つつあると思う。葉石濤『台湾文学史綱』<sup>22</sup>は、そうした新しい段階への過渡期の産物であるように見える。

鄭炯明の説明<sup>23</sup>によれば、一九八三年の春ごろから『文学界』の同人たち、葉石濤、陳千武、趙天儀、彭瑞金、林瑞明、鄭炯明、陳明台、陳坤崙、曾貴海らによって台湾文学史の撰述が企てられ、資料の収集を行うかたわら、葉石濤によってまず大綱を著すことが決定されたという。『文学界』では、その第5集（一九八三年一月）に、鍾蔭政、鍾理和らによる「文友通訊」（五〇年代に、彼ら同人の連絡、研鑽のために発行されていた非公認の同人通信誌）を収録し、文学史資料の発掘に着手していたが、前述の気運とともにいっそう力が入れられ、八集、九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四年二月）には『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芸欄、十集、十三集（一九八四年五月、八五年二月）には『台湾新生報』副刊「橋」という、いずれも光復直後の重要な新聞の文芸欄の主要作品を収録し、また葉石濤による文学史大綱は、12集、13集、15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五年二月、八五年八月）に掲載された。『台湾文学史綱』は、この葉石濤による

本文と、林瑞明による詳細な年表「台湾文学年表」という労作をあわせ収録したものである。

『台湾文学史綱』の刊行は、二つの点で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と思う。第一に、光復直後の重要な資料の発掘を踏まえて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それゆえ、本書のその部分は、もっともすぐれた部分とな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それだけに、本書の日本時代を扱った部分は、基本的にはこれまでわれわれの知っていたことの整理を出していない点は、残念に思われる。

第二に、清代から日本時代、そして戦後までを、一貫した歴史として扱っていること。これまで、日本時代や戦後文学のそれぞれの通史はいくつか書かれてきているが、それらを一貫して扱ったものは本書がはじめてであり、語の真正の意味での台湾文学史は、本書をもって嚆矢とするといつてよい<sup>24</sup>。

以上の二点によって、本書の出現は、文学史研究がこれまでの再発見と顕彰の段階を超えて行われるべき段階に入ったこと、すなわち日抛下新文学の研究についていえば、『台北文物』二冊の枠を超えて、新たな資料の発掘や、新たな視点による研究の行われるべき段階に入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もののように思われる。

では、本論文のテーマである頼和についてはどうか。これも本文末につけた「頼和研究文献目録」を見ていただければ、右のような流



れの中にあつ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いただけよう。すなわち、第一段階ではただちに作品の刊行が行われ（文献目錄9、10）、第二段階の『台北文物』でも13などで触れられていたが、その後忘れられ、14に到つてまさに「頼和とは誰か？」のタイトルのもとに再発見された作品のすべてと、未発表草稿の一部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再発見のサイクルは一応完結したわけだ。研究についていえば、14、19、22、29、34などはみな再発見に主眼を置いたものといえる。なかでは、19がこの時期を代表するすぐれた論考といえる。だが、20の刊行によって再発見の段階はもはや終わつていくといつてよく、24、25、26は、さすがにそれを踏まえて、視点の上で新しいものを見せてはいるが、資料的には20の範囲内にあるものといつてよい。これらに対して、ここに扱う林瑞明の論文は、頼和の未公開の稿本を精査し、また周辺資料を丹念に拾つて、頼和のこれまで知られてこなかった側面や伝記的事実をうかがひ上げさせ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頼和文学の持つ問題点についても一歩つこんだ分析を行っている点で、まさに研究の新しい段階を示すものとなつていふように思われる。

林瑞明は一九五〇年生まれ、台湾大学歴史学系に学んで、現在成功大学歴史学系で講ずる歴史学者であるが、また、林梵という筆名

で『失落的海』（環宇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九月、未見）、『流転』（鴻蒙文学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七月）、『未名事件』（同前）の詩集を持つ詩人でもある。また、文学史家としてもすでに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うちに、『楊逵画像』①の作者として、また『文学界』における資料発掘の中心的メンバーのひとりとして、さらに労作『台湾文学年表』②の作者として触れてきたとおりであり、七〇年代からすでに単なる顕彰にとどまらない、すぐれた仕事をしてくている。

というわけで、いよいよ本論文の紹介に入るわけだが、その前に頼和について簡単に述べておいたほうがいだろう。

頼和は一八九四年、日本による台湾占領の前年に生まれた。台北医学校卒業後、一九一七年から一九年まで厦門の博愛病院に勤務したほかは、おおむね故郷の彰化で開業、気さくで面倒見のいい名医として、民衆にしたわれたという。二一年文化協会成立とともに理事となり、抗日文化運動にも尽力し、二三年の台湾治警事件で入獄している。文化協会分裂後は文化協会代表となり、また民衆党幹事ともなったことからわかるとおり、党派にこだわらない立場から広く運動に関わっていたが、どちらかといえば左派のほうにシンパシーを持っていたようだ。二五年に書いた散文の「無題」は、台湾最初の白話文による作品で、以後実作面で白話文による新文学運動をリードし、また『台湾民報』文芸欄の編集責任者として後輩を育て

るなど、台湾新文学運動の育ての親ともいふべき位置にあった。作品は虐げられた民衆の生活を描くものが多く、素朴だが当時の状況を彷彿とさせる、すくれたものとなっている。彈圧の強まった三六  
年以降は筆を断った。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翌日、  
投獄され、翌年一月に出獄したが、獄中に得た病がもとで、四三年  
一月に逝去。その生涯はほぼ日本による台湾支配の全期間にあたる。  
さて、この頼和について、本論文ではつぎの九章に分けて論じて  
いる。

- 一、前言——文学と時代
  - 二、民族意識と復元会
  - 三、民間より出て民間へ返る
  - 四、旧文学から新文学へ
  - 五、初期作品の白話文の運用
  - 六、文学創作と文学活動
  - 七、路線の転折——「前進」の検討
  - 八、文学内容の分析——作品の芸術性と思想性
  - 九、結論——頼和の文学史上の位置
- 以下この章立てにしたがって、内容を見ていこう。
- 本論文はおおむね頼和の一生を順を追ってたどりながら、同時に  
章ごとにひとつのトピックをもって、頼和におけるその時期ごとの

問題点を集中的に分析する構成をとっているが、このうち「二、民  
族意識と復元会」は、総督府医学学校時代のトピックとして、頼和が  
復元会に加入していた可能性の高いことを論じ、つづいて「三、民  
間に出て民間へ返る」では、厦門時代の心境を中心に論じ、この二  
章によって、文学者となる以前の頼和の思想、ことにその民族意識  
との関わりが分析されている。この時代の頼和については、これま  
での頼和論では、まったく論じられたことがなかった。

復元会とは、王兆培、翁俊明らによって、総督府医学校を中心に  
作られた、中国革命同盟会の外郭団体であるが、いまのところその  
会員についてはごく少数しか判明していない。林瑞明は、頼和がそ  
の会員であったらうと思われる理由を多数あげているが、いまそ  
の主なものを摘記してみると、①頼和の未刊の稿本に、この頃の作  
として「登楼」と題する七律があるが、この楼とは復元会の集會に  
よく使われていた江山楼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またその尾聯に「かく  
の如き江山ついに淪没し、いまだ知らず、この責誰かになわんとす  
るか」とあるのは、復元会の趣旨である「光復台湾」の意志を示  
す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こと。②頼和が日本語、日本の年号を使わな  
かったこと、また、のちの詩社応社の設立趣旨書に見られる民族意識  
などの志向性。③頼和の孫文に寄せる気持ち。④頼和がこの頃翁俊  
明、王兆培らと写したとみられる写真が残っていること。⑤同盟

会、復元会員であった社總明との親しい関係。⑥翁俊明との関係でいえば、賴和の廈門行きも、翁との関係が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こと、また、四一年の賴和の逮捕は、翁との関係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らしいこと、等々。以上のような林瑞明の推論は、十分に説得的であり、かつ、その推論の過程で、賴和の民族意識のありようが、おのずと浮かびあがってくるしかけになっている。

つぎに廈門時代だが、それを論ずる前に、林瑞明はまず賴和の家系をたどって、その祖父が、戴万生事件でその起義に積極的に参加したために零落し、後年は宗教的民間芸能者として身を立てたこと、その父もそれをついで道士を業としたことを述べ、こうした民間習俗と密切な関わりを持つ「小伝統(Little tradition)」の中の幼年時の生活は、賴和の民衆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上で重要であろうと指摘する。ついで、漢学塾の先生の影響にふれて、そうした「大伝統(Great tradition)」の受容が、賴和の民族意識をより明確なものとしたであろうとする。これに、先に見た復元会と関わる民族主義を加えたものが、賴和の廈門行直前の思想のありようだといことになる。

つづいて本章では、廈門当時の未発表草稿中の旧詩の検討を通じて、廈門時代の賴和が、五四運動以後の反日気運の高まりと、台湾総督府の対岸政策の一環として建設された病院の勤務医という自ら

の身分との矛盾、および、自らのいたく民族意識と、大陸の現実への失望との矛盾に苦しみ、いわば挫折した心情をもって台湾へ帰ったことが論証され、帰台後は一介の町医者として過ごしたことが、「民間より出て民間へ返った」と評価される。

賴和のいだいた矛盾とは、おそらく理念としての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によって新たな認識の目を開かれながら、實際の大陸の政治過程からは疎外された位置に立たされてしまったことからく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大陸にある者にとっては疎外されようと思われまいといわばいやおうのないものであっても、台湾から渡った者にとっては、日本植民地支配下へ返るといふことがあるわけで、そのことは必ずしも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を棄てることを意味しはしないし、また、民間へ返る(本土回帰)ことが、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と矛盾するわけでもないが、しかし、そこにある種の空隙が生ずることも十分想定できることであろう。そうした事情は、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児』の大陸に関わる部分にも見られる。台湾における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の意味をどう考えるかは、現在の統独問題の帰趨を考えるうえでもカナメとなるほどの大きな問題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そうした問題をどう考えるかは重要な問題であろう。本論文ではいわばそうした問題のトバ口のところを提起され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が、それにしても、未公刊草稿中の幾首かの詩

をさがし出すことによってこうした問題を他ならぬ頼和について提起しえたことは、本論文の功績と云ってよい。事がここまで進んできた以上、もはや今後の研究においては、言葉の上で中国を主張したとか、台湾を主張したとかいったアリバイ捜しの域を超えた、よりつっこんだ分析が行われてゆかねばなるまい。

さて、つぎに「四、旧文学から新文学へ」、「五、初期作品の白話文の運用」の二章は、白話文による創作を開始するまでの、いわば文学者頼和の形成過程を扱う。

「四」では、まず、初期の頼和の文学的養育として、伝統文学と、日本での翻訳を通じてのユーゴー、ツルゲーネフ、ロープシンなどの西洋文学とをあげ、それらが五四新文学運動の影響によって、白話文による創作へと開花したとする。さらに、未刊稿本の調査によって頼和がすでに二一年には文言と白話を交えた詩の創作を試みており、二三年には完全な白話による新体詩を作り（公開された台湾最初の新体詩は、同年の謝春木による日本語の詩）、二四年には多数の白話詩を作っていること、すなわち張我軍が白話文による新文学を提唱する以前に、すでに白話文による創作の練習を積んでおり、それが頼和の公開された最初の白話文の創作であり、かつ台湾新文学運動の第一歩とされる「無題」(二五年)の基礎となつていゝることを論証する。ここに引用された稿本中の白話詩によって、わ

れわれは当時の頼和の思想が、五四運動に見られた新しい思想を、いかにもみずみずしく体現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を知ることができ

る。

ついで「五」では、初期作品の文章の分析を通じて、頼和の文体が基本的には中国白話文によるもので、台湾語の語彙、構文から離れた異質の文体として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を論証し、このことは「台湾新文学の出現のはじめから、中国白話文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を証明するに足りる。もし日本の影響を受けたとすれば、その歩んだ方向は、べつの様相を持っていたらう」と指摘する。ただし、頼和はその文脈の中に、台湾語の語彙、構文を導入して、台湾的な色彩をうまくもし出していることをも、林瑞明は周到に分析している。また、『台湾民報』文芸欄の編集にあたって、頼和が投稿作品の文章にいてねいに手を入れたことを指摘し、白話文の草創期にみごとな白話文による実作を提示したこととならんで、白話文の能力が、頼和が台湾文壇に重きをなした重要な理由のひとつであらうとしている点も注目すべき見解と思われる。

「六、文学創作と文学活動」は、頼和の白話文による全創作を概観したもの。それについてはいふべきことはないが、ただ、最後に注意しておくべき指摘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頼和は三〇年以來提起された「台湾話文(台湾語による表記)」に賛成し、三二年一

月にはこの問題に関する文章を書いているが、それ以後しばらく（三四年十一月？）の「普遍的人的故事」まで、創作の筆を絶ってしまう。そのことは、頼和がこの問題に深く悩んでいたことを示す、というのも、台湾語による創作を開始することは、中国白話文による創作を開始するのとほとんど同じくらしいエネルギーを要する難事であるからだ、と林瑞明はいう。そして、三五年に頼和の最後の作品となった「一個同志的批信」が台湾白話文によって書かれるが、これは明らかに失敗であった、そしてこの失敗が、以後頼和が筆を絶った理由である、と林瑞明は指摘する。いまその結論を引用してみよう。頼和はその漢文の基礎と民族意識とによって、中国白話文に対して深い感情をいだいており、また中国白話文をよくこなしえたために、台湾新文学史上の最初の作家として現われることとなった。一九三一年以後本土意識がますます強まり、台湾話文による創作を試みたが、結果は明らかに失敗であった。そして頼和は沈黙した。」

三〇年代の三七年までの間は、台湾新文学史上もっとも実り多かつた時期とされるが、頼和のこの間の創作力は、質量ともに衰えており、三六年以後はまったく新文学の創作を絶ってしまう（伝統詩は作っていた）。この頼和の沈黙の原因を、林瑞明はいわば中国近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台湾本土意識の矛盾に見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だが、この指摘は必ずしも十分に論証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ない。というのも頼和自身はこのことについて何も語っておらず、むしろ頼和が何も語っていないという事実そのものが、右のような想定を呼びおこす最大の原因となっているからだ。それゆえ、林瑞明の指摘は、頼和の沈黙に対する氏の「読み」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それは「三」でみた中国近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台湾における意味の問題と呼応しつつ、「九」の結論における頼和評価の問題へとつながっていく「読み」なのである。それゆえ、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結論に触れるところで再度考えてみるとして、いまは先へ進もう。

「七、路線の転折——「前進」の検討」について。一九二七年、台湾文化協会は社会主義派と民族派に分裂し、文協は左派の占めるところとなり、民族派は台湾民衆党を作る。「前進」はこの分裂後の文協機関誌『台湾大衆時報』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この分裂前後の状況に対する頼和の気持ちのこめられた、寓言ふうの散文である。本章ではこの「前進」前後の頼和を分析して、頼和が左派のほうにシンパシーを持ち、これを応援していたが、台湾共産党とは一線を画しており、また、民族派とも協同し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頼和の思想は基本的には民族思想であって階級思想ではなく、その立場は、広義の社会主義への傾向を持つ人道主義にあったとする。過不足な

い評価であると思う。また、未刊の遺稿（全集にも収録）「社会」の分析を通じて、頼和が民衆に対して持っていた同情と一体感、また逆に、文化協会幹部などの上流意識や贅沢な生活への反感が、右のような左派へのシンパシーの基盤に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点も、十分にうなずける。

「八、文学内容の分析——作品の芸術性と思想性」は、頼和の小説を中心に、その中に表現されている旧社会への批判（反封建）と植民地支配への諷刺（反帝）、およびそこにこめられている抗辯精神を分析し、さらに、こうした小説のリアリスティックな作風に対して、詩作品にはより主観的な理念、理想が表現されていることに注目している。特にその、植民地支配下における「死」から「再生」へ到る転換を支える頼和のキーワードとして「覚悟」をあげているあたりは、説得的である。

以上ここまで紹介してきた部分は、いずれも未刊資料等の丹念な調査に基いた創見であって、教えられるところが多かった。頼和についてそう熱心に読んできたわけではないわたしには、これ以上いうべきことはない。

さて、そこで「九、結論——頼和の文学上の位置」であるが、林瑞明による頼和の位置づけは、おそらくつぎのことばに集約されていよう。曰く、「頼和はまず中国白話文で創作し、これに台湾の語調

を加えて、台湾的色彩を濃厚にした。そこには自ずと台湾意識がそなえられているが、それは日本時代には日本意識と対立するものであって、中国意識と対立す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その後、本土的色彩が濃厚になってくるにしたがって、徐々に弱小民族意識が現われてくるが、これは日本の高圧的統治下において必然の反応であった。台湾の出路はどこにあるか？ 一九三〇年代には、これはまだ未解決の問題であった。」

本土的色彩といい、弱小民族意識といい、いくらかわかりにくい「三」および「六」で見えてきたところと考えあわせれば、それは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という視点からの総括ではくりきれないある意識をさす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林瑞明の頼和評価は、中国近代ナシ・ナリズムと、この「弱小民族意識」との間を、いわば橋渡し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そしてその背景には、頼和の名誉回復時における頼和評価の対立や、また、その奥にある「中国意識」「台湾意識」の問題などが存在していよう。

一九五一年、頼和は抗日烈士として彰化の忠烈祠に祀られたが、五八年、台湾共産党関係者であったとして、忠烈祠から除かれた。その後八四年にいわば名誉回復され、再び忠烈祠に祀られることとなった<sup>(28)</sup>。同年一月には、それを記念する講演会が開かれたが、党外雑誌の中にはその講演会を批判するものもあったという。わた

しはそのことを文献目録37の王曉波の文章によって知っているだけなのでその内容に立ち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おそらく批判はその講演会の基調を統一派的なものともみなしての、台湾意識派からのもの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時あたかも「中国結」「台湾結」の論争のまっ最中であつた。こうした問題を頼和評価の問題にひきつけていえば、その中国ナシヨナリズムの契機を重視するか、民衆と密着した本土的色彩を重視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わたしは先に、林瑞明は綱渡り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と書いたが、それはこの両者のいずれか一方を安易に裁断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はなく、また安易にこれを折衷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はなく、あたうかぎり頼和の作品自体に密着しながら、その両者を架橋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かに見えるからである。とりわけ、中国近代ナシヨナリズムの視点のみではぼ割り切れるかに見える頼和について、それを十分に踏まえつつも、そこに疑問を投げかけ、それによって中国近代ナシヨナリズムの台湾における意味そのものをはじめめて問おうとしたというか、そのように問題をたてることを可能にした功績は大きいと思う。もちろん、ことわるまでもないことだが、「意味を問う」とは、それが台湾にあったか、なかったかという、いわばアライバイがしをすることではない。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本論文は、アライバイがしのレベルを超えて、問題そのものを問うためのトバ口に立つ

ているといつてよい。

だが、綱渡りに見えるのは、そこに一種の危うさが感じられないわけでもないからであつて、それはおそらく林瑞明のいう「弱小民族意識」の内実が、頼和の作品自体によって論証さ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いつに頼和の沈黙に対する林瑞明の「読み」にかかっているかに見えることによる。そしてその問題を解明するには、おそらく頼和論のみでは不十分なのであつて、頼和をとりまく台湾の文学史そのものの研究の深化こそが必要であるように思われる。三〇年代の「台湾話文」の提唱についても、民衆化の方向（黄石輝ら）と本土化の方向（郭秋生ら）の二つの方向があり、必ずしも単一の方向性にくく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かつたように思われるし、三〇年代の台湾文学の傾向を「本土化」というふうに総括できるかどうかとも問題であろう。白話文による創作を夭折させたものについていえば、台湾文学の日本語化という問題があるし、また、台湾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形成と、そうした日本語化の趨勢が重なりあう部分があるとしたら（楊達の例など）、それと白話文による新文学とはどのような脈絡でつなが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もある。

さらに、これらの問題の背景として、台湾の抗日運動における中国近代ナシヨナリズムの意味をどう考える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る(36)。それはたしかに台湾における抗日運動の形成に決定的な影響を与え

たが、三〇年代後半以降は、台湾島内においては表現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二者択一の立場に立てば、そのいずれか一方の時期が本来の姿であって、他方の時期は変態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とになるが、そう考えないとすればどうなるのか。林瑞明の立っている場所は、そのような場所であるように見える。

林瑞明のいう「弱小民族意識」とは、おそらく中国近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を変態として退けるものではなく、また単にその延長線上にあるものでもない、ある悲しみの質のようなものをとりあえず名づけているのであって、林瑞明はそれを頼和の沈黙のなかに読むことによって、頼和の人間像にある拮抗する矛盾としての形式を与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そしてそれは、自らの中にある矛盾からこそ出発しようとする林瑞明の立場を示すものでもあるように、わたしには読めるのだが、どうだろうか。

以上、学術論文の評としては、余りに読みこみの強すぎるものとなつてしま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が、本論文を読んでわたしの感じた新しさを説明するとすれば、これだけのことはいってみ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ように思う。その当否は別として、そんな気にさせられてしまったのは、本論文の筆者が、単なる学術研究としてではなく、まさに台湾の文学の現在に身を置いて仕事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らう。

## 頼和 研究文献目録

- 1 飯文（廖漢臣）「諸同好者の面影」、『台湾文芸』2巻1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 2 王錦江（王詩琅）「頼和雲論」、『台湾時報』202号、一九三六年八月
- 3 台湾新民報社「台湾人士鑑」、『台湾新民報社』一九三七年九月
- 4 楊雲萍「頼和氏追憶」、『民俗台湾』3巻4号、一九四三年四月
- 5 楊達「頼和先生を憶ふ」、『台湾文学』3巻2号、「頼和追悼特集」、一九四三年四月
- 6 朱石峰「頼和先生の思ひ出」(同前)
- 7 守愚（楊松茂）「小説と頼和」(同前)
- 8 頼和「私の祖父」高木友枝先生「(同前)」
- 9 頼和「善訟的人的故事」(民衆出版社、一九四六年?) ※未見
- 10 楊達「幼春不死、頼和猶存」(『文化交流』1号、「記念台湾新文学」開拓者」特集、一九四七年一月)



- 11 賴和「賴和先生遺稿集」(同前) ※「查大人」「溪水漲」をふくむ
- 12 中村哲「知識階級の政治的立場」(東京・小石川書房、一九四八年一月) ※「台湾の賴和氏」をふくむ
- 13 一剛(王詩琅)「懶雲做城隍」(「台北文物」13卷2期、一九五四年八月)
- 14 梁德民(梁景峯)「賴和是誰?」(「夏潮」1卷6期、一九七六年九月)
- 15 賴和「不如意的過年」「前進」「南国哀歌」(同前)
- 16 台湾作家選集編委會「台湾作家選集」(香港・台湾作家選集編委會、一九七六年十月) ※「觉悟下的犧牲」をふくむ
- 17 賴和「一桿秤仔」(「夏潮」2卷3期、一九七七年三月)
- 18 賴和「善訟的人的故事」(「夏潮」2卷6期、一九七七年六月)
- 19 林辺(林載爵)「忍看蒼生含辱——賴和先生的文学」(「台湾文芸」61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 20 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同編「日坵下台湾新文学」明集の第1巻、明源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 ※賴和のほほ完璧な全集であり、附録として本目録の1、2、4、5、6、7、13、14、19他をふくむ
- 21 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湾文学全集1 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 ※「鬪鬪熱」「一桿秤仔」「不如意的過年」「惹事」「覺作」「善訟的人的故事」をふくむ
- 22 黄武忠「日坵時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伝」(事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八月) ※「台湾新文学開拓者——賴和」をふくむ
- 23 張葆華編「台湾作家小説選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一桿秤仔」「不如意的過年」「可憐她死了」をふくむ
- 24 花村「従旧詩詞起家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賴和」(「台湾文芸」80号、「賴和專輯」、一九八三年一月)
- 25 陳明台「人的確認」(同前)
- 26 施淑「秤子与称鐘」(同前)
- 27 王晋民、鄭白曼編著「台湾与海外華人作家小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 ※「賴和」の項をふくむ
- 28 陸士清等編「台湾小説選講」(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 ※「一桿秤仔」「不如意的過年」をふくむ
- 29 黄武忠「文芸的滋味」(自立晚報社、一九八三年十月) ※「日坵下的小民悲歌」をふくむ
- 30 「中国現代短編小説析」(長安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 ※「一桿秤仔」をふくむ

31 汪景寿『台湾小説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 ※「頼和」をふくむ

32 「頼和先生平反紀念集」(彰化・紀念頼和先生九十冥誕籌備会、一九八四年四月) ※未見

33 黃得時「台湾新文学播者——頼和」(『聯合報』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六日) 未見

34 高天生『台湾小説与小説家』(前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

※「覚悟下の犠牲」をふくむ

35 「頼和短篇小説選」(北京・時事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斗鬧熱」他九篇の作品と、許覚民「台湾文学的奠基者——頼和先生」および本目錄の17をふくむ

36 林瑞明「頼和与台湾新文学運動」(『国立成功大学歴史学系歴史学報』12号、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37 王曉波「被顛倒的台湾歴史」(帕米爾書店、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台湾新文学之父——頼和与他的思想」讀平反頼和先生以慰抗日同胞英靈「台湾新文学之父頼和先生平反的經過」鎮倒了的是非一定要顛倒過來——為頼和先生平反而作「有聞頼和先生的忠奸之弁」の五篇の論文の他、附録として八四年二月の「慶賀頼和先生平反講演会」の講演筆記(陳映真、居伯均、侯立朝、楊達、陳若曦、葉石濤、鐘肇政、黃順興、鄭学稼、李篤恭、李南衡、王曉

波、黃得時、楊雲萍、頼榮、胡秋原による)をふくむ

38 李魁賢「頼和詩中的反抗精神」(『笠』111期、一九八二年十月)のち「文学的道路」新地出版社、一九八五年に収録)

39 葉寄民「不死的野草——台湾新文学的奶母頼和」(『台湾學術研究會誌』2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40 巫永福「台湾新文学運動与頼和」(『文学界』26期、一九八八年六月)

注

(1) 台湾新生報社編『台湾年鑑』(同社、一九四七年六月)

(2) 王錦江(王詩琅)「台湾新文学運動史料」(新生報副刊「文芸」、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文学界』十集、一九八四年五月、に収録)

(3) これらより早く、楊雲萍「台湾新文学運動的回顧」(『台湾文化』一期、一九四六年九月)があるが、未見のためここでは触れなかった。

(4) こうしたものの存在を發掘したのは、『文学界』十集(一九八四年五月)の特集「台湾新生報「橋」副刊小説選刊」(「橋」は一九四七年八月から四九年三月まで発刊された)をはじめとする努力(後述)の大きな功績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 (5) 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九十七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のち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に収録)
- (6) 陳少廷「五四与台湾新文学運動」(『大学雜誌』五三期、一九七二年五月)
- (7) 陳少廷論文の前年に、黃得時「台湾光復前後的文芸活動及民族性」(『新文芸』一九〇期、一九七一年一月)、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台湾文学」(『幼獅文芸』二二六、二二二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二年五月)があるというが、いずれも未見なのでここには触れない。黃得時、吳瀛濤とともに第一段階、第二段階の研究の担い手たちと同じ世代の人々であるが、同年には、これも同じ世代の筆者たちによる、葉榮鐘等編『台湾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一九七一年九月)の労作も出ており、機は熟していたとい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 (8) 「日据時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運動座談会」(『大学雜誌』七九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 (9) 『大学雜誌』一一九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同号に全巻をこの特集にあてている。
- (10) 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国現代文学的回顧』(龍田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 (11) 陳少廷『台湾新文学運動簡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五月)
- (12) 顏元叔「台湾小説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学』二卷二期、一九七三年七月。未見)、張良沢「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中外文学』二卷六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未見)、林載爵「台湾文学的兩種精神」(『中学文学』二卷七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 (13) 鍾理和「貧賤夫婦」など四篇(『文季』二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 (14) 楊逵「模範村」(『文季』二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鶴媽媽出嫁」(『中外文学』二卷八期、一九七四年一月)、「送報夫」(『幼獅文芸』二四九期、一九七四年九月。未見)
- (15) 呂赫若「牛草」(『夏潮』一卷五期、一九七六年八月)
- (16) 賴和研究文献目録の15、17、18。
- (17) 楊逵「鶴媽媽出嫁」(張良沢編、大行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五月。のち、香草山山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五月、として再刊)、「羊頭集」(輝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また、楊逵論を集めたものとして、楊素娟編『庄不扁的玫瑰』(輝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さらに、伝記として本論文の筆者林梵(林瑞明)による『楊逵画像』(筆架山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九月)がある。『楊逵画像』は、楊逵の農園で一年の生活と労働を共にするな

かから書かれた労作である。

九七九年三月

(18) 『張我軍』張我軍文集(張光直編、純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八月)

(25) 『光復前台湾文学全集』(十二卷、遠景出版社)は、一々八卷

(19) 『鍾理和全集』(張良沢編、八卷、遠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

は鍾肇政、葉石濤の編で小説を集め、一九七九年七月の刊、九  
々十二卷は羊子喬、陳千武の編で詩を集め、一九八二年五月の  
刊。

(20) 『吳濁流全集』(張良沢編、六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九

(26) 『新文学雜誌叢刊』(十七冊、景印中国期刊五十種の第二十九

月)

種、東方文化書局、一九八一年三月)

(21) 『吳新榮全集』(張良沢編、八卷、遠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

(27) 『台湾青年』(景印中国期刊五十種の第十二種、東方文化書

月)

局、『台湾』(同第十三種)、『台湾民報』、『台湾新民報』(同第十四

(22) 『王詩琅全集』(張良沢編、十一卷、德馨室出版社、一九七九

種) 出版年は不明。

年六月)

(28) 葉石濤『台湾郷土作家論集』(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

(23) 鍾理和は五四期、一九七七年三月、吳濁流は五八期、一九七

(29) 黄武忠『日坵時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伝』(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八月)、『文芸的滋味』(自立晚報社、一九八

一九八三年三月、葉榮鐘は六二期、一九七九年三月、廖漢臣は

三年十月)

七二期、一九八一年五月、日本文學訳作専輯は六三期、一九七

(30)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東大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四月)

九年七月、太平洋戦争経験専輯は七七期、一九八二年十月、王

(31) 高天生『台湾小説与小説家』(前衛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詩琅は九一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楊逸は九四期、一九八五年

(32) 葉石濤『台湾文学史綱』(文学界雜誌社、一九八七年二月) 葉

五月、翁鬧は九五期、一九八五年七月、賴和は八〇期、一九八

石濤の本文と、林瑞明『台湾文学年表』を収む。

三年一月。

(33) 鄭炯明『為』(台湾文学史綱)的出版說變句話』(『文学界』20

(24) 李南衡編『日坵下台湾新文学』明集(五卷、明潭出版社、一

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34) もっとも、日本時代と戦後を通観する試みが、これまでもなかつたわけではない。例えば『中国現代文学的回顧』(注10)がそうであるし、また、台湾の現代文学の面白さをわれわれに教えてくれた『台湾作家選集』(香港・台湾作家選集編委会刊、一九七六年十月)が、その巻頭に頼和の作品を掲げていたのも忘れられない。

(35) この間の経緯については、王曉波「台湾新文学之父頼和先生平反的経過」(『文季』一卷五期、一九八四年一月。のち王曉波『被顛倒的台湾歴史』、帕米爾書店、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所収)に詳しい。

(36) 台湾の抗日ナシヨナリズムの動態を、二七年前後の「台湾解放イメージ」の分岐に即して分析したものとして、若林正丈「台湾抗日ナシヨナリズムの問題状況・再考」(同著『海峡——台湾政治への視座』、研文出版、一九八五年十月、所収)がある。林瑞明のごこでの仕事は、そうした分岐を、ひとりの作家の主体の問題としてとらえることで、その意味を問お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 初出一覽表：

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12 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1921~1931)

台灣風物 38 卷 4 期 ~ 39 卷 1 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 一九八九年三月

賴和〈獄中日記〉及晚年情境

台灣風物 41 卷 1 期  
一九九一年三月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

國文天地 7 卷 4 期  
一九九一年九月

賴和的文學及其精神

台灣風物 39 卷 3 期  
一九八九年九月

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

台灣文藝創新 7 號  
一九九一年十月

〈富戶人的歷史〉導言

文學台灣創刊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民間的兒女——〈相思〉引言

彰化人 11 期  
一九九二年一月

關於賴和研究的幾點說明

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1期  
一九九〇年四月